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八章（中）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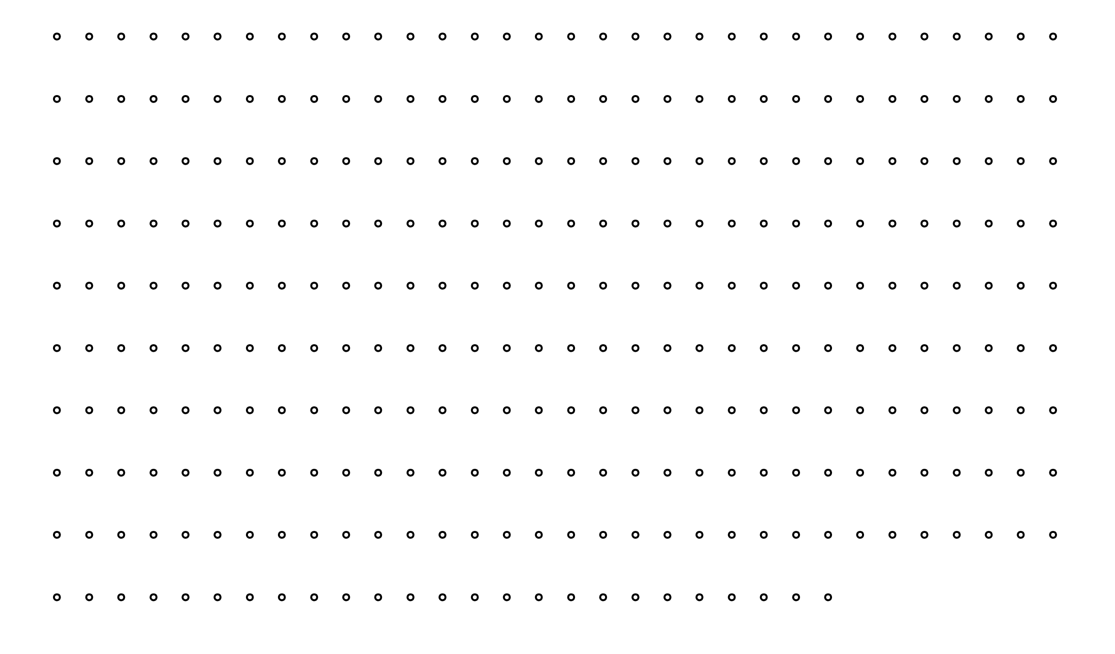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第八章

1966年-1976年

——————————————————————————————————

非洲、中南美洲、亚洲、中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Africa

非洲经济

统计数据

人口　13.07 亿 (16%; 2019)

国内生产总值　　　2.6 万亿美元（名义；2019 年）

6.7 万亿美元（购买力平价；2019 年）

GDP增长　　 3.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70 美元（2020 年；第 6 名）

百万富翁（美元） 140,000 (0.011%)

失业 15%

截至 2019 年，约有13 亿人生活在非洲54 个国家。非洲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陆。最近的增长是由于商品、服务和制造业的销售增长。西非、东非、中非、特别是南部非洲，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29 万亿美元的总GDP。

2013 年 3 月，非洲被确定为世界上最贫穷的有人居住的大陆；然而，世界银行预计，大多数非洲国家将达到“中等收入”状态（定义为，如果目前的增长速度持续到2025年，至少每人每年US $1000）。

截至 2013 年，非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陆，年增长率为 5.6%，预计 2013 年至 2023 年间GDP平均每年增长 6% 以上。2017 年，非洲开发银行报告称，非洲是世界上增长第二快的经济体，并估计 2017 年平均增长将反弹至 3.4%，而 2018 年的增长预计将增长 4.3%。整个非洲大陆都在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实现了 6% 或更高的增长率，另有 40% 的国家以每年 4% 至 6% 的速度增长。一些国际商业观察家也将非洲列为世界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

历史

在城市和王国之间发展的广泛贸易路线的推动下，非洲的经济是多样化的。一些贸易路线是陆路，一些涉及河流航行，还有一些在港口城市周围发展。大型非洲帝国因其贸易网络而变得富有，例如古埃及、努比亚、马里、阿散蒂和奥约帝国。

非洲的一些地区与阿拉伯王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非洲人已经开始大量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发展，连同寻找通往印度洋的贸易路线的经济潜力，将葡萄牙人作为帝国力量带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利益创造了新的产业来满足欧洲对棕榈油、橡胶、棉花、贵金属、香料、经济作物等商品的需求，并将沿海地区与大西洋经济结合起来。

20 世纪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吞噬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的经济反弹已经很明显。

非洲经济繁荣的曙光（自 2000 年代以来就已经存在）被比作1970 年代后期以来在亚洲出现的中国经济繁荣。2013 年，非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七个经济体的所在地。

截至 2018 年，就名义 GDP 而言，尼日利亚是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南非；就购买力平价而言，埃及仅次于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拥有非洲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存在侵犯人权的指控。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加蓬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博茨瓦纳成为 21 世纪以来的主要经济体，而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国家之一，但却由于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战争和劳动力的人才流失，已经被列入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名单。博茨瓦纳仍然是非洲经济繁荣期最长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繁荣期最长的地区（1966-1999 年）。

当前条件

数据表明，非洲大陆的部分地区现在正在经历快速增长，这要归功于它们的资源和日益稳定的政治，并且“自 2007 年以来和平水平稳步提高”。

增长最快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07年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包括毛里塔尼亚，增长率为 19.8%，安哥拉为 17.6%，苏丹为 9.6%，莫桑比克为 7.9%，马拉维为 7.8%。其他包括卢旺达、莫桑比克、乍得、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尽管如此，非洲许多地区（包括津巴布韦、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增长一直令人沮丧、消极或缓慢。许多国际机构越来越有兴趣投资于新兴的非洲经济体，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非洲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非洲的投资回报率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

为了支持非洲的经济发展，一些国际机构正在解决债务减免问题。1996 年，联合国发起了HIPC倡议，随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基金以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DRI) 的形式推动。截至 2013 年，该倡议已向 30 个非洲国家提供部分债务减免。

贸易增长

贸易在 21 世纪初推动了非洲经济的大部分增长。中国和印度日益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非洲12.5%的出口对中国，4%对印度，占中国进口的5%，印度的8%。五国集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非洲出口的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市场。

未来

非洲经济——随着贸易的扩大、英语技能（许多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官方语言）、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预计未来将继续表现得更好。2011 年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为 1660 亿美元。

到 2035 年，非洲会经历“人口红利”，届时其年轻且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将减少儿童和退休人员作为受抚养人占人口的比例，使其在人口结构上与美国和欧洲更具可比性。它正在成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预计到 2020 年将有近一半的人接受中等教育。非洲也出现了一个消费阶层，预计将继续蓬勃发展。非洲约有 9000 万人的家庭收入超过 5000 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而不是必需品。到 2020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 1.28 亿。

2013 年 7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非洲期间，宣布了一项耗资70 亿美元的计划，以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并与非洲国家元首加强合作。奥巴马还公布了一项名为“非洲贸易”的新计划，旨在促进非洲大陆内部以及非洲与美

国之间的贸易。

随着非洲联盟成员提出的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计划的出台，大约有 27 个成员（非洲大陆一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将进一步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促进成员国之间以及大陆内部的商业活动。

预计未来几十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

创业

创业是成长的关键。政府需要确保商业友好的监管环境，以帮助促进创新。2019年，风险投资启动资金增长至13亿美元，增长迅速。原因尚不清楚，但教育肯定是一个因素。

多年来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非洲贫困看似难以解决的性质引发了对其根源的争论。地方性战争和动乱、普遍的腐败和专制政权都是持续经济问题的原因和结果。非洲的非殖民化充满了因冷战冲突而加剧的不稳定。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冷战以及腐败和专制主义的加剧也导致非洲经济不景气。

据《经济学人》报道，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腐败、政治不稳定、社会主义

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基础设施

据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称，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最重要限制之一。基础设施投资和维护可能非常昂贵，尤其是在非洲的内陆、农村和人口稀少的国家等地区。

有人认为，在 1990 年至 2005 年期间，基础设施投资对非洲增长绩效改善的一半以上做出了贡献，增加投资对于保持增长和解决贫困是必要的。

在非洲，有人认为要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达到 GDP 的 15% 左右（每年约 930 亿美元）。目前，不同部门的融资来源差异很大。一些部门由国家支出主导，其他部门由海外发展援助（ODA）主导，而其他部门由私人投资者主导。

总体而言，援助、私营部门和非经合组织金融家之间的支出超过了国家支出。仅私营部门的支出就等于国家资本支出，尽管大部分都集中在 ICT 基础设施投资上。外部融资从 70 亿美元（2002 年）增加到 270 亿美元（2009 年）。中国尤其是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者。

语言多样性

在加纳随机选择的一对人只有 8.1% 的机会分享母语。

非洲国家因语言多样性而遭受沟通困难。格林伯格的多样性指数是两个随机选择的人拥有不同母语的可能性。根据该指数，在最多样化的 25 个国家中，有 18 个（72%）是非洲国家。这包括格林伯格多样性指数超过 0.9 的 12 个国家，这意味着一对随机选择的人拥有相同母语的机会不到 10%。然而，政府、政治辩论、学术话语和行政的主要语言往往是前殖民国家的语言；英语、法语或葡萄牙语。

治理

尽管非洲和亚洲在 1960 年代的收入水平相似，但自那以后，除了阿富汗和也门等少数极度贫穷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外，亚洲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非洲。一派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本地投资。非洲的腐败主要包括榨取经济租金并将由此产生的金融资本转移到海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对拥有瑞士银行账户的非洲独裁者的刻板印象通常是准确的。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估计，从 1970 年到 1996 年，30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资本外逃1870 亿美元，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外债。作者Leonce Ndikumana和 James K. Boyce 估计，从 1970 年到 2008 年，来自 33 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资本外逃总额达 7000 亿美元。这种发

展上的差异与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提出的模型是一致的。因为政府在政治上不稳定，新政府经常没收前任的资产，官员们会把他们的财富藏在国外，未来无法征用。

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ese Seko)在其统治期间因腐败、裙带关系和贪污40 亿至 150 亿美元而臭名昭著。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府及其实施的土地改革也导致非洲经济停滞。例如，穆加贝政权在津巴布韦，特别是针对白人农场主土地的改革，导致该国的农业经济（这以前是非洲最强之一）的崩溃。穆加贝此前曾在津巴布韦解放战争期间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坦桑尼亚成为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依赖援助的国家之一，并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恢复过来。自1992年社会主义一党制废除和民主过渡以来，坦桑尼亚经济快速增长，2017年增长6.5%。

外援

在当地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食品外援运输通常没有争议；但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表明的，大多数饥荒都与当地缺乏收入而非食物有关。自 1980 年代以来，外援一直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贸易多边组织

非洲联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国际经济组织。该联盟的目标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单一市场、中央银行和共同货币，从而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目前的计划是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以促进发展。非盟计划还包括一个过渡非洲货币基金导致的非洲中央银行。一些政党支持建立一个更加统

一的非洲合众国。

非洲内部贸易因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放缓。尽管如此，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国家之间的贸易在截至 2012 年的过去十年中增长了六倍。例如，加纳和肯尼亚已经发展了该地区的建筑材料、机械和成品市场，与占其国际出口大部分的矿业和农产品市场大不相同。非洲贸易部长于 2010 年同意建立泛非自由贸易区。这将降低各国的进口关税并增加非洲内部贸易，并有望实现整体经济的多元化。

经济部门和行业

由于非洲的出口组合仍然主要基于原材料，其出口收入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波动。这加剧了非洲大陆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并加强了出口多样化的必要性。服务贸易，主要是旅行和旅游业，在 2012 年继续增长，突显了非洲大陆在该领域的强大潜力。

非洲的能源

非洲拥有以多种形式产生能源的重要资源（水力发电、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煤炭生产、铀生产、太阳能、风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缺乏发展和基础设施意味着今天实际上很少使用这种潜力。

石油和石油产品是14个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2010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占非洲出口总额的46.6%；整个非洲的第二大出口是天然气，气态和液化天

然气，占非洲出口的 6.3%。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缺乏给非洲企业带来了障碍。尽管有许多港口，但与亚洲港口相比，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增加 30-40% 的成本。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铁路项目在矿区很重要。大型铁路和公路项目是 19 世纪后期的特色。在殖民时代强调铁路，在“后殖民”时代强调道路。Jedwab 和 Storeygard 发现，在 1960 年至 2015 年间，交通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有影响力的政治包括前殖民集权、种族分化、欧洲定居、自然资源依赖和民主。

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正在非洲各地进行。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大部分是在电力的生产和运输方面。许多其他项目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其他建筑。

电信基础设施也是非洲的一个增长领域。截至 2011 年，估计有 5 亿部各类手机在非洲使用，其中包括 1500 万部“智能手机”。

采矿和钻井

非洲的矿产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工业之一。非洲是第二大的大陆，这意味着大量的资源。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矿产勘探和生产构成了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非洲矿产储量丰富，铝土矿、钴、工业金刚石、磷矿、铂族金属（PGM）、蛭石、锆的储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金矿开采是非洲的主要矿产资源。许多其他矿物质也大量存在。2005 年来自非洲土壤的世界产量份额如下：铝土矿 9%；铝 5%；铬铁矿 44%；钴 57%；铜 5%；黄金 21%；铁矿石 4%；钢 2%；铅（Pb）3%；锰 39%；锌 2%；水泥 4%；天然钻石 46%；石墨 2%；磷矿 31%；煤 5%；矿物燃料（包括煤炭）和石油 13%；铀 16%。

制造

对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多样化以及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关注，激发了人们的希望，即 21 世纪将成为非洲经济和技术增长的世纪。这种希望，再加上未来非洲新领导人的崛起，激发了“非洲世纪”一词的灵感，指的是 21 世纪可能是非洲大量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潜力可能成为世界参与者的世纪。这种对制造业和工业的希望得益于通信技术的繁荣和当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采矿业。纳米比亚近年来吸引了工业投资，南非已开始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毛里求斯等国家已计划为制造业开发新的“绿色技术”。这样的发展具有为非洲国家打开新市场的巨大潜力，因为随着全球石油储备枯竭和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变得不那么经济，预计未来对替代“绿色”和清洁技术的需求将激增可行的。

尼日利亚近年来一直在拥抱工业化，它目前拥有一家本土汽车制造公司 Innoson Vehicle Manufacturing (IVM)，该公司生产快速公交巴士、卡车和SUV，即将推出汽车。他们的各种品牌车辆目前在尼日利亚、加纳和其他西非国家有售。

制造业规模较小，但在东非增长。主要产业是纺织和服装、皮革加工、农业综合企业、化工产品、电子产品和车辆。乌干达等东非国家也为国内市场生产摩托车。

投资和银行业

许多金融公司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设有办事处。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瞄准非洲大陆新兴的中产阶级，非洲 1070 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由于各种技术创新，银行业一直在经历创纪录的增长。

中国和印度在 21 世纪对新兴的非洲经济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近年来，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非洲和中国之间的相互投资急剧增加。

中国对非投资的增加引起了欧盟的关注，并引发了欧盟的竞争性投资谈判。海外的非洲侨民成员，特别是在欧盟和美国的侨民，已加大力度利用其企业在非洲投资，并鼓励非洲对欧洲经济的海外投资。

安哥拉已宣布有意投资欧盟，尤其是葡萄牙。南非作为制造业、金融市场和小企业投资的新前沿，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关注，近年在其新领导下的利比里亚也是如此。

有两个非洲货币联盟：西非中央银行（BCEAO）和中非中央银行（BEAC）。两者都使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作为法定货币。在整个非洲建立单一货币联盟的想法已经浮出水面，并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建立它，但许多问题，例如将非洲大陆的通货膨胀率降至 5% 以下，仍是最终确定的障碍。

证券交易所

截至 2012 年，非洲有 23 个证券交易所，是 20 年前的两倍。尽管如此，非洲证券交易所仍占世界证券交易所活动的不到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tin_American_economy

拉丁美洲经济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地区有多个民族国家，经济复杂程度各不相同。拉美经济是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包括北美个别国家，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地理区域。现在所谓的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在该地区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控制的殖民时代设定的。该地区许多地方拥有有利的贵金属矿床，主要是银。热带气候条件和靠近海岸的位置，使得甘蔗种植园发展。在独立后的 19 世纪，拉丁美洲的许多经济体衰落了。在 19 世纪后期，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作为商品出口国融入了世界经济。外国资本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部门随着海外移民的增长、机构的加强以及教育的扩大，都有助于工业增长和经济扩张。许多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但贫穷和不平等在拉丁美洲社会根深蒂固。

截至2016年，拉丁美洲的人口为6亿3300万人，总的GDP在2015年为5.3万亿美元。拉丁美洲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如铜、铁和石油。2016 年，拉丁美洲经济在经历了 2015 年的停滞之后收缩了 0.8%。摩根士丹利表示，经济活动的下降是低商品价格、资本外逃和当地货币市场波动的综合因素。

从历史上看，拉丁美洲一直以出口为基础，白银和糖是殖民经济的发动

机。该地区仍然是原材料和矿物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美洲国家一直致力于将其产品融入全球市场。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两个主要经济部门组成：农业和采矿业。拉丁美洲有大片土地，富含矿物质和其他原材料。此外，拉丁美洲的热带和温带气候使其非常适合种植各种农产品。

与收入水平相似的经济体相比，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被归类为低于平均水平。因此仍有增长空间，一些国家已经主动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是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智利。摩根士丹利对这些经济体的 2017 年展望为积极。拉美经济主要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因此，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拉美经济增长有显着影响。由于其强大的增长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拉丁美洲吸引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投资。

历史

继 1492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首次航行后，西班牙迅速在加勒比岛屿上建立了两个完整的殖民地，尤其是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他们建立了城市作为永久定居点，并在那里建立了王室统治机构（进行民政管理）和罗马天主教会。城市吸引了一系列定居者。1499年西班牙探险队开始开采玛格丽塔和古巴丰富的珍珠贝。它们在 1508 年至 1531 年间成为美洲初期西班牙帝国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砂矿开采最初产生了足够的财富来维持西班牙企业的发展；西班牙人寻求另一种高价值产品并开始种植甘蔗，这是一种从西班牙控制的大西洋岛屿进口的作物。土著劳工被非洲奴隶劳工所取代，并开启

了数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即使有可行的出口产品，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定居点在经济上也令人失望。尽管如此，1503 年，王室在塞维利亚建立了 Casa de Contratación（贸易之家），以控制新大陆的贸易和移民。在殖民时代，它仍然是西班牙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直到西班牙与墨西哥大陆的意外相遇以及随后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1519-21），西班牙从新世界获得财富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西班牙王室开始担心一小群持有encomiendas的西班牙征服者垄断了大部分土著劳动力，并且征服者获得了太多的权力和王室自主权。由多米尼加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带头为土著人的人道主义权利伸张正义的宗教推动成为国王通过 1542 年新法律确保受保护人财产权和扩大王室控制的理由。

白银、开采和劳动系统

西班牙在巨大矿床中发现的白银是西班牙帝国经济的巨大变革性商品。在波托西和墨西哥北部发现"上秘鲁"（现玻利维亚）后，银矿开采成为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引擎。西班牙的经济实力建立在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出口之上。白银比索既是出口商品，也是第一个全球货币，改变了欧洲和中国的经济。

银通过复杂的混合工艺进一步精制，该工艺在美国基于德国的基本技术不断发展。根据德国银矿开采专家的说法，天井混汞技术（开发于 17 世纪

初期）被认为是提炼银矿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该技术将磨碎的矿石与催化剂（盐或黄铁矿）混合，制成糊状物，将其干燥并留下银汞齐。它只需要很少的水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设置，这对新西班牙的银矿商来说非常有利。

糖业、奴隶制和种植园

糖是殖民时代的另一种主要出口产品，利用肥沃的土壤、热带气候和靠近海岸的种植区，将精制糖运输到欧洲。糖的种植和加工结构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甘蔗被砍下后必须立即加工糖，这样种植和高度技术性的加工就作为一个企业进行了。两者都需要高额的资本和信贷投入，需要专业的熟练劳动力以及大量的奴隶来耕种和收割。

英国试图压制奴隶贸易，但它一直持续到 1840 年代；奴隶制作为一种劳工制度在巴西和古巴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

在西班牙美洲，最初的经济是基于定居的土著人口的贡品和劳动力，这些人口被重新定向到西班牙的小部门。但随着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和定居在新成立的西班牙城市，企业应运而生，为这些城市人口提供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这意味着在城市附近发展农业企业和牛羊牧场，使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中心紧密相连。

殖民经济发展并融入新兴的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交通困难。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提供廉价的运输和很少的道路，这意味着驮畜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装满货物的稳重骡子。将货物运往市场或港口通常涉及骡车。

从欧洲进口的牛、羊、马和驴，在庄园和牧场上繁衍，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牛和羊被用作食物以及皮革、牛油、羊毛和其他产品。骡子对于运输货物和人员至关重要，特别是因为道路未铺砌且在雨季几乎无法通行。

制成品

大多数精英消费者的制成品主要来自欧洲，包括纺织品和书籍；瓷器和丝绸通过西班牙菲律宾贸易从中国运来。除了由当地饲养的绵羊制成的毛坯毛织品外，几乎没有本地制造的消费品，这些羊毛被运往城市大众市场。这种布料是在小型纺织作坊中生产的，在秘鲁和墨西哥有最好的记录，称为obrajes。还为穷人生产廉价酒，包括pulque、chicha和朗姆酒。拉丁美洲的各个地区都种植烟草供当地消费。

封闭系统中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

跨大西洋贸易由位于塞维利亚的Casa de Contratación（贸易之家）监管。一项创新是comercio libre（“自由贸易”），它不是普遍理解的自由贸易，但允许所有西班牙人和西班牙裔美洲人的港口相互通达（不包括外国贸易商），以刺激经济活动，同时保持王室控制。在 19 世纪初独立时，西班牙美洲和巴西没有外国投资，也没有与经济伙伴的直接、合法接触。

尽管波旁王朝通过的立法对改革帝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不足以挽救它。种族紧张局势持续增长和大规模的不满导致了一些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实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独立的战争。

独立的经济影响

西班牙美洲（古巴和波多黎各除外）和巴西在 19 世纪初的独立产生了经济后果以及明显的主权政治后果。新的民族国家参与了国际经济。然而，拉丁美洲和英属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学者们试图解释拉丁美洲和英属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半球发展和繁荣的不同路径，寻找拉丁美洲经济如何落后于英属北美，后者成为 19 世纪的经济发动机。

在独立之前，西班牙美洲和巴西在经济上比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英国小殖民地更重要。大西洋中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英国殖民地气候温和，没有可以剥削劳动力的主要土著人口，也没有鼓励进口黑奴的主要出口商品。与英国北部殖民地相比，拥有种植园农业和大量黑奴人口的南部殖民地与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的特征相似处更多。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地区的特点是家庭农场，拥有同质的欧洲血统人口，贫富差距不大。

在独立后的巴西，随着咖啡作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发展，非洲奴隶被广泛使用。随着海地的革命废除奴隶制后，许多甘蔗种植园主搬到古巴，在那里糖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独立后早期（1830-1870）

在西属美洲，殖民时代经济限制的消失（古巴和波多黎各除外）并没有立即产生经济扩张，因为投资、区域市场、信贷和运输系统在独立冲突期间遭到破坏。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共和国确实认为有必要取代西班牙殖民商法，但由于政治不稳定和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他们直到 19 世纪中叶之后才制定新法典。在为新的主权国家制定宪法之前，制定新法律的任务基本上被搁置。立法机关由以前没有管理经验的人组成，因此起草法律具有挑战性，包括那些影响经济活动的法律。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或法律框架来保障财产权，使得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潜在企业家不太可能进行投资。整个 19 世纪早期及以后，大地产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

经济增长的障碍

许多地区面临经济增长的重大经济障碍。由于政治不稳定，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和生产力都低于殖民时期。独立战争的代价和缺乏稳定的税收制度使新的民族国家陷入财政紧张的境地。即使在经济资源破坏较少的地方，金融安排和贸易关系的中断也导致一些经济部门的衰退。

阻碍政治独立后经济扩张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新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软弱或缺位，这些政府本应当可以维持和平、征税、发展基础设施、扩大商业农业、恢复采矿经济和维护领土主权。独立导致了传统商业网络的崩溃，这些网络一直由位于西班牙的跨大西洋贸易公司主导。国外的入口客商的进

口商品导致与当地生产商和贸易商的竞争。很少有出口产品能够找到世界市场足以刺激当地增长，也很少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本，因为外国投资者对其资金安全缺乏信心。许多新的民族国家从外国借款来资助政府，导致独立战争的债务增加。

拉丁美洲的政治独立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但西班牙美洲民族国家的软弱政府无法复制殖民时代普遍和平的条件。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早在独立时代就开始了，但在 19 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较小程度上，英国政府也参与其中。英国政府确实寻求贸易中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英国历史学家 DCM Platt 的说法，并没有促进特定的英国商业企业。

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英国试图结束巴西以及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的非洲奴隶贸易，并向英国商人开放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成为英国制造商的出口地，但当商人期望用白银付款时，结果令人失望。拉美出口的繁荣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当拉美出口物品充满英国船只返航，拉美经济增长受到刺激时。

出口繁荣（1870–1914）

1800 年代后期代表了拉丁美洲新兴国家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特点是重新定位于世界市场，这在 1880 年之前就已经很好地进行了。当欧洲与美国经历了工业化的提升，他们意识到了拉美原材料的价值，导致拉美国家转向出口经济。这种经济增长还促进了构成新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有利的政府政策

随着政治局势在 19 世纪后期趋于稳定，许多政府积极推行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的政策。“秩序与进步”这个词是拉丁美洲发展新阶段的关键概念，在 1889 年君主制被推翻后，巴西共和国的旗帜实际上被挂上了。在Porfirio Díaz (1876-1911)政权期间，墨西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在阿根廷，1853 年的宪法赋予外国人基本的公民权利。许多政府积极推动外国移民，既要创造低工资劳动力，又要改变人口的种族和民族特征。确保宗教宽容的法律为新教徒打开了大门。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在此期间能够实施自主贸易政策。

交通与通讯

通信和交通方面的革命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基础设施是通过外国融资建设的，金融家从向政府提供贷款转向对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和公用事业，以及采矿和石油钻探。铁路建设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经济。虽然缺乏可通航的河流系统，但铁路建设的创新克服了重大的地形障碍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在建立大型交通网络的地方，它们促进了国内经济一体化，并将生产区与港口和边界连接起来，以进行区域或国际贸易。初级商品出口增加、资本货物进口增加、直接和间接利用海外投资活动扩大、现代制造业在产出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经济活动步伐和范围普遍扩大，这些都密切相关。这是该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的时机和特点。英国资本促进了阿根廷、巴西、秘鲁和墨西哥的铁路建设，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投资改善了港口设施以容纳轮船，缓解了运输环节的瓶颈，使远洋运输成

本大幅下降。巴西和阿根廷的商船运输增长最快，外国和国内船舶都参与了贸易。一个例子是 1897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新的港口设施。通信方面的创新，包括电报和海底电缆促进了信息的传输，这对经营远程企业至关重要。电报线路通常建在铁路线旁边。

出口商品

鸟粪

秘鲁早期的繁荣出口是鸟粪，鸟粪含有大量用于肥料的硝酸盐。秘鲁拥有的岛屿上的矿床被工业开采并出口到欧洲。秘鲁政府的政策促进了开采。

糖

糖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它在巴西的重要性下降，巴西转而种植咖啡。糖业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最后西班牙殖民地通过非洲奴隶劳工扩张，这在西班牙帝国仍然是合法的。糖以前被认为是现金很少的消费者的奢侈品，但随着价格的下降，大众市场发展起来。以前古巴有多种农产品，但它基本上变成了单一作物出口，继续种植烟草以供国内消费和出口。

小麦

在19 世纪中叶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智利刺激了出口小麦的生产，但随着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结束。在阿根廷，小麦成为对英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因为运输成本已经下降到足以使这种大宗产品有利可图。在潘帕斯草原肥沃的原始土壤上种植小麦的农业在繁荣时期被大型企业机械

化。

咖啡

随着19 世纪外国对咖啡的需求扩大，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开始种植气候适宜的咖啡。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成为主要的咖啡生产国，这打破了传统的土地保有权模式，需要稳定的劳动力。巴西开始依赖单一作物的咖啡。

橡胶

在巴西和秘鲁发现野生橡胶树，工人采集原始树液用于后期加工。

石油

随着墨西哥湾沿岸发现石油，英美企业投入巨资钻探原油。Porfirio Díaz 政权期间通过的法律推翻了赋予国家对土资源权利的殖民法律，自由主义政策赋予石油公司开采石油的全部所有权。石油的外国所有权在墨西哥是一个问题，1938 年外国公司被没收。20世纪之交后，委内瑞拉发现了大量石油储备，并已成为该国的主要出口商品。

采矿

白银作为主要出口品下降，但铜和锡等次要矿物在 19 世纪后期开始变得重要，外国投资者提供资金。锡成为玻利维亚的主要出口产品，最终取代

了白银，但白银开采促使铁路线的建设，使锡矿开采有利可图。在智利，铜矿开采成为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这也是墨西哥的一个重要产业。智利在太平洋战争中获胜后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获得的地区提取硝酸盐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移民和劳工

独立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试图吸引移民，但只有在政治稳定、外国投资增加、轮船运输成本降低以及过境速度和舒适度适宜的时候，移民才大量涌入。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为农业和工业提供了低工资的劳动力。外国移民被吸引到拉丁美洲的特定国家：阿根廷、巴西（废除奴隶制后）、乌拉圭和古巴。意大利和阿根廷之间的季节性移民发展起来，劳动力能够利用收获的季节性差异和阿根廷支付的更高工资。许多这样的季节性移民是单身男子而不是作为永久定居的家庭的一部分。

在巴西，随着黑人奴隶制的废除，日本劳动力的招聘对咖啡业很重要。巴西还补贴来自欧洲的移民，为咖啡种植提供低工资劳动力。

新秩序的出现（1914-1945）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国际经济秩序消失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德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黯然失色，英国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处于主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8 年），唯一进入冲突的拉美国家是巴西，它效仿美国向德国宣战。尽管拉美总体保持中立，但由于跨大西洋运输中断，欧洲国家专注于战争而不是海外投资，因此其所有地区都遭受了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断。受影响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是那些与欧洲建立了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例如，随着协约国将其产品转移到其他地方，阿根廷的贸易急剧下降，而德国变得无法进入。

随着货币金本位制的暂停，资本流动中断，欧洲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贷款，引发了国内危机。来自欧洲主要大国英国的直接外国投资结束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中立，直到 1917 年，它大幅增加了对拉丁美洲商品的采购。对战争有用的商品，如金属、石油和硝酸盐，价值增加，来源国（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受到青睐。

交通

美国在扩大与拉丁美洲的贸易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已经很牢固。随着1914 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和跨大西洋贸易的中断，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增加了。随着加勒比地区的运输变得更便宜和更容易获得，脆弱的热带进口产品，尤其是香蕉，可以到达美国的大众市场。美西战争（1898 年）后被视为过剩的美国海军舰艇被提供给联合水果公司，该公司创建了“运输舰队”。

银行系统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扩张，特别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建立中央银行，以调节货币供应和实施货币政策。此外，一些国家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创建了更专业的国家发展银行（工业、农业和外贸）。美国进入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的私人银行业，开设分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邀请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W·凯默勒（“金钱医生”）就财务问题向他们提供建议。他提倡基于强势货币、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和平衡预算的财务计划。1920 年代，作为凯默勒使命的直接结果，安第斯地区（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在 1920 年代建立了中央银行。

在墨西哥，Banco de México（墨西哥国家银行）成立于 1925 年。与英国有着长期联系的阿根廷在英格兰银行奥托·尼迈耶爵士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即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1935 年），劳尔·普雷维什担任第一任行长。私人银行业务也开始扩张。

为国内市场制造

面向国内或出口市场的制造业并不是拉丁美洲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在阿根廷向英国出口的牛肉、羊毛和小麦。阿根廷在 1870 年至 1930 年期间经历了国内工业的增长，这满足了国内对一般非进口商品（啤酒、饼干、香烟、玻璃、纸张、鞋子）的需求。啤酒制造业建立于十九世纪后期，主要由德国移民引入到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啤酒生产的改进促使产品保持更长时间的稳定，以及运输网络的发展，意味着啤酒进入了大众市场。

大萧条的影响

大萧条的外部冲击对拉美经济的影响不均衡。出口价值普遍下降，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巴西咖啡，出口量增加。来自英国的信贷蒸发了。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贬值了本国货币，引入了外汇管制，并试图调整偿付外债的支付，或违约，包括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进口急剧下降，也导致进口关税收入下降。在巴西，中央政府销毁了三年的咖啡产量，以保持咖啡价格居高不下。

拉丁美洲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恢复得相对较快，但出口并未达到 1920 年代后期的水平。英国试图在罗卡-朗西曼条约中重新实施阿根廷的优惠政策。继1933年的睦邻政策之后，美国通过实施1934 年的互惠关税法来加强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纳粹德国的政策极大地扩大了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巴西对德国的棉花出口大幅增加。1937 年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 GDP 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德国潜艇活动和英国经济封锁导致海上航道不安全，拉丁美洲与德国的贸易停止了。对于与美国没有大量贸易往来的那些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影响更大。对于拉丁美洲整体而言，战争带来了经济利益，因为它们成为对盟军战争有用的产品的供应商，并且随着进口减少和与战争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它们积累了硬通货余额。这些提高了拉美国家政府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的能力，该计划在战后时期大幅扩大。

改变国家角色，1945–73

社会变化

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农村居民向城市中心迁移以及工业部门的发展开始改变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面貌。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和土地改革普遍缺乏（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除外）造成农村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时会导致 像 1950 年代哥伦比亚和秘鲁的那样的暴力事件。

各国扩大了公共教育，这些教育越来越旨在纳入边缘化群体，但该系统也增加了具有不同质量层次的社会分割。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将重点从创造民主公民转移到为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培训工人。1959 年 1 月古巴革命之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将成为焦点。

经济民族主义

二战后，许多拉美政府开始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项目或其他企业创建国有企业，造就了新型的拉美企业家。

墨西哥于 1938 年将其石油工业从开发它的英国和美国公司手中收归国有。墨西哥政府以完全的法律权力这样做，因为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宪法赋予国家控制自然资源的权力，扭转了 19 世纪后期授予私人公民和公司不可剥夺的财产权的自由立法。LázaroCárdenas政府征用了外国石油利益，并创建了国有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 (PEMEX)。墨西哥为其他拉美国家

提供了战后时期本国工业国有化的典范。巴西于 1953 年成立了国家垄断石油公司Petrobras。其他政府也遵循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并扩大了国家的经济作用。在阿根廷，胡安·庇隆政府颁布的五年计划试图将全国服务行业国有化。在玻利维亚，维克多·帕斯·埃斯滕索罗(Victor Paz Estenssoro)领导的 1952 年革命推翻了控制该国主要出口锡的一小群商人，并将该行业国有化，并颁布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和实现成年玻利维亚人的普选权力。

许多拉美国家从参加二战中受益，积累了财政储备，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来扩大工业。

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框架

二战后，以美国而非英国为主要力量的国际体系结构新框架出现。1944 年，一个由美国和英国领导的多国集团建立了正式的机构来构建战后国际经济：布雷顿森林协定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稳定金融体系和汇率，以及世界银行，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美国专注于西欧经济体的重建，而拉丁美洲最初并未从这些新机构中受益。然而，1947 年签署的关贸总协定（GATT）确实有阿根廷、智利和古巴作为签署国。关贸总协定有一个通过降低关税来促进国际贸易的法律结构。乌拉圭回合关贸总协定谈判（1986-1994）导致形成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该机构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也以其西班牙语首字母缩略词 CEPAL 而闻名，旨在制定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战略。它包括来自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业化国家的成员。在其第二任主

任、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50）的作者、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50-1963年）的领导下，CEPAL 建议将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克服不发达的关键战略。很多拉美国家确实按照 CEPAL 的分析推行了内向发展战略，尝试了区域一体化，但到 1960 年代末，经济活力并未恢复。

1959 年 4 月，美国和最初的 19 个拉丁美洲国家成立了美洲开发银行(IDB)，为拉丁美洲提供信贷，解决了战后时期对拉丁美洲发展缺乏关注的问题。创建此类银行的早期想法可以追溯到 1890 年代，但当年并未实现。然而，在二战后的时代，又有了新的推动，特别是当新成立的世界银行更专注于重建欧洲的时候。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一份报告敦促设立一项基金，以促进拉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在巴西，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支持创建这样一家银行的计划，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该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成立了一个谈判委员会来制定银行的框架。自 IDB 成立以来，其总部一直设在华盛顿特区，但与世界银行的董事一直是美国国民不同，IDB 的董事来自拉丁美洲。大多数资助项目是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农业、能源、工业、交通、公共卫生、环境、教育、科技和城市发展”。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59年，恰逢古巴革命之年；随着许多国家认为需要向拉丁美洲提供发展援助，该银行的作用扩大了。多年来，伙伴国的数量有所增加，非借款国扩展到西欧、加拿大和中国，为银行提供信贷。

拉丁美洲发展了旨在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旅游业。在墨西哥，政府于 1950 年代在阿卡普尔科开发基础设施，并于 1970 年开始在坎昆开发基础设施，以创建海滩度假村。工业经济中经济落后的土著地区成为旅游目的

地，往往导致文化商品化。

古巴革命的影响

1959 年的古巴革命是对美国在该半球的新秩序的一次重大冲击。它迅速从既有规范内的改革运动转变为宣布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古巴与苏联结盟，在美国对古巴单一作物的长期采购实施禁运后，古巴找到了糖的出口地。古巴没收了外国人的财产，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投资者拥有的大量甘蔗种植园。对美国而言，革命可能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蔓延的威胁促使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 年宣布成立进步联盟，旨在帮助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实施减轻贫困和促进发展的计划。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当选智利领导人；他签署了颁布宪法改革的法令，启动了铜业的国有化。这被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之路”，而不是古巴模式的武装革命。阿连德试图实施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而不对智利进行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同时保持法治。他承诺进行土地改革、税收改革和铜工业国有化。智利的两极分化和暴力日益加剧。1973 年 9 月 11 日的军事政变期间，他的自杀结束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迎来了一个政治镇压和经济路线变化的时代。

为了通过避免过度依赖原材料出口来实现经济多元化，拉美国家争辩说，他们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更高的关税，以防止从世界上更工业化地区的更成熟的竞争对手进口制成品。这些观点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中大受欢迎，甚至在 1964 年被接受为新的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四部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以每年3.1%的速度快速增长。

1970 年代至 2000 年代的重新定位

到 1970 年代，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拉美国家看到了内向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发展基于对出口拉动增长潜力的悲观情绪。在发达国家，工资上涨使得寻找工资较低的地点建厂更具吸引力。跨国公司拥有可动资本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拉丁美洲国家注意到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GDP 出现了显着增长。

拉丁美洲国家承担债务以推动经济增长和融入全球化市场。使用借来的钱获得出口收入的承诺吸引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接受以美元计值的贷款，这可以扩大其经济能力。债权人渴望在拉丁美洲投资，因为 1970 年代中期实际利率很低，乐观的商品预测使贷款成为理性的经济决策。外国资本涌入拉丁美洲，在金融上连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70 年代初期的墨西哥经济停滞不前。随着 1970 年代中期在墨西哥湾发现巨大的石油储量，墨西哥似乎能够利用高油价来投资工业化并资助社会项目。外国银行急于向墨西哥放贷，因为它似乎很稳定，实际上是一党制政治制度，将社会动荡保持在最低限度。同样令国际贷款人放心的是，墨西哥自 1954 年以来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1976-82) 打破了不承担外债的长期国库做法，并以美元为基础大量借入未来的石油收入。随着 1981-82 年石油价格

暴跌，墨西哥经济陷入混乱，无法偿还贷款。政府贬值了其货币，暂停了 90 天的对外公共债务本金的支付，最后洛佩斯·波蒂略将该国的银行国有化，并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货币实施了外汇管制。当墨西哥拖欠债务时，国际贷款机构本身就很脆弱，因为墨西哥的债务占美国九家最大银行资本的 44%。

一些拉美国家没有参与这种向国际银行大量借款的趋势。古巴仍然依赖苏联来支撑其经济，直到 1990 年代苏联解体，古巴与世隔绝，陷入被称为"特殊时期"的严重经济危机。哥伦比亚限制其借贷，转而实施税收改革，从而显着提高了政府收入。但 1980 年代的总体经济衰退使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危机。

当贷款国利率上升、借款国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拉美国家向美国和其他国际银行借款使它们面临极端风险。流向拉丁美洲的资本出现逆转，在 1982 年冲击之前立即从拉丁美洲流出。利率上升影响到借款国，因为偿还债务直接影响到国家预算。在许多情况下，本国货币贬值，这减少了对现在成本更高的进口的需求。通货膨胀达到新水平，穷人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削减了社会支出，总体而言，贫困加剧，收入分配恶化。

华盛顿共识

1989 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阐明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解决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这些原则是：

财政政策纪律，避免相对于 GDP 的巨额财政赤字；

将公共支出从补贴（“特别是不加区别的补贴”）转向基础广泛的关键促增长、扶贫服务，如初级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投资；

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采用适度的边际税率；

由市场决定的实际利率为正（但适中）；

有竞争力的汇率；

贸易自由化：进口自由化，特别强调取消数量限制（许可等）；以较低且相对统一的关税提供的任何贸易保护；

对内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

私有化国有企业;

放松管制：取消阻碍市场进入或限制竞争的法规，但出于安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理由以及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的正当理由除外；

产权的法律保障。

这些原则侧重于贸易政策的自由化、减少国家作用和财政规范。

拉美政府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拉美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改革往往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贷款条件。智利经历了 1973 年的军事政变和多年的独裁统治，在 1970 年代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变革：稳定（1975）；私有化（1974-78）；金融改革（1975）；劳工改革（1979 年）；养老金改革（1981 年）。墨西哥经济在 1982 年崩溃，并于 1986 年开始将长期经济政策转向财政改革，但更重大的变化出现在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政府的领导下（1988-1994）。萨利纳斯寻求墨西哥

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如果墨西哥要取得成功，贸易政策的自由化、国有公司的私有化和财产权的法律保障是必不可少的。“1917年墨西哥宪法”的修改于 1992 年通过，改变了墨西哥国家的角色。加拿大和美国以及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该协定于 1994 年 1 月生效。 1990 年代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以每年 1.7% 的速度增长。

这一时期农村出生人口的增长导致向城市迁移，那里的就业机会更好。

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

随着 1947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的形成，建立了降低关税和增加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框架。它消除了个别国家之间的差别待遇，例如最惠国待遇，并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1995 年，关贸总协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满足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制度需求。尽管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减少了贸易壁垒，但要求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以及需要所有人就条款达成一致意味着进行了几轮谈判。

拉丁美洲和该地区以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在 20 世纪建立的。有些是短暂的，例如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1958-1962），后来扩展到加勒比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双边协议的扩展，包括墨西哥，生效于1994年1月。安第斯共同体 （CAN）是一个关税同盟，包括南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最初成立于1969年。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2016年停

止）和安第斯共同体是南美洲最大的两个贸易集团。

2016年在美国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之后，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了谈判，考虑到1994年以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其中包括“服务的跨国化和崛起”所谓的数字/数据经济——包括通信、信息学、数字和平台技术、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专业和技术工作以及许多其他无形产品。

移民和汇款

拉丁美洲人迁移到经济更加繁荣的地区，尤其是美国。但这些移民向本国亲人的汇款代表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重要资金注入。全球移民与发展知识伙伴关系（KNOMAD）的一份报告估计，2017 年向墨西哥的汇款为 305 亿美元；危地马拉为 87亿美元；多米尼加共和国为57亿美元；哥伦比亚为55亿美元；萨尔瓦多为51亿美元。

腐败

腐败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影响到它们的经济。根据透明国际在其 2015 年的报告中对 167 个国家的透明度认知度排名，乌拉圭以 72% 的透明度认知度排名最高（21），其他主要拉美国家排名较低，哥伦比亚排名 83/36%；阿根廷 106/35%；墨西哥 111/34%；委内瑞拉最低，为 158/19%。非法毒品贸易，特别是可卡因转运安第斯山脉，产生巨大的利润。这些黑市洗钱资金往往与金融机构和政府官员串通一气。贩毒造成的暴力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非常严重。

按行业分类

农业

圣保罗的甘蔗种植园。2018年，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产量为7.46亿吨。拉丁美洲生产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甘蔗。

马托格罗索州的大豆种植园。2020年，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产量为1.3亿吨。拉丁美洲生产世界一半的大豆。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咖啡。2018 年，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产量为 350 万吨。拉丁美洲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咖啡。

圣保罗的橙子。2018年，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产量为1700万吨。拉丁美洲生产了世界上 30% 的橙子。

拉丁美洲生产了世界上 25% 的牛肉和鸡肉。

农业是大多数拉丁美洲经济体的一个部门，但总的来说，那些依赖农业作为GDP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不如那些拥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国家发达。拉丁美洲生产和出口多种农产品，例如咖啡、可可、香蕉、大豆和牛肉，但大多数国家只生产一两种这样的出口产品。拉丁美洲占世界粮食和农业产量的16%。由于谷物、油籽和动物蛋白出口量高，巴西和阿根廷在净出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农业部门的结构非常多样化。在巴西和阿根廷，大农场占商业农业的大部分，但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来自该地区的小农场。

由于世界人口和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全球对农产品的需求正在上升。到

2050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 90 亿，粮食需求预计将比 2014 年高出 60%。拉丁美洲未开发土地的分布非常不均衡，巴西和阿根廷有最多的额外的土地。

Rabobank报告说，拉丁美洲的农业生产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各个国家的表现存在很大差异。对于大型商业农场，对精准农业和植物育种技术的投资将导致生产力的提高，而对于小型农场，获得基本技术和信息服务将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南美洲农业最强的四个国家是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现在：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大豆、咖啡、橙子、瓜拉那、巴西莓和巴西坚果的生产国；是玉米、木瓜、烟草、菠萝、香蕉、棉花、豆类、椰子、西瓜和柠檬的5大生产国之一；并且是世界上可可、腰果、鳄梨、柿子、芒果、番石榴、大米、高粱和番茄的十大生产国之一；

阿根廷是世界大豆、玉米、葵花籽、柠檬和梨5大生产国之一，世界大麦、葡萄、朝鲜蓟、烟草和棉花10大生产国之一；小麦、甘蔗、高粱和葡萄柚的15大生产国之一；

智利是世界樱桃和蔓越莓5大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葡萄、苹果、猕猴桃、桃、李子和榛子10大生产国之一，重点出口高价值水果；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 咖啡、鳄梨和棕榈油5 大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 甘蔗、香蕉、菠萝和可可10 大生产国之一；

秘鲁是鳄梨、蓝莓、朝鲜蓟和芦笋的5大生产国之一，世界咖啡和可可10大生产国之一，世界马铃薯和菠萝15大生产国之一，还拥有相当可观产量的

葡萄、甘蔗、水稻、香蕉、玉米和木薯；它的农业相当多样化；

巴拉圭的农业正在发展，目前是世界第六大大豆生产国，并进入20大玉米和甘蔗生产国之列。

在中美洲，以下情况尤为突出：

危地马拉，世界咖啡、甘蔗、甜瓜和天然橡胶10大生产国之一，世界香蕉和棕榈油15大生产国之一；

洪都拉斯，世界咖啡5大生产国之一，棕榈油10大生产国之一；

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大的菠萝生产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世界木瓜和鳄梨的前 5大生产国之一，也是 可可10 大生产国之一。

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鳄梨生产国，是世界辣椒、柠檬、橙子、芒果、木瓜、草莓、柚子、南瓜和芦笋的前5大生产国之一，是世界甘蔗、玉米、高粱、豆类、番茄、椰子、菠萝、甜瓜和蓝莓十大生产国之一。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肉出口国：2019 年为 377 万吨。该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牛群，占世界牛群的 22.2%。该国是 2019 年第二大牛肉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 15.4%。它也是 2018 年世界第三大牛奶生产国。今年，该国生产了 351 亿升。2019年，巴西是世界第四大猪肉生产国，产量近400万吨。

2018年，阿根廷是世界第四大牛肉生产国，产量为300万吨（仅次于美国、巴西和中国）。乌拉圭也是主要的肉类生产国。2018年生产牛肉58.9万

吨。

在鸡肉生产方面，墨西哥位居世界前 10 位，阿根廷位居 15 位，秘鲁和哥伦比亚位居 20 位。在牛肉生产方面，墨西哥是世界 10 大生产国之一，哥伦比亚是 20 大生产国之一。在猪肉生产方面，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 15 个生产国之一。在蜂蜜生产方面，阿根廷位居世界前 5 位，墨西哥位居全球前 10 位，巴西位居 15 位。就牛奶产量而言，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 15 个生产国之一，而阿根廷则位居 20 个之列。

采矿和石油

对贵金属的开采可以追溯到拉丁美洲的前西班牙时期，是整个西班牙美洲殖民时期和 18 世纪巴西的经济驱动力。矿物和石油的开采主导着某些国家的经济而不是农业，特别是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和玻利维亚。这些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大型工业企业。

最近在阿根廷西北部和玻利维亚进行的锂矿开采以及新矿床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锂是电池的关键组件，可为手机、电动汽车和电网等电子设备提供动力。阿根廷的资源现在由一家澳大利亚-日本-阿根廷合资企业开采。几十年来，智利一直是阿塔卡马盐滩的主要生产国。

拉丁美洲生产了全球 45% 的铜、50% 的银、26% 的钼和 21% 的锌。

BNAmerica 矿业调查的一半参与者认为，政治和法律的不确定性将减缓 2017 年拉丁美洲的矿业投资。然而，个别国家已经实施了可能改善 2017 年矿业公司条件的变化。许多公司都专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以实现增长。一些公司正在寻求整合、自动化和自营矿山，以减轻成本上升的影响。

在采矿业，巴西在铁矿石（它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铜、金、铝土矿（世界 5 大生产国之一）、锰（世界 5 大生产国之一）、锡（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商之一）、铌（集中了世界已知储量的 98%）和镍的开采方面脱颖而出。在宝石方面，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紫水晶、黄玉、玛瑙生产国，也是碧玺、祖母绿、海蓝宝石和石榴石生产国。智利约占世界铜产量的三分之一。2018 年，秘鲁是世界第二大银和铜生产国，以及第六大黄金生产国（产生最高价值的 3 种金属），此外还是世界第三大锌和第四大锡生产国。玻利维亚是第五大锡生产国，第七大银生产国和第八大锌生产国。墨西哥是最大的银生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近23%，生产超过2亿盎司；它也有重要铜和锌，并生产大量的黄金。

在石油生产方面，巴西是2019年全球第10大石油生产国，产量为280万桶/日。墨西哥排名第十二，为 210 万桶/天，哥伦比亚以 88.6 万桶/天排名第 20，委内瑞拉以 87.7 万桶/天排名第二，厄瓜多尔以 53.1 万桶/天排名第 28，阿根廷50.7 万桶/天第29。由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消耗很少的石油并出口其大部分产品，因此它们是欧佩克的一部分。由于缺乏投资，委内瑞拉在 2015 年后产量大幅下降。

在天然气生产方面，2018年阿根廷生产了1524bcf（十亿立方英尺），墨西哥生产了999，委内瑞拉946，巴西877，玻利维亚617，秘鲁451，哥伦比亚379。

制造

尽管很大一部分生产在采矿和农业部门，但拉丁美洲各国也有重要的制造业部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占拉丁美洲制造业的 75%。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遵循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对外国制成品征收关税，以鼓励国内制造业。拉丁美洲发展了重要的汽车制造业，外国公司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地方设立了工厂。例如，在墨西哥，福特汽车公司于 1925 年设立工厂，墨西哥的汽车工业包括大部分主要汽车制造商。被称为maquiladoras或maquilas 的装配厂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沿线蓬勃发展，进口组件在那里变成成品然后出口。巴西的汽车工业在该国的工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巴西的交通挑战，沿海城市不易通过公路或铁路连接，该国采取措施发展飞机工业，1969 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成立成立，专门从事支线飞机。

世界银行每年列出制造业总制造价值的国家排名。根据 2019 年的榜单，墨西哥拥有世界上第 12 大最有价值的产业（2178 亿美元），巴西第 13 大（1736 亿美元），委内瑞拉第 30 大（582 亿美元，但依赖石油获得这个价值），阿根廷第 31 大（577 亿美元），哥伦比亚第 46 大（354 亿美元），秘鲁第 50 大（287 亿美元）和智利第 51 大（283 亿美元）。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以及不那么突出的智利，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从二战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二战使得处于战争中的英美等国家无法与他们习惯于进出口的地方进行贸易。当时，得益于当地丰富的原材料、支付给劳动力的低工资以及移民带来的一定专业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以及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得以实施重点产业园区。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的工业园区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产先进的技术产品。在其他拉美国家，主要是中美洲，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业占主导地位。

在食品行业，2019年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加工食品出口国。2016年，该国是世界第二大纸浆生产国和第八大纸生产国。在制鞋业，2019年，巴西在世界生产国中排名第4。2018年，巴西化学工业位居世界第8位。在纺织业，巴西虽然是 2013 年世界 5 大生产国之一，但很少融入世界贸易。在航空领域，巴西拥有仅次于波音和空客的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金融

自 19 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拥有运作良好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发行货币、管理流动和实施货币政策。在有大量商品出口活动和外国资本存在的国家，19 世纪建立了

证券交易所：巴西里约热内卢（1845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854 年）；秘鲁（1860）；阿根廷罗萨里奥；墨西哥(1886)；乌拉圭（1867）。大多数其他创建证券交易所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在 20 世纪这样做的。

在 20 世纪后期，贩毒，尤其是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可卡因，为一些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现金。巴拿马文件等数据泄露表明该国洗钱的重要性，在那里，莫萨克丰塞卡在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曼岛，泽西岛，摩纳哥，苏黎世等主要金融中心运营着一个全球洗钱网络。

基础设施

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水平被描述为不足，是该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政府在鼓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拉丁美洲，该地区设有部门规划机构，但许多关键属性可以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拉丁美洲在基础设施资金的可用性和多年预算框架的可用性方面表现不佳。

拉丁美洲将大约 3% 的 GDP 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金融时报》建议，拉丁美洲要实现其基础设施目标，基础设施支出应至少为 6%。这可以通过促进私营部门的参与来实现。私营部门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也本应当可以发挥着积极作用。拉丁美洲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方面做得很差。为基础设施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开发金融市场可以帮助政府为基础设施项目调动资源，同时限制其面临的货币风险。

虽然拉美基础设施仍有增长空间，但拉美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2013 年，私募股权公司在能源、电信和供应链开发方面的投资超过 35 亿美元。各国政府仍在寻求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小型合作伙伴关系，以减少贸易动态中的不足。巴拿马已采取措施整合其供应链能力的物理基础设施。巴拿马完成了扩建巴拿马运河，以容纳更大的船只。2014年，巴拿马新建托库门国际机场和科隆自由贸易区是主要的机制，以加强在巴拿马的供应链。

中国在拉丁美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包括一条连接哥伦比亚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铁路线，以及一条从巴西到秘鲁的更长的铁路线，但计划尚未转化为已完成的项目。与尼加拉瓜政府合作的港资项目计划通过中美洲最大的尼加拉瓜湖建造尼加拉瓜大洋运河项目，与巴拿马运河竞争。总部位于香港的 HKND 集团是唯一的特许经营商。

2012 年建成的一条主要国际公路通过跨洋公路将巴西与秘鲁连接起来。它具有经济效益，但也为亚马逊地区的环境退化开辟了道路。巴西还资助了古巴马里埃尔的古巴港口的重大升级，以处理大型集装箱船。

拉美地区交通基本采用公路方式进行。还有相当多的港口和机场基础设施。铁路和河流部门，虽然有潜在的价值，通常在二级对待。

巴西拥有超过170万公里的道路，其中21.5万公里是铺砌的，约1.4万公里是公路。该国最重要的两条高速公路是BR-101和BR-116。阿根廷拥有超过

600,000公里的道路，其中约70,000公里是铺砌的，约2,500公里是分隔公路。在该国三个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是九号干线，干线7和14号公路。哥伦比亚有大约 210,000 公里的道路，大约 2,300 公里是分开的高速公路。智利有大约82,000公里的道路，其中20,000公里是铺砌的，大约2,000公里是分开的高速公路。该国最重要的公路是5号公路（泛美公路）。这 4 个国家是南美洲公路基础设施最好、双车道公路数量最多的国家。

墨西哥的公路网全长 366,095 公里（227,481 英里），其中 116,802 公里（72,577 英里）已铺设，10,474 公里（6,508 英里）是多车道高速公路：9,544 公里（5,930 英里）是四车道高速公路，其余有 6 条或更多车道。

由于安第斯山脉、亚马逊河和亚马逊森林，实施横贯大陆或生物海洋的高速公路一直存在困难。实际上，唯一存在的路线是将巴西连接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连接到智利的圣地亚哥。但近年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新路线开始涌现，如巴西-秘鲁（Interoceanic Highway），以及连接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北部和智利北部的新高速公路（Bioceanic Corridor）。

巴西有2000多个机场。该国拥有世界第二多的机场，仅次于美国。圣保罗国际机场位于圣保罗大都市区，是该国最大、最繁忙的机场——该机场将圣保罗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巴西拥有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贝洛奥里藏特、阿雷格里港、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库亚巴、萨尔瓦多、累西腓、福塔莱萨、贝伦和马瑙斯等44个国际机场，等等。阿根廷拥

有重要的国际机场，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巴里洛切、门多萨、萨尔塔、伊瓜苏港、内乌肯和乌苏海亚等。智利拥有重要的国际机场，如圣地亚哥、安托法加斯塔、蒙特港、蓬塔阿雷纳斯和伊基克等。哥伦比亚拥有重要的国际机场，如波哥大、麦德林、卡塔赫纳、卡利和巴兰基亚等。秘鲁拥有重要的国际机场，如利马、库斯科和阿雷基帕。其他重要机场位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巴拉圭（亚松森）、玻利维亚（拉巴斯）和厄瓜多尔（基多）的首都。2017 年南美洲最繁忙的 10 个机场是：圣保罗-瓜鲁柳斯（巴西）、波哥大（哥伦比亚）、圣保罗-孔戈尼亚斯（巴西）、圣地亚哥（智利）、利马（秘鲁）、巴西利亚（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Aeroparque（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阿根廷）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巴西）。

墨西哥有 1,834 个机场，按国家/地区划分，机场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七个最大的机场——吸收了 90% 的航空旅行——是（按照空中交通量的顺序）：墨西哥城、坎昆、瓜达拉哈拉、蒙特雷、蒂华纳、阿卡普尔科和巴亚尔塔港。考虑到整个拉丁美洲，2017 年最繁忙的 10 个机场是：墨西哥城（墨西哥）、圣保罗-瓜鲁柳斯（巴西）、波哥大（哥伦比亚）、坎昆（墨西哥）、圣保罗-孔戈尼亚斯（巴西）、圣地亚哥（智利）、利马（秘鲁）、巴西利亚（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和托库门（巴拿马）。

关于港口，巴西有一些在南美洲最繁忙的港口，如桑托斯港，里约热内卢港，巴拉那瓜港，伊塔雅伊港，格兰德港，圣弗朗西斯科港口和Suape的港口。阿根廷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和罗萨里奥港等港口。智利在瓦尔帕莱索、火山口、梅希隆内、安托法加斯塔、伊基克、阿里卡和蒙特港有重要港口。哥伦比亚拥有布埃纳文图拉、卡塔赫纳集装箱码头和玻利瓦尔港等

重要港口。秘鲁在卡亚俄、伊洛和马塔拉尼有重要港口。南美洲最繁忙的15 个港口是：桑托斯港（巴西）、巴伊亚卡塔赫纳港（哥伦比亚）、卡亚俄（秘鲁）、瓜亚基尔（厄瓜多尔）、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圣安东尼奥（智利）、布埃纳文图拉（哥伦比亚） ）、伊塔亚伊（巴西）、瓦尔帕莱索（智利）、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巴拉那瓜（巴西）、里奥格兰德（巴西）、南圣弗朗西斯科（巴西）、马瑙斯（巴西）和科罗内尔（智利）。

考虑到整个拉丁美洲，运输量最大的 10 个港口是：科隆（巴拿马）、桑托斯（巴西）、曼萨尼约（墨西哥）、卡塔赫纳巴伊亚（哥伦比亚）、太平洋（巴拿马）、卡亚俄（秘鲁）、瓜亚基尔（厄瓜多尔）、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圣安东尼奥（智利）和布埃纳文图拉（哥伦比亚）。

巴西铁路网延伸约3万公里。它主要用于运输矿石。阿根廷铁路网拥有47,000 公里的轨道，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之一，并且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广泛的铁路网。它拥有大约 100,000 公里的铁路。它与巴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和乌拉圭有四个不同的步道和国际连接。智利拥有近7,000 公里的铁路，可通往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哥伦比亚只有大约3,500 公里的铁路。

在巴西的主要水道中，有两条脱颖而出：Hidrovia Tietê-Paraná（全长2,400 公里，巴拉那河上有 1,600 公里，在铁特河上有 800 公里，从马托格罗索州、南马托格罗索州排出农业生产、戈亚斯和朗多尼亚的一部分、托坎廷斯和米纳斯将军）和Hidrovia do Solimões-Amazonas（它有两

个部分：Solimões，从 Tabatinga 延伸到 Manaus，大约有 1600 公里；Amazonas，从 Manaus 延伸到贝伦，有 1650 公里。几乎所有亚马逊平原的客运都是通过这条水道完成的，此外还有几乎所有运往贝伦和马瑙斯主要区域中心的货物运输）。在巴西，这种交通仍未得到充分利用：从经济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水路延伸在该国的东南部和南部。它的充分利用仍然取决于船闸的建设、主要的疏浚工程，主要是允许多式联运一体化的港口。在阿根廷，水路网络由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巴拉圭河和乌拉圭河组成。主要内河港口有萨拉特和坎帕纳。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在历史上是第一个重要的港口，但被称为上游的地区，沿着巴拉那河圣菲部分的 67 公里延伸，汇集了 17 个港口，集中了 50% 的国家出口总额。

能源

巴西

巴西政府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此前进口占该国石油需求的 70% 以上，但巴西在 2006-2007 年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巴西是 2019 年全球第 10 大石油生产国，产量为 280 万桶/天。生产能够满足该国的需求。

巴西是世界主要的水力发电生产国之一。2019年，巴西在运水电站217座，装机容量98581兆瓦，占全国发电量的60.16%。在总发电量中，2019 年巴西的装机容量达到 170,000 兆瓦，其中 75% 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大部分为水力发电）。

核能约占巴西电力的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21 年 2 月，光伏太阳能总装机容量为 8.5 吉瓦，平均容量系数为 23%。2020 年，巴西在太阳能装机量（7.8 吉

瓦）方面位居世界第 14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east_Asia

东南亚

东南亚北临东亚，西临南亚和孟加拉湾，东临大洋洲和太平洋，南临澳大利亚和印度洋。除了英属印度洋领地和马尔代夫26 个环礁中的两个在南亚，东南亚是亚洲唯一部分位于南半球的区域。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仍位于北半球。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南部是赤道以南的唯一部分。

其总人口超过6.5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8.5%。它是亚洲人口第三多的地理区域，仅次于南亚和东亚。该文化和种族上具有多样性，不同种族群体使用数百种语言。该地区有十个国家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东

盟是一个地区性组织，旨在实现其成员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和文化融合。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该地区连同南亚的部分地区在 20 世纪之前被欧洲人称为东印度群岛或简称为印度群岛。中国资料称该地区为南洋。东南亚大陆部分被欧洲地理学家称为印度支那，因为它位于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之间，并且受到两个邻近地区的文化影响。然而，在 20 世纪，该术语更多地限于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东南亚的海域也被称为马来群岛。东南亚海上的另一个术语是Insulindia（印度群岛），用于描述印度支那和澳大拉西亚之间的地区。

1839 年，美国牧师霍华德·马尔科姆 (Howard Malcolm) 在其著作《东南亚游记》中首次使用"东南亚"一词。马尔科姆在他对东南亚的定义中只包括大陆部分而排除了海洋部分。该术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正式使用。1970 年代后期，"东南亚"一词及其包含的领土的大致标准用法已经出现。尽管从文化或语言的角度来看，"东南亚"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当今最常见的定义包括以下所列国家（主权国家和附属领土）所代表的地区。

东南亚十一个国家中有十个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而东帝汶是观察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已表示可能加入东盟，目前是观察员。南海部分岛屿存在主权问题。

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

文莱

东马来西亚

东帝汶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半岛在地理上位于大陆东南亚，它也分享了许多相似的文化和生态亲和力周围的岛屿，因此它可作为两个分区域的桥梁。在地理上，印度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也被认为是东南亚海洋的一部分。孟加拉东部和印度东北部与东南亚大陆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有时被认为是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跨区域地区。在某些情况下，斯里兰卡因其与东南亚大陆的文化和宗教联系而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新几内亚岛的东半部，即不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时也被列为东南亚海洋的一部分，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也是如此，它们与该地区都是西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特别是菲律宾有着强大的文化和语言联系。

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的东半部被认为是大洋洲在地理上相关的，由于其独特的区系特征。在地质上，新几内亚岛及其周围岛屿被视为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通过萨胡尔大陆架相连。圣诞岛和科科斯位于澳大利亚板块，南部的爪哇海沟。尽管它们在地理上比澳大利亚大陆更靠近东南亚海洋，但这两个澳大利亚的外部领土在地质上与亚洲无关，因为它们实际上都不在巽他板块上。世界地理分区列表把两个岛屿领土归类为大洋洲部分，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洋洲）分区。

历史

大多数东南亚人最初是万物有灵论者，从事祖先、自然和神灵的崇拜。在该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在1世纪与印度次大陆接触后，这些信仰体系后来被印度教和佛教所取代。印度婆罗门和商人将印度教带到了该地区，并与当地宫廷取得了联系。当地统治者皈依印度教或佛教，采用印度宗教传统来加强其合法性，并促进与南亚国家的贸易。他们定期邀请印度婆罗门进入他们的领域，并开始了一个渐进的该地区的印度化的过程。湿婆派是公元 1 世纪许多南印度王国的主要宗教传统。然后它通过孟加拉湾、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传播到东南亚，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柬埔寨和越南的岛屿上形成了数千座湿婆神庙，与该地区的佛教共同发展。小乘佛教在 3 世纪通过该地区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海上贸易路线进入该地区。佛教后来在5世纪的阜南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势力。在当今的东南亚大陆，上座部佛教仍然是佛教的主要分支，由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的佛教徒所信奉。这个分支与受印度教影响的高棉文化融合在一起。大乘佛教在东南亚海上建立了存在，由中国僧侣在前往那烂陀的途中在该地区过境时带来。它仍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佛教徒实践的主要佛教分支。

这两种印度宗教的传播将东南亚土著信仰的信徒限制在偏远的内陆地区。直到 15 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在这些地区传播时，马鲁古群岛和新几内亚从未被印第化，其土著居民主要是万物有灵论者。在越南，由于中国强大的影响力，佛教从未设法发展出强大的制度网络。在当今的东南亚，越南是唯一一个民间宗教占多数的国家。最近，越南民间宗教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复兴。在其他地方，也有东南亚族群是仍然保留其原始信仰万物有灵论，如Dayaks在加里曼丹，Igorots在吕宋岛，和掸族在缅甸东部。

印度教和佛教王国时代

印度教从南亚传播到东南亚

该地区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与印度次大陆接触后，开始了印度化的逐步过程，印度的宗教、文化、建筑和政治管理等思想由商人和宗教人物带来，并被当地统治者采用。反过来，当地统治者邀请印度婆罗门和僧侣居住在他们的领土上，并帮助改变当地政体，使其更加印度化，融合印度和土著传统。梵语和巴利语成为该地区的精英语言，有效地使东南亚成为印度圈的一部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前几个世纪已被印度化，而菲律宾后来在大约 9 世纪，当通多王国在吕宋岛建立时被印度化。越南，尤其是其北部地区，由于经历了许多中国统治时期，从未完全印度化。

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受印度影响的政体是大约公元前 2 世纪已经存在的 Pyu 城邦，位于缅甸内陆。它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陆上贸易枢纽。小乘佛教是这些城邦的主要宗教，而其他印度宗教，如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也很普遍。公元1世纪，以湄公河三角洲为中心的阜南诸国建立，包括现代柬埔

寨、越南南部、老挝和泰国东部。大约五个世纪以来，它成为东南亚大陆的主要贸易力量，为印度和中国的商品提供通道，并在东南亚的商业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东南亚海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印度化王国是沙拉卡那加拉王国，大约在公元 2 世纪建立于西爪哇。这个印度教王国被希腊人称为Argyre（银之国）。

到公元 5 世纪，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网络集中在海上航线上。由于东南亚海上的发展，外国贸易商开始使用马六甲和巽他海峡等新航线。这种变化导致了阜南的下降，而新的海上强国，如室利佛逝，Tarumanagara和Medang出现。Srivijaya 尤其成为超过 5 个世纪的海上霸权，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1025 年，当斯里维也被朱罗帝国入侵时，这种统治地位开始下降。入侵重塑了该地区的权力和贸易，导致高棉帝国和卡胡里潘等新的地区强国崛起。与中华帝国的持续商业联系使朱拉人能够影响当地文化。今天在整个东南亚发现的印度教文化影响的许多幸存例子都是乔拉探险的结果。

随着三佛齐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印度教高棉帝国在公元 11 至 13 世纪经历了黄金时代。帝国的首都吴哥拥有雄伟的古迹——如吴哥窟和巴戎寺。占城文明坐落在今天的越南中部，是一个高度印度化的印度教王国。1471年，在越南发动了针对大规模征服湛人的过程中，越南入侵，洗劫和焚烧占城，屠杀数千名占族人，并强行将他们同化到越南文化中。

公元13世纪，该地区经历了蒙古人的入侵，影响了越南沿海、缅甸内陆和爪哇等地区。1258年、1285年和1287年，蒙古人试图入侵大越和占城。入

侵没有成功，但大越和占婆都同意成为元朝的朝贡国，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1277年至1287年，蒙古人还入侵了缅甸的异教王国，导致王国分裂，并由名义上臣服于元朝的当地酋长统治的较小的掸邦崛起。然而，1297年，一个新的地方力量出现了。敏赛王国成为缅甸中部的真正统治者，挑战蒙古人的统治。这导致了 1300 年蒙古人第二次入侵缅甸，但被 Myinsaing 击退。蒙古人后来在1303年从缅甸撤出。1292年，蒙古人派使节到爪哇的辛哈沙利王国，要求其臣服于蒙古人的统治。Singhasari 拒绝了这个提议，并伤害了使节，激怒了蒙古人，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入侵舰队前往爪哇。他们不知道的是，由于其封臣之一卡迪里（Kadiri）的叛乱，辛哈萨里（Singhasari）于 1293 年垮台。当蒙古人到达爪哇时，当地一位名叫维贾亚的王子主动帮助蒙古人惩罚卡迪里。Kadiri 被击败后，Wijaya 转向他的蒙古盟友，伏击他们的入侵舰队并迫使他们立即离开爪哇。

1293年蒙古人离开后，维贾亚也在爪哇东部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满者伯夷很快就成长为地区强国。其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哈耶姆·乌鲁克(Hayam Wuruk)，他在 1350 年至 1389 年的统治标志着帝国的顶峰，当时马来半岛南部、婆罗洲、苏门答腊和巴厘岛的其他王国都受到其影响。Nagarakertagama 等各种消息来源也提到它的影响范围遍及苏拉威西岛、马鲁古岛的部分地区，以及新几内亚西部和菲律宾南部的一些地区。使其成为东南亚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然而，到了公元 15 世纪，满者伯夷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因为它经历了许多继承权的战争，以及围绕战略性马六甲海峡的新伊斯兰国家，如八昔和马六甲苏丹国的兴起。满者伯夷随后于 1500 年左右崩溃。它是欧洲人到来之前最后一个主要的印度教王国，也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地区强国。

伊斯兰教的传播

公元 8 世纪，当倭马亚人通过海上航线与该地区建立贸易时，伊斯兰教开始与东南亚接触。然而，它的传播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后。11世纪，东南亚的海上历史发生了动荡的时期。印度朱罗海军飘洋过海，攻击室利佛逝 Sangrama Vijayatungavarman在Kadaram（王国吉打）；强大的海上王国的首都被洗劫，国王被俘虏。与卡达拉姆、班奈一起位于今苏门答腊 Malaiyur 和马来亚半岛的诸王国也遭到袭击。不久之后，吉打国王 Phra Ong Mahawangsa 成为第一个放弃传统印度教信仰的统治者，并在 1136 年成立吉打苏丹国后改信伊斯兰教。Samudera Pasai于 1267 年改信伊斯兰教，马六甲国王帕拉梅斯瓦拉娶了八昔公主，其子成为马六甲的第一任苏丹。很快，马六甲成为伊斯兰海上贸易的中心，其他统治者也纷纷效仿。

东南亚的伊斯兰化进程有多种理论。一个理论是贸易。西亚、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贸易的扩大有助于宗教的传播，因为来自南也门（Hadramout）的穆斯林商人以其大量贸易将伊斯兰教带到该地区。许多人定居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在阿拉伯-印度尼西亚人、阿拉伯-新加坡人和阿拉伯-马来人中很明显，他们曾经在各自的国家中都非常突出。最后，统治阶级接受了伊斯兰教，这进一步促进了该宗教在整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最重要港口马六甲苏丹国的统治者，在 15 世纪接受了伊斯兰教，预示着整个地区伊斯兰教加速转变的时期，因为伊斯兰教在统治阶级和贸易阶级中提供了力量。古吉拉特穆斯林在东南亚建立伊斯兰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贸易和殖民

马来西亚相传，一位中国明朝皇帝在被苏丹的智慧所折服后，派遣公主杭丽宝带着500名随从前往马六甲与苏丹曼苏尔沙结婚。Han Li Po 的井（建于 1459 年）现在是那里的旅游景点，她的随从定居的Bukit Cina也是如此。

西方的影响力于 16 世纪开始进入，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马鲁古和菲律宾，后者在几年后被西班牙人定居。在整个 17 和 18 世纪，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国印度支那; 和英国海峡殖民地。到19世纪，除泰国外，所有东南亚国家都被殖民。

欧洲探险家从西边和东边到达东南亚。从印度洋向东航行和从亚洲大陆向南航行的船只之间的定期贸易提供商品以换取天然产品，例如来自群岛岛屿的蜂蜜和犀鸟喙。在 18 和 19 世纪之前，欧洲人大多对扩大贸易联系感兴趣。对于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来说，与欧洲人的互动相对较少，传统的社会惯例和关系仍在继续。对大多数人来说，以维持生计的农业、渔业以及在欠发达文明中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生活仍然很艰难。

欧洲人带来了基督教，使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广泛传播。泰国还允许西方科学家进入泰国发展自己的教育体系，并开始派遣皇室成员和泰国学者从欧洲和俄罗斯接受高等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侵略这一地区的大多数西方的前殖民地。占领政权对平民实施暴力行动，如马尼拉大屠杀和系统化实施强迫劳动，

比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涉及4 10万人的奴役劳动制度。后来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在日本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有 400 万人因饥荒和强迫劳动而死亡。盟军在二战东南亚战场击败日本以后，民族主义者赢得独立。

印度古吉拉特邦在 15 和 16 世纪与东南亚有着繁荣的贸易关系。17世纪葡萄牙入侵东南亚后，与古吉拉特邦的贸易关系下降。

美国于 1898 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菲律宾1934 年获得内部自治权，1946 年获得独立。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享有民族自治权。民主的政府形式和对人权的承认正在生根发芽。东盟为整合商业和区域对国际关注的反应提供了框架。

中国根据其九段线对南中国海提出了广泛的主张，并建造了人工岛屿以加强其主张。中国还主张以南沙群岛为基础的专属经济区。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菲律宾诉中国（2016），法院做出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并拒绝中国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群岛。在地质上，印度尼西亚群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地质隆起的地区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区。

东南亚以热带气候为主，全年炎热潮湿，雨量充沛。越南北部以及老挝和缅甸的山区是东南亚唯一具有亚热带气候的地区，冬季凉爽，可能会下雪。由于风或季风的季节性变化，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有干湿季节。该热带雨带在季风季节导致额外的降雨。其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第二大雨林（与亚马逊雨林是最大的）。这种气候和植被的一个例外是北部地区的山区，那里的高海拔导致温和的温度和干燥的景观。

经济

该地区的商品种类繁多，但尤为重要的是胡椒、姜、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香料贸易最初是由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发展起来的，但它也将欧洲人带到了该地区。首先，从美洲和葡萄牙王国航行的西班牙人（马尼拉大帆船），然后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结果，荷兰人进入印度尼西亚，英国人进入马来亚和婆罗洲部分地区，法国人进入印度支那，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进入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越南、柬埔寨的橡胶种植园，马来亚的锡矿开采，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都是对强大市场需求的回应。

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影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当时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移民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定居。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该地区的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因许多中国难民移居国外。

该地区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大米和橡胶长期以来一直是突出的出口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新兴市场，印度尼西

亚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新加坡和文莱则是富裕的发达经济体。东南亚其他地区仍然严重依赖农业，但越南在发展工业领域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该地区主要生产纺织品、微处理器等电子高科技产品和汽车等重工业产品。东南亚的石油储量丰富。

17 家电信公司签约建造连接东南亚和美国的亚美门户海底电缆，这是为了避免2006 年恒春地震中从台湾到美国的海底电缆被切断造成的那种中断。

旅游业一直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柬埔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如果构思正确，旅游业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发展工具，也是保护我们星球文化多样性的有效手段。”自1990年代初以来，“即使是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等旅游业收入较低的非东盟国家，也在尝试扩大自己的旅游业。” 1995 年，新加坡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超过 8%，位居区域领先地位。到 1998 年，这些收入下降到 GDP 的 6% 以下，而泰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收入增加到 7% 以上。自 2000 年以来，柬埔寨已超过所有其他东盟国家，2006 年其 GDP 的近 15% 来自旅游业。此外，由于其大量的外国投资机会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越南被认为是东南亚的新兴力量，尽管他们的贸易禁运在 1995 年才解除。

印度尼西亚是G-20 主要经济体的唯一成员，也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 2020 年的估计国内生产总值为 10,888 亿美元（名义）或 33,283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038 美元（名义）或 12,345 美元（购买力平价）。

东南亚股市在 2010 年的表现优于亚太地区的其他证券交易所，其中菲律宾PSE以 22% 的增长率领先，其次是泰国的SET以 21% 的增长和印度尼西亚的JKSE以 19% 的增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的估计，东南亚的人均 GDP 为 4,685 美元，与南非、伊拉克和格鲁吉亚相当。

人口统计

东南亚面积约为 4,500,000 平方公里（1,700,000 平方英里）。截至 2018 年，该地区约有 6.55 亿人，其中超过五分之一（1.43 亿）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这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大岛。印度尼西亚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 2.68 亿人口，也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东南亚的宗教和人民分布多种多样，因国家而异。大约有 3000 万华侨也居住在东南亚，其中最突出的是圣诞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还有作为Hoa在越南。东南亚血统的人被称为东南亚人或东盟人。

族群

Aslians和内格里托斯被认为是该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他们在基因上与印度尼西亚东部、东帝汶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巴布亚人有关。在近代，爪哇是东南亚最大的族群，有1亿多人，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的Java。东南亚第二大民族是越南人（京族），人口约 8600 万，主要居住在越南，并在邻国柬埔寨和老挝形成了重要的少数民族。泰族也是一个重要的族群，约

有 5900 万人口在泰国占多数。在缅甸，缅甸人占该国民族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印度-雅利安罗兴亚人在若开邦占很大比例。

印度尼西亚显然以爪哇人和巽他族为主，岛上居住着数百个少数民族，包括马都雷人、米南加保人、武吉士人、巴厘岛人、达雅克人、巴塔克人和马来人。在城邦新加坡，华人占多数，但这座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也把这座岛称为他们的家。

宗教

东南亚国家信仰许多不同的宗教。按人口计算，伊斯兰教约有 2.4 亿信徒，约占总人口的 40%，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南部和菲律宾南部。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东南亚约有 2.05 亿佛教徒，是该地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全球约 38% 的佛教徒居住在东南亚。佛教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新加坡占主导地位。祖先崇拜和儒家思想在越南和新加坡也很普遍。

基督教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部、东马来西亚和东帝汶占主导地位。菲律宾拥有亚洲最多的罗马天主教徒。由于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统治的历史，东帝汶也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2019年10月，东南亚的天主教和新教基督徒人数达到1.56亿，其中菲律宾9700万，印度尼西亚2600万，越南1100万，其余来自马来西亚、缅甸,东帝汶,新加坡、老挝、柬埔寨和文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he_Middle_East

中东经济

中东的经济非常多样化，国家经济范围从碳氢化合物出口到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该地区以石油生产和出口而闻名，这通过其产生的财富和劳动力的利用对整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

中东经济体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 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和也门的经济体。

概述

中东经济一体化是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

巴林

2018年巴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US $ 50,700。巴林拥有波斯湾第一个“后石油”经济。自20世纪末以来，巴林在银行业和旅游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该国首都麦纳麦是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所在地。巴林的人类发展指数很高（世界排名第48位），被世界银行认定为高收入经济体。巴林已将其工业产能扩大到包括铝生产，并签署了一项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以扩大其出口基础。巴林也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银行业的强大参与者，以期在资源出口之外扩张，并在国际服务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黎巴嫩

在 2012年黎巴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16,000美元。当时黎巴嫩的人均 GDP 仅次于 6 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成员国和以色列。然而，黎巴嫩的经济因内部教派冲突和与以色列的冲突而受到严重抑制。黎巴嫩内战后，政府为了重建国家基础设施而承担了巨额债务 。通过外援，该国在重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其贸易逆差接近 80 亿美元，外债 316 亿美元。黎巴嫩的经济正在重建，特别是其工业（包括水泥）和服务业的显着增长，占该国经济的 70% 以上。在稳步增长的鼓舞下，贝鲁特正在重新成为中东金融中心，所有领域的外国投资都在回归。

埃及

埃及的大量外汇来自旅游业。因此，其大部分劳动力都投身于服务业。农业也是埃及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尼罗河地区为埃及最肥沃的土地。它生产用于消费和出口的食品以及用于国内外纺织品生产的棉花。埃及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苏伊士运河。大约 7.5% 的全球海上贸易通过运河，为埃及每年提供超过 30 亿美元的收入。埃及的工业基础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当时该国承担了进口替代产业化政策。国营计划的低效率导致政府开始私有化计划，因此埃及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了可观的 GDP 增长。它还利用合格工业区的优势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尽管有这些发展，埃及仍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500 美元。

伊朗

伊朗有一个在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按 PPP 计算，它是世界第 18 大。伊朗的主要工业主要是国有的。伊朗国有企业的性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低效率。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伊朗在 139 个国家中排名第 69 位。伊朗已经能够通过大量石油收入补贴低效工业并保持可观的增长率。近年来，国家驱动经济的性质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在国外寻找机会，因此，伊朗开始了私有化努力，以根据其正在进行的五年计划刺激贸易，并且还实施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

2018 年 11 月 10 日，SWIFT 首席执行官 Gottfried Leibbrandt 在比利时表示，伊朗的一些银行将与该金融报文服务断开连接。2018年11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预测，到今年年底伊朗的通胀率将高达

40%。

伊拉克

1980 年代与伊朗和1991 年以来的美国近 30 年的战斗对伊拉克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石油生产仍然是伊拉克的主要经济活动。其他部门缺乏发展导致 18-30% 的失业率和 4,632 美元的人均 GDP 低迷。重建援助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基础设施。

以色列

当以色列成立于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创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在敌对的邻国面前，建立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农业，并为人口因移民迅速扩大而提供就业机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造成了大量的低效率，政府能够通过外国援助来抵消，首先是来自于西德的大屠杀赔偿的形式，然后是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

继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国防开支急剧上升，露出了国营经济的弱点。结果导致以色列于1980年召回里拉并发行谢克尔。这一举措未能充分抑制通货膨胀，因此谢克尔在 1985 年被召回，支持以色列新谢克尔，这一举措与全面的经济稳定计划一起实施，该计划阻止了通货膨胀并为 1990 年代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以色列还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私有化努力。

随着数十万来自前苏联的移民的到来，经济在 1990 年代初期得到了提

振。由于大量移民受过高等教育，以色列加快了私有化进程，以鼓励高技能工人留下来。新劳动力也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以色列过去十年的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约为 35,000 美元/年 - 在不依赖自然资源的中东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巴林和阿联酋）。以色列被描述为“非常发达”。

2010年9月，以色列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该组织盛赞以色列的科技进步，称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杰出的成果”。过去几十年该国经济的大部分增长归功于软件、生物医学、电子、电信和其他高科技部门，因为以色列人从事科学和技术调查的百分比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高科技产业约占以色列出口的 43%。

约旦

约旦的经济主要基于外援、投资和汇款。约旦严重依赖其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的高技能劳动力来寄回资金，以帮助支持成千上万的约旦家庭。因此，它的经济命运与国际社会的事件息息相关。约旦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相似的国家，拥有好的教育和医疗体系，许多约旦人选择在国外工作是因为本国生活成本飙升和失业率高。约旦依赖于自 1975年以来占 GDP 近 20% 的汇款。

约旦亲商和亲西方的政府创造了激励措施和自由贸易区，以刺激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约旦的私营部门增长得到了更高的重视。通过利用合格工业区的优势，制成品出口增加，主要是通过纺织业的增长。约旦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

科威特

根据经济自由指数，科威特在 2010 年拥有中东第二大自由经济体。科威特 57% 的GDP来自非石油工业（主要是商业服务、制造、零售贸易、金融机构、建筑、运输和房地产）。石油占GDP的43%、出口收入的87%和政府收入的75%。科威特也出口化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1,912 美元。作为多元化计划的一部分，科威特政府已将其收入进行投资并维持一个规模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2008 年，这些投资占科威特 GDP 的一半以上。科威特 60% 的劳动力是非科威特人。

阿曼

阿曼有几个不同的行业，包括原油生产和精炼、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建筑、水泥、铜、钢铁、化学品和光纤。阿曼也有大量的贸易和预算盈余。阿曼政府收入的 55% 来自非石油行业。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的 64%、政府收入的 45% 和 GDP 的 50%。阿曼希望到 2020 年将石油收入减少到其收入的 9%。随着该计划，该国希望摆脱食利者经济学，在劳动力市场雇用其公民并减少对外籍劳动力的依赖。为了迈出经济独立的第一步，它签署了一份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寻求与欧盟、中国和日本也这样做。它目前正在进入再出口和重型制造市场。

巴勒斯坦

与以色列的持续冲突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的经济。自2000 年第二次起义开始以来，产量一直在下降。自 2007 年 6 月哈马斯在与巴勒斯坦敌对组织

法塔赫的冲突中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后，加沙地带一直被以色列和埃及封锁。2010 年 5 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自实施封锁以来，加沙的正规经济已经崩溃。巴勒斯坦几乎完全依赖外援。总的来说，巴勒斯坦 2014 年的人均 GDP 为 4,300 美元。

卡塔尔

卡塔尔目前享有该地区最高的人均 GDP，为 128,000 美元。它从开采天然气储量中获得了财富。卡塔尔凭借其碳氢化合物产业的收入建立了食利者经济。卡塔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均主权财富基金。由于人口不足 100 万，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实现经济多元化。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经济是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之一，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沙特阿拉伯是G20国家集团的一部分。

沙特阿拉伯总价值为34.4 万亿美元，拥有世界上第二大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该国拥有第二大已探明石油储量，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它还拥有第五大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并被认为是“能源超级大国”。

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并且是欧佩克的成员。2016 年，沙特政府启动了沙特 2030 年愿景，以减少该国对石油的依赖并使其经济资源多样化。2019年第一季度，沙特阿拉伯的预算实现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盈余，这一104亿美元的盈余是由于石油和非石油收入的增加而实现的。

叙利亚

源于 1960 年代的国有化努力，叙利亚经济的大部分由政府经营。然而，低效率的公共部门、大量的国内补贴以及对黎巴嫩的大量干预投资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外债问题。因此，叙利亚政府进行了适度的私有化改革，为 2009 年大马士革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做准备。适度的石油生产和农业部门主导着叙利亚的生产，而其大部分就业则在服务部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900 美元。

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土耳其拥有世界第15 大 GDP-PPP 和第 15 大名义 GDP。该国是经合组织（1961 年）和20 国集团主要经济体（1999 年）的创始成员。土耳其自 1995 年 12 月 31 日起加入欧盟关税同盟。

土耳其经常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归类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美林证券、世界银行和经济学人杂志将土耳其描述为新兴市场经济体。

土耳其正在重组其经济，以试图获得欧盟的正式成员资格。它在 1970 年代初开始实施这一政策，放弃了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由于私有化在土耳其扎根，它带来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此外，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为土耳其带来了收入，并使其能够分享部分区域油气财富。土耳其的经济目前由汽车、农业、建筑和纺织业主导。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200 美元，此外还有大约 120 万在国外工作的土耳其人。

过去，土耳其的经济被认为是地区性的成功故事。

根据致力于提供该国官方统计数据的政府机构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在 2020 年 11 月上升了 14.03%。统计数据显示，与预期水平相比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创 15 个月新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月度消费价格上涨 2.3%，食品、饮料和交通等基本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有报道称土耳其里拉贬值。自 2020 年初以来，它对美元贬值了30% 以上，对欧元贬值了3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是阿拉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沙特阿拉伯），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3770 亿美元（1.38 万亿迪拉姆）。经济多元化。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的71%来自非石油部门。石油仅占迪拜 GDP 的 2%。阿联酋还通过提供 100% 的外国所有权和免税来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旅游业是阿联酋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也门

也门长期遭受经济管理不善之苦。该国失业率高达 85%，严重依赖外籍人士汇款。1991 年波斯湾战争之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驱逐也门工人并减少对该国的援助以回应其对伊拉克的支持，对外国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也门的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其有限的石油生产。其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其主要经济作物是阿拉伯茶。2018 年 11 月 3 日，一名来自工党的英国议员指责伊朗支持也门的叛乱分子是该国灾难性人道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

经济改革

继 1970 年代的石油繁荣之后，中东经济体实施了多项改革政策，旨在维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参与。由于油价波动威胁到主要石油出口国的经济稳定，该地区实施这些经济改革变得更加紧迫。虽然每个国家都遵循自己的经济议程，但许多国家面临着影响整个地区的类似挑战和目标问题。这些政策特别关注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吸引外国投资。

中东国家也开始实施促进中东国家一体化的政策。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该地区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并维持已实现较高增长率和发展速度的国家的稳定。

背景

在1973 年 10 月欧佩克禁运之后，由于欧佩克国家减产 5% 和供应减少，石油市场价格从每桶 3 美元上涨至每桶 12 美元。欧佩克禁运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荷兰、葡萄牙和南非），以报复它们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的财政援助和支持。禁运也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损害以美元收取收入的石油生产国的决定。虽然欧佩克禁运加剧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影响，中东经济体 GDP 快速扩张和增长，中东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 1972 年的 3.6% 增加到 1979 年的 8%。除了经济增长外，中东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发展指标也有所改善，大多数部门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

继 1970 年代石油繁荣和欧佩克禁运之后，中东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地区。中东主要石油出口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导致阿拉伯和亚洲国家的外国工人大量涌入。到 1980 年代末，随着石油价格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中下跌，增长开始停止。因此，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等国家在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不久之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经济稳定政策。1990 年代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越来越容易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

宗教问题

对许多中东国家而言，宗教与经济政策紧密结合，已被证明是有效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该地区的宗教不稳定阻碍了外国投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缺乏政治透明度也被证明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威慑。由于制度质量和治理质量是刺激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同时提出或实施政治改革，中东的经济改革可能不会完成。政治不稳定和持续的地区冲突（如巴以冲突）阻止该地区发挥其最大潜力，因为该地区始终面临影响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发展指标的人道主义危机。

融入全球经济

该地区在经济和政策改革中解决的另一个共同问题是中东融入全球经济。2000 年代初中东经济改革的报告呼吁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改善中东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因为它低于大多数发达地区。此类报告还呼吁改革阻碍大多数贸易（石油出口除外）的贸易部门和协议。中东几个国家将贸易开放视

为“提高人均收入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已经实现了贸易改革和开放的共同目标。

中东新时代的改革

补贴改革

中东价格补贴的历史

中东经济体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补贴的使用，其中能源补贴占最多。这些价格补贴最初是在 1940 年开始的 30 年间推出的，其中许多只是作为价格稳定器开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转变为价格补贴。虽然旨在作为“社会保护”或福利工具实施，但补贴没有足够的针对性，也没有成本效益，违背了其主要目的。它们没有接触到需要更多政府援助的人，而是让大部分富裕的公民受益。补贴已经被接受，通常是唯一到位的社会保护计划，一些中东国家开始将其视为公民的自然权利。这使得它们的移除变得困难。

改革压力

1990 年代之后，随着石油价格在 2000 年代稳步上涨，改革价格补贴的压力开始增大。很明显，价格补贴阻碍了管理机构实施所需的社会计划。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价格补贴改革变得更加必要。

改革

从 2010 年开始，中东 6 个国家（伊朗、也门、约旦、突尼斯、摩洛哥和

埃及）对其价格补贴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伊朗是该地区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并开始对所有燃料产品、电力、水和运输实施大幅提价。这被每人每月 445,000 里亚尔的现金转移所抵消。在非补贴商品方面，此类商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平均涨幅在30%左右，最高为100%。向公民提供的现金转移被发现过多，并且不成比例地使该国较富有的公民受益。由于补贴改革的不利影响，部分改革于 2012 年 3 月根据新修订的"定向补贴改革法"被废除。

该地区另一个实施补贴改革的国家是也门共和国，它在 2005-2010 年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进行了改革。在此期间，价格周期性地上涨了数倍。2011年和2012年汽、柴油、煤油价格持续上涨，公众关注度不高。然而，2014 年取消所有补贴的决定使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了近90%，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并导致其中一些改革在当年发生逆转。

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极端改革到渐进改革。有效性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例如改革期间的政治气候，或者公众是否收到有关应对取消商品和服务补贴的预防性警告和建议。减少中东的补贴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仍然容易受到政权、政治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的影响；尽管经常遇到挫折，但已经取得了显着进展。

经济多元化

中东国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实现经济多元化，尤其是石油出口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已经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实施改革方面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减少海湾国家对资源的依赖，未来的改革和政策建议已经实施，并遵

循经济发展计划，标志着从自然资源转向全球一体化的多元化经济，希望吸引外国投资。此类多元化计划的例子包括沙特阿拉伯的 2030 年愿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30 年经济愿景，每个愿景都概述了该国到 2030 年达到预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目标。

沙特阿拉伯愿景 2030

沙特阿拉伯 2030 年的经济愿景概述了该王国希望实现的各种目标。一是中小企业（SME）扩大到占GDP的35%，几乎是目前的两倍。该计划概述了将 20% 的资金分配给中小企业。该计划还提到继续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

阿布扎比 2030 年经济愿景

阿布扎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设定了到 2030 年实现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经济的目标，其资金来自该市获得的石油财富。该计划以部门GDP为重点，强调经济多元化与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酋长国还关注城市内私营部门的发展。

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境况

本书前文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以来、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外部、国际环境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于工业革命起源的追溯，包括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在过去几百年的经济腾飞历史的回顾。

这样的讲述和回顾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在过去七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在几乎所有的中文语境中，无论是报章书刊，或是任何文字性的书籍和论文，在近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方面，都被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所笼罩【凡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矛盾冲突的东西，或是凡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之仇视、蔑视、无视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历史观念，都会受到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审查和监视】，从而充满了虚假、扭曲、过滤、系统化的谎言。以至于，多数中国人民对于世界近现代史、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等等，都往往知之甚少，或是被局限在所谓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等陈词滥调甚至谎言和虚假、或以偏概全的历史之中。

对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发展状况，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中外之间的横向比较是必要的，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见，所谓苏联共产国际，以及所谓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

谬、愚蠢、罪恶之处。

在1976年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之前，荒唐罪恶的文革不仅把中国这样一个占据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拖入世界上最贫穷落后国家的深渊，而且，更在文革中、以及之前的大跃进大饥荒中，分别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把无尽的痛苦和患难带给千千万万家庭，把贫穷、封闭、愚昧带给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开始逐渐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为了继续在中国实施专制主义统治政策【尽管，准备在经济发展方面，放松桎梏性政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有限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于是，又继续编造了更多的谎言。在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继续施展狡诈的撒谎传统，把文革的罪恶粉饰成毛泽东的无心之失、判断性错误、或仅仅是晚年糊涂的错误【而以似是而非的、所谓的“三七开”的评判标准来评价毛泽东；即，毛泽东的一生是百分之七十正确的，而只有百分之三十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文革以前都是正确的，等等】，并把罪恶的罪名交给林彪、四人帮等来顶替。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20年代成立的那一天起，其基础、核心、理

念、出发点、目标、方法、体系、组织路线、等等，就充满了谬误、罪恶、愚妄、谎言，正如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础、核心、理念、出发点、目标、方法、体系、组织路线、等等，都充满了谬误、罪恶、愚妄、谎言一样。

事实是，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大饥荒等等，从本质性、一般性而言，是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然产物，正如苏联、越南、北朝鲜、柬埔寨、等地所曾经普遍一致性地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清洗、大饥荒一样；正如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以及今天的古巴所实行的，专制主义统治、欺谎、愚昧、压制、铁拳统治、等等一样。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通过系统性狡诈谎言的形式，开始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政治领域，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七十年前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任何不同；它们都是同样地残酷压制人民、狡诈地压榨人民、欺谎地愚弄人民。

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否定了文革，但是，自从1976年以来的四十多年中，中国从未曾对文革的发生机制、原因、过程等等进行深刻地、

系统性地、认真严肃、谦卑诚实地反思和研究。

反而，随着二十一世纪初的二十年中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气和野心、残暴愈加明显，文革在中国民间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肯定，人民日日生活在谎言之中；整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充满了对于民主自由政治等等、以及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仇视、蔑视、无视。

自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其所谓理想主义中就充满了很多暴戾、邪恶、不讲法治、不讲民主、不讲妥协、不讲恩慈、不讲饶恕的成分和特征。其中充满了自义、顽梗、口是心非、虚假，没有诚实、谦卑、温柔、博爱的心灵。共产党人常常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成是正义的化身，然而却堂而皇之地行诡诈欺谎之事。他们真正信奉的，其实不是什么济世主义，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们自己的权力、利益、话语权、业绩。他们打着光辉理想的旗帜，却自欺欺人地做着各种各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事情。他们和纳粹主义、专制暴君制度等等一样；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自己的目标是“正确”“伟大”的，那么，他们所作的欺压、残暴和欺谎的恶事就是必要的、情有可原的、迫不得已的、等等。他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敬畏。他们就像是愚顽人一样，在心里面悄悄地对自己说“其实没有神”；他们明知道，恶人的罪，必将要受到终极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但是，他们却肆无忌惮地行恶、行诡诈之事，就好象将要被屠宰的猪，却在引颈受屠之前批命狂欢一样。

【引述 圣经 诗篇 愚顽人在心里说，没有神】

诗篇.

53.

大卫的训诲诗，交给诗班长，调用“麻拉”。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不义；没有一个行善的。

神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　神的没有，

他们各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　神。

他们在无可惊惧的时候，必大大震惊；因为　神把那些扎营攻击你的人的骨头击散了；他们蒙羞受辱，因为　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或译：“　神把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

文革是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影响深远的、破坏性巨大的事件。文革的发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罪恶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

文革的发生，真实地显明了：——

中国共产党系统的真专制、假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荒谬、愚昧、罪恶、欺谎；

所谓的"公有制"经济意识形态的低效、欺谎、不公、虚假【从根本上说，公有制经济之所以低效、不公、远逊于私有制经济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有制中，人们没有责任、不负责任、偷奸耍滑、负面竞争、劣币淘汰良币、言辞行为假大空；诚实的劳动、智慧的创造、判断、抉择、汗水、辛勤、历险、勇气、耐心、坚韧的劳作，等等，得不到人们的诚实认可，社会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公有制中，表面上看起来人们彼此共有财物，但实际上，人们在内心中充满了蝇营狗苟、欺谎、虚伪、贪恋、贪婪、嫉妒、吝啬、争竞、等等。这并不是说，私有制经济制度就是完美的、就不需要认真严肃谨慎的管理、引导、监督、赏罚、法治。这也并不是说，——在一些行业方面，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与监管、以至于仅仅地盲目信任一些财阀或寡头统治者对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影响和管理。而是说，在深刻的理念层面、经济体系层面上，公有制包含着巨大的、普遍的

缺陷、漏洞、谎言、愚昧，远远地超过了所谓私有制经济制度给人类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损害和阻碍。公有制之罪恶、愚昧、低效、欺谎的核心，正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等等，根本没有看到、或是故意无视，在人心之中所普遍地遍及存在的罪性和罪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中，人不但不是无罪的，而且是自义的；所谓"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伟大光荣"、"劳动创造了人"等等，与其说是一些虚幻的、自义的幻想、陈词滥调的政治经济学语汇，不如说是愚妄骄傲的、罪恶的、对于人心的深刻引诱，以及罪恶的欺谎、试探。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以及对世人的试探引诱，正如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中魔鬼撒旦对于亚当夏娃的试探引诱一样；其主旨正是要把人的心灵引诱、使之离开那伟大的上天、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使人类在内心深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自己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使人在内心中失去对于上帝、造物主的敬虔信仰和敬拜、倚靠。】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2章、3章】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

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

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

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诗篇.

14.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本节在《马索拉抄本》包括细字标题）

耶和华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　神的没有。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所有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

华。

他们必大大震惊，因为　神在义人的群体中。

你们要使困苦人的计划失败，但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或译："耶和华把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启示录.

16.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发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　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性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水就变成好像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今在昔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啊！全能的　神，你的审判真实、公

义！”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

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难的　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

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为自己所作的悔改。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

我看见三个污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它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作战。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就不至于赤身行走，让人看见他的羞耻。）

污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

于是有闪电、响声、雷轰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

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自

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它。

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块重约四十公斤。由于这冰雹的灾，人就亵渎　神，因为这灾太严重了。

启示录.

17.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跟我讲话，说："你来，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你。

地上的众王都跟她行过淫，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她淫乱的酒醉了。"

我在灵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这兽布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那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着金子、宝石和珍珠的装饰，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的物，和她淫乱的污秽。

她额上写着一个名号："奥秘，大巴比伦，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

我又看见那妇人喝圣徒的血，和那为耶稣作见证的人的血，喝醉了。我看见了她，就大大惊奇。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惊奇呢？我要把这妇人的奥秘，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的兽的奥秘告诉你。

你看见的那兽，先前在、现今不在、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然后走向灭亡。住在世上的人，凡是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看见了那先前

在、现今不在、将来还要出现的兽，就都要惊奇。

在这里需要有智慧的心。七头就是那妇人所坐的七座山，

也就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倒了，一位还在，另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存留一会儿。

那先前在、现今不在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是出于那七位中的一位的，并且正在走向灭亡。

你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取得王权；但要跟兽一同得着权柄，作王一个时期。

他们同心合意，把自己的权力权柄交给那兽。

他们要跟羊羔作战，羊羔必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些与羊羔同在、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胜过他们。”

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着的众水，就是多种民族、群众、邦国，方言的人。

你看见的十角和那兽，都要恨那淫妇，使她荒凉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把她烧掉。

神要众王行他的旨意，就把意念放在他们心中，叫他们同心把自己的国献给那兽，直到　神的话都实现为止。

你看见的那妇人，就是有权统治地上的众王的那座大城。”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六章

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1-7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第五位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8-11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12-16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17-21节）。

V。1-7

我们应当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记述了，一系列的可怕灾祸、神的可畏惩罚与意旨安排。这些灾祸，映照了埃及的那些灾祸与惩罚。罪是相似的，因而惩罚也相似。全地，空中，海里，江河，城邑，都要因他们的罪孽而被毁灭。神的圣洁、公义和真实，是可称颂的。神的审判与惩罚，是何等可畏。那些逼迫属神圣徒和先知的恶人，他们将要落入永远的悲惨之境。

V。8-11

人的心如此罪恶，以致于他们在最严厉的惩罚面前也不知悔改；若没有神

的特别恩典，所有人就都这样坠入灭亡之中了。地狱本身，里面就充满了亵渎神、憎恨神的人；若我们熟悉人类的历史、人的本性，熟悉圣经，熟知人的心，我们就会知道，当人越经受痛苦的时候，当人越清楚地看见神手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越对神充满愤怒和憎恨。罪人们应当到基督这里来，悔改自己的罪，寻求圣灵的恩典；否则，他们就会带着这颗不谦卑、不悔改、绝望的心，承受永远的痛苦和恐惧了。黑暗是与智慧和知识相对立的；人的心在黑暗和罪恶之中，充满了愚妄和慌乱，他们敬拜偶像、跟随兽。他们丝毫没有欢乐和喜悦，而是内心充满煎熬和烦忧苦痛。

V。12-16

这或许是在表明，东方各国的民将要进入到基督的教会之中；道路已经为他们准备。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与基督为敌的敌人们，想要招聚力量，在毁灭之前作垂死的挣扎。神警告属他的百姓，将会有试炼和患难；神鼓励、激励他们，要为此预备好。

将会有极大的引诱和试探；因此，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呼召他的仆人们，要儆醒。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耶稣基督，主的荣耀，会突然临到，并审判世界。那是一切信从基督之人所喜乐地盼望的。

V。17-21

第七位、最后一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罪恶的世界、巴比伦彻底地倾倒了。属天的教会，看见而欢喜，得胜的喜悦充满他们。那些沉溺在罪中、

自觉安稳的人有祸了。许多人为灾祸而亵渎神、憎恨神：即使是在最大的灾祸面前，他们也不愿意悔改、谦卑。人若在神的面前心地刚硬，在神的公义审判惩罚面前刚硬顽梗，那么，这就是清楚的记号，表明那人必将承受确定的、永远的、彻底的惩罚与毁灭。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七章

那七位天使中的一位，指给使徒约翰那个大淫妇将要受的刑罚（1-6节）。天使解释那淫妇和驮着她的七头十角兽的秘密（7-18节）。

V。1-6

本章清楚地指向罗马的异教。罗马用各样的不义和欺骗，维持着对各国的统治。这里也指向世界的虚浮荣耀和财富，荣华与骄傲，以及这些对人感官与属世的心思意念的引诱。兴旺，荣华，华丽，这些充满着、引诱着人心中的欲望和骄傲自高；但是，这些却不能使人在神的忿怒面前站立得住。金杯代表着那些虚浮华丽的引诱和欺骗；那巴比伦的大淫妇用这金杯来引诱人、影响人，诱拐人和她一样狂妄自大。她被称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她用可憎的偶像和各样的罪恶来引诱人。那 女 人 喝 醉 了 圣 徒 的 血 ， 和 为 耶 稣 作 见 证 之 人 的 血 。她喜欢如此，而且从不满足。我们会惊奇，有多少真正的基督徒的鲜血，被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所流；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这里的预言时，就会看见，那些可怕的事情，恰恰证明了福音的真理。我们要小心警惕那些表面华丽的、引

人入胜的、时髦的宗教信仰。让我们尽力地避免罪恶，勤奋地查考关于敬虔的事；使我们可以效法基督，而学习到谦卑与感恩。当我们越多地寻求基督、越多地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远离那些敌基督之人的诱骗和试探。

V。7-14

淫妇所坐的兽，先 前 有 ， 如 今 没 有 。 将 要 从 无 底 坑 里 上 来 ， 又 要 归 于 沉 沦 。这兽所代表的，是偶像与逼迫；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的；不是像古时那些异教偶像的形式，但其实质却是一模一样的：是偶像的崇拜，以及残暴的统治；尽管形式变成了另外一种。凡 住 在 地 上 名 字 从 创 世 以 来 没 有 记 在 生 命 册 上 的 ， 见 先 前 有 ， 如 今 没 有 ， 以 后 再 有 的 兽 ， 就 必 希 奇 。这兽将要吸引、欺骗地上的居民，使他们愚蠢地、盲目地顺服于它的诡计；除了神的选民以外，一切世人都被它所引诱、掳掠。这兽有七角，代表七座山；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又是七位王，代表七种政府的统治。其中，五种已经过去，一个还在，一个则还没有来到。这兽就是第八位统治者，并要再把可憎的偶像建立起来。这兽有十角，代表还没有成国的十国；那将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但一时之间，这十国将要为兽而极其热心。基督必胜过他们；他们必被踩踏在基督的脚下。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有完全的能力，统管一切受造之物；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基督的掌控之下。跟随基督的人，被基督呼召，要参加这属灵的争战；他们必将信实；基督必将使他们得到能力，得到胜利。

V。15-18

神统管着列王的心；神以自己的权柄和意旨安排管辖着他们；他们所作的事情，虽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和目的，但却要成就神的目的与预言。他们将要看到自己的愚妄，看见自己是怎么被那个大淫妇所欺骗和奴役；并

且，他们将要引致她的灭亡。那大淫妇，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这城，是在指向罗马。信从基督之人，将要被接到神的荣耀中；恶人，则要在可怕的灾祸中被毁灭。恶人在罪中彼此联合，也将要在罪中彼此仇恨，彼此陷害，彼此折磨。然而神的分是他的百姓；神的旨意立定；神所作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喜悦、他的荣耀，为了他一切仆人的幸福。

——

文革期间的中国经济境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China_before_19
12

1912年前中国经济史

中国的经济历史长达数千年，该地区经历了盛衰交替的循环。中国，在过去的两个千年，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经济史学家通常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秦始皇之前的前帝国时期；从秦到宋兴起的早期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60年）；与帝国晚期，从宋到清。

在商代（公元前 16 至 11 世纪）和西周（公元前 11 至 8 世纪）时期，劳动力在大型铸造厂和作坊工作，为精英生产青铜器和丝绸。庄园经济产生的农业剩余支持了这些早期的手工业以及城市中心和可观的军队。公元前 771 年这个制度在西周崩溃后开始瓦解，中国在春秋（公元前 8 至 5 世纪）和战国时代（公元前 5 至 3 世纪）支离破碎。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大部分立法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地方国王手中。战国时期贸易的增加产生了更强大的商人阶层。新国王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官僚机构，用它来发动战争、建造大型寺庙和制定公共工程项目。这种精英制度奖励人才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公元前 500 年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彻底改变了农业，并导致这一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在公元前221年，秦王宣布自己是秦始皇，中国团结成一个单一的帝国，并将其各种民族和传统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政府体系中。虽然它们的最初实施导致其在公元前 206 年被推翻，但秦的制度幸存了下来。在汉朝（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期间，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帝国，由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组成，地方自治有限。

在宋代（公元960- 1279年）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改革。纸币、指南针和其他技术进步促进了大规模的交流和书籍的广泛流通。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弱，使私人商人繁荣起来，投资和利润大幅增加。明朝时代经济被重新货币化；尽管采取了普遍的孤立主义政策，但还是通过对外贸易带来了日本和南美的白银。在清朝（公元 1644-191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和中国的相对经济地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 19 世纪出现了明显的大变化，欧洲发生了工业和技术革命。

前帝国时代

商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庄园制度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战国时期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的繁荣经济。这种转变在公元前 221 年秦国统一中国时完成，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帝制时代。

最早驯化的农作物是北方的小米和南方的水稻。最早发现的丝绸遗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到中国北方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千年），出现了大量具有分层社会结构的社区。

商朝（公元前 1600 年 – 公元前 1045 年）

通过同时代的铭文明确确定为商朝的第一个遗址是安阳，这是一个商都，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成为主要定居点。商朝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主要农作物是小米，但在皇家贵族拥有的田地中也种植水稻和小麦。皇家田地生产的农业盈余支持商朝皇室和统治精英、先进的手工业（青铜、丝绸等）和庞大的军队。大型皇家牧场为祭祀提供牲畜和肉类消费。其他农产品支撑着商族人口，估计约有 5.5万 至 800 万人。

需要不断地通过低洼地排水或清除灌木丛或森林来开辟新的土地。这些任务是在国家监督下由强迫劳动完成的，通常在狩猎探险的背景下进行。

商人使用纺锤轮制作纺织品。受控制的工人在工场为贵族生产丝绸。田地和作坊由不同程度的奴役劳动力操作。一些历史学家称这些依附工人为“奴隶”，并将商代称为“奴隶社会”，但其他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标签过于模糊，因为我们对这种劳动力的性质知之甚少。

西周（公元前 1045 年 – 公元前 771 年）

根据传统年代，周朝在公元前 1045 年左右击败了商，并控制了商所统治的魏河和黄河流域。土地继续属于王室，王室将其重新分配给其家属。碑文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后期，土地就被交易，尽管它尚未被视为私有财产。

商代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如纺织、青铜和武器制造，在周代还在继续，但完全由国家控制。周政府还通过任命商贾来控制大部分的商业和交流，商贾官员的头衔后来被用来指任何商人。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1–475 年）

春秋时代开始，以孔子的《春秋》命名。这是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时期，早期的半封建制度开始衰落，贸易开始蓬勃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快速的技术进步。铁制工具变得可用，产生了农业盈余，结束了曾经存在的井田系统。到了这个时代末期，铁技术的引进，使封建制度彻底瓦解，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中国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包括在公元前六世纪首次分离元素硫。

春秋时期，许多城市的规模和人口都在增长。临淄是齐国繁荣的首都，公元前 650 年的人口估计超过 20 万。与其他大城市一样，临淄也是行政、贸易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大多数城市的人从事畜牧业，因此可以自给自足。这些城市的发展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发展。

春秋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当时商人在国家之间运输货物。大量的货币被发行以适应商业。尽管一些国家限制贸易，但其他国家鼓励贸易。郑在华中承诺不规范商人。从北方的燕到南方的楚，郑商在整个中国变得强大。

大封建领地被瓦解，当鲁国在公元前 594 年改变税收制度时，这一进程加快了。根据新法律，粮食生产者按耕地面积征税，而不是对每个贵族征税。其他国家效仿他们的做法。自由农民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并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提供了税收基础。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221 年）

在战国时期获得了迅速的技术进步和哲学发展。统治者争相控制彼此的土地，他们实施了各种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平民出身的地主和商人繁荣起来，剩余的贵族失去了影响力。一些商人，如吕不韦，可能已经和小国一样富有。

国家资助的铸造厂使铁制工具无处不在；开始使用铁犁、牵牛、行耕和集约锄。铸铁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在中国发明的。控制着最大铁厂的政府垄断了军事装备，以牺牲封建领主为代价加强了国家。铁制农具使得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

经过商鞅的公元前3世纪的改革，土地可以买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率。新的强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如郑国运河和都江堰灌溉系统。大量以前荒凉的土地被耕种并融入秦经济。农业繁荣允许更大规模的军队。

在这个时代，国家权力的增长加强了君主制，使其能够进行改革以加强君主的权威。其中最广泛的改革是商鞅在秦时进行的，包括废除封建贵族，根据军事功绩重新分配贵族土地，并允许土地私有。他鼓励耕种未垦的土地，授予战绩优良的士兵高尚的军衔，并制定了有效而严格的法律法规。专制君主制在中国一直持续到宋明两代逐渐衰弱。

早期帝国时代

早期的帝国时代以强大、统一和集权的君主制为标志，尽管地方官员仍然保持有限的自治权。在帝国初期，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主导着经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整个市场运作。

秦朝（公元前 221–206 年）

公元前221年，秦国征服了中国剩余的诸侯国，成为学者们认为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它迅速扩张，将南部边疆从长江延伸至现代越南，将北部边疆延伸至现代蒙古。早期的夏商周虽然名义上对全中国有权威，但封建制度赋予了大部分地区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然而，在秦国之下，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整个帝国都有统一的标准和货币以促进贸易。此外，秦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公共工程项目，如中国长城。秦始皇开创了所谓的"中华第一帝国"，一直持续到五胡起义。

秦始皇统一了书写、重量和轮长的标准，同时废除了各国之间不同的旧货币。他还在整个帝国颁布了统一的法典，使贸易更加容易。国家之间的防御墙因其对贸易的破坏性影响而被拆除。秦帝国没有回到旧的封建制度，而是建立一个郡县系统。秦国的其他政策，包括对盐和铁制品征收重税，以及迫使许多中国人向南部和西部的新领土迁移。

秦政府承担了许多公共工程，工人经常被国家征召以偿还欠税。这些项目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的长城，它是为保卫国家免受匈奴入侵而建造的。其他秦项目包括连接长江和珠江支流的灵渠运河，使秦的南方征服成为可能，

以及估计为 4,250 英里（6,840 公里）的广泛的道路系统。

然而，秦国的法家法律及其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不容易为帝国内其他诸侯国家人民所接受。与其他国家不同，秦国专门制定法律，放逐商人，剥夺他们的财富，并对盐、铁、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实行垄断。有学者指出，汉代司马迁《史记》所编的战国名商名录中，没有一个秦商。秦始皇死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公元前206年，秦国已经崩溃。

汉朝（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

汉代被认作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汉武帝（公元前 141-87 年）征服了匈奴并控制了河西走廊，在公元前 121 年开辟了丝绸之路，汉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汉代经济繁荣，户籍人口5800万。出现了大型企业，有些后来在西汉时期被暂时国有化。这一时期发明了手推车、纸张和地震仪等技术创新。

西汉

汉文帝（公元前180-157）和汉景帝（公元前157-141）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经济的国家控制是最小的，遵循道教的“无为”原理，意思是“无为而行动”。作为其自由放任政策的一部分，农业税从农业产出的 1/15 减少到 1/30，并在短时间内完全取消。此外，劳动徭役农民的需要，从每一年一个月缩短至每三年一个月。铸币被私有化。

在此期间，私营和公共部门都蓬勃发展。

废除了砍掉罪犯鼻子等严厉的刑事处罚。

汉的税制以两税为基础；土地财产税和人头税。平均个人的税负包括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7至14岁的人每人缴纳20硬币的人头税，14岁以上的人另交人头税。 汉代后期，农业税率减少到百分之一，损失的收入由增加的人头税弥补。商家的收费是个人费率的两倍。税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身体健全的男性，定义为 20 岁以上健康状况良好的男性，应当服两年兵役、或一个月兵役加一年劳役（后来 56 岁以上者免服兵役或兵役）。

另一方面，当汉武帝干预经济以支付他的战争费用时，引发了争论。他的干预，在主要由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儒家学者组成的改革派、和支持武帝开创的盐铁和高税收政策国家垄断的一群政府官员的现代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被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这是一份展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文件。尽管在武帝之后的西汉大部分地区都遵循现代主义政策，但改革派在东汉废除了这些政策，除了政府垄断铸币。

西汉初期，帝国最富有的人是商人，他们生产和销售盐和铁，其财富可与朝廷每年征收的税收相媲美。这些商人投资土地，成为大地主并雇佣大量农民。盐业或铁工业家可以雇用一千多名农民来提取液态盐水、海盐、岩盐或铁矿石。先进的钻探技术得以开发，使中国人能够提取盐分甚至天然

气用于燃料和照明。

汉武帝（公元前 141-87 年在位）将如此大规模的私营工业视为对国家的威胁，因为他们将农民的忠诚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家。将盐和铁贸易国有化消除了这种威胁，并为国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这一政策符合武帝的扩张目标，即殖民河西走廊和现在的中亚新疆、越南北部、云南和朝鲜的同时，挑战游牧民族联盟。

尽管许多实业家因这一行动而破产，但政府还是征召了像桑弘阳（公元前 80 年）这样的前商人来管理国家垄断企业。虽然宫廷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在公元前 44 年至公元前 41 年曾暂时成功地废除了中央政府的垄断，但垄断一直持续到王莽（公元 9 至 23 年在位）政权结束。在王莽被推翻后，中央政府将这些行业的控制权交给了私人商人。

白酒是另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在公元前 98 至 81 年间，政府也将其收归国有。政府回归私有制经济后，对酒商征收重税。

除了国家短暂的垄断之外，政府还经营着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旨在满足宫廷和军队的需要，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尽管这一部门的重要性在唐朝有所降低。

纺织、制陶等轻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手工陶器制作量

大；其价格大幅下降，取代了周代使用的青铜器。瓷器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汉代农业

战国时期开始广泛使用铁器，使中国农业提高了效率。其中包括“两齿”犁和早期镰刀。随着需要两名操作员的三牛犁和需要一名操作员的两牛犁的引入，牛拉犁的使用得到了改进。另一个重要的发明是马项圈挽具的发明，与早期的喉咙挽具形成对比。这项创新与独轮车一起，通过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和允许长途贸易来整合中国经济。

在汉武帝时期，“代田法”引入了一种早期的轮作形式。农民们把他们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种植，另一部分休耕。

汉代贸易与货币

用于资助武帝的军事运动和殖民努力的收入来源包括从贵族手中夺取土地、出售职位和头衔、增加商业税以及发行政府铸造的硬币。中央政府此前曾试图垄断铸币厂，但未能成功，于是从私人郡级和王国级铸币厂手中夺取权力。公元前119年，中央政府推出重3.2克（0.11盎司）的五铢硬币，到公元前113年，这成为帝国唯一合法接受的硬币，政府禁止私人造币厂。王莽政权引入了多种新的、轻量级的货币，包括古老的刀钱，使硬币贬值。

与外国的大规模贸易始于武帝，当时他派遣使臣前往中国西部寻找盟友以对抗匈奴。然而，匈奴战败后，中国军队在中亚和西域扎根，开启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途径。

东汉

在王莽被推翻后的东汉时期，恢复了早期的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废除了征兵制，退出了经济管理。一个新的思想繁荣的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见证了伟大的科学家张衡的诞生和纸张的发明。然而，到了2世纪末，汉开始瓦解。184年，"黄巾之乱"的叛乱终结了汉朝。

魏晋（220–304）

汉朝灭亡后，150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战争。死亡人数和随后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有权势的贵族地主为流离失所的农民提供庇护，利用他们增加的权力收回秦汉时期废除的特权。这些难民不再被国家征税。晋时，应税人口2000万；汉朝时为五千七百万。华北大部分地区由建立魏朝（220-265 年）的曹操统一，280 年晋朝统一了中国的其余部分。中央集权国家在失去大地主保护下的税收后减弱。尽管如此，在曹操的政策下，经济略有复苏，他将废弃的土地国有化，并命令和鼓励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以及重新建立铁垄断制度，这种情况在晋朝和南朝的统治下继续存在。后来，八王之战，加上晋朝将蛮夷五胡迁入中国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导致中国最终沦陷。

五胡（304–420）

公元304年，中国控制的蛮族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晋朝诸侯内战多年，匈奴起义、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其他几个在中国控制下的团体随后起义，包括桀、羌、狄和鲜卑。这些团体统称为五胡，在黄河流域对汉族人进行种族灭绝。晋朝的瓦解很快就伴随着这些起义。五胡入侵导致秦、汉、魏、晋时期人口大量减少，市场经济迅速衰落，封建庄园经济重新崛起。大型庄园可以自给自足，与更广阔的市场隔绝。这些庄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从事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手工艺品生产。交换不再通过货币进行，而是以物易物。隋统一后经济复苏，庄园经济再次衰落。

一个简短的经济复苏发生在北方苻坚的统治期间，他统一了中国北方。苻坚修复了汉晋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每隔20公里就为商人设立旅馆和车站。在苻坚的统治下，贸易和农业显着恢复，许多国家再次向苻坚朝廷进贡。苻坚在肥水之战中被晋军打败，他的帝国瓦解为一系列小国，这种复苏就结束了。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因为它使中国文明免于毁灭的危险。

与此同时，合法的晋朝逃到了南方，当时是中华帝国未开发的边缘。晋朝统治者试图将该地区发展为统治中心和收复家园的基地。晋朝统治者将南方的大片土地授予了逃离蛮族统治的中国移民和地主，他们保留了起义前的政府制度。北方人的迁移刺激了南方经济，使其能够与北方经济相抗衡。引入南方的改良农业技术增加了产量，随着晋朝统治者执法，市场经济得以幸存。

南北朝（420–58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持续不断的战争，主要来自于五胡叛乱。这个时代的早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本土的刘宋王朝统一，其北部边界延伸到黄河。刘宋的创始人兼将军刘裕收复了中国的大部分腹地，征服了五胡在 4 世纪建立的大部分国家，不包括北魏鲜卑国。在他儿子的领导下，中国在元嘉时代见证了短暂的繁荣。然而，后来鲜卑的入侵再次将中国王朝限制在淮河以南的领土上。从此，中国分为南北朝，分别发展；北方在新的均地制度下繁荣昌盛，南方经济继续以魏晋的方式发展。公元589年，隋朝恢复了中国北方的本土统治，统一了国家。

南朝

由刘裕和他的儿子文帝开创的元嘉时代是一个繁荣的统治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战争仍在继续。文帝以节俭和关心人民的福祉着称。他虽然没有父亲的武力，但却是一位出色的经济管理者。他减少对农民的税收和征税，并鼓励他们在他父亲重新征服的地区定居。他削弱了富裕地主的权力，增加了应税人口。他还制定了一套审查公务员表现的制度。由于他的政策，中国经历了繁荣和经济复苏的时代。

元嘉时代，中国人发展了炼钢共熔工艺，将铸铁和熟铁熔炼，提高了中国铁的质量和产量。

文帝末年，北魏鲜卑国开始加强，果断地挫败了文帝的进攻。这场胜利之后，魏国多次入侵北方诸省，最终于 468 年夺取了他们。

中国南方的经济繁荣在刘宋朝垮台后继续发展，在随后的梁朝期间最为繁荣，梁朝在陈庆之将军的指挥下以 7,000 人的军队短暂地重新征服了北方。南朝的经济最终在胡人将军灾难性的洗劫南京之后衰落。

北朝

鲜卑征服华北后，经历了北魏时期的经济复苏，其规模甚至超过元嘉盛世时期。这主要是在北魏孝文帝的统治下进行的，他引入了几项旨在进一步中国化北魏的改革，包括禁止鲜卑语言和习俗，以及促进中国的法律、语言和姓氏。引入了新的农业系统；在平地制度中，国家将土地终生租给农民工，在佃户死后收回。农民还获得了可以继承的较小的私人土地。牛和农具也被出租或出售给农民。

国家还实行了服兵制，士兵既可以耕种，又可以接受军事训练。这种军事制度一直使用到唐朝，并赋予了占军队大多数的汉人权力。此外，通过任命地方官员而不是依靠地方地主，并定期向官员支付工资，从而加强了国家对各省的控制。首都迁往位于华北平原中心的洛阳，振兴了该市及周边省份。改革非常成功，为华北带来了繁荣。孝文帝的应税人口估计有3000万，超过了晋朝。

孝文统治后，北魏经济开始恶化，饥荒和干旱破坏了魏的统治。从 523 年起，保守的鲜卑贵族控制了北方，推翻了孝文的大部分改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相互交战。但直到577北中国再次被重新统一，它很快就被中国汉族人杨坚篡夺，在中国北方恢复本土法治。

隋朝（581–618）

隋朝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恢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统一标志着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个中华帝国"的建立，跨越了隋、唐和北宋。尽管时间短暂，但隋统一了中国，其法律和行政为后来的唐、宋、明三代奠定了基础。隋朝鼎盛时期人口约4500万。

隋文帝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统一中国。统治南方的陈比隋弱，其统治者无能而好享乐。中国南方的人口也比北方少。经过八年的准备，隋军于589年进军并击败了陈，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复苏。登记人口在二十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 3000万 增加到 4600 万。为了鼓励经济增长，隋政府发行了一种新货币，以取代其前任北周和陈发行的货币。他们还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旅行并进口货物，并建造了许多旅馆来容纳他们。

隋继续沿用北魏引进的均田制。每个健全的男性获得 40 亩的永久业权土地和 80 亩的终生租赁土地，在接受者去世时归还给国家。即使是妇女也可以终生获得 40 亩土地，这些土地在她死后归还给国家。隋政府每年收三石粮。农民每年必须为国家工作 20 天，但 50 岁以上的农民可以支付少量费用。

604年，文帝被其子杨广刺杀，后者成为隋炀帝。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立即承担了许多工程，包括修建大运河和重建长城。数以千计的强迫劳动者在建设项目时死亡，最终女性不得不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劳动。隋

炀帝还对高句丽发起了一系列不成功的战役。这些运动对王朝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他的政策驱使人民反抗。突厥人土地起义和袭击变得普遍。618年，隋炀帝被刺杀，隋朝灭亡。

唐朝（618-907）

唐朝是另一个黄金时期。到 630 年，唐朝征服了强大的突厥人，阻止了对中国边境的威胁超过一个世纪。一系列强大而高效的统治者，从创始人开始，包括一个女人，将唐帝国扩张到可以与后来的元、明、清媲美的地步。唐代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繁荣的时期，见证了木版印刷的开始。唐朝统治者发行大量货币以促进贸易，并在均地制度下分配土地。人口恢复并超过汉代水平，估计达到8000万。虽然在灾难性的安史之乱后国家衰弱，并在 9 世纪退出管理经济，但这种退出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宋明时期的商业经济。

安史之乱前

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统治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在他的统治下，中国从内战的废墟迅速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贞观时代。太宗减少了征兵的需求，降低了税收；此外，他小心避免进行可能耗尽国库和耗尽人口力量的项目。在他的统治下，引入了一部名为《唐律》的法典，缓和了隋法。

在太宗统治期间，直到安史之乱，中华帝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经济发

展时期。太宗和他的儿子征服了突厥、高句丽和其他敌对帝国，确保了中国的相对和平。对中国西部省份的控制重新开放了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其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蓬勃发展。唐军多次插手西域，以维护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状态。

唐朝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官僚监管来管理经济，限制他们交换商品的时间，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并调节产品价格。

唐代的税制以均田制为基础，使农民的财富均等。农民的税收负担是基于每户人口，而不是财产价值。标准税额为（约 100 升）粮食，以及 2 张（约 3 1/3 米）布。农民要参加 20 天的服役；如果他违约，他必须每天支付 3 尺的布料。假设每个农民有30亩土地，每年生产1吨粮食，则税率为农民收入的25%。商业税较轻，占收入的 3.3%。

唐政府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手工业，与服务于大多数人口的私人手工业分开。民间手工业为唐朝政府、军队和贵族提供各种产品。政府的手工业阻碍了私营部门的发展，直到安史之乱之后，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政府手工业的规模）急剧减少，私营部门才迅速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大量家庭在私营企业工作；有学者估计，唐朝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鼎盛，将唐朝势力向西扩展。玄宗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长官，他的开元时代在行政效率上经常与早期的贞观时代相提并论。此后，唐朝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后

玄宗皇帝的统治以阿拉伯人在塔拉斯的胜利和安史叛乱结束，这是中国境内 120 多年来的第一场战争，由一位名叫安禄山的胡人将军领导，他使用了大量的外国军队。作为经济活动的支柱的北方地区被摧毁，唐朝的经济遭到破坏。洛阳、长安城沦为废墟。战后，唐中央政府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权力，地方将领也脱离了唐的统治。这些将军拥有巨大的权力，通过世袭继承他们的头衔，征税，并组建自己的军队。虽然这些节度使大部分 9 世纪初被平息，河北节度使，其中许多是安禄山的前军官，保留了他们的独立性。

叛乱后，被削弱的唐政府被迫废除了许多规定和干预措施；这无意中刺激了唐朝的贸易和商业，唐朝在 9 世纪初达到了顶峰。中国的经济中心由于北方遭到破坏而向南转移。

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构成农业基础的均田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瓦解。平地制度依赖于国家拥有大量土地，但随着土地私有化或授予农民，国有土地所有权减少。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他们的庄园加剧了均田制度崩溃。废除兵役制、平地耕种的服役制，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志愿军和常备军的募兵制。780年，唐政府废止平田制，改组税制，每年春秋两季按财产价值征税。

木版印刷在 8 世纪和 9 世纪开始发展。这源于汉代以来出现的庞大的造

纸业。木版印刷使许多书籍得以快速生产，并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以这种方式印刷的第一本书，有生产日期，是868 年印刷的佛经《金刚经》，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手抄本仍然更为重要。唐朝后期，海外贸易也开始与东非、印度和中东地区进行贸易。

尽管经济在 9 世纪复苏，但中央政府被削弱了。最紧迫的问题是政府的盐业垄断，在平地制度崩溃后政府无法有效征收土地税后，通过盐业增加了收入。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垄断食盐以增收；这很快就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此时期，私盐商被处死，盐价高到许多人买不起。最终，私盐商联合起来反抗唐军。这次叛乱，被称为黄巢之乱，历时十年，毁灭广州至长安的乡村。叛乱后，两位将军统治了唐朝。10世纪初，内战再次爆发。唐朝随后瓦解。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

五代十国是一段战争和破坏的时期。907年后，唐朝政府分裂为南方的几个小国，而北方则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朝代和蛮夷入侵。那个时代的一个关键事件是突厥人征服华北。突厥人统治期间，将包括华北自然地理防御和长城东段在内的重要的十六州地区交给契丹，又一个蛮族。这有效地使中国北方地区对来自其北方的入侵毫无防备，这是宋朝后期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突厥和契丹的入侵严重扰乱了北方的经济活动，并迫使经济活动向南转移，直到宋朝的前身后周王朝才恢复了中国本土的统治。

南部省份相对未受到崩溃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地区持续繁荣。

中华帝国后期

960年，赵匡胤发动政变，建立了五十年来的第六个王朝。在宋代，中国的经济急剧上升。在技术进步的鼓舞下，出现了大规模企业、雇佣劳动和纸币发行。经济经历了制造业产出的大幅增长。明朝时期海外贸易蓬勃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中央政府的削弱，投资、资本和商业自由化。政府制造业被私有化。农村和城市市场的出现，生产面向消费，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发展。中国在这个时代不断增长的财富导致了武力的丧失；这个时代涉及两个汉族统治时期，每个时期都紧随其后是异族统治时期。到孤立主义的满清（1664-1911）末期，中国的发展放缓，落后于西方。

由于更多的耕地和作物产量的增加，粮食产量增长。铁、盐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也在这一时期增长。根据 Broadberry 等人对 GDP 的估计，人均 GPD 在宋明时期保持稳定，然后在清代人口增长超过 GDP 增长时下降。因此宋朝在世纪之交是世界上人均 GPD 最富有的国家，到 14 世纪欧洲部分地区赶上了它，到 18 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显着差距出现。

宋朝（960-1279）

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推翻皇上，建立宋朝，这是五十三年的第六次。十九年后，他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与其前任不同的是，宋朝时期君主和贵族的势力减弱，让非贵族的绅士阶层获得权力。中央政府退出管理经济（除了王安石的宰相和南宋时

期），引发了剧烈的经济变化。技术进步促进增长；所谓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木版印刷和指南针，是在这个时代发明或完善的。宋代人口增至一亿多。然而，宋最终成为第一个被侵略者完全征服的统一中国王朝。

在 11 世纪，中国开发了先进的技术来提取和利用煤炭作为能源，导致铁产量飙升。铁产量从 800 年到 1078 年增加了五倍，达到约 125,000 英吨（114,000 公吨），不包括未注册的铁产量。最初，政府限制铁工业，但在著名官员包青天（999-1062）向政府请愿后，取消了对私人冶炼的限制。其他金属的产量也飙升；正式登记的宋代银、铜、锡、铅产量分别是唐的3、23、54、49倍。正式注册的盐产量也至少增长了 57%。]

政府监管其他几个行业。硫磺是火药中的一种成分——唐代引入的一种重要的新武器——成为一个成长性行业，并于 1076 年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在四川省，宋政府垄断茶叶的收入被用于为宋的骑兵部队购买马匹。宰相王安石在多个行业实施垄断，引发争议。

为了供给铁等行业的繁荣，矿山产量大幅增加。据估计，宋首都汴京附近有超过 100 万户家庭使用煤炭取暖，这是煤炭使用量的一个指标。宋代轻工业也开始繁荣，包括取代陶器的瓷器、造船和纺织业。与唐朝相比，纺织品产量增加了55%。历史学家谢恰估计，宋代有超过10万户家庭从事纺织业，这是宋代纺织业规模的一个指标。宋朝城市化率从唐朝的10%上升到12%。

宋农业

宋朝农业发达。宋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灌溉工程，增加了可耕地，鼓励农民耕种更多的土地。耕地总面积大增至7.2亿亩，是后世无法比拟的。与以前朝代的单一栽培不同，人们种植了多种作物。橙子和甘蔗等特殊作物经常与水稻一起种植。与汉唐时期早期的自给自足农民不同，农村家庭生产的剩余物可以出售。收入使家庭不仅可以买得起食物，还可以买得起木炭、茶、油和酒。许多宋农民以手工业为生。

新工具，如水车，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尽管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仍以稻农为主，但也有一些农民专门种植某些作物。例如，洛阳以花卉栽培而闻名；花的价格高到一个球茎达到一万金币的价格。宋代引进的一种重要的新作物是占城稻，这是一种新品种，其产量比早期的稻米高，大大提高了稻米产量。通过允许农民每年收获两次水稻来提高产量的复种做法是宋代的一项关键创新。华南地区的亩均农业产量翻了一番，而北方地区仅略有增加。学者们提供了“保守估计”，表明宋朝期间农业产量至少增加了 20%。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宋朝应税土地仅增加了5%，但实际收入的粮食收入却增加了46%。

农业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农业以自给自足的农民为主。大多数农民不再拥有土地；他们成为地主的租户；地主通过投资发展了农村经济。这种农业制度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宋商

在宋代，商人阶层变得更加成熟、受人尊敬和有组织。商人阶级积累的财富往往可以与管理政府事务的士大夫相媲美。

不幸的是，与欧洲同行一样，这些行会通过与政府合作限制竞争来限制经济增长。

大型民营企业主导着宋的市场体系。1127 年女真征服华北后，有一个大型黑市。1160 年左右，黑市商人走私了大约7万至8万头牛。

家庭拥有许多成功的小窑炉和陶器店，还有榨油机、酿酒店和造纸企业。“…… 客栈老板、小占卜师、药贩、布商”也经历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成功。

宋取消贸易限制极大地帮助了经济。与早期贸易相比，商业活动的频率增加了，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宋朝各大城市都开了很多店铺。通常，销售相同产品的商店都集中在一个市区。例如，所有的米店将占据一条街道，而所有的鱼店将占据另一条街道。与后来的明朝不同，宋朝的大多数企业都是生产商和零售商，销售他们生产的产品，从而形成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混合体。宋朝大多数企业都是小企业。

随着指南针的发明和宋朝统治者的鼓励，海外商业也蓬勃发展。航运和导航技术的发展允许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宋代的中国人可以进行大量的海外贸易，给一些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宋代的商业企业变得非常复杂。商人积累的财富往往可以与管理政府事务的士大夫相媲美。

繁荣的宋代经济导致货币铸造增加。到 1085 年，铜币的年产量达到 60 亿枚，而 1080 年为 58.6 亿枚。唐朝繁荣的天宝时期 742-755 年铸币 3.27 亿枚，而公元前 118 年至汉朝公元5年仅铸币 2.2 亿枚。

纸质存款收据最早出现在 10 世纪，但第一个官方赞助的票据是在四川省推出的，那里的货币是金属的，而且非常重。尽管企业开始发行私人汇票，但到 11 世纪中叶，中央政府引入了纸币，使用木版印刷制作并以铜币为后盾。宋政府也积攒了大量的纸贡品。1101年前，每年仅新安府（今安徽西县）就向京城开封送去七种不同类型的150万张纸。在南宋，使用有标记面值的标准货币。然而，缺乏标准导致面值大幅波动。直到 1274 年，也就是南宋灭亡前两年，才开始生产全国性的标准纸币。

宋财政

宋政府建立了农业税收制度，每年征收两次财产税，约占收入的10%。然而，由于许多附加费，实际水平更高。商业税约为 2%。然而，与唐朝的做法相比，宋代并没有试图规范价格和市场，但王安石时代除外。它也间接垄断了盐业。

1069年，思想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近的王安石出任宰相。他相信国家必须为人民提供服务，并因收入需要对西夏和辽发动统一战争；他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将茶、盐和酒等产业国有化，并采取直接将大量货物从一个地区运输到另一个地区的政策，王认为这将消除对商人的需求。其他政策包括为农民提供农村信贷计划，以税收代替徭役劳动，向农民提供和平时期使用的军马，对平民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以及设立“市场交易

局”来定价。这些政策极具争议性，尤其是对支持自由放任的正统儒家而言，并且在王安石死后，除了在徽宗统治时期外，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第二次更严重的干预经济尝试发生在 13 世纪后期，当时宋朝在试图抵御蒙古入侵时遇到了财政问题。宋相贾思道试图通过土地国有化来解决问题，这一政策遭到强烈反对，后来被撤回。

宋崩

1127年，女真的入侵打断了宋朝的繁荣。在与金国结盟成功后，宋灭了宿敌契丹，金攻打宋，并洗劫了首都开封。这场入侵发生在长达 15 年的持续战争之前，尽管宋朝将军岳飞几乎击败了女真人，但最终还是以宋朝交出淮河以北的领土以换取和平而告终。中国南方省份成为商业中心。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逃离了南宋的女真统治。

由于女真人新的军事压力，南宋将税负大幅增加到北宋的数倍。南宋与金保持不安的休战，直到蒙古人崛起，1234 年宋与蒙古人结盟灭金。借此机会，当蒙古人撤退的时候，宋军短暂夺回了他们在黄河以南失去的领土。然而，黄河泛滥，加上蒙古人的进攻，最终迫使宋人撤退。

为了征服中国，蒙古帝国对宋朝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到了 1270 年代，宋朝政府用来资助对抗蒙古人的战争的税收和通货膨胀负担使宋朝经济崩溃。1275年，蒙古人在襄阳附近击败宋军，并于次年占领宋都、杭州。宋代的抵抗在崖门海战中结束，最后一位宋皇帝与其剩余军队投海而死。南

宋时代的蛮族入侵所造成的破坏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挫折。

元朝（1271–1368）

元朝是第一个异族王朝统治全中国。作为蒙古帝国最大的汗国，元朝皇帝对其他三个蒙古汗国拥有名义上的权威。这个时期的蒙古和平刺激了贸易。然而，由于蒙古人的征服，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在蒙古统治下，大约 6500 万人在 1290 年登记；1215年，女真和南宋的户籍人口在1.1亿到1.2亿之间。此外，蒙古政府后来征收高额税收，并将主要经济部门大规模国有化，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剩余部分。

在征服中国，尤其是在女真曾统治下的中国北方时，蒙古人采取了焦土政策，摧毁整个省份。蒙古军队在他们占领的城市进行大屠杀，一位可汗提议杀死所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人，将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但被他的大臣耶鲁楚才劝说反对，他提议对该地区的居民征税，比杀了他们更有利。

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后，将连接黄河和长江的大运河延伸至首都北京。这简化了现在是经济活动中心的南方与北京之间的交通。这提高了北京的地位，它以前是一个外围城市，对于后来的政权决定让它继续作为首都很重要。

元政府通过引入纸币作为主要流通媒介，彻底改变了经济。元朝的开国元勋忽必烈在位期间发行了纸币；中国纸币由国家担保，而不是由私人商人或私人银行家担保。钞票的概念直到 13 世纪在欧洲才出现在世界上，而

真正的钞票出现在 17 世纪。元朝的原始纸币与宋代一样，在使用区域和期限上都有限制，但在元朝后期，由于在中国的统治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开始印刷纸币，不受期限的限制。

忽必烈和他的统治者鼓励中国与蒙古帝国其他汗国之间的贸易。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增加，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进入中国，有些人永久移民。马可波罗正是在这一时期访问了中国。虽然忽必烈想认同他的中国臣民，但蒙古人的统治对中国人来说是严格和陌生的。中国精英进入政府的传统方式、公务员考试结束，大部分政府职位由非中国人担任，特别是国家财政管理部门。

忽必烈及其继任者的过度开支导致他们诉诸高税收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广泛国家垄断，以资助他们的奢侈开支和军事行动，这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负担。在盐、铁、糖、瓷、茶、醋、酒和其他行业建立了国家垄断。然而，忽必烈最具争议的政策是打开宋朝皇帝的陵墓为国库获取宝藏，并发行大量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这些政策与儒家节俭和轻税的理想大相径庭。由于忽必烈的政策以及蒙古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华南地区被反对蒙古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所困扰。许多中国人拒绝为元朝政府服务或与他们交往，他们认为元朝政权是野蛮的暴君。

在 1340 年代，频繁的饥荒、干旱和瘟疫助长了中国人的不安。1351年，一个自称是宋徽宗后裔的农民起义领袖，试图通过驱逐蒙古人来恢复宋朝。到 1360 年，华南大部分地区已脱离蒙古人的统治，并被划分为地区国家，如朱元璋的明、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另一方面，华北地区的军阀分裂为名义上只效忠于元的地区军阀。1368年，统一华南后，明朝北进，攻占北京，结束元朝。

明朝（1368–1644）

元末动乱后，农民朱元璋发动叛乱，反抗蒙古统治。他建立了明朝，其统治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之一。私营工业取代了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充满活力的对外贸易使东西方之间建立了联系。经济作物种植更加频繁，专业工业得到建立，国有工业私有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超过了前宋时期。

明也是技术进步的时期，尽管不如早期的宋。据估计，明朝中国在 1600 年的人口约为 1.5 亿。

明初

朱元璋，又名洪武帝，出身农民家庭，同情农民。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旨在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来支持农业。国家扶持农民，提供土地和农业设备，修改税收制度。还修复了许多长期被忽视的运河和堤坝，这些运河和堤坝对农业有帮助。此外，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

洪武的继任者、孙子建文帝，在长达三年的血腥内战中，被他的叔叔朱棣推翻，后者被称为永乐帝。朱棣的思想比他的父亲更开明，他废除了许多对绅士和商人的管制。因此，他的统治有时被视为明朝的“第二次建国”。他的太监郑和的远征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在永乐的统治下，明军不断战胜蒙古人，蒙古人被迫承认他为他们的统治者。他还迁都北京。到永乐年间，中国收复了东疆、满洲、西藏和五代十国时期失落的领土。

明朝财政

明政府虽然开始时是专制政权，但逐渐演变为皇帝与文官共享权力的制度。

明政府的收入远低于宋朝。士绅阶层赢得了政府的让步，并抵制增税。在整个明朝时期，国家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与唐宋等早期朝代和清朝等朝代不同，明朝没有调节经济，而是实行类似于汉朝的自由放任政策。《剑桥明代中国史卷》说：

“明政府允许那些能够获得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中国人将他们的资源主要用于他们自由选择的用途，因为与当时和后来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对人民征税非常低的政府并将其人民生产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在了这些财富的生产地区。”

明代的主要税种包括地税（2100万两）、劳务税（直接征用平民的劳务和货物，价值约1000万两）、明盐专营收入（200万两）。其他杂项收入包括内陆关税（343,729两）、出售军衔（500,000两）、僧人执照费（200,000两）和罚款（300,000两）等，合计约400万两。明朝的整体税率很低，大约在 3% 到 4% 之间。然而，到了王朝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居正实行改革，将任意劳务税并入土地税。明政府的盐业垄断被私人卖家破坏，到15世纪完全瓦解；政府官员估计，所生产的盐中有四分之三用于私人销售。

明代商业与货币

朱元璋在未统一中国之前的时候曾推动对外贸易以之作为一个收入来源；但是，一旦统一中国以后，他开始实行一系列海禁令。1371年，明朝海禁令对私人外国商人处以死刑，并对其家人和亲属进行流放；1384 年广州、泉州和宁波等对外港口关闭。1405 年至 1433 年 “下西洋航行”后，明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合法贸易仅限于派往外国政府官方代表或由外国政府官方代表派遣的贡品代表团。这些政策加剧了沿海的“倭寇”海盗活动，许多中国商人加入了明朝无法遏制的非法贸易网络。海上禁令最终于 1567 年结束，只禁止与朝廷交战的国家进行贸易。据估计，禁令结束到王朝结束（1567-1644）之间的贸易量约为价值3亿两。

除了小型贱金属硬币外，明朝从初期到 1450 年还发行了法定 纸币作为本位货币，此时与它的前朝一样，正经受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的伪造。货币的需求最初是由银锭满足，但白银在15世纪中叶造成短缺严重的货币紧缩迫使大量贸易以易货方式进行。中国对欧洲或日本的商品不太感兴趣，但白银重要到无法限制。日本和西班牙白银的流入使中国经济货币化，西班牙元成为一种常见的交换媒介。

晚明经济的规模是一个猜想问题，Twitchett 声称它是地球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国家，而麦迪逊估计其人均 GDP在亚洲处于平均水平，低于欧洲。

1400年后，明中国经济复苏，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煤铁等重工业的复兴。工业产值达到新的高度，超过宋朝。然而，与宋朝不同的是，新的工业中心位于南方而不是华北，并且没有现成的煤炭。铁产量增加到宋水平

的三倍，远远超过 300,000 吨。进一步的创新有助于将工业能力提高到宋以上的水平。1637年编纂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记载了许多明代的创新。

明农业

在明朝时期，一些农村地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农业工具和手推车，有些是水力驱动的，可以生产大量剩余的农业产品，这是农村经济的基础。与其他作物一起，水稻被大规模种植。人口增长和肥沃土地的减少使得农民必须生产经济作物以谋生。有地主管理的庄园大幅增长；1379年只有14241户拥有700亩以上，到明末，一些大地主拥有70000亩以上土地。在明朝，日益商业化导致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允许更多的人口。

在农村建立了许多市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在最简单的市场中，商品被交换或以物易物。 在"城乡"市场，农村商品出售给城市居民；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利用农村土地的收入促进城市的交换。商人大量购买农村商品并在这些市场上出售。宋代发展起来的"全国市场"在明代变得更加重要。除了商人和易货，这种类型的市场涉及直接为市场生产的产品。许多明代农民不再依靠自给农业；他们为市场生产产品，然后出售以获取利润。关于明朝的剑桥历史记载：

"明朝社会在扩大交往的背景下的商业化，可以说是这个朝代历史的一个显着方面。在商品生产和流通方面，明朝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方面，以及支配商业交换的经济关系的性质。"

过度奢侈和颓废是晚明时期的标志。

明崩

明朝末年，小冰河时期严重限制了中国北方省份的农业。1626年，中国北方遭遇饥荒、旱灾等灾害，引发农民起义。明政府无法征税，导致军队经常得不到报酬。许多军队加入了叛军，使局势更加恶化。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结束了北方明朝的统治。忠于明朝的政权（统称为南明）继续统治中国南方，直到 1662 年。

清朝（1644–1912）

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清朝，是由女真人建立的，后来称为满人，他们曾是明朝的臣民，更早时曾建立了女真金王朝。1616年，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满人进攻了明朝。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的叛军洗劫，崇祯皇帝于城陷落时自杀。满清随后与前明将军吴三桂结盟，夺取了北京的控制权，并迅速推翻了李氏短暂的王朝。直到 1683 年，清政府控制了整个中国。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已从先前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秩序崩溃中恢复过来。18世纪清朝经济虽然显着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但未能跟上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国家的经济步伐。

清初

虽然满族建立的清朝在1644年迅速占领了北京，但中国其他地区仍然存在敌对政权，清政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控制整个中国。这一时期，特别是1640年代和1650年代，人们死于饥饿和疾病，导致人口减少。1661年，

面对海外明朝势力的进攻，清政府采取清理海岸线的政策，命令所有居住在从浙江到越南边境的沿海的人都向内陆移动 25 公里（16 英里）；警卫军队部署在海岸，以防止任何人住在那里。因此，直到1685年，很少有人从事海事和对外贸易。这几十年里，虽然粮食收成好转，但由于经济萎缩，地方价格触底，很少有人参与市场。

和平逐渐恢复后，情况才明显好转。到 1680 年代，清政府巩固了对帝国的控制，有利的经济发展又恢复了。这些发展类似于明末的扩张，但清初市场跨区域贸易更多，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人口更多。与此同时，市场与习惯经济和指令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康乾时代

1683 年在南方粉碎了所有明朝保皇党后，康熙皇帝撤销了破坏性措施，如王侯领地和清理海岸线政策。他迅速恢复了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开启了历史上的大繁荣时期。在他的继任者统治下，清朝在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之间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康熙及其继任者控制了新疆和西藏地区，征服了准噶尔汗国，并比明朝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更严格的控制。这消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威胁，并将新疆和蒙古地区纳入了中国经济。

清朝时期，外国粮食作物，如马铃薯，在18世纪大规模引进。这些作物以及 18 世纪的普遍和平促使人口急剧增加，从明朝的约 1.5 亿至 2 亿增加到清朝的 4 亿多。18世纪，市场如晚明时期一样继续扩张。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参与市场的动力，与晚明相比，他们被减轻了税收负担，并以用于雇用劳动力的人头税取代了服劳役制度。中国继续出口茶叶、丝绸和制

成品，与西方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为了扭转明朝的趋势之一，清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盐业的垄断地位得以恢复，成为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清朝官员试图阻止经济作物的种植，转而种植粮食。由于担心富商的权力，清朝统治者限制了他们的贸易许可证，并且通常拒绝他们开新矿的许可，除非在贫困地区。商人行会在所有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都激增，并且经常获得巨大的社会甚至政治影响。有官方关系的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资助文学、戏剧和艺术。布料和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

铜来自日本和云南。

清国际贸易

清朝的贸易政策大体上是孤立主义的，乾隆皇帝特别宣称：

“我们的土地如此富裕和繁荣，我们拥有一切。因此，没有必要用外国蛮子的产品来交换我们自己的产品。”

其实，像之前的明朝，大清帝国是依赖日本和南美银的外贸以支撑其货币体系。

康熙皇帝1661 年即位后不久颁布了比之前更严厉的禁海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部分地区的中国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被强行从海岸上移走。船只被毁，对外贸易仅限于过境澳门。

其他的禁令在1684年解除；海关在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设立办事处，处理外贸业务。巨大的移民南洋的中国人数 – 以及在菲律宾有一个明朝觊觎者的谣言- 导致康熙皇帝禁止在南海进行贸易，并于 1717 年命令对返回的流亡者处以死刑；这在十年后被取消，但随之而来的港口检查和限制仍在继续。

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宁波海关的价格和税务均低于广州海关，因而促使他们在1755年试图把贸易向北方迁移。随后，乾隆皇帝于1757年宣布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即，外国商人只能够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在这种制度下，广州公行垄断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以换取其外国合作伙伴的良好行为和纳税。尽管有这些限制，中欧之间的贸易在 1719 年至 1806 年间以年均 4% 的速度增长，贸易量每 18 年翻一番。这有助于中国的内陆市场和沿海城市港口，为国内产品提供额外需求。尤其是广州，专为迎合欧洲因素而设计的出口特种瓷器和出口艺术品有所增长。广州公行的一些成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应缴的全部赔款的三分之一由这些个人承担。该政策还使广州的税基和外国白银流入正常化，白银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部进口之一。由于其在经济中的不断需求，白银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然而，通过将进口主要限制在银条上，它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压力——英国人在 18 世纪期间茶已成为他们的国饮——他们寻求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调整贸易平衡。在几次使团未能说服中国人扩大合法贸易后（传统上被认为是马戛尔尼和其他人拒绝向皇帝磕头），解决方案是印度鸦片。据估计，在 1821 年至 1840 年间，中国流通的白银中有多达五分之一用于购买鸦片。

白银进口使中国更加富裕，但并没有像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西欧打开的那种局面。

清内贸

在清朝疆域内，跨地区、跨省的贸易盛行，在明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壮大。村级、区域和省际各级市场之间的贸易发展成为一个网络，覆盖了王朝的大部分领土，并丰富了许多贸易中心，如苏州。各省之间的粮食和棉花等大宗商品贸易，每个都在专业省份种植并运往全国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清朝边境内运输货物，清朝取消了许多国内贸易限制。

虽然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商人因为没有在社会中创造任何东西，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商人通过这种国内贸易变得非常富有。从当地村庄级别的小商贩到在大都市贸易和生产中心之间流动的商人，许多商人加入了王朝的内部贸易。这些商人，通常是那些为公务员考试而学习但找不到职位或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在他们的新职业中获得了财富和繁荣。通常，许多这些商人联合起来创建贸易行会，贸易中心内的商人聚集，特别是富裕的大都市贸易中心。这些行会尽管传统地位较低，但成为推动城市中心变革、参与慈善事业并为城市维护做出贡献的强大力量。这些商人除了在大都市核心内蓬勃发展之外，还利用财富通过购买士人执照在清朝等级制度中获得社会地位，从而在儒家等级制度中提升自己。

尽管一些省份和地区开始将生产重点放在棉花或粮食等需求旺盛的主粮作物上，但其他省份和地区却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生产，这一举动刺激了当地

丝绸纺织品或瓷器等产品的生产仓库的发展.

清经济崩溃

在1833 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东印度公司对英国与中国贸易的垄断之前，中国现行的鸦片贸易禁令通常被忽视。新的走私者肆无忌惮的涌入使中国人大为震惊，但在总督林则徐将外国工厂置于全面封锁之下、要求交出珠江三角洲所有鸦片之前，他们无法控制他们。英国人只有在他们的管理者保证赔偿损失后才愿提供它。关于私人财产权保护以及贸易开放的争议，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 年的南京条约——19 世纪限制清朝主权的、开放贸易条约的开始——通常被认为结束了中国的孤立，开放了中国的港口——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但合法贸易继续仅限于这些特定港口，直到王朝末期。尽管如此，开始了战争、失败、让步和赔偿的格局，通过白银的外流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政府和经济。

1850 年代初期的灾难性洪水使得黄河改道，摧毁数百万人的家园，使他们流离失所。1851年，洪秀全开始反抗清朝，宣称清朝统治者是"使中国陷入绝望"的"卑鄙野蛮人"。他的太平天国叛乱迅速控制了中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清军击败了叛军，但最终牺牲了超过 2000 万人的生命。一直持续到 1871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摧毁了清朝经济。与此同时，中国新疆地区发生动荡。遥远的西北部战乱进一步消耗了帝国的国库。维持新疆秩序的驻军及其附属行政机构每年花费数万两白银，这需要较富裕省份征收的农业税补贴。

太平天国之乱后，一些满族贵族承认改革是必要的。他们发起了自强运

动，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工业进行了有限的现代化改造。陆军得到了重新装备，并发展了一支现代化的常备海军。大多数满族贵族反对这些发展，包括随之而来的有限工业化。1894 年被日本人击败后，该运动名誉扫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族，建立中华民国。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和内战时代。

尽管这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很低，但中国人口的算术率——衡量一个社会数字技能的指标，与后来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与西北欧国家不相上下，因此在世界上最高的。中国人的人力资本潜力与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凸显了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时代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解释了中国每逢经济繁荣时期就会出现爆发式经济增长的原因。

欧洲影响

在两次战争中击败中国后，英国签订了条约，主要目标是贸易，但港口城市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有着重大的长期影响。最重要的是，上海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中心。天津、沉阳紧随其后；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而不是通商口岸，但与此类似。外国人受到欢迎并拥有稳定的安全基地，基督教传教士也是如此。在港口外，唯一的外国人是偶尔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经常遇到严重的困难。

与 19 世纪后期日本戏剧性的快速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满族领导人走的是一条保守的道路。1871 年，大北方电报公司开通了连接上海与香港、新加坡、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印度和欧洲的电缆，中国与外界的通信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中国国内的第一条电报是 1881 年开

通的上海和天津之间的短线。1871 年，中国与日本在平等的基础上签署了第一个现代商业条约。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中国于 1877 年至 1880 年在东京、伦敦、柏林、华盛顿、马德里和圣彼得堡设立了大使馆。每个人都对与中国数亿消费者进行贸易抱有乐观的期望。它没有发生。到 1890 年，中国对外界的进出口总额仅为 5000 万英镑，低于许多小国。欧洲制造了自己的瓷器和丝绸；中国自己种植鸦片。唯一的主要新产品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带来的煤油（用于灯）。中国太穷，太自给自足，太缺乏铁路，无法实现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

上海和香港确实发生了重大的现代化，其他港口城市也发生了较小程度的现代化。上海公共租界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经常被比作巴黎，柏林和伦敦。它为中国和整个东亚设定了现代性标准。在上海，1863 年英美定居点合并为国际定居点，法国定居点在附近单独运作。外国人长期租用这片土地，兴办工厂、办公室、仓库、卫生、花园、饭店、旅馆、银行和私人会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于 1854 年，最初有 9 名成员，1920 年代由大约 2,000 名选民选举产生。

欧洲国家促进了技术和经济创新以及知识产业，事实证明，这些对中国企业家特别有吸引力。这是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国家的城市中的典范。港口城市结合了许多领导角色。首先，它们是所有进出口的主要口岸——鸦片除外，鸦片由其他城市的走私者处理。外国企业家引进欧洲最新的制造技术，提供了一个迟早会被全中国效仿的模式。最初的机构集中在造船、修船、铁路维修以及生产纺织品、火柴、瓷器、面粉和机械的工厂。烟草、香烟、纺织品和食品加工产业位于广州。融资由银行分行和全新的业务处理，如汇丰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该银行在 21 世纪仍然是世界一

流的机构。现代化的世界铁路建设是主要的金融和工业努力，通常由英国领导。现在投资涌入建设铁路加电报系统，将中国连接在一起，连接通商口岸和其他主要城市，以及矿区和农业中心。中国企业家在港口城市学习了他们的技能，并很快为自己的创业公司申请并获得了银行贷款。总部设在那里的华商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包括英属新加坡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和美属菲律宾。

港口城市信息产业蓬勃发展，有中欧文字印刷厂、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图书出版商经常以哲学、政治、文学和社会问题方面的欧洲经典的中文翻译为特色。根据历史学家克劳斯·穆尔翰 (Klaus Mühlhahn) 的说法：

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庞大网络刺激了中国城市人口的转变。在他们的思想、品味和日常活动中，受过教育和富裕的城市人口开始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接受他们眼中的现代生活方式。

基督教传教士将所有中国人视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但他们的总部设在港口城市。传教士在中国人口皈依方面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但发现他们因建立医疗和教育设施而广受欢迎。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最初设立神学、西学和汉语学院，然后扩展到文学、科学、医学和西语，这些是那些拒绝旧儒家的雄心勃勃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所渴望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考试制度，以及工程学校也成立了，到 1914 年，大学、学院、教师培训学校和专业工业学校的网络总部设在港口城市，并将其校友遍布中国城市。

学生涌入港口城市。许多人采纳了想法，利用新开放的设施相互联系，建立组织和发行出版物，策划反清政府的革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霸

占中国的侵略行为在五四运动中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中央政府在港口城市几乎没有警察权力，使得秘密社团在华人社区蓬勃发展，其中一些变成了犯罪团伙。最终上海有了一个强大的地下黑道，愿意使用暴力。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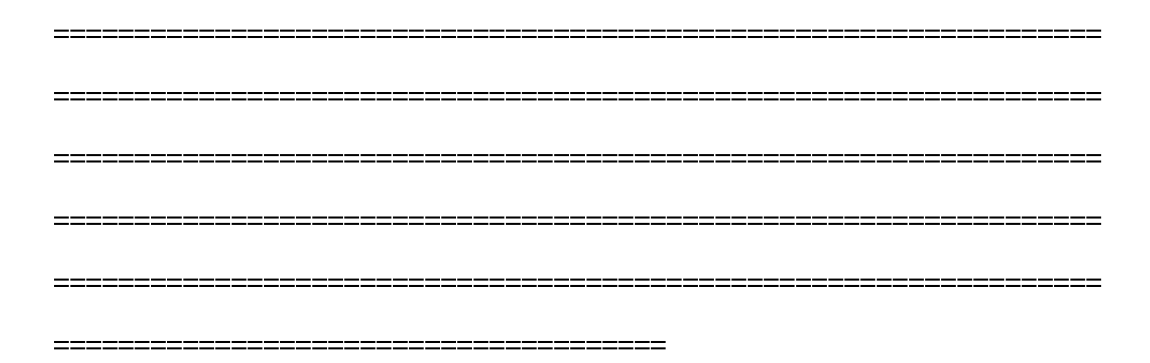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China_(1912%E2%80%931949)

中国经济史（1912-1949）

清朝在1912年倒塌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扰乱了经济活动。在南京的十年（1927-1937），中国建设了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军事的部门，努力与西方赶上，并备战日本。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结束后，接下来的中国内战造成中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

民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从 1913 年到 1927 年，中国分裂为各地军阀的统治，他们互相争夺权威，造成苦难并扰乱增长。1927年后，蒋介石

设法统一了中国。尽管内战和日本侵略，南京十年仍是相对繁荣的时期。政府开始稳定税收，建立国家预算，资助建设通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并制定雄心勃勃的国家计划，其中一些计划在1949年后实施。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八年的战争中将中国夷为平地。1945年以后，中国内战进一步摧毁了中国，导致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然而，经济学家Gregory Chow总结最近的学术研究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政治不稳定，经济活动仍然继续进行，经济发展发生在 1911 年至 1937 年之间"，简而言之，"现代化正在发生"。他继续说，直到 1937 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表现良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后能够回归市场经济。

在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学者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相互矛盾的解释（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

传统主义者（主要是 Lloyd Eastman、Joseph Esherick 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从 19 世纪早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经济表现非常糟糕。他们认为清末民初的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无法应对西方的压力，抑制经济增长。这些学者强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转折点，因为它允许进行导致经济快速增长所需的政治和经济革命。

修正主义者（主要是 Thomas Rawski、Loren Brandt 等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在 19 世纪后期的人均 GDP 增长缓慢但稳定的情况下大多是成功的。这些学者关注的是传统经济特征与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特征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民国和晚清时期存在的有利条件

之上，这使得该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

共和国初期的内战、饥荒和动乱

早期的共和国以频繁的战争和派系斗争为标志。自袁世凯执政至 1927 年，饥荒、战争和政府更迭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各省定期宣布“独立”。中央政权的瓦解导致自清以来的经济收缩加速，直到 1927 年蒋重新统一中国并宣布自己为领导人时才被扭转。

国内产业的发展

尽管中国政局动荡，但清朝灭亡后，中国国内工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使中国的产业受益。此外，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后，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在1913年有482,192台针机，到1918年（战争结束）这一数字增加到647,570台。到 1921 年，这个数字增长得更快，达到 1,248,282 家。此外，面包厂从 57 家增加到 131 家。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学生呼吁中国民众抵制外国商品的运动也有助于刺激发展。从 1919 年到 1921 年以及从 1925 年到 1927 年，外国进口急剧下降。

随着 1930 年代南京十年的到来，中国工业在 1930 年代继续发展，当时蒋介石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带来了政治稳定。1927-1931年中国工业发

展壮大。尽管中国经济受到1931-1935年经济大萧条和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的负面影响，工业产值到1936年恢复。到1936年，工业产值已经恢复并超过1931年的峰值。中国GDP的趋势最能说明这一点。193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峰值288亿，1934年降至213亿，1935年恢复到237亿。

中华民国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保留了晚清的许多特征。虽然市场已经成形于宋及明清时期，但共和国的农业几乎完全朝着生产用于国外消费的经济作物的方向发展，并且因而受国际市场的主导。主要出口产品包括胶水、茶叶、丝绸、甘蔗、烟草、棉花、玉米和花生。

农村经济受到 1930 年代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农产品生产过剩导致中国价格大幅下跌，并且外国进口增加。1931年，中国进口大米为2100万蒲式耳，而1928年为1200万蒲式耳。其他商品的增长更为惊人。1932 年，进口了 1500 万蒲式耳的粮食，而 1928 年为 90 万蒲式耳。这种竞争加剧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更便宜），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大幅下降。1932 年，农产品价格是 1921 年水平的 41%。到 1934 年，一些地区的农村收入下降到 1931 年水平的 57%。

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

民国时期，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猛增。到 20 世纪初，中国已有约 15 亿投资，其中俄罗斯、英国和德国是最大的投资国。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和俄罗斯的投资停止了，而英国和日本则发挥了主导作

用。到1930年，外国对华投资已超过35亿美元，其中日本领先（14亿美元），英国为10亿美元。但到了1948年，资本存量停止了，投资额下降到只有30亿，美国和英国领先。

中华民国货币

中国的货币最初是白银支持的，但国民政府在1935 年臭名昭著的银行业政变中夺取了私人银行的控制权，并用中华民国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币”取代了原有货币。中华民国政府特别努力将这种货币定为中国的垄断货币，淘汰了早先构成中国货币的白银和黄金支持的纸币。不幸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利用这一特权大量发行货币；1936 年共发行了 14 亿元，但到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时，发行了约 1.031 万亿元。随着 1946 年中国内战的爆发，这一趋势进一步恶化。 到 1947 年，由于战争造成的巨额预算赤字，发行了约 33.2 万亿的货币（税收仅为 2.5 亿，而战争支出为 2.5 万亿）。到 1949 年，流通货币总量是 1936 年的 1200 亿倍。

中国战争经济（1937-1945）

1937年，日本侵华，战火焚毁中国。繁荣的华东沿海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实施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和农村乱杀等暴行。日本对中国城市进行系统轰炸，国民党军队奉行“焦土”政策，摧毁他们不得不放弃给日本人的地区的生产能力。在 1942 年的一次日本反游击行动中，日本人在一个月内杀死了多达 200,000 名平民。1942 年和 1943 年，河南有200万 至 300 万平民死于饥荒。据估计，这场战争总共造成 2000万 至 2500 万中国人死亡。它严重阻碍了前十年的发展。战后，由于毁灭性的冲突以及廉价美

国商品的流入，工业受到严重阻碍。到 1946 年，中国工业以 20% 的产能运转，产量占战前中国的 25%。

战争导致政府对工业的控制大幅增加。1936 年，国有工业仅占 GDP 的 15%。然而，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抗战而控制了许多行业。1938 年，中华民国成立了一个工矿委员会，以控制和监督企业，并实施价格控制。到1942 年，中国工业70%的资本为政府所有。

恶性通货膨胀、内战和共和国迁往台湾

在与日本的战争之后，蒋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台湾，并重新开始与共产党的斗争。然而，国民党的腐败，以及试图打内战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整个共和国的大规模骚乱和民众对共产党的同情。此外，共产党人重新分配土地的承诺赢得了大量农村人口的支持。1949年，共产党占领了北京，后来又占领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中华民国迁往台湾，之前的日本在那里奠定了教育基础。台湾在中华民国政府下继续繁荣发展，并由于其“经济奇迹”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后来在邓小平改革中国经济政策后，开始快速增长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之一。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China_(1949%E2%80%93present)

中国经济史（1949年至今）

中国经济史描述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根据政府统计，中国自 1980 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1978 年至 2005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10%。2005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286 万亿美元。自 1978 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从国家主导的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向混合经济过渡。这种转变需要中国在财政、金融、企业、治理和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改革，以及政府能够灵活应对这些变化的意外后果的能力。这一转变伴随着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一过程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方方面面。

中国幅员辽阔，意味着生活水平存在重大区域差异，从极端贫困到相对繁荣不等。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以土地为生，而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现代服务型经济正在形成。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令人惊讶和动荡的

经济发展过程。它经历了革命、社会主义、毛主义，最后是毛后时代特征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和快速经济增长。该时期大跃进饥荒和混乱文化大革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个时期，中国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

改革时期的高增长率是由于资源的大规模动员以及这些资源的控制权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从而提高了管理这些资源的效率。这个大规模资源动员时代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即将结束，中国未来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效率来进一步发展经济。

一般概述

1990 年代后期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某些产业为国家所有，计划和金融体系由中央控制，这使得政府能够调动一切可用的盈余，并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

分析家估计，1979 年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左右，这一比例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超过。然而，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相对较低，即使如此高的投资率，相对于国家和人口的规模来说也只能确保少量的资源。

可供投资的资源有限，阻碍了中国快速生产或进口先进设备。技术发展逐

步进行，陈旧的设备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使用。因此，同时使用了许多不同级别的技术。大多数行业包括一些与现代西方设施相当的工厂，通常基于进口设备和设计。中国工厂生产的设备通常比标准的西方设计落后多年。农业在国家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低于工业，而且平均投资额仍远低于技术和生产力。尽管拖拉机、卡车、电动泵和机械脱粒机的可用性显着增加，但大多数农业活动仍然由人或动物进行。

虽然中央政府协调经济并在必要时将资源重新分配到需要它们的地区，但大部分经济活动非常分散，地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流动很少。例如，中国种植的粮食大约有 75%被生产它的家庭消费，其余 25% 分配到其他需要它的地区。

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是通过扩大运输能力来展示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运输和通信部门正在增长和改善，但由于投资资金稀缺且缺乏支持这种增长所需的先进技术，因此速度不足以处理快速增长的现代经济所需的交通量.

由于区域之间的互动有限，形成了大量不同的地理区域，使用了广泛的不兼容技术，形成了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和繁荣程度差异很大的区域。

在任何一个城市中，企业范围从小型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单位，勉强为其成员赚取生活水平的收入，到现代化的国有工厂，其工人获得稳定的工资以及免费医疗、奖金和各种其他福利.

农业部门多样化，容纳设备齐全的“专业家庭”，为当地市场提供稀缺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专门生产蔬菜、猪肉、家禽和鸡蛋的富裕郊区村庄，并在附近的自由市场上出售。沿海的城市附近有渔村，内蒙古草原上有牧群，陕西、甘肃干旱山区有贫困、苦苦挣扎的产粮村。

尽管存在巨大的限制和干扰，但中国经济从未停滞。产量在 1800 年至 1949 年间大幅增长，1949 年之后增长相当迅速。然而，在 1960 年代之前，产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相匹配，因此生产能力无法显着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例如，1979 年的粮食产量大约是 1952 年的两倍，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产量的增加，因此，即使在高产年份，也几乎没有产生剩余。此外，很少有资源可以用于投资资本货物，例如机械、工厂、矿山、铁路和其他生产性资产。相对较小的资本存量导致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仍然很低，

经济政策，1949-1969

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上台时，其领导人的基本长期目标是将中国转变为现代化、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这些目标意味着工业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现代军事装备的生产。随着岁月的流逝，领导层继续支持这些目标。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在若干场合因经济、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认为收入均等和提高政治意识的社会主义目标应优先于物质进步的领导人与认为工业化和全面经济现代化是实现成功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的领导人之间出现了重要区别。以政治为首要考虑的著名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的成员。更经常强调实际经济考虑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重要的政策转变反映了对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交替强调，并伴随着个人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政策和基本经济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一个新的政策时期，虽然与其前身有很大不同，但仍保留了大部分现有的经济组织。因此，经济模式的形式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特定时间点所表达的政策既反映了当前的政策重点，也反映了早期建立的结构基础。

从战争中恢复，1949–1952

1949 年，中国经济饱受数十年战争的不利影响。许多矿山和工厂遭到破坏或摧毁。在1945年与日本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拆除在东北的主要工业区约一半的机器并把它们运到苏联。由于缺乏维护，交通、通讯和电力系统遭到破坏或恶化。农业中断，粮食产量比战前峰值低约 30%。此外，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加剧了经济弊病。

1949-1952 年间政府的主要目标只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秩序。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修复交通和通讯联系，重振经济活动。银行系统被国有化并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1951年，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统一货币体系，收紧信贷，各级政府预算限制集中控制，保证货币价值。国营贸易公司（商务部门）的成立刺激了商业并对其进行了部分管制，这些公司与私人贸易商在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并将其出售给消费者或企业方面展开竞争。工业所有制转型进展缓慢。在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1927-49 年），

该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现代化的运输部门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上台后立即将这些单位改为国有企业。剩余的私营企业逐渐被政府控制，但 1952 年仍有 17% 的工业单位完全处于国家体制之外。

在农业方面，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全国土地改革计划，大约 45% 的耕地所有权从地主那里被重新分配给60% 到 70% 的、以前拥有很少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家庭。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一旦完成，就鼓励农民在生产的某些阶段进行合作，组建每六七户的小型"互助小组"。1952 年，38% 的农户属于互助队。到 1952 年，物价稳定，商业恢复，工农业恢复了以前的生产高峰。恢复期已经实现了目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在恢复了可行的经济基础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老兵的领导准备着手实施工业增长和社会化的密集计划。为此，政府采用了苏维埃经济模式，其基础是现代部门的国家所有制、农业的大型集体单位和集中的经济计划。苏联的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与苏联经济一样，主要目标是实现高经济增长率，主要强调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 和资本密集型技术。苏联计划者帮助他们的中国同行制定了计划。大量苏联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协助开发和安装新的重工业设施，包括许多从苏联购买的整厂和设备。在此期间，政府通过施加财政压力和诱因说服私营现代公司的所有者将其出售给国家或将其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公私联合企业，从而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到 1956 年，大约 67.5% 的现代工业企业为国有，32.5% 为公私合营。没有留下任何私营企业。同一时期，手工业被组织成合作社，到 1956 年，合作社占

所有手工业工人的 91.7%。

农业也经历了广泛的组织变革。为促进农业资源的调动，提高耕作效率，增加政府对农产品的获取，当局鼓励农民组织越来越大的社会化集体单位。从结构松散、规模很小的互助小组，村庄首先发展到低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中，家庭仍然根据他们贡献的土地数量获得一些收入，最终发展到高级合作社，或者集体。在先进生产合作社中，收入分成仅基于贡献的劳动量。此外，每个家庭都被允许保留一小块私人土地，在上面种植蔬菜、水果和牲畜供自己使用。该集团化进程开始缓慢，但在1955年和1956年加速。在1957年有关的所有农户93.5％的人加入了先进的生产合作社。

在经济增长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在苏式发展战略所强调的领域。重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点行业，包括铁和钢制造，煤炭开采，水泥生产，电力发电，机械制造业被大大扩展。建设工矿企业数千家，重大设施156项。1952 年至 1957 年间，工业生产以年均 19% 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以每年 9% 的速度增长。

尽管国家对农业缺乏投资，但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约 4%。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通过集体化实现的重组和合作带来的效率提高。然而，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关注农业相对低迷的表现，以及国有贸易公司无法大幅增加从农村采购的粮食供城市消费的数量。

大跃进，1958-60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工农业增长不平衡、对效率低下的不满以及决策过程缺乏灵活性使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确信高度集中的工业——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1957 年，政府采取措施，将大量经济决策权下放给省级、县级和地方政府。1958 年，旨在延续第一个计划政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方法，依靠全体人民自发的英勇努力，使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同时产生戏剧性的“巨大飞跃”。农业的进一步重组被认为是突然跃入更高生产力阶段的关键。一个根本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同时大量投资于工业和农业。为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层决定通过建设庞大的灌溉和水利控制工程，雇佣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农民劳动力团队，试图在农业部门创造资本。通过在农场单位建立数以千计的小型、低技术、“土法炼钢”工业项目，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也将用于支持工业部门，这些项目将生产农业发展所需的机械和城市工业的组件（但多数失败了）。

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形成

人民公社是由大约 20 或 30 个先进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平均成员为 20,000 至 30,000 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成员人数从 6,000 人到超过 40,000 人不等。最初成立时，公社被设想为将最低级别的地方政府和最高级别的农业生产组织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公社由三个组织层次组成：中央公社行政；生产大队（大致相当于先进生产合作社，或传统的农村）和生产队，一般由三十户左右组成。在大跃进初期，公社旨在获得对其下属单位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所有权，并接管大部分农业活动的规划和决策。理想情况下，公社将通过将农户搬进宿舍、在公共食堂为他们提供食物、以及对整个劳动力团队分配任务来提高效率。实际上，这种理想的、极其集中

的公社形式并未在大多数地区建立。

1958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98% 的农场人口被组织成公社。很快就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社过于笨拙，无法成功执行分配给他们的所有管理和行政职能。1959 年和 1960 年，大部分生产决策恢复到大队和小队层面，最终大部分政府职责又回到了县和乡镇政府。尽管如此，直到 1960 年代初，公社制度仍然保留并继续成为农业部门的基本组织形式。

在大跃进期间，工业部门也有望发现并利用闲置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将产量提高到以前认为可行的水平之上。政治热忱是动力，“以政治为主导”的党支部接管了许多工厂的工作方向。此外，中央计划被降级为次要角色，以支持各个单位自发的、受政治启发的生产决策。

大跃进的结果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58年工业产值确实“跃升”了55%，农业部门迎来了丰收。然而，在 1959 年、1960 年和 1961 年，在过度集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期间，不当建造的水利工程以及其他资源配置不当导致了农业产量的灾难性下降。1959 年和 1960 年，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 14% 和 13%，1961 年又下降了 2%，达到 1952 年以来的最低点。 1962 年发生了大面积饥荒，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死亡率从 1958 年的 1.2% 上升到 1959 年的 1.5%，1960 年的 2.5%，然后在 1961 年回落到 1.4%。从 1958 年到 1961 年，显然至少有超过 1400 万人死于饥饿，报告的出生人数比正常情况下减少了约 2300 万。从 1960 年开始，政府取消了几乎所有外国技术进口订单，并利用国家外汇储备每年进口超过 500 万吨粮食，从而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矿山和工厂在 1960 年继续扩大产量，主

要是因为“一五”期间建造的许多新工厂在这些年中已全面投产。然而，此后设备和工人的过度压力、农业危机的影响、缺乏经济协调，以及在 1960 年代，苏联援助停止，导致1961年工业产出下降38%，1962年又继续下降16%。

调整和恢复：“农业第一”，1961-65

面对 1960 年代初期的经济崩溃，政府大幅修改了经济的近期目标，并制定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来取代大跃进的政策。重中之重是恢复农业产量并以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的速度扩大产量。计划和经济协调将恢复——尽管其形式不如大跃进前那么集中——以恢复经济秩序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投资率，调整投资重点，农业优先，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

与大跃进期间坚持的对重工业发展的重视进一步背离，政府承诺调动国家资源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的组织变革主要涉及公社结构内生产决策和收入分配的权力下放。中央公社行政机关的作用大大减少，尽管它仍然是地方政府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纽带，并且在开展对生产大队来说规模过大的活动方面很重要。生产队被指定为基本核算单位，负责制定几乎所有有关生产和对其成员的收入分配的决策。

对农业的经济支持有多种形式。降低农业税；相对于农业工业用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化肥和各类农业机械，尤其是灌溉用小型电动泵供应量大幅增加。大多数现代供应都集中在已知能产生“高而稳定的产量”的地区，以确保获得最佳结果。

在工业方面，少数重点企业回归中央，但大部分企业仍掌握在省级和地方政府手中。这种权力下放发生在 1957 年和 1958 年，并在 1961-65 年期间得到重申和加强。计划而不是政治再次引导生产决策，物质奖励而不是革命热情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随着 1960 年苏联撤出援助而突然停止的先进外国机械进口是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开始的。

1961-65年调整和恢复时期，经济恢复稳定，到1966年农业和工业生产均超过大跃进时期的高峰水平。1961 年至 1966 年间，农业产量以年均 9.6% 的速度增长。同年工业产值以年均 10.6% 的速度增长，主要是通过恢复 1961 年经济崩溃后产能不足的工厂。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增长来源是农村小规模工业，特别是煤矿、水力发电厂、化肥厂、农机厂。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模式结合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高度集中、以工业为导向的苏联式体制的要素，以及以大跃进为特征的所有制和决策权下放的方面，并强调关于农业发展和均衡增长的“农业第一”政策。1960 年代初期形成的基本所有制、决策结构和发展战略直到改革时期才发生显着变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事件，1966-76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1966-69

与大跃进不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政治动荡，并没有导致官方经济政策或基本经济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如此，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城市社会，并深刻影响了现代经济部门。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但总体而言，农村地区的动荡比城市要少。现代非农业部门的产量以多种方式减少。

停产的最直接原因是学生和矿厂工人的政治活动。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征用火车和卡车运送中国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导致交通大面积中断。许多工厂的产量受到原材料和其他供应短缺的影响。

第三个破坏性影响是，工厂的指挥权掌握在由党、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手中，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对如何管理他们所在的企业知之甚少。此外，几乎所有的工程师、管理人员、科学家、技术人员、地主和其他专业人员都被"批斗"、降级、"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甚至坐牢，所有这些都导致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从企业流失。

结果是 1967 年工业生产下降了 14%。1967 年底和 1968 年军队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工业部门在 1969 年恢复了相当高的增长率。

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对经济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技术进步所需的外国设备的进口因仇外心理而受到限制。

对经济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大学关闭造成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严重短缺。由于高等教育的中断，中国开发新技术和吸收进口技术的能力将在多年内受到限制。

系统性增长的恢复，1970-74

随着政治稳定的逐步恢复，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协调平衡发展的新动力重新启动。

为了重振工业效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恢复了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并开展了一项运动，让技术人员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重返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代的工作岗位。

大学开始重新开放，对外交往扩大。经济再次受到不同工业部门能力不平衡的影响，迫切需要增加现代农业投入品的供应。针对这些问题，投资大幅增加，包括与外国公司签订了建设化肥生产、钢铁精加工、石油开采和炼油等重大设施的合同。这些合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化肥厂中的 13 家的合同。在此期间，工业产值以年均 8% 的速度增长。

1972 年，由于天气恶劣，农业产量有所下降，但整个时期的年均增长率为 3.8%。党和国家领导层对发展需要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周恩来在 1975 年 1 月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结论。他在报告中呼吁进行四个现代化。周强调农业机械化和到本世纪末整个经济现代化的

两阶段综合计划。

四人帮，1974–76

在 1970 年代早期和中期，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组织试图通过他们的支持者网络，最重要的是通过他们对媒体的控制来统治权力中心。

然而，更温和的领导人正在制定和颁布一项务实的计划，以实现经济的快速现代化，这与媒体表达的一系列政策相矛盾。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倡议在新闻界和政治运动中被猛烈抨击为"毒草"。

利用官方新闻机构，四人帮主张非物质优先，政治激励，彻底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私人农场，并将基本核算单位转移到农业大队级。他们反对加强中央计划并谴责使用外国技术。

面对如此矛盾的政策声明和不确定的政治潮流，各级行政人员和经济决策者几乎陷入瘫痪。经济活动放缓，初期的现代化计划几乎陷入停顿。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和随后 4 月邓小平的第二次清洗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1976 年 7 月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加剧了权力斗争和政策纷争的影响。当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出比 1975 年没有增长。毛死后一个月，10 月四人帮被捕。

后毛泽东插曲，1976–78

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以及到 1977 年 7 月平反的邓小平——重申了周恩来在 1975 年支持的现代化计划。

新政策以牺牲党的官员为代价，加强了管理者和经济决策者的权威，强调对工人的物质激励，并呼吁扩大研究和教育体系。对外贸易增加，而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将被鼓励。

这一新的政策倡议在 1978 年 2 月和 3 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限制，当时华国锋提出了 1976-85 年期间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草案。该计划要求工业和农业都实现高速增长，其中包括 120 个需要大量昂贵进口外国技术的建设项目。

1976 年至 1978 年间，经济迅速从文化大革命的停滞中复苏。1977 年，由于连续第三年恶劣的天气条件，农业生产低迷，但在 1978 年实现了创纪录的收成。工业产值在 1977 年增长了 14%，在 1978 年增长了 13%。

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此不是很清楚，马克思

主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高级阶段，实行量产、按需分配的原则。这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是通过这些力量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大的发展来证明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建国后，我们的不足之一就是对发展生产力不够重视。社会主义意味着消除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4 年 6 月 30 日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22 日开幕，党的领导人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渐进但根本性的改革。他们的结论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毛主义版本未能产生有效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兴工业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

在 1970 年代后期，当日本和香港在现代技术方面与欧洲国家相匹敌时，中国公民不得不勉强维持粮食供应、服装配给、住房不足以及服务业不足且效率低下的情况。所有这些缺点都让中国在国际上难堪。

改革计划的目的不是放弃共产主义，而是通过大幅增加市场机制在体制中的作用，减少——而不是消除——政府计划和直接控制，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新措施首先在少数地方进行试点，如果成功，则在全国推广和传播。

到 1987 年，该计划在增加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为经济创造了充满活力和机遇的新氛围。然而，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局势，导致对该计划未来的激烈质疑和政治斗争。

调整期，1979-81

改革方案的前几年被指定为“调整期”，在此期间，经济的主要失衡将得到纠正，并为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华国锋十年计划的时间表被废弃了，尽管其中的许多元素被保留了下来。

调整过程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扩大出口；克服交通、通讯、煤炭、钢铁、建材、电力等重点领域的不足；通过提高轻工业增速，减少重工业投资，纠正轻重工业不平衡。1979 年农产品采购价格上涨 22% 以上，刺激了农业生产。

改革方案的中央政策是在调整期间试行的。最成功的改革政策是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是政府于1979年提出的，作为山区或干旱地区农村贫困户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责任制允许个体农户耕种一块土地以获取利润，以换取以给定价格向集体交付一定数量的产品。这种安排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实行责任制后不久，各个地区的许多农场单位都采用了这种责任制。

农民也受到官方鼓励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建立自由农贸市场以及允许一些家庭作为“专业户”经营，致力于生产稀缺商品或服务的刺激。

在行业方面，主要的政策创新增加了企业管理者的自主权，减少了对计划配额的重视，允许企业在计划外生产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并允许企业尝试使用奖金来奖励更高的生产力。政府还对数量有限的国有单位进行了财务程序的根本性变革：这些企业不是像通常那样将所有利润上缴国家，而是允许这些企业对其利润纳税后保留其部分利润。余额用于再投资和分配给工人作为奖金。

政府还积极鼓励建立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工业和服务企业，以此来吸收年轻人的部分失业，同时帮助增加轻工业产品的供应。在文革期间几乎消失的个体企业也被允许，独立的鞋匠、裁缝、修补匠和小贩再次成为城市的常见景点。对外贸易手续大大放宽，允许个别企业和外贸部（1984年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部）以外的行政部门与外国企业直接谈判。

改革开放，始于1982年

调整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收入大幅增加；提高食品、住房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并在除重工业之外的所有部门产生强劲的增长率。凭借这些初见成效，改革方案不断拓宽，邓小平领导层多次提出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改革开放”，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贸易开放。

在农业方面，全国实行承包责任制作为组织规范，公社结构基本解体。到1984年底，大约98%的农户实行了责任制，除少数公社外，其他所有公社都被解散了。公社的行政职责移交给乡镇政府，而公社的经济职能则分配给乡镇和村庄。农产品自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扩大，随着营销可能性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

在工业中，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阻碍了单一、简单的政策带来农业责任制所实现的那种显着改善。尽管如此，一系列基于更大灵活性、自主权和市场参与的政策显着改善了大多数企业的机会，产生了高增长率并提高了效率。企业管理者逐渐获得了对其单位的更大控制权，包括雇用和解雇的权利，尽管这个过程需要与官僚和党的干部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到 1985 年，利润上缴税款并保留余额的做法变得普遍，这增加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并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一个潜在同样重要的变化是投资资金的来源从政府预算拨款转变为有息银行贷款，这种分配不带利息也不需要偿还。到 1987 年，对此类贷款收取的利率仍然太低，无法作为对非生产性投资的检查，但该机制已经到位。

对外贸易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重要性。改革前，进出口总值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10%。1969 年为 15%，1984 年为 21%，1986 年达到 35%。与早期中国致力于实现自给自足不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外贸被视为投资资金和现代技术的重要来源。结果，贸易限制在 1980 年代中期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合法化。最常见的外国投资是外国公司与中国单位之间的合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独资也变得合法，但这种承诺的可行性仍然值得怀疑。

对外贸易新地位的最显着标志是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它们于 1979 年创建，作为外国投资可以得到特殊待遇的飞地。四个区域中的三个——深圳、珠海和汕头——位于广东省，靠近香港。第四个是福建省厦门，与台湾直接隔海相望。1984年4月，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最大的沿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的划定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都是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这些区域旨在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与中国主要经济网络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交流。

国内商业也受到改革政策的刺激，改革政策明确致力于通过将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主要负担从政府计划转移到市场来活跃经济。1980 年代，私人创业和自由市场活动被合法化并受到鼓励，尽管中央政府不得不不断打击地方政府机构对独立商人征收过高税收的努力。到1987年，由商业机构和零售店组成的国有体系与快速发展的私有和集体所有体系并存并与之展开激烈竞争，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广泛的消费选择。

尽管改革方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自由市场活动和职业管理自主原则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另一个困难是犯罪浪潮、腐败浪潮，以及在许多老年人心目中，由宽松的经济和政治气候导致的道德败坏。最根本的紧张局势是由“致富”者与未“致富”者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威胁造成的。这些担忧在最终导致胡耀邦总书记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胡1987 年被迫下台。胡下台后，领导层就改革的未来进程以及如何平衡对效率和市场激励的需要与政府引导和控制的需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进一步改革的承诺得到肯定，但其步伐以及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杠杆的重视仍然是谨慎考虑的对象。

中国 GDP

1985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建立SNA（国民核算体系），用GDP来衡量国民经济。中国开始研究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和核算模式等。1986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获得海外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公民、张风波博士主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国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并完成和发布了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自己的研究。以上总结已收录于张风波主编、国务院研究中心合著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1988年6月）一书。这是中国首次公布的GDP数据。

本研究借鉴世界银行的方法，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多次适当调整。GDP也已通过使用移动平均汇率转换为基于美元的数据。该研究系统地完成了1952年至1986年中国GDP和人均GDP，分析了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变化和贡献率。该研究还包括国际比较。此外，该研究比较了 MPS（材料产品系统）和 SNA（国民核算系统） ），从两个系统的分析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果。这一成果为中国GDP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2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国民核算制度的通知》，西方SNA制度正式引入中国，取代苏联的MPS制度，西方经济指标GDP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根据张风波博士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与日本大学合作，根据SNA原则估算了1952年至1995年中国的GDP数据。

工业

1985 年，工业雇用了全国大约 17% 的劳动力。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有许多小型手工业单位和许多企业使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安装或设计的机器。有大量最新的大型工厂，包括纺织厂、钢铁厂、化肥厂和石化设施，但也有一些新兴的轻工业生产消费品。

外国技术转让是通过引进整厂、设备和设计作为重要的进步手段。主要工业中心是在辽宁省、北京-天津-唐山地区，上海和武汉。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储量，并且几乎所有其他工业矿产供应充足。过时的采矿和矿石加工技术正逐渐被现代工艺、技术和设备所取代。

农业

1985年，农业部门雇用了全国约63%的劳动力。由于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投入品供应不足，生产力低下。大多数农业过程仍然是手工进行的。土地集约利用；所有的田地每年至少生产一种作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年种植两种甚至三种作物，特别是在南方。粮食是最重要的产品，包括大米、小麦、玉米、高粱、大麦和小米。其他重要作物包括棉花、黄麻、油料种子、甘蔗和甜菜。鸡蛋也是主要产品。家禽和猪在家庭土地上饲养。除绵羊和山羊在内蒙古草原上成群放牧外，其他牲畜数量相对有限。

能源

煤炭和石油自 1970 年代初开始出口。其煤炭储量位居世界前列，采矿业在 1960 年代后期，技术发展不充分，但稳步改进。当时石油储量非常大，但质量参差不齐，分布在不同的地点。西北部和近海区域的疑似石油储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储量之一。勘探和开采受到设备和训练有素人员稀缺的限制。到 1982 年，日本和西方石油公司签署了 27 份联合海上

勘探和生产合同，但到 1980 年代后期，只有少数油井在生产石油。北部、西北部和近海有大量天然气储量。水电站的潜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容量是第六大，并且正在建设非常大的水电项目，其他项目处于规划阶段。火电，主要是燃煤，1985 年产生了大约 68% 的发电量，到 1990 年增加到 72%。政策制定者认为 1980 年代后期对火电的重视是满足能源需求的快速、短期解决方案，水电和核电被视为长期解决方案。石油产量继续增长，以满足全国机械化的需要，并提供重要的外汇。

对外贸易

外贸按国际标准很小，但在规模和重要性迅速增长，因为它代表了20％的国民生产总值。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外贸业务出现了实质性的权力下放和更大的灵活性。纺织品在出口类别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他重要的出口包括石油和食品。主要进口包括机械、运输设备、制成品和化学品。日本是主要的贸易伙伴，1986年占进口的 28.9% 和出口的 15.2%。香港是主要的出口市场（31.6%），但仅占进口的 13%。1979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1986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西欧，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旅游业受到鼓励和发展。

1990–2000

自 1991 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 GDP 持续增长至少 5%。1992 年初中国新年访问中国南方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旨在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和振兴的政治声明。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支持邓小平再次推动市场改革，指出中国在 1990 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经济体制的更大胆改革被宣布

为 1990 年代 10 年发展计划的标志。

1996年，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增长率约为9.5%，同时伴随着低通胀。此后三年经济放缓，部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 年官方增长率为 8.9%，1998 年为 7.8%，1999 年为 7.1%。 1995 年至 1999 年，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反映货币政策收紧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控制食品价格。2000 年显示了这一趋势的适度逆转。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正式增长 8.0%，自 1978 年以来增长了四倍。 1999 年，中国拥有 12.5 亿人口，但人均 GDP 仅为 3,800 美元（PPP）。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以及绝大多数由长期投资组成的资本流入。由于这些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区域危机的影响，其不贬值的承诺一直是该区域的主要稳定因素。然而，中国由于内部问题而面临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包括金融体系背负着巨额不良贷款，以及因积极改革国有企业而导致的大规模裁员。

尽管中国在过去 20 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但改革国有部门和实现银行体系现代化仍然是主要障碍。中国超过一半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报告亏损。在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在呼吁增加“非公有制”（非公有或委婉的私有化）时，宣布了出售、合并或关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计划。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 1998 年 3 月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些计划。2000 年，中国宣布其三年努力使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SOE）盈利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从 2000 年开始

继 200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立法者公布了几项国家宪法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保护的提议。立法者还表示，政府整体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将得到新的重视，包括努力降低失业率（目前城市地区的失业率在 8-10% 的范围内），重新平衡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在保护环境和改善社会公平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 2004 年 3 月召开会议时批准了修正案。

2005 年 10 月召开的五中全会批准了"十一五"经济规划（2006-2010年），旨在通过更加均衡的财富分配和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十一五"规划。该计划要求到 2010 年 GDP 增长 45%，能源强度（单位 GDP 能耗）降低20%，这是相对保守的。

1990-2004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尽管政府试图为经济降温，但中国的 GDP 在 2003 年增长了 10.0%，2004 年增长了 10.1%，2005 年甚至更快地增长了 10.4%。2006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1.76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如果中国要创造每年所需的 1500 万个工作岗位——大约相当于厄瓜多尔或柬埔寨的规模——以雇用新进入者进入就业市场，那么如此高的增长是必要的。

2007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4 万亿美元，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3.3 万亿美元。这使中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这些数据，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是1994年以来最快的，当时GDP增长了 13.1%。

自近期各项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和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但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与欠发达、较贫困的内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根据联合国 2007 年的估计，中国约有 1.3 亿人——主要是在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天的消费不足 1美元。大约 35% 的中国人口每天生活在 2 美元以下。

中国的城市化和技术的进步和追赶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运行。但是，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未来的增长变得复杂。

中国启动了经济刺激计划，专门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主要侧重于增加经济适用房，放宽对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的信贷限制，降低房地产销售和商品税等税收，将更多公共投资注入铁路网络、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2008 年的重大自然灾害，如2008 年中国冬季风暴、2008 年四川地震和 2008 年华南水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地方和区域经济和基础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四川的增长率在第二季度降至 4.6%，但在 2008

年全年恢复到 9.5% 的年增长率。5 月 12 日地震后，主要的重建工作仍在继续，预计至少会持续三年. 尽管一些工厂因2008 年夏季奥运会而关闭和搬迁，奥运会对北京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由于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中国经济受到 2008-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然而，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企业所得税 (CIT)：公司的所得税定为 25%，但也有一些例外。当企业投资于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时，税率仅为15%。投资于这些行业的公司还可以获得其他优势。

在网络领域，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速度比欧盟和美国要慢，从 2009 年左右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根据瑞士信贷的数据，中国的在线交易总额从 2008 年的微不足道的规模增长到 2012 年的约 4 万亿元人民币（6600 亿美元）。支付宝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 3 亿用户，并控制着略低于2014年2月中国在线支付市场的一半，而财付通的份额在20%左右，中国银联的份额略大于10%。

根据全球联盟透明国际编制的 2013 年腐败感知指数，中国在 177 个国家中排名第 80，得分为 40。该指数从 0（高度腐败）到 100（极低腐败）对国家进行评分。透明国际在其最终评估中表示：

如果要做出真正的努力，中国政府目前的努力应该超出遵守法治的范围。他们应该接受允许制衡、透明和独立审查的政治改革，同时承认民间社会在反腐败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经济规划

直到 1980 年代，经济都是通过各级行政部门制定的经济计划来指导和协调的。该计划方案显著减少的作用是，中央计划通过鼓励计划外的国有单位生产，促进没有计划体制下集体和个体企业的成长。政府还努力通过税收和投资支持等经济杠杆，以间接引导经济取代直接计划控制。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经济的总体方向仍由中央计划执行，钢铁和能源等关键商品的配置也是如此。

1950 年代初中国的计划机构首次建立时，它是仿照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建立的。该系统基本上依赖于中央计划官僚机构，该机构计算和平衡主要商品的需求和供应量。这种方法在大跃进（1958-60 年）期间得到了实质性的修改，当时经济管理被广泛分散。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计划体制的集权程度随着政治潮流而波动，在务实的发展时期有增无减，在文革和四人帮的影响下有所减弱。

在国家层面，规划始于中央政府的最高机构。国民经济的目标和重点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然后将这些决定传达给国务院各部委和其他机构，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实施。

国家计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原国家建委，中国人民银行，经济部门和其他机构制定时间长短不一，进口的国家计划。长达十年和十二年的长期计划也在不同时间宣布。这些基本上是对未来目标和预期的经

济总体方向的陈述，它们对经济活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截至 1987 年底，最近的此类长期计划是华国锋于 1978 年 2 月提出的 1976-85 年计划草案。

中期计划的主要形式是五年计划，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特点。五年计划的目的是指导和整合年度计划，以实现平衡增长和朝着国家目标前进。在实践中，这一作用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 年）中发挥作用，它有效地充当了工业化蓝图。第二个（1958-62）、第三个（1966-70）、第四个（1971-75）和第五个（1976-80）五年计划都被政治动荡打断，影响很小。"六五"规划（1981-85 年）是在规划期间制定的，与其说是改革指南，不如说是改革方案成果的反映。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90 年）旨在指导 1980 年代后半期的改革进程，

中期计划的第二种形式出现在 1949-52、1963-65 和 1979-81 的调整和恢复时期，每个时期都伴随着一段混乱时期——内战、大跃进和四人帮。在这些情况下，正常的中长期计划被暂停，而经济中的基本失衡得到了针对性纠正。在每种情况下，目标都比五年计划更有限、更明确，并且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

经济单位的活动受年度计划控制。计划的制定始于计划年度之前的秋季，以便可以考虑到当年的农业产量。年度计划的基础是"物料平衡表"。在国家层面，编制物料平衡表的第一步是估算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接控制的企业的每个中央控制商品的需求和供应。统筹省级单位之间的货物调拨，实现供需平衡。作为最后的手段，一种商品的严重总体赤字可

以通过进口来弥补。

初步目标下达省级行政部门和中央企业。国家经委、部委省级对口单位分解分配目标，在所属县、区、市、省级直管企业之间分配。县进一步在所属镇、乡、县属企业之间分配分配数量，市将目标划分为所辖企业的目标。最后，城镇将目标分配给他们控制的国有企业。农业目标由乡镇在其村庄之间分配，最终减少到村庄与个体农户签订的数量。

在每个级别，各个单位都获得了目标投入分配和产出数量。经理、工程师和会计师将目标与他们自己的预测进行比较，如果他们得出结论，计划的产出配额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会咨询上级行政机构的代表。各级行政部门在与下属单位讨论的基础上调整了目标，并将修订后的数字重新上调了计划阶梯。各委部委对修改后的金额进行评估，重复物质平衡表程序，并将结果作为最终方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

省级制定的年度计划规定了中央控制商品的数量，对未列入国家计划但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重要意义的商品设定了目标。这些数字与中央计划目标一样，经过了分解、审查、讨论、再聚合的过程，最终成为省级单位年度计划的一部分。许多未列入省级的商品也同样被列入县市计划。

计划过程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各个生产单位。企业收到产量定额和资金、劳动力和其他物资的分配数据后，一般将生产计划安排为十天、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的计划。

中国的计划体系也遇到了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出现的缺乏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基本的困难在于，计划者不可能预见经济的所有需求并充分说明计划投入和产品的特征。从 1979 年和 1980 年开始，第一批改革是在试验基础上进行的。几乎所有这些政策都增加了自主权和决策权，中央计划的直接作用减弱。到 1980 年代中期，计划仍然是政府引导经济和纠正失衡的主要机制，但其预测和控制经济行为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价格

价格的确定

直到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的改革时期，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机构制定的，很少变动。由于商品的生产成本或需求发生变化时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往往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导致多种商品错配，形成中国政府自己称之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产生经济效率所需的准确价格的最好方法是通过供求过程，1980年代的政府政策越来越提倡使用“买卖双方共同商定”的价格，即通过市场。

农产品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1985 年夏天，除粮食外，所有食品的国营商店价格也被允许根据市场情况浮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私营和集体企业生产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一般都可以自由浮动，国有企业生产的许多计划外商品的价格也是如此。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的主要商品的价格，以及国家商务部门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用于城市零售的粮食价格，仍然由政府部门制定或限制，仍然不够准确。

1987年中国的价格结构混乱。有些价格是通过供求关系在市场上决定的，

有些是由政府机构设定的，还有一些是通过没有明确定义的程序产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不只一种，这取决于它的交换方式、生产单位的种类或购买者是谁。虽然政府对这种情况不满意，但它致力于继续进行价格改革。然而，由于潜在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它不愿公布剩余的固定价格。突然不可预测的价格变化会使消费者无法继续购买某些商品；在旧的价格结构下，一些以前盈利的企业将开始亏损。

价格的作用

由于经济改革计划以及市场交易和盈利能力的日益重要，在 1980 年代，价格在决定大多数经济部门的商品生产和分配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此前，在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企业以实物形式分配了产出指标和投入。在改革方案下，显示正利润的激励措施甚至导致国有企业尽可能根据价格选择投入品和产品。国有企业不能改变计划要求生产的商品数量或价格，但可以通过尽可能便宜的采购投入来增加利润，而计划外生产的决定主要基于价格考虑。

除配给粮食外，消费品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给家庭。家庭根据与家庭收入相关的商品价格来决定购买哪些商品。

价格政策问题

无论是纵容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持续存在，还是进行价格改革，粮食市场都是政府面临重大问题的典型例子。国家商业机构支付给农民的粮食价格高于国家从城市居民那里得到的粮食价格。1985 年，国家商业机构向农民支

付平均每吨粮食 416.4 元，然后以每吨 383.3 元的平均价格在城市出售，每吨损失 33.1 元。在这种安排下销售了 9000 万吨，导致政府损失近 30 亿元。如果国家降低收购价格，农民就会减少粮食产量。由于谷物是中国人的主食，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国家将城市零售价格提高到与采购价格持平，中国家庭的主要食品成本将上涨 9%，引起巨大的反感。但即使是这种替代方案也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平均粮食的自由市场价格——1987 年每吨 510.5 元——表明其真实价值远高于国家采购价格。

价格政策困境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政府的做法是鼓励非计划经济活动的增长，从而扩大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比例。然后，这些市场价格可以作为对计划项目进行更准确定价的指南。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继续以双重价格体系运行。

通货膨胀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中国经济不稳定的最显着表现之一是失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1940 年代后期的中国内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上海的批发价格在3 年内上涨了 750 万倍。在 1950 年代初期，通过货币改革、银行的统一和国有化以及对价格和货币供应的严格控制来阻止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项主要目标。这些措施一直持续到 1979 年，中国取得了显着的物价稳定记录。1952 年至 1978 年间，零售业 消费品价格平均每年仅增长 0.6%。

在改革期间，当政府控制减少时，通货膨胀水平会更高。1980 年，城市居

民的生活成本首次出现大幅上涨，当时消费价格上涨了 7.5%。1985 年增加了 11.9%，1986 年增加了 7.6%。经过三十年的物价稳定，这次通货膨胀的爆发有几个基本原因。首先，改革前几年，生产资料制造业的投资率和集中度普遍较高。由此产生的消费品短缺导致过度需求逐渐积累：个人储蓄相对较大，并且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这种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如手表和电视机。其次，随着一些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以及技术改变了制造工艺和产品，许多物品的实际价值发生了变化。生产农产品的实际成本随着现代投入物使用量的增加而上升。比以前市场上的那些技术更先进、更昂贵的制造消费品——例如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变得可用。

在 1980 年代初期，消费者收入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相当迅速地增加，有时甚至出乎意料地增加。由于改革计划强调物质激励以及生产力和创收可能性的整体扩张，消费者收入增长。企业赚取和保留的较高利润在许多情况下以加薪、奖金和更高补贴的形式转嫁给工人。与此同时，银行系统的扩展和多样化作用导致贷款和存款的数量有时超过官方批准的水平，向经济注入了计划外的新货币数量。

国家目标

到1987年，在改革方案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实现现代化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教育系统的复兴、经济向与其他国家更广泛的贸易和合作开放、市场利用扩大以活跃商业和生产以及决策的增加，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潜力大大增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chnological_and_industrial_history_of_China

中国科技工业史

中国的技术和工业历史是极其多样和广泛的。1950 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利用其大部分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

概述

到 1980 年代中期，产业改革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广泛的现代工业已经建立；该国是世界领先的煤炭、纺织品和自行车生产国之一。几乎每个关键行业都有大型工厂。 轻工的输出消费品已大大增加。在某些情况下，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管理人员能够行使更大的自主权，并实施技术创新以提高效率。

主要问题包括：价格体制改革不力、地方干部干预企业管理者经营、终身制、职工“铁饭碗”制度等。快速的工业增长使能源短缺成为经济面临的最

关键问题之一，将工业企业和矿山的产能限制在 70% 或 80%。

在 1980 年代，大规模、中央控制的工厂主导了制造业。这些大型工厂与许多小型乡镇企业相辅相成，在全国煤炭、建筑材料和皮革制品产量中占很大比例。

组织

根据政府管理的行业类型和控制水平，有各种国务院部委。1987年，有单独的航空，航天，化工，煤炭，电子，冶金，核能，军火，石油和纺织行业，轻工行业，铁路，以及水资源和电力部委；有两个委员会——国防科工委和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1986年，政府承认了四种经济企业所有制："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集体、个人和其他。国有制下，企业的生产性资产归国家所有，企业的活动由国民经济计划决定，盈亏归国家预算。大多数最大的现代企业都是国有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许多其他企业也是国有企业，但由中央政府和省、地或县各级当局共同监管。这些企业的利润分配给中央和下级单位。

在集体所有制下，生产性资产由工人自己（在城市企业的情况下）或农村单位建立的企业成员所有。盈亏属于集体成员，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指挥松散。集体所有制企业普遍规模小、劳动密集型，1983 年城镇从业人员约 2700 万人。个人所有制在 1950 年代属于个体手工业范畴；到 1980 年代

中期，它还包括最多拥有 30 名雇员的个体企业。中国当局未定义“其他”类别。

产业地理分布

1949年以前，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和东北地区。上海是最大的工业中心，其次是鞍山、抚顺和沉阳，均在辽宁。青岛、天津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内陆只有少数城市有现代工业。他们包括武汉、重庆和太原。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 年）期间，政府特别强调发展东北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以外的地区。内蒙古包头和湖北武汉建设钢铁厂。西南地区也出现了工业中心，主要在四川。

1950年代，华东和东北地区的工业中心约占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然而，到 1983 年，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工业中心已将其产值份额增加到 40% 以上。这一增长是 1950 年代开始的一项政策的结果，即逐步将现有工业基地扩展到新地区，在北部和南部建立新基地，并在西南建立新基地。

1952—1983年，华南、西南、西北工业增速高于华东、东北、华北地区。南部的工业总产值增长最快——从 1952 年的 13.7% 增长到 1983 年的 18.5%。自 1950 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强调发展内陆地区，但到 1986 年它放弃了这一战略，转而开发具有更成熟的基础设施。

技术水平

尽管建国初期有了显着进步，但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总体上仍然很低。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着的技术进步，如核武器、卫星和计算机；但总体而言，工业部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大部分机械和设备都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苏联曾在50年代期间提供技术援助，但这种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双边关系破裂时突然结束。

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之间缺乏协调。1979年至1984年，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发现由2790项增加到10000项，国家批准的发明专利由42项增加到264项，其中大部分发现和发明没有付诸实施。这主要是因为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独立运作，很少或没有信息交流。此外，大多数企业管理者更关心满足生产配额而不是技术创新。

没有明确的研发目标，也没有研发对工业的重要性的概念。相反，努力集中在纯粹科学目的的研究和开发上。因此，中国没有发展出广泛的工业研发基础。到 1981 年，只有 8% 的研发人员参与了工业研究，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72%。1983 年，每 10,000 人中只有 3.2 人参与研究，而美国则为每 10,000 人中 31 人。体制障碍和资源短缺也困扰着研究机构。

1985年中共印发了《关于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的决议》。该决议寻求更密切地协调研究和生产。“四个现代化”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是将科学技术转向经

济进步。研究机构将竞争来自各个行业的合同，并以按服务收费的方式运作。重点放在工厂、大学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上。

到 1987 年为止，这项努力的状态仍不清楚。冶金行业加大个体企业产学研结合力度。此外，主要的冶金联合体都拥有用于新产品研究的内部研究设施。另一方面，电子产品的划分要大得多。到 1980 年代后期，技术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壁垒没有得到决定性的突破。

在 80 年代中期，中国吸收进口技术的结果好坏参半。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但需要很长时间。例如，先进的西德冷轧技术已搬入辽宁省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由于原材料短缺、缺乏可靠的电源、人力技能低以及服务和应用人员短缺，电子行业没有那么成功。江苏无锡江南半导体厂是个例外，它接收了许多日本和美国公司的设备。到 1987 年，它的生产力很高。然而，与大多数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电子行业当时远未实现先进技术，无论其来源如何。

工业资源供应

资本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将很大一部分投资投入到工业领域。到 1983 年，工业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57%。1984 年，大约占国家总支出的 30%，被安排用于基本建设。1981 年，领导层试图限制对基本建设的不受控制的过度投资。结果并不是特别积极——部分原因是允许保留利润的企业进行再投资，部分原因是外国投资。

为了补充国内资本来源，中国领导层在 1979 年底开始允许几乎所有形式的外国贷款和信贷。到 1980 年初，中国获得了近 300 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和信贷。中国还通过鼓励中外企业合资项目寻求外资。但是，在 1986 年初，外国公司将中国视为高成本和高风险的投资领域。1985 年已经承诺了价值 85 亿美元的外国资本，而 1986 年第一季度仅为 5 亿美元。

劳工

在 1980 年代中期，约有 11% 的劳动力（即 5000 万人）受雇于国有单位企业的工业部门。在国有企业中，人均年产值（中国衡量生产力的指标）增长了 9.4%。1987 年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几乎无限供应。技术工人、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非常短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专家被迫放弃他们的职业，在 1966 年至 1976 年高等教育中断的 10 年期间，大多数培训和教育计划停止了。这导致技术人员短缺，严重阻碍了工业部门引进现代技术和自主开发新的管理和生产形式。1980年，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在辽宁大连建立了现代化管理培训中心。1987年，许多大学毕业生因缺乏管理自主权而难以运用新获得的技能，许多干部对维持现状有既得利益。当时还不清楚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对行业有什么影响。

原材料

中国拥有大部分重要的工业矿石、燃料和其他矿产。只有少数原材料存在于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储量中。铁和炼焦煤的供应虽然质量很差，但足够了。到 1980 年代初至中期，中国已成为航空航天和电子工业所需的稀有

金属的重要出口国。尽管如此，由于国内需求量大，开发不足和交通基础设施不足，中国需要进口钢铁、生铁、铜和铝等材料。

能量

尽管中国在 1985 年是世界第四大燃料生产国，但能源短缺仍然是工业增长的主要障碍。能源浪费相当大；为了抵消这一点，一些能源价格上涨，对浪费的处罚开始生效。

煤炭是主要能源，1985 年占燃料消耗总量的 70% 以上。探明储量超过7000亿吨，估计储量30000亿吨。1985 年陆上和海上石油储量约为 53 亿吨，大部分尚未开发。中国拥有世界第七大发电能力，但产量仍远不及需求。1985年天然气总产量为127亿立方米，到1990年目标为150亿立方米。"七五"期间天然气与石油同等重要。

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按照"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发展，这是1950年代实行的自力更生政策。1980年代，一支队伍由国家出资、国有控股的大中型工厂组成，拥有最多的人才和最先进的设备。另一条腿是使用劣质设备和大量当地劳动力的小型工厂。这两个部门共同生产了范围广泛的工业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较大的工厂占生产的大部分，但较小的企业正在增加其份额并生产相当大比例的水泥、化肥和农业机械。

钢铁

1949年之前，铸铁和钢铁行业小且分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在辽宁鞍山建造了唯一的现代化钢铁设施。尽管日本最终在鞍山建造了九座高炉，但所有工厂的钢总产量从未超过每年一百万吨。日本的大部分装备要么在中国内战中受损，要么在二战结束时被苏联人拆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扩大钢铁产量不断进行大量投资。然而，钢铁生产对经济政策和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钢产量在20世纪50年代稳步上升，当时苏联顾问帮助建立了钢铁工业的基础，安装了许多前苏联设计的爆炸和平炉。大跃进(1958-60)期间，土法炼钢大量增长。1961 年该行业崩溃；几乎所有的小工厂都关闭了，产量下降到 1960 年的一半以下。1960 年至 1965 年，随着设备维修和从奥地利购买碱性氧气炉和日本电炉，产量逐渐恢复。1967 年和 1968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产量下降，但在 1969 年至 1970 年代初期相对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产量迅速增长。1970 年代中期的政治动荡阻碍了产出，1976 年灾难性的唐山地震也是如此。那次事件严重破坏了唐山钢铁厂和开滦煤矿。后者是炼焦煤的主要来源。1976年后产量稳步攀升，1979年达到3450万吨。1986年钢铁产量为5000万吨。

钢铁被视为大跃进和四个现代化计划的基石或“关键环节”。但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决心不再重蹈经济灾难性的大跃进政策的覆辙：1979 年，它呼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削减钢铁投资。但是，它设定了到 2000 年生产 8000 万吨钢铁的目标。生产目标是通过改造和改进现有设施来实现的，而不是建造新设施。现有工厂的改进使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从 1978 年的 7380 万吨煤炭减少到 1983 年的 6910 万吨，产量增加了 26%。然而，中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外部援助才能实现钢铁工业的全面现代化. 他们寻求

硬件、外国技术转让以及管理和规划方面的帮助。

1987年中国是世界第五大钢铁生产国，但在生产方式和质量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大部分钢铁产能是在带有碱性氧气炉、电炉和侧吹转炉的平炉中进行的。许多用于炼钢的铁和炼焦煤质量低劣。1985 年，全国约 25% 的煤炭用于钢铁生产。1985 年，中国认为过度的基本建设加剧了现有钢材短缺，进口填补了国内需求的 25%。

1985年，中国有13家工厂有能力每年生产至少100万吨钢。这些工厂约占总产量的 65%，主要建于 1950 年代。鞍山工厂是历史最悠久、产量最高的工厂，年产量为 700 万吨。其次是武汉。它是在 1950 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建造的。中国于 1978 年开始建设其第一个综合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厂，但竣工日期从 1982 年移至 1985 年，最后移至 1988 年。

除了较大的工厂外，1985 年约有 800 家较小的工厂分散在全国各地。它们的范围从每年生产 500,000 吨的特种工厂到地方管辖或其他部委下的非常小的工厂。许多较小的钢厂都是大跃进的遗产，当时地方当局匆忙建立了自己的炼钢设施。在 1980 年代中期，政府希望逐步淘汰这些效率低下的工厂，以支持更大、生产力更高的工厂。

1980年代后期，钢铁产量显然不足以满足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七五”期间，进口预计平均占国内产量的 41%。薄卷板，用于制造车辆、洗衣机和冰箱等物品，供不应求。1984 年，中国不得不进口大约一半的钢卷板和大

约 80% 的钢板。管材的生产也不足，大约 50% 的管材必须进口。该国最擅长生产钢筋，但 1984 年仍需进口约 180 万吨棒材。 1985 年中国进口了创纪录的 1500 万吨钢材，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日本。

机械制造

新中国成立以来，机械工业一直是重中之重。该行业从 1949 年之前的几个小型装配和维修设施扩展到一个大型、分布广泛的机械制造部门，生产多种类型的现代设备。但是，截至1987年，总体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在 19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打算通过大规模进口来实现机械工业的现代化，但后来决定将进口限制在关键领域的成本会更低。机械工业部计划要求1990年全行业60%左右的产品达到工业发达国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期间的技术水平。按照国际标准制造的产品在资金、材料和能源分配方面享有优先权。

1987年机械工业分布全国。几乎所有的县和镇都有一个或多个机械厂。主要机械中心有上海、天津、沉阳、北京、哈尔滨、长春、太原、洛阳、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

机械行业被国务院选定为管理改革的领头羊。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机械的质量将决定所有经济领域现代化的成败。该行业的极端条块分割（毛派对自力更生的痴迷的遗留问题）表明部门之间或区域内缺乏沟通。也缺乏熟练的管理人员。

机床

1986年，大约有120家大企业生产了中国机床的大部分。许多大型工厂在东部、北部和东北部，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沉阳、哈尔滨和天津。在 80 年代初和中期，与外国制造商达成的多项协议旨在帮助中国升级其机床行业。上海市政府还请求世界银行协助制定上海机床工业综合现代化计划并为其提供资金。

总体而言，机床行业是基于 1960 年代的技术。许多工具的使用寿命只有五到七年，而在工业化国家则为十二到十五年。由于过时的设计、低质量的采购组件、不合格的制造设施以及缺乏生产管理专业知识，这些工具通常不可靠且不适合精密工作。

电力设备

到 1970 年代初，哈尔滨、上海、北京和德阳的主要发电机生产中心，建造了高达 300 兆瓦的水力和热力发电机。还有许多中小型发电厂生产 3.2 至 80 兆瓦范围的发电机。到1986年，制造了容量6000～30万千瓦的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12000-50000千瓦背压抽汽发电机组、1000-3000千瓦地热设施；和水电设备，包括1800万千瓦容量的发电机设备。发电设备和输电技术存在不足，直流输电特别是变流技术存在较大问题。中国在高压安培变压器和断路器的设计和生产方面仍然缺乏经验。

运输设备

1949 年后大幅增长的汽车工业没有跟上现代化的需求。在 1980 年代初

期，需求仍然很低。需求激增导致生产了 400,000 辆汽车，到 1985 年初又进口了 300,000 辆汽车。 1985 年下半年，严厉的行政措施限制了大部分进口。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 1984 年和 1985 年高生产和进口水平造成的大量过剩。尽管 1986 年的生产水平被认为是短期放缓，但"七五"计划（1986-90）的目标很低。

"七五"期间中国对铁路行业的投资高于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比"六五"期间（1981-85 年）增长了 80%。国家拨款 100 亿元用于制造和购买机车，其余用于维修和更新陈旧设备。"七五"期间，铁道部制定了5000台机车的生产目标，其中电力机车800多台，内燃机车2000多台。该部还计划生产 110,000 辆货车和 10,000 辆乘用车。尽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国内生产目标，中国不得不严重依赖进口技术来实现铁路现代化。

从1961年到1987年，中国海上舰队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此期间，商船吨位平均每年增加 13.6%。1982年至1987年，中国造船厂共生产散货船、货轮、油轮、集装箱船、部分集装箱船、客货船等船舶55艘，总载重量超过7000亿吨。1985年底，中国大约17%的商船队是在国内建造的。

在 195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开发自己的飞机。中国在 1981 年至 1985 年间制造了 135架民用飞机，并计划在"七五"期间再制造数百架。民用飞机和飞机发动机主要在位于上海、西安、哈尔滨和沈阳的大型工厂生产。中型工厂生产必要的测试设备、组件、航空电子设备和配件。中国希望最终在所有飞机生产中实现自力更生，但它在 1987 年仍然进口飞机。

冶金设备

冶金工业中的许多设备都是基于1930 年代的日本设计和1950 年代的苏联设计。鞍山是中国最大的工厂之一，三分之二的主要设备是在 1930 年代和 1950 年代建造的。总的来说，主要冶金设备的技术比仪表和控制系统更先进。质量控制必不可少的测量和监测仪器供不应求。

一般使用的炼铁和炼钢设备大部分是国产的。这包括基于中国对旧苏联设计的改进的高炉、选矿厂、平炉、侧吹转炉、电炉和各种炼钢设备。由于中国没有吸收国内生产所需的技术，为了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各种设备都是进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行业只进口主要设备，而忽略了必要的控制仪器和辅助技术。

电子

1987年中国电子工业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关键问题是无法将技术从研究转移到生产以及继续依赖手工劳动。此外，急于达到西方标准有时会适得其反。例如，中国并没有在国外购买微处理器等复杂的产品，而是选择自行开发，花费巨大。

1985年电子工业由约2400家企业、100家研究机构、4所高等院校和20所中等职业学校组成。该行业从业人员约136万人，其中技术人员13万人。除了工业生产的约2000种电子元件，它还制造了400多种电子机械，包括电子计算机、电视广播发射机和接收机、雷达和通信设备。1980 年代，中国在电

视、收音机和录音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化学品

中国的化学工业从 1949 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基础发展起来，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大幅增长，并在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得到重点发展。1984 年化学产品主要服务于农业和轻工业。化学制造的三个主要领域是化肥、基础化学品和有机合成产品。化学肥料被一致认为是关键农业产出增加。从 1978 年到 1984 年，许多化学产品的产量稳步上升，有时甚至急剧上升。

除了纯碱、合成橡胶等少数商品外，包括化肥在内的绝大多数化工产品都来自小工厂。与大型现代化工厂相比，小型工厂的建造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而且其设计目的是使用低质量的当地资源，例如少量煤炭或天然气。他们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过度劳累的交通系统的需求。

更大更现代化的化肥厂分布在每个直辖市、省和自治区。1970 年代初期，中国与外国公司就建设 13 座大型氮肥厂进行谈判。到 1980 年，所有 13 家工厂都已完工，其中 10 家已全面投入运营。从 1980 年到 1984 年，许多效率低下的化肥厂被关闭，到 1984 年，更多的工厂正在建造，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为了利用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新工厂正在靠近煤炭、磷酸盐和钾矿床的地区建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化肥缺乏磷、钾，氮含量过高。为了增加磷酸盐

和钾的供应，中国在“六五”期间严重依赖进口。

1949年后基础化工生产快速增长。1983年硫酸产量约870万吨，主要生产中心在南京和鲁大，并有许多化肥厂的大型工厂。1984年纯碱产量为1.88万吨，产能集中位于靠近主要来源盐的地区，如大型沿海城市，四川，青海和内蒙古。烧碱的生产分散在大连、天津、上海、太原、沈阳和重庆的大型设施中。1984年烧碱产量为222万吨。硝酸和盐酸产于东北、上海、天津。

化学工业的有机合成分支制造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染料、药物和油漆。塑料、合成橡胶和尼龙等合成纤维在现代化进程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被用于生产鞋类和服装等基本消费品。1979年至1983年，塑料产量从79.3万吨增长到110万吨，化学纤维从32.63万吨增长到54万吨。主要有机合成中心包括上海、吉林、北京、天津、太原、锦西，和广州。该行业在1970 年代接收了大量外国机械。

建筑材料

与化肥工业一样，水泥生产的特点是小型工厂和大型现代化设施同步发展。1958 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小型水泥厂。到 1970 年代中期，中国 80% 的县都有这种工厂；1984 年，它们占全国水泥产量的主要份额。这些本地工厂的规模和技术差异很大。1983年中国水泥产量约1.08亿吨，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1984 年产量增加 14%，达到 1.23 亿吨，除西藏和宁夏外 自治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年产50万吨水泥的工厂。

中国建材工业发展迅速，1984年产值达287亿元，1984年生产产品500多种，从业人员约380万人。这些材料用于冶金、机械、电子、航空、国防工业和土木工程项目。建筑材料的主要生产中心是北京、武汉和哈尔滨。

到 1980 年代中期，中国是世界上平板玻璃（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的主要生产国之一。1984年产量达到4830万箱，20个城市玻璃厂每年生产50万箱。1985年，洛阳、秦皇岛、南宁三座年产120万标准箱的大型玻璃厂建成。

纸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生产性森林严重短缺，加上技术落后，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造成纸浆和纸短缺。1981 年至 1986 年，纸张产量的年增长率为 7.3%。然而，在 1986 年，只有 20% 的纸浆是用木头制成的；其余来自草纤维。

1986 年，中国有 1500 多家造纸厂，生产约 4540 万吨机制纸和 500 多种不同类型的机制纸。每年进口约 100 万吨纸浆和纸张。1986 年，中国将重点放在污染控制、增加产品种类、减少纤维和化学成分的使用以及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作为改善生产的措施。然而，中国也寻求外国援助以实现这些目标。

纺织品

棉纺纱和织布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大的国内工业。在经历了 1949 年至 1978 年可观但不稳定的表现之后，随着1979 年农业责任制的引入，纺织品生产显着增加。到 1979 年纺织品供应有所改善，布料配给制度（自 1949 年起生效）结束，工业开始蓬勃发展。

从1979年到1984年，纺织工业的产值每年增长约13%。1984年，中国有棉毛纺、丝绸、麻、化纤、印染、针织、纺织机械等企业约1.2万家。1984年纺织品生产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4%。1984年纺织品出口（不含丝绸制品）41.5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21.7%，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8.7%。到 1986 年，纺织品已经取代石油成为最大的外汇来源。

传统上，沿海地区拥有最现代化的纺织设备和设施。上海市和江苏省是纺织业的神经中枢，1983年占纺织总产值的31.6%。其他主要纺织产区有山东、辽宁、湖北、浙江和河北等省。

1949 年之后，棉纺织生产进行了重组和扩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海、青岛、天津、广州等港口城市已建成的纺纱中心周边地区棉花种植有所增加。在内陆棉花产区附近开设了新的纺纱和织布设施。1983 年中国生产了 460 万吨棉花，是 1978 年的两倍多。

1983 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国，生产了大约 10 亿米的丝绸纺织品。上海市和江浙一带是主要的丝绸中心。这一年中国还生产了约

10万吨针织 羊毛140万米呢绒布匹，330万吨纱，并541000吨化学纤维。

食品加工

1949 年后，中国的食品加工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基本的改进是在农村生产单位几乎普遍建立了机械化谷物碾磨设施。食品加工成成品和包装产品也得到广泛发展。

尽管越来越多的食品被包装出口，但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国的食品加工能力相对较低。为当地消费生产了种类繁多的烘焙食品和糖果，大多数中国人继续抵制加工食品。然而，由于加工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优势，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加工食品的需求。

饮料行业是非常大的，广泛的。所有地区都有啤酒厂和酿酒厂，生产啤酒和各种国内外酒精饮料。中国成功出口了多个品种的啤酒和白酒，国内软饮料生产十分普遍。

其他消费品

建国前三十年，由于重工业发展，许多基本消费品稀缺。然而，1979 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导致消费品爆炸式增长。例如，电视产量从 1978 年的约 50 万台增加到 1984 年的超过 1000 万台。同期，自行车产量增加了约三倍半，电风扇的产量增加了十二倍，收音机增加了一倍。1985年上半年，与1984年同期相比，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的产量大幅增加。冰

箱、洗衣机和电视包括进口部件。1985 年，经济规划者决定限制冰箱的生产，因为他们估计 1990 年供应将超过需求 590 万台。次年，由于产量过多和强调质量，当局限制了电视的生产。

建筑

房屋建设

现代住宅在当代中国长期短缺。1949 年的住房条件原始而拥挤，此后人口的大量增长给该国的建筑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根据 1985 年的估计，到 2000 年，每个城市家庭将需要增加 4600 万套住房，或约 24 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充足的住房被定义为人均居住面积平均为 8 平方米。然而，截至1984年，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8平方米。住房专家建议改革住房建设和分配制度，分两个阶段实现八平方米目标：1990 年 6 平方米，1990 年至 2000 年增加 2 平方米。企业正在增加对工人住房的投资。1985年，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建设的住房建筑面积为1.3亿平方米。

基本建设

自 1950 年代以来，基本建设行业一直受到过度增长和条块分割的困扰。经常出现成本超支和施工延误，资源负担过重。项目主管经常无法准确预测对运输、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的需求。大量小工厂建成，国家层面产能过剩，但在工厂层面规模经济不足。部委和省之间的合作不畅导致了不必要的重复。由于每个地区在建设的各个阶段都力求自给自足，专业化受到了影响。建国初期，建筑业的过度投资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1979 年和 1980 年的财政改革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大比例的来自各自地区企业的收入，从而加剧了过度投资。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将留存收益用于投资

所在地区的工厂。这些投资不属于国民经济计划，干扰了中央政府对资本投资的控制。

1981年经济进入“调整期”，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大幅减少。管理解决方案证明无效，后来的改革集中在经济的措施，如通过税收阻碍投资。发放计息贷款而非赠款也是为了控制建筑业的增长。尽管进行了改革，但基本建设在 1986 年继续高速发展。新的投资大部分是计划外的，来自贷款或企业内部资金。

“七五”期间，计划实施大中型项目925个。政府计划安排固定资产1.3万亿元，比“六五”计划增加70%。40% 的资金用于新项目，其余 60% 用于现有设施的翻新或扩建。涉及的项目包括发电站、煤矿、铁路、港口、机场和原材料生产中心。

采矿业

煤

20 世纪上半叶，煤炭开采比大多数工业更发达。这些主要矿山为抚顺，大同，和开滦的煤炭产量得以大量用于铁路，海运和其他行业。扩大煤炭开采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国家在现代采矿设备和大型机械化矿山的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长壁开采技术得到广泛采用，1957年产量达到1.3亿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大型矿山和现代设备的投资滞后，产量落后于行业增长。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产量增长来自当地的小型矿山。1976 年 7 月唐山地震后，生产出现暂时但严重的倒退，严重破坏了中国最重要的煤炭中心开滦煤矿。开滦的生产用了两年时间才恢复到1975年的水平。

1987 年，煤炭是该国最重要的能源来源，满足了能源总需求的70% 以上。1984年的生产水平为7.89亿吨。三分之二以上的沉积物是沥青，其余大部分是无烟煤。大约 80% 的已知煤炭矿床位于北部和西北部，但大多数煤矿位于黑龙江和华东地区，因为它们靠近需求最高的地区。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供应，但在高需求地区仍然存在短缺，主要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由于无法运输国内煤炭，中国人于 1985 年将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到华南。该行业也缺乏现代设备和技术专长。与欧洲国家 95% 的机械化水平相比，只有 50% 的隧道开挖、开采、装载和运输活动实现了机械化。

铁矿石

1980年，中国拥有铁矿石储量共计约44十亿吨。然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因为国内运输和生产问题而不得不依靠进口。规模较大的铁矿床广泛分布在中国约三分之二的省区。辽宁省数量最多，其次是四川、河北、山西、安徽、湖北、甘肃、山东、云南和内蒙古。

在80年代中期，矿山缺乏现代化的挖掘，运输和矿石-选矿设备。大多数开

采的矿石含铁量低，在用于高炉之前需要大量精炼或选矿。大多数矿山缺乏将低品位铁矿石转化为浓缩球团矿的现代化工厂。

能源工业

油

1949 年之前，中国的大部分石油都是进口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在勘探和油井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1959年在中国东北松花江-辽河盆地发现了巨大的储量。1960年黑龙江大庆油田生产约230万吨石油一直到1963年，并继续通过上世纪70年代引领行业。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等重大发现，使中国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并在 1960 年代中期消除几乎所有进口。1973年，尽管国内对石油产品的需求稳步增长，但产量足以向日本出口100万吨原油。1974 年出口量增加到 660 万吨，1978 年达到 1350 万吨。1985 年原油出口量约为 2000 万吨，约占总产量的 16%。1985 年大部分出口到日本，但政府也在现货市场上释放了越来越多的数量，并将一些出口到新加坡进行炼油。1986年虽然政府暂时放弃扩大石油出口基地的努力，但仍生产原油1.31亿吨，比1985年增加580万吨。

石油储量大且分布广泛。一般来说，开发集中在从主要工业和人口中心容易获得的矿床上。塔里木、准噶尔和柴达木盆地等偏远地区的矿床大部分仍未勘探。主要矿床的石油质量差异很大。少数矿床，如胜利油田，生产主要用作燃料的低质量石油。中国北方和东北大油田出产的石油大多为重质、硫含量低、石蜡含量非常高的石油，开采提炼难度大、成本高。

近海勘探和钻探最早是在 1970 年代初期进行的，随着十年的进展，它变得更加广泛和先进。中外石油专家认为，海上储量丰富，可媲美陆上储量。离岸业务严重依赖外国技术。1982年33家外国石油公司投标海上钻井权；二十七家最终签订了合同。到 1980 年代中期，海上勘探结果令人失望，实际生产石油的油井屈指可数，中国开始重视陆上开发。为了继续进行海上勘探，中国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以协助外国石油公司勘探、开发、开采和销售中国的石油。

勘探及钻探集中在中国南海地区，北部湾和珠江口盆地的南部，渤海湾北部。中国与几个邻国之间的争端使几个有前景的海上地区的石油开发前景复杂化。

天然气

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次要的能源。产量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迅速增长。到 1985 年，产量约为 120 亿立方米——约占中国一次能源供应量的3%。次年，产量增加130亿立方米。四川省拥有中国约一半的天然气储量和年产量。剩余天然气大部分产于大庆和胜利东北油田。其他产气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沿海平原；在华北复杂的河北省份；和辽宁辽河油田 省。

中国天然气储量的确切规模尚不清楚。估计数从 1290 亿到 24.4 万亿立方米不等。中国希望在河南和山东两省交界的 5,180 平方公里的中原盆地取得重大发现。发现了主要的海上储量。最大的未开发天然气潜力据信在青海和新疆。

1950 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初级的炼油工业。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该基地进行了现代化和扩建，部分配备了欧洲和日本设备。1986 年，中国炼油厂的日加工能力约为 210 万桶。到1990年，中国计划达到每天250万桶。

1970年代，中国修建了输油管道，改善了装卸油轮的港口。大庆至秦皇岛港的第一条石油管道铺设；全长1150公里，1974年投入运营。次年，管道延伸至北京；第二条线路将大庆连接到旅大港，并分支到朝鲜。1978年，山东临沂至南京的管道建成，将胜利油田、华北油田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港口和炼油厂连接起来。1986年规划建设105公里长的管道连接经海南岛与中国大陆相连的近海油井。

电力和核电

领导层决定建设火力发电站以满足国家的电力需求，因为这种发电厂相对便宜，建设周期仅需三到六年。1985 年，大约 68% 的发电量来自火力发电，主要是燃煤发电，观察家估计到 1990 年其份额将增加到 72%。燃油电厂的使用在 1970 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到 1980 年代中期，大多数设施已改用煤炭。只有少数热电厂以天然气为燃料。水电仅占发电量的 30% 左右。观察人士预计，“七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强调火电的发展，而不是水电，因为需要迅速扩大电力供应以跟上工业增长的步伐。然而，从长远来看，水电将逐渐优先于火电。

1986 年中国的总发电量为 76,000 兆瓦：52,000 来自火力发电厂，24,000 来自水力发电厂。中国计划建设 100 至 300 兆瓦的大型发电机组，以增加火电容量。新的、更大的发电机将比容量仅为 50 兆瓦或更低的发电机效率更高。有了更大的发电机组，到 1990 年，中国只需增加 40% 的煤炭消耗量即可实现 54% 的发电量增长。 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电网网络的增加，可以在靠近煤矿的地方建设发电厂，然后运行通往城市的电力线。这种方法将消除煤炭运输到较小的城市工厂的成本高昂和困难，而这些工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问题。

从 1949 年到 1986 年，中国至少建成了 25 座大型、130 座中型和约 9 万座小型水电站。据水利电力部统计，1983年发电量3514亿千瓦时，其中水电发电860亿千瓦时。建设火力发电厂被设计为缓解中国电力短缺的快速补救措施，而开发水电资源被认为是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水电站建设的主要区域是黄河上游、长江上中游支流和干流，以及上游地区的红水河。珠江流域。在美国、加拿大、科威特、奥地利、挪威、法国和日本的协助下，新水电站的建设是一个昂贵而漫长的过程。

为了增加其火力和水力发电能力，中国正在发展核能能力。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核工业开始于苏联的援助。直到 1970 年代初，它主要用于军事应用。然而，据报道，在 1972 年 8 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开始研制满足民用能源需求的反应堆。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核电发展的支持显著上升。签订了进口两座法国工厂的合同，但国内经济紧缩和在美国的三哩岛事件，导致突然停止核计划。经过三年的“调研论证”，领导层决定继续推进核电发展。到 1990 年，中国打算将 60% 至 70% 的核工业投入民用部门。到2000年，中国计划核电装机容量达到10000兆瓦，约占全国

总装机容量的5%。

1989年在浙江秦山建成国产300兆瓦核电站。虽然工厂的大部分设备是国产的，但一些关键部件是进口的。“七五”规划要求在秦山增建两座600兆瓦反应堆。在广东大亚湾建造了另一座拥有两座 900 兆瓦反应堆的电厂。大亚湾核电站是与香港合资企业，具有相当的外国贷款和专业知识。

通讯业

1985 年，交通、邮政系统和电信从业人员超过 1200 万人。长途运输主要通过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进行。政府运营的铁路网是货运系统的支柱，铁路线几乎延伸到中国的所有地区。然而，在大多数地区，铁路系统的馈线太少，整合不充分。大部分铁路系统在 1980 年代得到了改进；许多经常使用的路段改建为双轨或升级，并建造了几条关键的新线路以缓解拥堵地区。大多数机车1980 年代初期使用的是已经过时的蒸汽机。然而，到 1987 年，几个铁路区已改用更现代、更高效的内燃机车或电力机车，并且现代发动机的国内生产得到了进口车型的补充。在其限制范围内，铁路运作相当有效，并大量使用铁路网络。1986年铁路货运量8745亿吨公里，占全国货运总量的45%，比1985年增长7.8%。客运量近11亿人次，占全国客运总量的20%。尽管表现相当不错，但经济在城市和地区之间移动货物的能力受到系统缺陷的严重限制，

内陆航运的增长速度超过铁路系统，1986 年运输了 8278 亿吨公里的货物，几乎与铁路一样多。主要内河航道是长江及其支流，是连接华中和西南工农业区与上海大港口和工业中心的大动脉。水路的改进使更大、更快

的现代船只能够使用它们，延长它们的通航长度，并减少它们每年关闭的时间。除了现代船只外，湖泊、河流和运河还由数以千计的各种大小的机动和非机动传统方式提供服务。

各地的道路网络很广泛，但许多道路狭窄且未铺砌，而且都挤满了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拖拉机和动物牵引的手推车、自行车、行人和当地农民晒干的谷物。由于私人和单位卡车运输量的迅速增加，公路货运是除海运外运输系统中增长最快的主要部分。1986年公路货运总量为2596亿吨公里，比1985年增长47%，其中80%为非国家公路部门管理的车辆。1986 年，公共汽车为 43 亿乘客提供了相对短途旅行。

民航提供了与该国偏远地区和外国的重要联系。然而，它只承载了总货运和客运量的一小部分。

服务业

服务业是改革计划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目标。私人和集体企业的合法化很快导致修补匠、鞋匠、裁缝、理发师和小型食品服务站的出现，特别是在自由市场中。1978年至1985年，从事服务业、零售业和餐饮业的人数从610万人增加到2500万人以上，其中集体或个体企业2100万人。1986 年，政府通过向私人或团体出租大量小型国有服务机构，包括餐馆、修理店和理发店，进一步刺激了该部门的发展。

其他雇用大量劳动力的服务部门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以及政府管

理。这些部门对国民经济很重要，雇佣了超过 2500 万人。

中国生产了几乎所有自己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但按照西方标准，大多数医院的设备都很差。更严重的短缺是医生和其他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数量相对较少。1985 年约有 430 万人在卫生保健机构工作。其中，140 万是医生——包括 336,000 名传统（而非现代）医学医生，637,000 名护士，140 万名助产士、化验员、药剂师和其他技术人员。1978 年至 1985 年间，现代医学医生的数量增长了 35% 以上，与西方的重新接触为接受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培训提供了机会。

只有 10% 多一点的中国人得到了免费医疗。为政府工作人员、军人、教师、大学生和国有企业职工提供免费照顾。其受扶养家属的部分医疗费用由单位承担。大多数农村乡镇实行自愿合作医疗。

1985年教育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270万人，其中高等学校教职工87.1万人，比1978年增长68%，体现了19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1985年有近800万人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

农村工业

1980年至1986年，农村乡镇企业数量由142万家增加到1220万家以上。乡镇企业有五种类型：乡镇企业、村企业、合作企业、多户联营企业和家庭企业。1986年乡镇企业总资产1340亿元。

1985年总产值为2728亿元，占国民总产值的17%，占农业总产值的44%。农村企业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因农业责任制和公社制度瓦解而转移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这种吸收消除了数百万失业工人的国家支持，极大地帮助了国家。1986 年农村企业雇佣了大约 7600 万人，占中国劳动力总数的 20%。

乡镇企业对经济总量增长贡献显着。1985 年，估计 28% 的煤炭、53% 的建筑材料、30% 的纸张、20% 的纺织品、33% 的服装和 75% 的皮革制品来自农村企业。企业在出口市场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拥有8000家外向型工厂，其中中外合资企业870家。

尽管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并取得成功，但继续扩张在 1987 年遇到了障碍。出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考虑，政府试图限制生产。此外，财务管理不善、市场分析不力、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设备不合格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不断干预阻碍了生产和扩张。在浙江等部分地区，着力解决农村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允许企业保留 70% 的利润，其余 30%上缴县政府，其中 70% 用于投资现有企业或用于新建企业。

国防工业

中国国防工业综合体生产的武器和装备主要基于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苏联设计。由于缺乏外汇、短期威胁认知度低以及对其他三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和科技）的重视，中国决定逐步发展国防工业。它将主要依靠国内生产，仅在急需的领域进口外国技术。

国防工业生产范围广泛的军用物资。大量的小型武器和坦克被生产出来，许多出口到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苏联飞机进行了升级，并正在开发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洲际弹道导弹以及配备红外夜视装置和激光测距仪的坦克。

由于国防在 1970 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中被列为最低优先事项，中国庞大的国防部门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民用生产中。例如，在 1980 年代中期，大约三分之一的军械工业产出分配给民用生产，预计到 1990 年该份额将上升到三分之二。 国防部门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从家具、望远镜、照相机到重型机械。

尽管军队对工业部门做出了贡献，但 1987 年中国工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许多工业技术已经严重过时；严重的能源短缺、交通瓶颈和官僚干预也阻碍了现代化。尽管许多行业的产出很高，但质量往往很差。然而，中国的工业部门自 1949 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 1950 年代以来，大多数产品的产量急剧增加，中国现在生产计算机、卫星和其他高科技产品。1970 年代后期推出的改革计划带来了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规划时代并为更加平衡和持续的工业增长奠定基础。到 1987 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需要提高工业效率和生产力，并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agriculture_in_China

中国农业史

4000 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民国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在耕种；几个世纪前建造的灌溉和排水系统以及集约化耕作方法已经产生了相对较高的产量。但可用于支持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原始处女地很少。然而，在大跃进（1958-60 年）导致产量下降之后，1980 年代实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产量，并承诺在未来利用现有耕地实现更高的产量。

1949年之前的历史

明朝，公元 1368 年至 1644 年

随着福建、广州和广西省新土地的落户、新作物的引进和灌溉系统的改善，人口翻了一番。中国东南部的山区是在明清时期由过度拥挤地区的移民开发的。他们专注于新作物（如玉米），以及国外市场对某些作物（如茶叶）的需求快速增长。

清朝 1644-1911 年

在 1949 年以前，90% 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从贫穷的佃农到富有的地主。许多人是非常贫穷的佃户或临时工，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在南部省份，拥有自己的土地，情况更好，更安全。控制中国的儒家称赞农民是为国家提供食物的诚实人。饥荒和洪水是严重的风险。为了防止地方叛乱，清政府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以防止饥荒和其他灾害，如流行病。它是围绕储存谷物的粮仓系统建造的。它通过分发免费或低成本的粮食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饥荒。然而，该系统在1850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基本上被摧毁，使这一庞大人口面临洪水、干旱、瘟疫和其他饥荒的风险。在甘薯中引入了一种主要的新食品供应，大大减少了过度饥饿并减少了反抗的频率。

在 1860 年代镇压叛乱后，中国政府致力于缓解困境、稳定社会和改善农业。它减少了税收并需要徭役劳动力、开垦土地并促进灌溉。1900年后，政府成立农村协会，为农民出版报纸和教科书，开办农业学校，举办地方培训班，以及农业展览。继续实施水资源保护和森林站项目的计划。农业改革是清政府在最后一刻大力改革教育、军队和地方行政管理的一个方面。

自 1949 年以来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尝试了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试验来促进农业生产。首先，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并将土地交给了耕种的人。接下来，农户逐渐被组织成合作社、集体，最后是人民公社。在与公

社相处了 25 多年之后，官员们废除了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变得过于官僚和僵化，无法应对农业生产的灵活需求。此外，农业生产激励措施在公社体制下沉沦。1978 年，中国领导人开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农业改革计划。乡镇和村庄被组织起来，新的激励措施被纳入将农民与经济合作社和企业联系起来的合同关系。

自 1949 年革命以来，中国将大部分投资和行政精力投入到工业部门。一般来说，只有当领导人意识到农业开始制约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时，农业部门才会受到特别关注。农业产量基本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但增长速度不足以提高生活水平。粮食、纤维、食用油、糖、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制品人均消费量保持低位。农业部门产生的商品价值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如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的产出快。1949 年，该国大约一半的产出来自农业部门。这个比率到 1955 年下降到 41%，到 1965 年下降到 31%，1975 年又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至 25%。但是 1980 年代初期开始的农业改革使农业在 1985 年占 GDP 的比重上升到 33%。与此同时，全国6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因此，在 1980 年代后期，中国准备通过结合久经考验的耕作方法和现代农业技术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需求。然而，该国的规模和多样性——在地理和人口方面——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提出了独特的挑战。

80年代农业经济改革

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 1985 年，大约

63%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全国将近 63%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现代技术在广阔的农田中传播缓慢，现代供应不足，导致农业产量增长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生产增长。与工业中的普通工人相比，平均农夫有少得多的机械和电力，可以使用的其他现代生产辅助工具更少。在责任制下，农户和集体组织购买了大量新机械，特别是小型拖拉机和卡车。1979 年至 1985 年间，每名农民的农业机械功率增加了近 30%，但仍低于每人 1 马力（0.75 千瓦）。

1980年代初以前，大部分农业部门是按照三级公社制度组织的。有5万多个人民公社，其中每个公社大多数约有3万名成员。每个公社由大约十六个生产大队组成，每个生产大队由大约七个生产队组成。生产队是农业的基本集体单位。它们对应于小村庄，通常包括大约 30 户家庭和 100 到 250 名成员。公社、大队和队拥有所有主要的农村生产资产，并提供农村几乎所有的行政、社会和商业服务。农场家庭收入的最大部分是团队净收入的份额，根据每个成员为集体努力做出的工作量分配给成员。农场家庭也在小型私人土地上工作，可以自由销售或消费他们的产品。

到1984年底，大约98%的老生产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除249个公社外，其他所有公社都被解散，其政府职能转交给了91,000个乡镇政府。94万个村委会取代了生产队组织。在责任制下，农户不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集体生产中，而是普遍与村镇签订合同，在特定的土地上种植特定的作物。收获后，必须以预定价格将一定数量的作物出售给该单位，超出该数量的任何产出都是家庭的财产，要么在市场上出售，要么被消费。除了合同规定的交付给集体的数量外，农民还可以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

市场活动在 1980 年代的农村经济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农民在农村或城市自由市场上出售的产品越来越多，并购买了许多以前由生产队或公社提供的投入品。在市场环境中蓬勃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新机构是“专业户”。专业家庭以企业家的经典模式经营，购买或租用设备来生产当地供不应求的商品或服务。一些最常见的专业是卡车运输、养鸡、养猪和技术农业服务，例如灌溉和害虫控制。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许多专业家庭变得相当富有。

新的经济环境和农村居民流动限制的放宽，为农村的营利性企业提供了大量机会。被称为“农村经济联盟”的城镇、村庄和家庭团体建立了小工厂、加工业务、施工队、餐饮服务和其他类型的非农业企业。许多这些组织与城市企业有联系，这些企业发现这些农村单位的服务比正式的城市单位的服务更便宜、更有效。

这些非农企业在农村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使许多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离开土地”成为可能，显着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增加农村收入。1986年，农村非农企业雇用了农村劳动力的21%，生产的产值首次超过农村总产值的一半。

尽管新农村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家庭农业，但集体组织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用地仍归乡镇政府所有，由乡镇政府决定农民承包种植的农作物和合同的财务条款。许多乡、镇、村政府还从事重大创业，兴办工厂、加工厂、砖厂等大型企业。最后，公共工程的维护和运营，如灌溉系统、发电厂、学校和诊所，通常仍被视为集体管理的责任。

全国 4% 的农田由国营农场耕种，1985 年雇用了 490 万人。国营农场由政府拥有和经营，与工业企业的经营方式大致相同。管理是董事的责任，工人获得固定工资，尽管责任制的一些要素是在 1980 年代中期引入的。国营农场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以西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东南部广东、福建和江西三省为首的边疆或边远地区分布最多。

资源

进一步的农业扩张相对困难，因为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土地未被利用，而且尽管进行了精耕细作，但一些边缘土地的产量很低。在该国人口稀少的地区，特别是在东北部，存在一些扩张的可能性，但那里的生长季节很短，而且开垦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

中国本土被秦岭山脉划分为高度不同的南北农业区。华南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生长季节长。水稻一直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田通常可以用河流或其他来源的水灌溉。虽然大部分土壤是酸性红粘土，但大量使用化肥（一度是有机的，但到 1980 年代中期还包括很大比例的化学养分）支持高收益。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通常会种植两种甚至三种作物。除水稻外，还种植粮食作物，最常见于丘陵地区或冬季。这些包括土豆和冬小麦。1980 年代中期全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普遍分布在四川盆地、长江下游和广东、福建等省，以水稻等作物复种为典型模式。那里还生产棉花、茶叶和经济作物。

小麦传统上是华北地区的主要作物，这个地区比华南地区干燥得多。冬小麦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近90%。春小麦主要种植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部省份。其他重要的粮食作物包括玉米、高粱和小米。这些通常是旱地作物。自 1960 年代后期以来，灌溉已大大扩大，但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与南方相比，北方的土壤普遍较好；然而，由于生长季节较短，气候较冷、较干燥，每公顷耕地的产量往往较低，灌溉面积也较不广泛。北方的劳动力不如南方丰富，但种植模式往往需要较少的劳动力，机械化（尤其是耕作）更为先进。

中国北方平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种植区，跨省延伸。冬小麦和玉米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还种植棉花，山东生产花生。华北平原虽然肥沃，但历来水旱灾害频发，但节水措施改善了这一问题。这片平原以西的山区生长着冬小麦，但气候更加恶劣，自然灾害的危险性更大。东北平原肥沃的土壤已被用来种植玉米、春小麦，甚至水稻。东北种植优质大豆，远销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内蒙古虽然出产一些春小麦和其他粮食，但最出名的是牧区。

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广阔而普遍荒凉的大部分地区不适合种植。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一样，也是以牧区着称。在西南部的西藏自治区，大部分耕地得到了灌溉，培育了适合该高海拔地区气候的小麦、水稻、大麦等特殊品系。

198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约3.7亿人。劳动力素质在过去三年中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引入了强调基础教育的农村学校。尽管如此，1987 年农村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很少有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住在乡镇。缺乏教育继续阻碍先进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传播。耕地的稀缺和人力的充裕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发展。而且，虽然中国的农业劳动密集度低于一些邻国，但它的特点是精心照料东亚几个世纪以来采用的土地和其他技术。

在 80 年代，农村劳动力也受雇于农村基本建设项目和小型工业。在冬季，大量农村人口从事灌溉或平整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工作。有农村工业厂房的地方，通常只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许多农民还从事手工业等副业。政府严格限制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移民。

到 1980 年代，中国的农业资源有所改善，但重要的障碍仍然存在。该国的农业资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土地改造积累起来的。几个世纪以来，田地被平整和巩固，并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自 1950 年代以来，机械农业设备的生产一直是主要产业。但在 1980 年代，许多观察家仍然注意到缺乏将农作物运往市场并将种子、燃料和肥料运送给用户的运输设施。除了资本，尽管文化大革命（1966-76）造成了破坏，但中国仍有大量熟练劳动力和大量有关种子品种和肥料使用的技术信息。

农业政策

农业政策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50 年代，农业集体化，以大跃进结束（1958-60）；从 1961 年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这段时期，农业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现代投入的供应；以及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时期，其特点

是更加依赖市场、价格和激励措施来促进生产和使产出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投入是指生产的组成部分，如土地、劳动力、种子、肥料、机械、工具和灌溉用水。）

1950年代

1950 年代，新人民共和国政府齐心协力，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土地。尽管许多农民拥有他们在 1949 年之前耕种的部分或全部小农田，但租赁很普遍，尤其是在华南地区。甚至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CCP）在其控制下的地区实施土地改革，随后地主和富农成为党的攻击目标。贯穿到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的目标是将地主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

土改后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互助小组。互助制度起初简单，只涉及临时分工和部分资金；个体家庭仍然是所有权和生产的基本单位。1954年，互助队越来越迅速地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与互助队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具、牲畜和劳动力是永久共享的。合作社成员保留其土地的所有权，但通过将他们的地块与公共土地中其他成员的地块一起抵押来获得合作社的份额。到1956年，互助队向农业合作社的转变几乎完成。而且到了年底，绝大多数合作社已经进入了更高的集体化阶段，已成为先进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与早期阶段的合作社形成对比，因为成员不再根据拥有的土地份额赚取收入。相反，集体农场的利润主要根据劳动贡献分配给成员。平均合作社由 170 个家庭和 700 多人组成。虽然允许有小块私人土地，但大部分土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发展是建立了国有农场，其中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

这种集体化程度的实现比苏联集体化期间发生的动荡要少得多。但是集体化并没有阻止农业生产的增长；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 年）下，粮食产量每年增长 3.5% 。增长主要是通过加强使用传统农业技术以及一些技术改进来实现的。

一旦实现集体化，人均农业产量开始增加，领导层就开始了 1958-60 年大跃进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农业中，这意味着不切实际的高生产目标和比已经实现的更高的集体化程度。现有的集体很快被组织成人民公社，更大的单位，平均有 5,400 户家庭，平均成员总数为 20,000 至 30,000 人。生产目标没有伴随足够数量的资本和现代投入，如化肥；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农民的英勇努力来实现的，他们经常被过度热心的党干部打得屈服。

大跃进期间在大规模但往往规划不善的基本建设项目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例如灌溉作品和“土法炼钢”。由于结果压力大，变化速度快，加上许多干部和农民缺乏经验和抵抗，大跃进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农民因持续不断的生产压力而筋疲力尽。根据政治影响比准确性更重要的理论，生产统计数据的膨胀导致了奢侈的主张。农业活动和运输的中断造成了粮食短缺。1959-61 年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因此，到 1960 年代初期，农业严重萧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因政府的粮食征用而挨饿。记录显示，尽管饥荒普遍存在，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情况下，北京仍然否认存在任何农业问题，并继续向苏联、东德和阿尔巴尼亚运送粮食和其他粮食资源。到1962年政府终于认输，中国被迫进口粮食（尽管其在 1950 年代是净出口国）供应城市地区。否则，就会从农村地区榨取过多的粮食。关于大跃进造成

的损害程度的记录各不相同，这通常是因为政府统计数据要么没有被采纳，要么被夸大了，要么完全是捏造的。然而，几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958 年至 1962 年期间饿死、工作累死或被殴打致死的中国人数普遍估计约为 4500 万。

承认农业的重要性

面对这种萧条，该国领导人启动了加强农业部门的政策。政府加大对个体和集体生产的激励力度，分散某些管理职能，扩大自有地块和市场的作用。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重组，使生产团队20至30户的90至140人拥有的大部分资产，自负利润或亏损，做出经济决策，以及分配收入。最重要的是，领导层着手制定政策，旨在将"农业第一"纳入规划，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更多现代投入。化肥产量和进口量增加。现代高产种子品种开始开发。灌溉设施得到了修复和扩建，政府开始提供更多的机械泵和其他灌溉设备。

这些改进并非偶然；大多数都集中在更先进和更有生产力的领域。其目的是建设高产稳产的现代化农业区，为更稳定的农业生产奠定基础。一般来说，被划为"高产稳产区"的地方，就是那些排灌充足的地方，多施化肥和新种子的收益会更高。

恢复

到 197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已从大跃进的失败中复苏。1979 年人均粮食产量首次超过了 1957 年达到的峰值水平。此外，1960 年代中期的小企业

开始大量生产化肥。政府研究人员开发了对肥料敏感的种子。将这些投入集中在高产和稳产地区意味着中国已经先进的部分往往比落后或欠发达地区更受青睐，从而扩大了已经具有潜在严重影响的差距。

同时，政府敦促贫困地区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向大寨学习”运动象征着这一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是山西省一个克服贫困、生产条件差、相对富裕的小镇。当局声称这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斗争实现的。大寨成为政治组织的楷模，其领袖也成为全国效仿的楷模。

这些政策——“农业优先”，强调现代投入品的供给，以及大寨和其他模式——形成了从 1960 年代初到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框架。文化大革命对农业部门造成了一些破坏，例如政治斗争会议和地方领导层的变化，但不如对工业部门的破坏那么严重。

后毛泽东政策

当党的领导层开始根据推动国家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运动来评估农业部门的进展时，它注意到令人失望的失败和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获。此外，尽管人均粮食产量从 1960 年代初期的低迷水平有所增加，但 1975-77 年期间产量停滞不前，因此 1978 年的人均产量仍不高于 1950 年代的平均水平。其他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增长更为缓慢。1978年，领导层决定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将其改组为新的农村体制

——乡-集体-家庭体制，由五个部分组成：地方政府、党、国家和集体经济实体以及家庭。公社制度将政治、行政和经济整合为一个单元，而新制度旨在让不同的机构处理特定的职能。乡镇是前公社时代政府的基本单位，被重建以处理政府和行政职能。党委要集中精力处理党内事务。组织经济集体管理经济事务。鼓励家庭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同。

公社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工作的积极性。非物质激励政策，例如群体间的红旗竞赛，被淡化了。平均主义口粮的分配措施有所下降，工作支付系统（“工分”系统）关闭。农村干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激励农民的方案，称为包干（家庭生产责任制）制度。包干制度中，分配的具体用地地块为家庭经济合作社培育，长达十五年合同。对于每一块土地，经济合作社规定必须交付采购的产出数量。合同还概述了家庭义务，例如对资本积累和福利基金的贡献；用于维护水控制系统的天数；和债务偿还时间表。超过国家和集体义务的产出是对家庭的奖励。家庭可以随意消费剩余的产品或在农村市场上出售。包干制度允许家庭通过努力工作、良好管理、明智地使用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收入。

虽然改革期间农业部门的整体投资水平没有太大变化，但投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领导人呼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但 1980 年代初期国家实际支出有所下降。虽然公社在农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新成立的经济合作社的投资率远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农村银行体系的振兴和延伸（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利的贷款政策，确实为该部门提供了少量但稳定的投资资金来源。但主要的变化是，1978年后允许农户投资资金，对小拖拉机、农村工业、住房等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1983 年，农村家庭在住房上的投资为 210 亿元，而国家来源的投资为 110 亿元。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政策放松了，他的“到处种粮”的格言被抛弃了。农户开始生产最适合其自然条件的作物和动物。文革期间曾种过粮食的山东优良棉田恢复种植棉花。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改革政策还减少了限制劳动力和资本超越公社边界的主要行政障碍。劳动力不足或不太愿意耕种的家庭可以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对种植和畜牧业感兴趣的家庭. 允许农村工人从农作物种植转向农村乡镇的商业、服务、建筑和工业活动。农村地区的资本被允许跨越行政边界，个人不仅投资于自己的农业生产，还投资于本村以外的企业。

后毛泽东时代，农村的营销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向地方国家采购站强制销售农产品的制度结束了，国家对消费者的粮食、食用油和棉布的配给也结束了。有可销售盈余的家庭有多种选择：商品可以在农场消费，在当地市场出售，或者根据签署的购买合同出售给国家站。文革期间被解散的农村市场重新开放，市场数量从1978年的3.3万个增加到1985年的6.1万个。这些市场的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25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632亿元。消费者购买了食品和日用品。在由国家、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家经营的商店以及当地的自由市场中. 与这些改革同时发生的是，国家提高了采购价格以改善激励措施并增加农民的产量。从1966年到1982年，小麦和大米收购价格上涨了66%，而油籽价格上涨了85%。为了避免城市对高价的不满，国家吸收了不断增加的额外成本，这些商品的零售价格保持不变。

新政策很快开始产生效果。1978年至1985年，农业总产值几乎翻了一番，粮食、油籽、棉花和牲畜的生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农户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大幅上升到 1985 年的 397 元，但收入不平等加剧。然

而，集体机构的消亡带来了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的减少。对环境的维护不够重视，浪费了一些水、土壤和森林资源。尽管如此，1980 年代中期的观察家认为，农村繁荣的整体增长前景良好。

19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改革也扫除了限制商业活动的政策和行政规则。旧的公社生产和大队企业进行了重组，经济合作社和公民成立了许多新企业。商业活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餐饮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到 1980 年代中期，这些企业产生的价值超过了种植农作物和牲畜的产出价值。

规划和组织

1980 年代中期，国家的作用主要是规划生产和管理资源。在国家层面的国家机构中，农牧渔业部主要负责协调农业项目。其他在农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央机构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商务部、林业部和化学工业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银行；以及从事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各种学院和机构。

在国家一级的国家机构与行政等级基础的乡镇和村庄之间，有各种省级、地级和县级政府机构，它们也负责管理项目，包括一些农业研究和推广活动。约2000个县级单位与辖区内的经济合作社和农户协调规划和执行政策。县级单位有时还经营自己的化肥厂或其他生产基本农产品的工厂，并帮助将生产的材料直接分配给农民。

一些农业生产发生在国营农场，那里的工人像工厂工人一样领取固定工资。国营农场主要分布在主要农业区的边缘，尤其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尤其是在东北部，但它们仅占总耕地的 4% 左右。

农村地区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集体和私营企业的范围内。经济合作社、企业和家庭以自给自足、追求利润和遵守年度经济计划为导向。自给自足的力量继续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农户分配资源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时。传统上，追求利润一直是农村地区的驱动力，虽然这种能量在过去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但在 80 年代鼓励农民追求利润。

国家制定年度经济计划，通过行政渠道下达，协助地方干部。农场经营者和其他企业审查了计划目标，指导他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国家使用直接和间接方法来影响决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干部们根据年度计划决定生产什么，采用什么生产技术，以及如何分配产量。间接控制，例如价格和利率，在 1980 年之后变得更加重要。自给自足、利润和国家计划的力量的不同组合影响了特定年份特定产品的决策。例如，1985 年棉农通过国家计划被告知种植棉花的面积，而农民没有收到国家计划种植瓜类；相反，他们种瓜是为了增加利润。

1980 年代后期，国家通过强大的政治和行政机制继续控制农户、经济合作社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这些机制中的第一个是83,000多个乡镇政府，它们负责民政军事、公安（警察）、计划生育和统计。村委会94万多人，隶属于乡镇。虽然它们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但它们维护公共秩序、管理福利服务并监督节水项目。地方一级最有权势的实体可能是乡镇的中共党委和

村庄的下属党支部。超过 2000 万农村党员在岗位和领导委员会监督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协调党、政府和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确保党的政策得到遵守。他们提名候选人担任行政职务，并批准服兵役、工作和高等教育机会的申请。

第二种机制——营销职能的控制——为国家提供了影响农业决策的强大工具。与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一样，国家负责组织和指导部门间资源流动的主要部分。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包括价格和市场以及直接控制。它需要平衡各个部门对燃料、水泥、木材和机械等投入的需求（以及农村和城市地区消费者的需求），以努力实现其目标。政府从农民那里采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城市地区和缺粮地区的生计，并提供原料用于纺织及其它光产业。所需金额的一部分只是作为直接税获得的。然而，从税收中获得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1984 年的税收不到总产值的3%。其余部分是通过国家采购机构的采购获得的。

1957年至1978年，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降低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燃料等基本物品价格。这对于促进使用更多的化肥和燃料以获得更大的产量和为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激励是必要的。

作为第三种机制，国家通过控制信贷和农业生产供应，在农村事务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国有控制的约 27,000 家农业银行服务于农村地区并提供生产贷款。农业银行还监管了4.2万余家信用合作社，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银行服务，为客户提供生产和消费贷款。国家通过行政法规、贷款政策和利率来控制银行活动。国家通过其营销渠道规范化肥、机械和燃料的

运输。此外，政府对水电供应的控制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杠杆，促使农民遵守政治政策和经济计划。

最后，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经济合作社和农户不太可能从事可能导致社会服务供应减少的活动。农村家庭渴望并越来越感到有权享受医疗、教育、福利和文化福利。村庄竞相将这些设施设在其境内，不仅是为了更方便地获得服务，而且是为了利用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

操作方法和输入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施肥和灌溉等技术来提高稀缺土地的生产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农业技术已经现代化：化肥补充了有机肥料，机械泵开始用于灌溉。1980 年代的政府规划者强调增加化肥的使用、改进灌溉、农业机械化和改良种子品种的推广是农业现代化计划的主要特征。

裁剪模式

现代农业的所有这些要素都用于传统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全年利用土地，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年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水稻、小麦、棉花、蔬菜和其他作物幼苗有时会在特殊的苗床中培育。然后移植到田间。移植缩短了作物成熟所需的时间，这使农民有机会在每个生长季节多种植一种作物。优化利用稀缺土地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另一种作物的成熟林分上种植幼苗。例如，10 月份种植冬小麦时，北方农民在行间留出空间，以便在 4 月和 5 月种植或移栽棉花幼苗。如果不进行间作，农

民一年只能种植一种作物。机械化支持这种集约化种植。尽管农村劳动力庞大，但每个季节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因为农民需要在几周内收获一种作物并种植另一种作物。1980 年代，农民投资收割和种植机械以克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种子育种者还通过选择和培育生长季节较短的品种来支持集约化种植模式。

肥料

集约利用的耕地、土壤进行的用肥势在必行来代替营养物质并帮助提高产量。长期以来，有机肥料一直为土壤提供大量养分，并有助于维持土壤结构。几个世纪以来，有机肥的使用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牲畜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农民传统上将大部分劳动力用于收集有机材料作为肥料。在中国南方，使用量特别大，因为这里的集约化种植需要更多的肥料，肥料的来源也更丰富。然而，自 1960 年代以来，化肥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1985 年化肥的使用量为每公顷 150 多公斤，以养分重量计算。由于有机肥料生产快速增长的自然限制，该国未来相当大的需求将通过化肥来满足。

在 60 年代初期的“农业优先”计划下，化肥的生产和进口迅速增加。国内工业扩大，部分借助进口化肥厂，到1965年产量达到170万吨。1965年进口量超过60万吨。在 1960 年代中期，政府也开始强调氮肥料的小型工厂生产，通常由县经营，年产量约为 10,000 吨。他们的产品在当地使用，这有助于节约运输资源。1972年政府承包进口13家大型尿素厂，每家年产氮肥标准100万吨以上。到1980年投产，1985年化肥总产量1340万吨，其中氮肥1230万吨。进口量又增加了 760 万吨。

未来的生产和进口可能会强调磷酸盐和钾的含量，以平衡从有机肥料和现有工厂中获得的养分。1980 年代初期的制度改革鼓励家庭削减成本和最大化收益，这可能导致更有效地使用化肥，因为农民将肥料施用于那些回报率最高的作物。

机械化

毛后改革极大地影响了农业机械化。大部分公社拖拉机站被解散，允许农户购买设备。私营拖拉机的比例从1975年的接近零增加到1985年的80%以上。这一时期机械耕种面积减少，但农民使用拖拉机和卡车运输货物的比例急剧上升。多达 60% 的拖拉机用于本地运输。制造农机的公司通过生产更多的小型拖拉机、合适的拖拉机牵引设备、质量更好的手动工具以及食品和饲料加工设备来适应农村组织的转变。农村电力系统——水坝、发电机和输电线路——自 1949 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1987 年大多数村庄都通电了。"四化"期间，农村用电量增长179%，从1975年的183亿千瓦时增加到1985年的512亿千瓦时。

尽管拖拉机库存量大、生产率高，但 1980 年代中期的大部分农场任务都是手动完成的。由于当地工程师还没有大量开发和生产水稻插秧机，因此水稻继续采用手工插秧。只有 36% 的土地是用机器耕种的，只有 8% 是用机器播种的，只有 3% 的作物面积是用机器收割的。役畜仍然是重要的动力来源，后毛时期牲畜的数量急剧增加。成功的机械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在农村工业和商业中找到工作. 在 80 年代，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中国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使用机械化来解决劳动力需求高峰时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将机械化集中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等规模化农业地区。

水利

灌溉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设施早在 2000 年前就已存在。以劳动密集型方式扩建水利设施是20世纪50年代农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跃进期间，承接了多项水利工程，但规划和资金不足。到 80 年代，灌溉设施覆盖了近一半的耕地；自 1960 年代后期以来安装的系统扩展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

在后毛泽东改革时代，灌溉和排水系统扩大，以增加稳定和高产的土地存量。机械泵的库存也大大增加；1985 年，动力灌溉设备达到近 8000 万马力。在此期间，政府开始对农民使用的水收费，因此农民在收益成本的基础上限制了用于农作物的水量。农村机构的重组削弱了使大型水厂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行政措施。投资减少、维护不善以及对设施的彻底破坏降低了系统的有效性。增加额外的面积可能会越来越昂贵，因为没有灌溉的地区远离容易取用的水源。在 1980 年代中期，政府官员认识到了问题并着手进行纠正。

华北地区长期缺水，干旱频繁。其灌溉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井。水利部（及其前身）的官员定期提出从长江引水灌溉华北平原。建设这样一个项目的巨额费用使其无法实现。还鼓励农民使用喷水系统，这比洪水式灌溉系统更有效地利用稀缺水资源。

害虫控制

1987年杂草和昆虫控制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劳动密集型 耕作。仔细照料田地，并使用了各种生物控制措施，例如培育农作物害虫的天敌。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生产和使用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迅速增加，但随后产量下降了一半以上（约 20 万吨），因为这些产品效果相对较差、价格昂贵且毒性较大。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较低。

种子品种

改良种子品种对提高作物产量做出了重大贡献。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使用对肥料高度敏感的品种。这些与中国以外开发的那些相当，但适应了复种造成的较短的生长季节。它们的广泛使用补充了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增加和灌溉面积的增加。1970 年代中期，农民开始种植杂交水稻，声称产量增加了 20% 以上。杂交水稻由于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但在 1980 年代中期种植了超过 600 万公顷，占水稻总量的 20%区域。1978年成立中国种子公司，推广良种；它出口中国蔬菜种子，进口改良谷物、棉花、牧草和油料种子。1980 年代中期，中国约有 5% 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种子，该公司在省、地、县各级经营着 2,000 多家种子公司。

农业科学

1950 年代后，农业科学受到政策和重点变化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农业科学培训和研究计划，但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培训和研究计划已恢复。政府官员强调务实、生产导向的科学工作。农村推广系统推广了新技术和新投入，例如喷灌系统。1987年84所农业院校和研究所在农业、林业、水产、开垦、机械化、水利、气象等七大领域开展研究。此外，农业学校近500所，教职工2.9万人，学生7.1万人。自 80 年代初以来，成千上

万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被派往国外。正在加强研究，建设了 16 个区域分布的农业试验站。建立了新的农业期刊和协会，以促进研究成果在国内的传播。中国人也通过技术和机器的进口以及代表团的国际交流向国外寻求技术信息。

生产

五种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部分农业产出：作物、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生产（农村工业）。作物种植是主要活动，在 1950 年代中期产生了多达 80% 的总产值。1980 年代初放宽了压产政策，到 1985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50%左右。1950 年代后畜牧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的产出比重缓慢增加。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副业生产，其份额从 1955 年的 4% 增加到 1985 年的 30%。

中国农业政策的产出结果喜忧参半。大跃进后产量急剧下降，之后很长时期的平均粮食消费仅维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直到 1980 年代才高于该水平。灌溉和水利控制项目的投资减弱了恶劣天气对产量的影响，但该国许多地区的生产继续受到天气的负面影响。全国各地的生产率差异很大，造成收入不平等。尽管 1980 年代农村地区迅速发展，但城乡生活水平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作物

1980 年代中期，中国农民每年在大约 1.45 亿公顷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5％为具有含油种子作物，5％水果，3％蔬菜，2％纤维作物，0.5％的糖作

物和烟草。其他作物占剩余的 4%。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当政策强调粮食产量时，粮食播种面积超过 85%。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80%以下，其他作物播种面积相应扩大。

粮食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它是普通饮食中大部分热量和蛋白质的来源，在农业生产价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统计学家将粮食定义为包括小麦、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土豆、大豆、大麦、燕麦、荞麦、豌豆和豆类。 从 1949 年到 1975 年，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长同步，但在 1975 年到 1985 年的十年间迅速增长。

1987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水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不到一半。在每一年，稻米总产量来自四种不同的作物。早稻主要产于长江沿岸省份以及南部各省；它在 2 月至 4 月播种，在 6 月和 7 月收获，占水稻总产量的 34% 左右。西南和长江沿岸的中稻和单季晚稻；它在 3 月至 6 月播种，在 10 月和 11 月收获，也占 1980 年代稻米总产量的 34%。早季收割后种植的双季晚稻于 10 月至 11 月收获，可增加水稻总产量的 25%。北方种植的水稻4-6月播种，9-10月收获；它约占总产量的 7%。

所有水稻种植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水稻通常作为湿地作物种植、在生长季节期间被洪水淹没以供水的田地中。移植幼苗需要许多小时的劳动，收获也是如此。水稻种植机械化只是最低限度的先进。与大多数其他作物相比，水稻种植还需要更多的其他投入，例如肥料。

大米作为粮食受到消费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华南地区，人均消费量逐年上升。此外，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更愿意多吃大米，少吃土豆、玉米、高粱和小米。1980 年代初期产量大幅增加，加上当地交通系统差，促使农民将大量低质量大米喂给牲畜。

1987年中国小麦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冬小麦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同年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8% 。每年秋季从 9 月到 11 月播种，并在次年的 5 月和 6 月收获。春小麦每年春季在北部和东北部种植，夏末收获。春小麦约占小麦总产量的 12%。

小麦是中国北方的主食粮食，以馒头和面条的形式食用。人均消费量上升，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小麦面粉的需求也增加了。小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进口粮食。

该国大部分地区都种植玉米，但在也生产小麦的地区最为常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产量大幅增加，在某些年份，玉米产量仅次于大米产量。它每单位土地的产量通常比其他谷物品种多，因此可用于维持生计。

北部省份主要在受干旱影响的地区种植小米和高粱。小米主要用作粮食。

在 1980 年代，大约 20% 的产量来自爱尔兰马铃薯，主要种植在华北。其余 80% 的产量主要来自中国中部和南部种植的红薯（木薯产量也包括在马

铃薯总产量中）。

其他谷物，如豌豆、豆类和豆类，在中国各地都有种植。这些谷物是植物蛋白的良好来源，可为饮食增添多样性。大麦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它用于直接人类消费、牲畜饲料，并且作为生产啤酒的原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大豆，一种豆科作物，也包括在中国的粮食统计中。东北地区历来是最重要的产区，但华北平原也出产大量大豆。大跃进后大豆产量下降，直到1985年产量才恢复到1950年代后期的1000万吨水平。人口增长大大超过大豆产量，人均消费量下降。大豆是蛋白质和脂肪的有用来源，鉴于可用的肉类数量有限以及以谷物和蔬菜为基础的饮食，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油籽饼是豆油提取的副产品，用作动物饲料和肥料。

棉花是中国最重要的纤维作物。该作物生长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1970 年代国内产量无法满足需求，大量原棉被进口。1980 年代初期产量急剧增加，1984 年达到创纪录的 600 万吨。虽然产量在 1985 年下降到 420 万吨，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1980 年代原棉进口停止，中国成为棉花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也生产大量黄麻和大麻。这些农作物的产量从1955年的25.7万吨增加到1985年的340万吨。主产省包括黑龙江、河南和长江沿岸省份。

中国是油籽的重要生产国，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葵花籽和红花籽。1955 年油籽产量为 480 万吨。然而，产量在 1955 年至 1975 年间并未增加，这意味着人均油籽供应量因人口增长而大幅下降。从 1975 年到 1985 年，产量增加了两倍多，达到 1550 万吨，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油籽消费量最低的国家之一。

1985年甘蔗约占糖料总产量的83%。主产省有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等省。多年来，产量稳步增长，从 1955 年的约 800 万吨增加到 1985 年的超过 5100 万吨。

1985年甜菜产量占总产量的17%。主产省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等。甜菜产量从 1955 年的 160 万吨增加到 1985 年的 890 万吨。尽管产量增长惊人，但人均消费量仍然很低，大量进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叶生产国。农民生产多种烟草，但烤烟品种通常占总产量的 80% 以上。主要产区有河南、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

主要产于南方的茶叶和丝绸历来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而且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出口产品。

鉴于中国不同的农业气候区，种植了多种蔬菜。农民在自有土地上种植蔬菜供自己食用。在城镇附近，农民种植蔬菜出售，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求。蔬菜是饮食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中国种植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水果。产量从 1955 年的 260 万吨扩大到 1985 年的 1100 万吨以上。1980 年代初期的改革鼓励农民种植果园，预计 1980 年代后期苹果、梨、香蕉和柑橘类水果的产量将增加。

畜牧业

1987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存量。数量从1955年的约8800万头增加到1985年的约3.31亿头。除西北穆斯林地区外，中国各地都有大量饲养。大多数猪是由个体农户在围栏内饲养的，但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主要城市的郊区建立了大型机械化饲养场。1980 年代之前，该国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产量，而很少考虑肉与脂肪的比例。在 1980 年代，消费者开始更加关注脂肪含量，育种者和饲养者开始转向生产更瘦的猪。

役畜是农村重要的动力来源。尽管农村地区拖拉机和卡车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役畜数量从 1955 年的约 5600 万头稳步增加到 1985 年的 6700 万头。为农作物种植和农村交通提供动力的动物包括水牛、马、骡、驴、牛和骆驼。

绵羊和山羊是中国最重要的放牧动物。这些动物大多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半干旱草原和沙漠中繁殖。绵羊和山羊的数量从 1949 年的约 4200 万头稳步增加到 1985 年的约 1.56 亿头。过度放牧、脆弱的牧场受到侵蚀的严重威胁，在 1980 年代后期，当局正在开展一项运动，以改善牧场和牧场和限制侵蚀。

畜牧经济中的乳制品和家禽部门在 1980 年代增长最快。1978 年奶牛数量不到 500,000 头，但在 1985 年增加了两倍，达到 150 万头左右。收入增加的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新鲜奶粉和奶粉供婴儿和老年人使用。这种增加的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被允许购买和拥有他们的动物的个体农民满足的。政府通过进口种畜和建设大型乳品厂和加工设施来支持增加牛奶产量。大多数家禽仍然在农场饲养，但改革鼓励个人和家庭群体投资于有限的饲养业务。特别是鸡蛋产量在 1980 年代迅速增加。

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饲料加工厂建于 1970 年代，随后是许多配备进口技术的加工厂。混合饲料和配合饲料的产量增长迅速，1985 年达到 1200 万吨以上。这种发展支持了畜牧业的发展。

林业

几个世纪前，中国主要农业区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因此，大部分木材来自中国东北以及西北和西南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1985年总产量约6000万立方米。竹竿及制品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1985年产量达2.3亿株。广东种植橡胶树；产量从1975年的6.8万吨稳步上升到1985年的19万吨。其他重要的林产品有漆、茶 油籽、桐油、松脂、核桃、板栗、胶合板和纤维板。

森林覆盖的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12%，官员们希望在长期内增加到 30%。每年都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以重建森林、植物防护带和建立土壤稳定区。但由于森林过度砍伐和新造地段幼苗成活率低，中国森林一直处于危险之中。需要更好的管理和长期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有价值的林产品的产

量。

渔业

水产品产量20世纪50年代以后慢慢增加，达到620万吨，1985年输出是由海洋和淡水的鱼类，贝类和海藻。海产品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63%。渔民从公海收集了超过 83% 的海洋产量。其余 17% 的产量来自中国沿海的海港。

1980 年代中期，淡水捕捞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37%。养鱼的池塘占80％的总淡水捕捞的；只有 20% 是在天然河流、湖泊和溪流中收集的。各种来源的鱼为消费者提供了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并在他们的饮食中增加了多样性。

副业生产

除了提高农业单位的主要产量外，毛泽东后的经济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农村副业生产。1984年以前，生产大队、生产队、家庭的副业生产包括狩猎、捕鱼、采野药、生产家庭手工业，以及各种工业、商业、运输和服务业。副业产出包括化肥、农机、纺织品、砖块、电器和各种消费品。副工业活动还包括加工棉花、谷物和油籽；开采煤炭、铁矿石和黄金；并疏浚砾石和沙子。包括在副业产出中的服务包括理发、娱乐和餐饮。作为副业经济的一部分，农村实体运输人员和货物并经营零售店；农村建设集团修建了水坝、厂区、道路、和房子。在各种副业生产中，国家仅将县、社经营企业的工业产值计入工业总产值。

产量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到 1985 年，副业产生的产值超过了主要作物

和畜牧业的产值。为了使农业产出总值更真实地代表了农业生产，在1985年统计的限制副业生产，以狩猎和捕鱼，采集野生药材，并生产家庭手工业. 因此，在 1985 年之后，至少有三种经济表现的综合衡量标准：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和副业）；农村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总产值加上农村工业、交通、建筑和其他产值。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

农业贸易

自 1949 年以来，大部分年份的农产品出口都超过了进口。中国官员将这种出口顺差作为进口高优先工业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多年来，农产品出口有所增长，但增速不如工业出口。例如，1970年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5%，而1985年中国65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20%。

1970 年代，农产品进口约占总进口的 30%。例如，1977 年进口的价值 71 亿美元的产品中，有 21 亿美元（30%）是农产品。1985年进口农产品47亿美元，仅占428亿美元进口总额的5%。预计农业进口与其他进口的比率在 1980 年代后期和 1990 年代会上升。

自 1950 年代初以来，几乎每年都进口小麦。这些进口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平均约为 500 万吨，但在 1982 年上升到超过 1300 万吨的峰值。随着小麦产量的迅速增加，小麦进口量下降，因此到 1985 年进口量下降到略低于 550 万吨。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小麦进口的主要来源。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每年出口约 100 万吨。大米出口主要出口到亚洲和东欧国家以及古巴。

中国一直是粗粮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到 1984 年，高粱、小米和玉米的出口总量通常只有几十万吨，但在 1985 年达到了超过 500 万吨的峰值。在 1980 年代中期，玉米主要运往日本、朝鲜和苏联。大麦进口作为牲畜饲料和酿造啤酒的原料。玉米进口用于人类消费和牲畜饲料。进口数量因内部供应情况和国际市场价格而有很大差异。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70 年代初和 1970 年代末进口了大量玉米，当时玉米进口量达到 360 万吨的峰值。主要粗粮供应国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泰国和美国。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豆一直是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大豆和豆制品的静态生产和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意味着直到 1980 年代初出口量下降。例如，1981年阿根廷和美国向中国出口了50万吨以上的大豆；这两个国家和巴西也向中国出口豆油。然而，国内产量在 1980 年代初期有所扩大，到 1985 年大豆进口量下降，出口量超过 100 万吨。同样在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亚洲市场运送豆粕。

1983 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棉进口国之一。这些进口量平均每年约 10 万吨，但在 1980 年攀升至近 90 万吨的峰值。国内棉花产量的急剧增长满足了国内需求，1983 年出口超过进口。1985 年中国向亚洲和欧洲市场出口了近 50 万吨原棉。

进口到中国的糖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古巴、菲律宾和泰国。进口量从 1955 年的 10 万吨稳步攀升至 1970 年代中期的 50 万吨，并继续急剧上升，1985 年达到 200 万吨以上的峰值。

除了刚才提到的商品外，中国还从其丰富的农业资源中出口了许多其他产品。大量活的动物、肉、鱼、蔬菜和水果被运往亚洲市场。茶，香料，精油被运到主要国际市场。中国还出口动物产品，如猪鬃、毛皮和其他动物产品。

农产品贸易仍然是中国总体农业现代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继续进口粮食等农产品。这些进口被用来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平，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进口有助于减轻更多采购的压力，释放资源用于增加消费或投资当地农业项目。

从长远来看，中国减少了农业进口所需的外汇支出。这些支出减少了用于经济的非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和投资的其他进口额。减少农产品进口的成功取决于国内供应来源的发展，为此中国希望部分依赖新的适销作物生产基地。消费增加的压力仍在继续。人口增长以及需要更多农产品（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和消耗粮食的牲畜）来支持城镇地区和新农业基地地区更高的实际收入仍然是造成这种压力的因素。

——

在此期间的中国科技、教育、文化、民情、政法史经哲境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cience_and_technology_in_China

中国科技史

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自然科学、工程、医学、军事技术、数学、地质和天文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创新、发现和技术进步。

最早的发明包括算盘、日晷和孔明灯。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是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唐朝（公元618-906），特别是伟大的创新的时代。直到清朝，西方和中国的发现之间发生了大量的交流。

16、17世纪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将西方科学和天文学引入中国。在 19 和 20 世纪，西方技术的引进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中国科学史上的许多早期西方工作都是由约瑟夫·尼达姆完成的。

在东汉末年的学者和天文学家张衡（公元78-139）发明了第一台水动力旋转浑天仪，编目2500分和100星座。132年，他发明了第一台地震探测器。据后汉史（公元 25-220 年），这种地震仪是一种类似瓮的仪器，它会掉落八个球中的一个来指示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2005年6月13日，中国地震学家宣布他们已经制造了该仪器的复制品。

“四大发明”是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纸张和印刷首先被开发出来。中国在唐代就有印刷术的记载，尽管现存最早的印制布纹样例可以追溯到 220 年前。确定指南针的发展可能很困难：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无可争议的磁针出现在 1086 年。

第一位宋皇帝创建了允许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政治制度，这促进了科学进步、经济改革和文学艺术成就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繁荣，技术的鼓励使开封和杭州的铸币厂逐渐增产。公元1080年，神宗造币厂已经生产了 50 亿枚硬币，第一张纸币是在 1023 年生产的。这些硬币非常耐用，在 700 年

后的 18 世纪仍在使用。

宋代有许多著名的发明家和早期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写道干船坞用于修理船只、导航磁罗盘以及真北概念（磁偏角朝向北极）的发现。沈括还设计了土地形成的地质理论或地貌学，并认为地质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发生气候变化。

中国天文学家是第一个记录超新星观测的人，第一个是SN 185，记录于汉朝。中国天文学家在宋代进行了两次更引人注目的超新星观测：SN 1006，历史上最亮的超新星记录；和SN 1054，使蟹状星云成为第一个被认为与超新星爆炸有关的天体。

化学

直至宋代，中医将药物归入本草体系：

与长生不老有关的上等药物被用于实现生命力

丰盈本性的中药

劣药是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

这些早期形式的药物是使用原始方法制成的，通常只是简单的干草药或未加工的矿物质。它们被开发成被称为“长生不老药”的组合。

中国炼金术士想方设法使朱砂、黄金和其他矿物质溶于水，以便于摄入，例如使用硝酸钾的醋溶液。

中国和阿拉伯的天文学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相互融合。穆斯林天文学家在忽必烈汗建立的中国天文局工作。在此之前，在古代，印度天文学家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传给了中国宫廷。

虽然中国人接受了球形天体的概念，但球形地球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平坦的大地）在中国是不能接受的思想，直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中国天文学家徐光启（1562年至1633年）在17世纪初的作品出版。

在 11 世纪，由于在冶炼过程中使用木炭，铁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森林砍伐。为了解决森林砍伐的问题，宋人发现了如何用烟煤生产焦炭来代替木炭。

炼金术与道教

在追求长生不老药和用各种材料混合创造黄金的愿望的过程中，道士与炼金术密切相关。

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

16 和 17 世纪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将西方科学和天文学引入中国。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写道，在晚明的宫廷中，耶稣会士"被视为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们在天文学、日历制作、数学、水力学和地理方面的知识"。

科技停滞

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进行科学革命，为什么中国的技术落后于欧洲。人们提出了许多假设，从文化到政治和经济。例如，约翰·K·费尔班克(John K. Fairbank)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对科学进步充满敌意。至于李约瑟，他写道，文化因素阻碍了中国传统成就发展成为所谓的“科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和哲学框架使他们无法相信自然法则的观念。

中医背后的哲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部分源自道家哲学，反映了中国古典信念，即个人的人类经验表达了在各种规模的环境中都有效的因果原理。因为它的理论早于科学方法的使用，它受到了基于科学思维的各种批评。哲学家罗伯特托德卡罗尔，怀疑论者协会的成员，认为针灸是一种伪科学，因为它“混淆了形而上学的主张和经验主义的主张”。

Mark Elvin 认为中国人口足够多，工人足够便宜，农业生产力足够高，不需要机械化：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完全能够快速完成任何需要的任务。海禁、鸦片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欧洲影响力的仇恨等其他事件阻止了中国进行工业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规模复制欧洲的进步是不可能的。慈禧治下政局不稳统治（现代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频繁摇摆）、共和战争（1911-1933）、抗日战争（1933-1945）、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战争（1945-1949）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在最关键的时候处于孤立。

贾雷德·戴蒙德假设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地理障碍——基本上是一个广阔的平原，有两条可通航的大河和一条相对平坦的海岸线——导致了没有竞争的单一政府。在一个不喜欢新发明的统治者的心血来潮中，技术可能会被扼杀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相比之下，欧洲的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以及各个防御性半岛（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希腊等）和岛屿（英国、爱尔兰、西西里等）的壁垒导致较小的国家不断与其他每个国家竞争。如果统治者选择忽视科学进步（尤其是军事或经济进步），他的更先进的邻居很快就会篡夺他的王位。然而，这种解释忽略了中国在过去政治上分裂的事实（因此并不一定天生倾向于政治统一）。

中华民国（1912–49）

大量中国学生赴日本和欧美留学。许多人返回帮助教学并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大学。其中不乏杰出人物，包括蔡元培、胡适、翁文浩、丁文江、傅斯年等。结果，中国的现代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共产党于 1949 年接管中国大陆，其中一些中国科学家和机构移居台湾。中央科学院中央研究院也搬到了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按照苏联的路线重组了科学机构。尽管国家政策在大跃进期间导致饥荒和文革期间政治混乱导致国家政策出现科学倒退，但核武器和卫星发射的科学研究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1975年，科学技术成为四个现代化目标之一，邓小平宣布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和外国技术转让，

其他民用技术，如超导和高产杂交水稻，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政府更加重视科技。这导致了资金的增加、科学结构的改善以及更多的研究资金。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医学、等的进步。2003 年，中国航天计划让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并计划在 2030 年将人送上火星。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中国在更先进的领域成为顶尖的科学和工业强国，例如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子弹头列车、航空、核物理研究等领域。

2016 年，按出版物衡量，中国成为科学产出最高的国家。虽然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最大的科学研究生产国，但中国在 2016 年发表了 426,000 项研究，而美国则发表了 409,000 项。然而，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因为它还取决于如何计算国际合作的作者身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cience_and_technology_in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呼吁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学政策在中国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比许多其他国家都大。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科技成就令人瞩目。但科技发展不平衡，有的领域成绩显着，有的领域水平低。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频繁逆转，共同赋予了中国科学独特的性格。质量和成就的差异部分源于农村人口众多且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有限——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条件。中国科学的特点也反映了资源集中在少数关键领域和机构，其中一些具有军事应用。在政治更激进的时期——比如大跃进（1958-60）和文化大革命 （1966-76）——大幅降低教育和认证标准。

科技政策的历史发展

与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多地参与了科学政策的制定。科学政策也在相互竞争的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经常充当科学机构不同部门的赞助人。党的领导人本身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但传统上非常重视科学和科学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和国力。然而，政府引导科学促进经济发展并产生军事收益的努力历来屡遭挫折。挫折反过来又导致政策的频繁逆转，并加剧了科学和政治精英之间在国家科学和技术的目标和控制上的内在紧张关系。在任何经济体系中，管理者和科学家之间都可能存在紧张和利益分歧，但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非常严重，

并导致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一再发生。中国科学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工作质量参差不齐，政治参与度高，政策高度不连续。

后毛泽东时代，文革的反智政策被扭转，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鼓励科学发展。但是，与过去 100 年的前任一样，1980 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仍然是，——对科学感兴趣的原因仅仅主要是将科学作为增强国力和经济增长的手段。决策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发达国家水平运作的充满活力的科学和技术机构同时以相当直接的方式为农业、工业和国防做出贡献。自 1980 年代初以来，通过一系列系统性和制度性变革来改革科技体系，以促进科学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在过去的 100 年里，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诸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各个研究领域的优先级、专业和学术自由的限制以及促进产业创新和发展的最佳机制等问题。广泛吸收最新技术。

1949 年之前

在中国的高产农业（因此经济上的盈余被转化为其他活动的闲暇时间）和儒家精英政治（因此相对于官场的开放和持续），使中国成为科学发现和前现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温床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集中在几个领域，主要是材料生产、运输、武器和医药。所有中国发现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的试错基础和渐进式改进。在这里，中国延续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成为优势。然而，这种反复试验的方法有其发展的上限。而且，渐进式改进面临收益递减。它无法实现所谓的“科学革命”。

他们在两个主要方面与伽利略或牛顿等西方科学家不同：他们没有试图将

自然规律简化为数学形式，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学者社区，批评彼此的工作并为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做出贡献. 中国的统治精英加强了对文学、艺术和公共管理的人文关怀，将科学技术视为微不足道的或狭隘的功利主义。

西方数学和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由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影响甚微。在 19 世纪，多次被西方侵略者（1840-41 和 1860 年）打败的创伤最终使一些中国领导人相信掌握外国军事技术的必要性。作为1860 年代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建立了许多外国式的兵工厂、造船厂和相关的培训学校。最初生产蒸汽船和火炮的努力逐步导致人们认识到掌握冶金学的必要性，以及化学、数学、物理和外语。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帝国政府或外国传教士的主持下，建立了教授科学的中学和大学，以及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深造的运动。

个别中国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没有太大困难，但他们人数和潜在影响力的增长对统治皇权和中国社会的儒家士大夫构成了挑战。这些官员不愿给予外国受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儒家学者同等的地位，他们怀疑外国关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思想，例如职业自治、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实验实践而不是书面文本作为命题验证。 19 世纪的官员试图控制外国知识和价值观的流入，将要进口和吸收的军事有用技术与外国哲学、宗教、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区分开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表达了这种态度。尽管这些术语不再使用，但在 1980 年代，根本问题仍然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试图区分有益的外国技术和“有害”的外国思想和做法。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非常矛盾，将其宣传为国防和国力的必需品，但又担心它是具有威胁性的思想和实践的载体。

到 1900 年，中国的科学技术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已经表现出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将贯穿整个 20 世纪。尽管中国早期的科学成就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但它们对中国以外国模式和外国培训为基础的科学实践和教学没有直接影响。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科学家凭借他们的外国教育、外语能力和接触外国科学思想，作为自主思考、国际和专业活动的基础，形成了人口中最国际化的元素。与外国同行相比，中国的科学家更多是出于爱国主义和通过工作帮助国家的愿望，许多人故意选择应用科学和基础科研工作。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儒家教义的影响，即知识分子对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应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许多科学工作是在政府的赞助、指导和资助下完成的。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共和政府，政府都对科学感兴趣，因为它可以为国家发展和军事力量做出贡献，并将科学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第一个主要的科技著作翻译出版商是1866年在上海成立的“江南兵工厂”，出版了近200篇英文、法文或德文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文本。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国外接受教育。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创办了中国科学协会，其成员包括大多数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1915年，该协会在中国出版了一个主要杂志《科学》；该杂志仿效美国的“美国科学促进会”所出版的杂志。1922年，该学会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主要的生物学研究实验室。学会致力于通过积极多样的出版计划、改进科学教育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来普及科学。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后又成立了数家政府研究和培训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有十几个科研院所，其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北京生物研究所、北京研究室等多个研究所相继成立，最终形成了物理、生物、药理学等部门。大多数研究机构的特

点是资金和人员非常有限，而且科学工作富有成效、质量高。到 1930 年代，中国拥有一批外国培养的科学家，他们从事高质量的研究，并在中外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科学家在大学、政府或外国组织（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机构工作，集中在北京、南京和上海。

1937年至1949年间，中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遭受了侵略、内战和失控的通货膨胀的蹂躏。支持研究的资金从不充足，几乎完全消失，大多数科学家被迫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学、行政或政府工作中。一改以往的模式，很多学生在接受国外教育后选择不回国，而是选择留在国外谋生。

1950 年代：苏联的影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按照苏联的路线重组了科学机构——这一制度一直有效到 1970 年代后期，当时中国领导人呼吁进行重大改革。苏联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主义而非专业组织原则，产学研分离，建立一套专门研究机构以及高度重视应用科学和技术，其中包括军事技术。

1949 年 9 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政府关于科学工作宗旨的观点，其中指出：“要为工业、农业、和国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1949年11月1日，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研究院（原北京研究实验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政府指示学院确定经济生产部门的要求并调整科研以满足这些要求。科学家将从事对社会具有重大和相当直接利益的研究，并作为集体成员而不是作为寻求个人名望和个人的认可而工作。

中国科学院明确仿效苏联科学院，其所长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I. Vavilov）就重组中国科学的正确方式提供了意见。他的著作《苏联科学三十年》被翻译成中文作为指南。苏联的影响也是通过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实现的。1950年代中国向苏联派遣了约38,000人用于培训和学习。其中大部分（28,000 名）是来自重点行业的技术人员，整个队列还包括 7,500 名学生和 2,500 名高校教师和研究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约1.1万名科技援助人员。其中估计有 850 人在科学研究部门工作，约 1,000 人在教育和公共卫生部门工作，其余在重工业部门工作。1954年中苏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直到1963年，安排了包括核科学在内的100多个重大科学项目的合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完成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草案时，提交苏联科学院审议。1957 年 10 月，一个由中国科学家组成的高级代表团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就十二年计划中列出的 582 个研究项目中的 100 个与苏联合作的协议进行谈判。

1950 年代的苏联援助计划旨在发展中国经济并按照苏联的路线组织中国经济。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的一部分，中国是现代工业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移的接受者。苏联援助了156个主要工业项目，主要集中在采矿、发电和重工业。按照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都是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到1950年代后期，中国有了电力、钢铁生产、基础化学品和机床，以及大炮、坦克和喷气式飞机等军事设备的生产。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加中国生产这些基本的商品如煤炭和钢铁，和教授中国工人操作导入或复制苏联工厂。这些目标得到了满足，作为一个副作用，苏联在材料、工程实践和工厂管理方面的标准得到了采用。中国工业还采用了苏联将生产与研究分开的做法。

采用苏联模式意味着中国科学的组织建立在官僚主义而非专业原则的基础上。在官僚模式下，领导权掌握在非科学家手中，他们根据中央确定的计划分配研究任务。管理人员，而不是科学家，控制招聘和人员流动。主要奖励是行政控制的加薪、奖金和奖品。被视为技术工人和机构雇员的个体科学家被期望作为集体单位的组成部分工作。信息受到控制，只能通过授权渠道流动，并且通常被认为是专有的或秘密的。科学成就被认为主要是“外部”因素的结果，例如社会的整体经济和政治结构、人员的绝对数量和充足的资金水平。与苏联体系不同的是，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专业原则下，西方科学家将自己视为国际专业社区的成员，该社区根据自己的专业卓越标准招募和奖励其成员。主要的奖励是专业同行的认可，科学家们参与一个精心设计的交流网络，其中包括发表的文章、资助提案、会议以及由从一个研究中心到另一个研究中心传播的科学家进行的当前和计划研究的新闻。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紧张局势

科学家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1966-76 年）期间达到顶峰。在 1950 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经常接受灌输，意在用更适合新社会的态度取代资产阶级态度。科学的专业组织的许多属性，例如它在研究课题选择上的自主性假设、它的国际主义，以及它面向专业同行群体而不是行政当局，都被谴责为资产阶级。在1956-57 年百花齐放时期，这些科学家使用自由表达的短暂时期的机会——公开抱怨政治会议和集会从科学工作中花费过多时间，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党干部试图指导科学工作的有害影响；——最后，他们因“反党”立场而受到批评，被贴上“右派分子”的标签。

该时期的术语区分了“红色”和“专家”。尽管党的领导人谈到需要将“红色”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但他们更多地表现得好像政治正直和专业技能是相互排斥的品质。该时期大跃进（1958-60）努力重新分配科学家去做一些立即投入使用的项目；涉及这样的研究工作，是让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进行植物育种和病虫害防治，并通过迅速扩大科技人员队伍降低职业标准。在经济衰退和大跃进饥荒之后，以及 1960 年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突然撤离的补偿需求以后，在 1960年代初期重新强调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标准，但只是短暂的。

文革期间科学机构遭到袭击，对中国的科学技术造成重大破坏。大多数科学研究停止了。在极端情况下，个别科学家被单挑为“反革命分子”，成为公开批评和迫害的对象，整个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连年停顿。科研院所的全体人员一般都被派往农村几个月或几年，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学习政治美德。致力于核武器和导弹的军事研究单位的工作大概还在继续，尽管围绕战略武器研究的保密性使得很难评估文化大革命对该领域的影响。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文革代表了反智主义的胜利，以及学术、正规教育和与科学专业精神相关的所有品质持续、长达十年的贬值。知识分子被假定为天生就是反革命的，并断言他们特有的态度和做法必然与群众的利益相悖。大学从 1966 年夏天关闭到 1970 年，当时它们重新开放给本科生，入学率非常低，并非常强调政治培训和体力劳动。选择学生的评判因素是政治正直而不是学术才能。1966 年和 1967 年中小学关闭，重新开放时多次因政治斗争而中断。所有科学期刊于 1966 年停止出版，对外国期刊的订阅失效或被取消。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没有培养新的

科学家或工程师，并且与外国科学发展隔绝。

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间，中国领导人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科技结构，其特点是群众参与、关注农业和工业中的当前实际问题，消除科学家和工人之间的区别。理论家将研究视为一种固有的政治活动，并将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从主题选择到调查方法）解释为潜在政治路线的证据。根据这种观点，研究服务于一个或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需要党的指导，以确保它服务于群众的利益。

1970 年代初期的特点是大规模实验，其中动员大量农民收集数据并鼓励他们将自己视为从事科学研究。典型的项目包括收集有关新作物品种的信息、研究当地生产的杀虫剂的有效性以及进行旨在寻找有用矿物或化石燃料的广泛地质调查。毛泽东对地震预测产生了个人兴趣，这成为了文革式科学的展示。地质学家下乡收集民间关于地震前兆的智慧，并建立了由数千名观察员组成的网络，以监测井中水位或家畜异常行为等迹象。与针灸麻醉一样，这项活动的重点是直接的实际利益，很少努力将观察到的现象整合到更大的理论框架中。

极端注重短期问题和弃用的理论的影响是由70年代中期和末期访问中国的西方科学家指出。例如，石化行业附属研究机构的工作被描述为过度试错。在一种情况下，尝试了大量的物质来在原油中作为催化剂或改性剂的蜡晶体，却很少关注化学性质的催化或调节剂的作用理论。

1977-84：平反和反思

文革对科学的攻击和对专业知识的贬低遭到了政府和党内那些更关心经济发展而不是革命纯洁性的人的反对。1970 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助手邓小平试图改善科学家的工作条件，促进研究。1975 年 1 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将中国本世纪下半叶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

讲话中提出的政策虽然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们将成为后毛时期的基本指南。1975年，时任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周恩来的政治继承人邓小平成为中国科学家的赞助人和发言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起草了科技、工业和外贸三大政策文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他们呼吁恢复科学家和专家的能力，重新实施严格的教育学术标准，并进口外国技术。扭转大部分文化大革命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提议遭到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和追随者的谴责。四人帮称之为"毒草"。周于 1976 年 1 月去世，邓于 4 月被免去所有职务。邓小平强调科技发展优先，被激进派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场争论展示了科学政策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科学政策与个别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逝世和随后于 1976 年 10 月推翻四人帮的一些直接后果是科学和教育政策的逆转。1977 年，四人帮的更多支持者被免去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权威职位，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专业资格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关闭的学术和研究机构重新开放，科学家从在农村体力劳动中被召回实验室。科学期刊恢复出版，通常载有 1966 年夏天在一切停止之前完成的研究报告。媒体非常关注科学的价值和令人钦佩的科学家素质。它谴责被废黜的四人帮的镇压和反智政策，指责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未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匹配

的罪魁祸首。新闻媒体现在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描述为社会"生产力"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潜在的反革命分子或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专家。对接纳或重新接纳科学家入党进行了大量宣传。

1978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科学政策的里程碑。由党中央召集的这次会议有许多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及 6,000 名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参加。其主要目的是公开宣布政府和党的鼓励和支持科技的政策。科技在200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新长征"中发挥关键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重申科学是生产力，科学家是工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表述，旨在消除对科学家进行政治迫害的理由。

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就不可能高速发展。"

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讲话中呼吁，只要研究工作符合国家的广泛优先事项，就可以让科学家们自由开展研究。支持基础研究，但仍将重点放在应用工作上，通过大大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中国科学家将广泛接触外国知识。

到 1978 年，科技建设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科学和技术负有特殊责任的领导者与新近平反的高级科学家一起展望未来，并为进一步发展制定了宏伟而雄心勃勃的计划。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讨论的科学技术发展八年计划草案要求迅速增加研究人员的数量，到 1980 年

代中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在激光科学、载人航天、高能物理等领域工作。对于一些科学家，或许还有他们的政治支持者来说，掌握技术、和发展中国在最先进科学领域的能力就是他们的目标，而不管成本或对农民和工人可能带来的好处。

政治领导人和媒体人员似乎都被科学奇迹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愿景所吸引。此外，许多领导者本身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他们倾向于对研究的直接好处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态度与文革期间表现出的对科学的敌意不同，它是基于对科学工作性质的误解，因此是科学政策的不良基础。

许多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计划与同样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和完整工厂的大规模进口相关。1979 年，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无法支付所有部委、地区当局和研究机构想要的所有进口或科学项目。越来越明显的是，项目推进者忽视了资金紧张和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缺乏全面的计划。1981 年 2 月，国家科委的一份报告推翻了 1978 年过于雄心勃勃的八年科学发展计划，要求重新强调科学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当科学家和管理人员面临着将研究与发展联系起来的问题时，他们意识到现有系统的限制以及应用科学知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科学和工业结构的后果；中国在 1950 年代曾不加批判地采纳了这些。

注意力转向改革现有系统，提高效率和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例如训练有素的人力。1981 年至 1985 年间，一些新期刊讨论了中国的科学体系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而国家和地方管理人员则赞助了广泛的实验性改革和研究机构重组。广泛的讨论和试验以 1985 年 3 月党的决定告终。中央要求彻底改革中国的科学体制。

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

熟练劳动力的供应

研发(R&D) 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其中关键资源是受过培训的人力资源库的规模和质量。中国遭受着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绝对短缺以及现有人员的分配不当和滥用。中国关于科学人员数量和分布的统计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6年底，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从事自然科学从业人员只有约820万人（而国家总劳动力有上亿人）。这些数字可能不包括军事研究机构的军事人员和科学家，但包括研究机构的支持人员。“科技人员”约占所有就业人员的1.5%，但其中真正的“研究人员”仅约35万人。自 1970 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学生从中国高校毕业，以及研究生开始从外国高级培训中返回，他们的人数显着增加。1979年至1986年间，中国共派出35000余名留学生，其中23000人赴美留学。

比绝对数量的科学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质量和分布。总数掩盖了教育背景和质量的巨大差异；两年制院校的毕业生或在低标准时期上过中学或中学的毕业生与 1960 年代初或 1980 年代初从主要院校毕业的人不应当被混为一谈（也就是文革时期之前或之后）。文革使整整一代人无法进入大学和专业培训，造成科学劳动力年龄分布的差距。科学界包括少数1949年

以前经常在国外受训的老年高级科学家，相对较少的中年人员，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大量青年科学家。80年代中期，许多中年、中级科学家的教育和专业水平较低，但一般不会被解雇或退休（因为中国实行终身就业保障）；他们也无法接受再培训，因为学院和大学将稀缺的名额分配给资格要好得多的年轻人。科学家和工程师集中在专业研究机构、重工业、国家军事研究和军事工业设施中，这些机构拥有最高标准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极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轻工业、消费工业、小型集体企业和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工作。

研究机构

在 80 年代后期，大多数中国研究人员在专门的研究机构工作，而不是在学术或工业企业工作。这些研究机构在 1985 年约有 10,000 家，就像它们的苏联典范一样，由各种中央和地区政府机构领导和资助。他们的研究任务，理论上是由上级下达的，作为整体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理论上，研究计划与总体经济计划相协调。科研院所是开展科研和聘用科学家的基本单位，由政府人事局分配到科研院所。科学家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通常都在同一个研究所度过。研究机构发挥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单位作用，具有终身就业的通常特征，单位控制奖励和稀缺物品，与不在同一指挥链中的其他单位联系有限。每个研究所都试图提供自己的员工住房、交通、实验室空间和仪器，并储备设备和人员。与其他机构交流信息的渠道有限，常常导致研究的重复。

国家组织和行政

研究机构属于更大的系统或等级制度，由指导和资助其下属机构的行政机

构定义。科研院所分为五个主要子系统，在中国被称为“五股主力军”（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院所）；这五个子系统在行政上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接触或交流。

中国科学院

8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仍然是自然科学领域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它在中国各地管理着大约120个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1986 年，学院雇用了 80,000 人，其中科学人员 40,000 多人。它还经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坐落于安徽省合肥，还有自己的印刷设备和科学仪器工厂。其研究所专注于多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并进行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研究（如超导材料研究）。中科院院所聘请了中国最优秀的民间科学家，拥有比其他四个研究系统的院所更好的实验室、设备和图书馆。该学院专注于基础研究，旨在辅之以更多的工业部委或地方政府附属机构的工作，这些机构专注于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家科委，但实际上直接向国务院报告。1956年以前，科学院直接负责总体科学规划，1987年保持了较高的机构自主权和对国家科学政策的影响。该学院应要求向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和机构提供专家建议。它的专门研究机构也为军事研究和发展计划工作。此外，它还负责多学科研究，监测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并建议应该购买外国技术的领域。1980年代，学院一再被要求更加关注生产的需要和知识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包括全国最资深和最知名的科学家，其中一些与高级政

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私人联系。这种关系和学院的声望帮助它在国家预算过程中赢得了优惠待遇，并且在相对较少的外部干预下运作。它的相对特权地位引起了工业部下属资金较少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不满，据报道，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些规划人员——认为该学院资金过剩，而且人员过多，理论家对国民经济贡献甚微。

国家科委

国家科委是国务院一个部级的机构。负责监督电子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各工业部委或省、地、市局下属的民间研究所的工作。中国1万家科研院所中，80%以上属于这一类，其质量范围相当可观。中央计划者和管理人员认为低质量研究机构的激增是对稀缺研究资金的浪费，但到 1987 年中，他们无法推翻强大的部委或地方政府。这些机构雇佣了中国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被期望致力于科学的应用和有益的创新和研究，改进工业过程和产品。他们与工厂和制造业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将研究结果向上级部门或部委的指挥链报告，后者负责将其传递给工厂。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没有机会与从事类似工作但隶属于不同部委或委员会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主要负责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协调工作，协调科学政策与国家计划和预算工作。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部长和副部长在国家和党的高级别表明了科学和科学政策的重要性。省级单位，负责预算、规划，并协调跨行政等级的工作，有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在政策制定和咨询中的职责划分不完全明确，在交往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和争论。委员会知道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并整体批准学院预算，但不能指导学院内部的资金分配。

国防科工委

自 195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大部分研发工作已投入军事工作。据报道，军事研究设施和工厂拥有中国训练有素的人员、最高水平的技术和优先资助。虽然军事部门被保密所笼罩，它的工作显然已经造成了很大程度上自主开发核和热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并成功发射和回收通信和侦察卫星. 军事研究部门的信息很少公开，许多军事研究中心被隔离在中国西部偏远的沙漠和山区，从而加强了保密性。中国军事技术整体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并不高，核武器和导弹的成就显然是资源集中、特色专业和产业有效协调、坚决领导、实现单一、明确的目标。风格让人联想到1940年代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其成果展示了苏联式组织研发模式的有效性。

军事部门是在与民用经济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直到 1980 年代，其较高的技能水平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小。整个 1980 年代，人们努力打破分隔军用和民用研发系统的一些行政障碍。军界享有相对特权，自力更生。尽管如此，电子和计算机应用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的大部分军工工业已经过时。因此，产生了军事研究单位和民间机构之间更多接触的压力（与国外的接触和最新的国外技术，超过了军事机构的技术水平）。

1987年，军事科研院所的工作继续由国务院国防科工委指导。1982年，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办、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和装备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建国家国防科技研究院。NDSTIC 的运作方式类似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专注

于组织军事研究机构和工厂的垂直指挥链的高层规划和协调。

在高校和企业中的研究

由于中国在科学和工业组织上采用了苏联模式——研究、生产和培训严格分离——中国大学很少进行研究。国家教委仅提供很有限的经费支持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高校科研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在 1980 年代，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在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成立。世界银行加大支持中国大学的研究和更好地利用教职员工稀缺技能的重大努力。不过，总体而言，大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仍然很小。

与生产性企业相关或组织起来的研究机构非常罕见，是五个研究机构系统中最小的一个。只有最大的矿山、油田或工厂，例如辽宁省鞍山钢铁联合企业或北京燕山石化联合企业，才有自己的研究单位，致力于解决 1980 年代后期生产中的紧迫问题。企业专注于生产，他们的经理几乎没有动力去承担与创新相关的风险。

规划科学研究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尝试根据中央国家计划组织研究和开发，但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中国自 1957 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科学发展计划范围很广——列出了主题和优先领域，但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试图向特定的研究机构发布目标或日期。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期，保障就业和资金的“铁饭碗”既适用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企业或国有部门的工人。没有任何研究所因未能按计划进行发现而削减预算，也没有科学家

因未能发表或在研究中取得进展而被解雇。

研究中的大部分主动权似乎来自底层，研究机构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交了项目和资金建议。该委员会的计划是在科学家和研究所所长建议似乎可行和值得的工作的会议之后制定的。该委员会北京总部的员工在 500 至 1000 人之间，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科学或经济背景。他们的一些精力用于与中央行政部门的其他部门，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沟通和协调。国家科委的职责和权力的核心是研究和立项资金的分配。它既不具备专业人力，也没有专门知识来监测它所监督的数千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它必须专注于重大项目，依靠专家科学家和区域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处理新项目的报告和申请。它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平衡"对有限资金的竞争要求，并且它的决定通常是基于科学价值以外的其他理由做出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科学研究提出了集中规划的言论，但研究活动更加分散，更容易受到来自强大部委和省级政府的压力。

行政系统的整合

在 1980 年代后期，五个研究子系统中的两个——中国科学院和军事系统——在接受政府资助和提供稀缺资源方面相对享有特权，并且在历史上倾向于形成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领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系统包括最多的研究机构，其特点是质量差异很大，垂直的、官僚的组织模式阻碍了合作和信息交流。大学和大型工业园区附属的研究机构都缺乏资金，脱离了研究的主流。

总体而言，中国科技结构的特点是熟练劳动力分布不均、普遍分散、条块

分割和研究重复——这是 1950 年代决定采用官僚科技组织模式的结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清楚这些问题，多年来，以两种形式的组织补救措施作出回应：高层协调机构和跨越行政边界的群众科学协会。

科技领导小组

中国的科学体系和发展在科学和工业组织的苏联模式，是由行政机关驱动的、旨在协调纵向组织管理层次的活动。

1983 年 1 月成立了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这是国务院为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而成立的专门工作组，为满足日益增加的权威性和综合性协调的需要而做出的努力达到了顶峰。它跨越行政边界，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科技决策机构。1987年由赵紫阳总理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委员、原国家科委、中科院院长方毅，国家科委、国家科技委、国家计委、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教育部领导成员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劳动和人事部。由总理领导的领导小组表明中国领导人对科学政策的重视以及解决争端和鼓励合作所需的权力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在行政等级的低端，交流与合作旨在由专业组织推动，其成员跨越行政边界。主要组织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一个非政府的群众组织。因为它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且像中国所有的组织一样，由党的干部领导，它的自治是有限度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一个伞式组织：1986 年，它由 139 个按学科组织的国家科学学会和 190 万个人会员组成。它继承了 1910-20 年

成立的早期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要服务于三个目的。首先，与大多数国家的专业协会一样，它在会议、讲座和联合项目中将个别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与来自其他机构的专业同行聚集在一起，并促进了跨行政边界的交流。其次，科协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这是通过出版面向高中教育受众的科普期刊和书籍，以及通过系列讲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进修培训以及为农民、农村和小规模工业提供咨询来实现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其会员协会越来越多地给政府官员担任顾问。三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中国国际科学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接待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在中国主办国际科学会议，参与与外国协会和科学机构的许多联合研究项目，并代表中国参加了许多国际科学学会。

国际关系

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自我封闭和自力更生后，国际科学交流的规模空前扩大。1980 年代的对外开放政策是邓小平现代化处方的基本要素，在科技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见四个现代化）。）。目标是帮助中国的科学技术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害。这是通过参加国际会议、与外国科学家合作开展项目、派遣数千名中国研究生和高级研究人员到国外大学进行培训和联合研究来实现的。

科学合作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出访往往以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为标志。1987 年中期，中国与 133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其中的 54 个国家签署了正式的政府间科学合作协议。

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成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此后，两国政府签署了28项科技合作协议，涵盖地震预测、工业管理等领域的科技合作。中国与技术先进的国家和科学能力薄弱的国家都有互利的科学交流计划。尽管中国倾向于从更科学的国家获得援助，并向欠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但科学交流中隐含的平等使其成为一种有用的外交形式。

1987 年，中国与 106 个国家建立了科学交流关系——通常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外国同行之间的协议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完成了500多个联合项目，与西欧各国的同行进行了1500个项目，与东欧国家的同行进行了300个，与日本研究人员至少进行了30个。1986年6月，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签署了在未指定领域进行科学合作的协议。与美国的许多交流涉及华裔美国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来美访问的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并访问中国，讲授他们的专业并为科学机构提供建议。

到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或其组成协会是96个国际科学学会和委员会的正式会员，300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机构任职。中国在 1980 年代也是联合国科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除了1979年至1986年间中国派往国外接受培训的35,000名学生外，约有41,000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各种国际交流。1980年至1986年，中国举办了155次国际学术会议，有1万名外国学者和3万名中国与会者参加。中国还聘请了大量外国专家，通常是退休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作为短期顾问——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管理。

这些国际交流代表并将继续代表中国政府努力提高科学水平的最成功的方

面之一，并展示了在中国官僚科学组织下可能的集中指导和资助的力量。这种组织模式的弱点是，它在改善国内科学技术机构的内部运作和生产力的努力不太成功。

改革计划

科技系统的缺点

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1980 年代后期的整个科学技术体系，拥有 800 万人员和 10,000 个研究机构，是一项昂贵、未充分利用且效率不高的资本 投资. 到 1980 年代初期，对该系统的不满已经普遍存在，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同意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必要性。领导层的主要抱怨是，尽管 30 年来针对科学家和工程师态度的政策声明、中央计划和政治运动，科学仍然不能满足经济的需要。改革派的政治领导人和资深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组织问题，这些问题是从苏联采用的制度中固有的，而中国的工作单位和终身工作分配实践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

1982 年 10 月，赵紫阳总理在全国科学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以下主要问题：科学领域发展不平衡和缺乏协调；研究和生产单位之间缺乏沟通；研究和设施重复；机构、行政机构和等级制度之间的竞争；人员分配不均，一些单位和领域人员过多，而另一些则非常缺乏技术人员。赵的演讲借鉴了科学家和行政人员对管理和组织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强调了部门主义、条块分割和工作分散的盛行。这些问题，再加上管理不善、管理人员教育程度低、缺乏对工作好的奖励或对表现不佳的惩罚，以及研究单位和生产企业之间缺乏直接沟通，导致科学和技术机构未能为生产和经济增长服务。

程序

1985年3月，党中央经过广泛讨论、协商和试验，要求全面改革科学管理。《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改革，是对以往做法的重大突破，对国家产业经济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通过改变资助研究机构的方法，鼓励技术商业化和技术市场的发展，以及奖励个别科学家，1980 年代中期的改革旨在鼓励将科学应用于工业需求. 预计大多数研究机构将通过咨询和合同工作来支持自己，并通过伙伴关系、合并、合资或其他适当和双方同意的方式与工厂合作。最终目标是鼓励交流与合作，打破中国研发结构的条块分割。

完成改革的主要手段是改变资助制度，迫使科研院所与生产性企业建立联系，直接支持这些企业开展工作。将逐步取消对研究机构的直接拨款，取而代之的是研究机构在市场上销售服务的制度。中科院、工信部、省级政府、高校，甚至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属各研究所之间的差别要最小化，都在一个单一的市场化体制下竞争和合作。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将争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后来成立）。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减预算，而是要增加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总投资。

80 年代后期将发展技术市场和技术商业化，以鼓励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减少对研究的直接集中管理和监督，研究所由年轻的、技术合格的主任领导，他们被赋予广泛的权力来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寻找合作和咨询的合作伙伴。科研人员将获得更好的薪酬福利、成就的认可，以及补充咨询工作和转移到更能发挥其才能的单位的权利。

在 1980 年代，研究机构和中国的所有工作单位一样，通过尝试尽可能自给自足来应对供应不确定的经济体系。跨越非常严格界定的行政边界的信息、服务或人员交流很困难，导致无法共享昂贵的进口设备和广泛的设施重复。缺乏其他研究机构的工作信息，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经常导致研究的重复。

与中国的所有其他工人一样，科学家被政府劳动局分配到研究机构或大学。此类任务通常不反映专业技能或培训。任务是永久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很难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单位。在许多情况下，人才或专业培训被浪费了。可能有资金购买外国先进设备的研究所往往无法聘请中国化学家或数学家。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供不应求，而且许多人就业不足或失业。

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而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则以经济、产业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为前提。总的来说，科技改革代表了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全面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该领域的应用。两项改革“决定”都强调了机构的更大自主权、市场的更大作用、更多竞争以及对成功引入改进产品和流程的奖励。在每种情况下，目标都是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1980 年代改革的核心条款涉及资金、技术市场和合作企业，以及个人研究人员的权利和潜在的工作流动性。改革者的意图是改变经济体制的基本条

件，使曾经推动工厂和研究机构管理者走向条块分割、重复和囤积资源的利己主义，将推动他们走向合作、分工。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由于这些改革与 1950 年代以来制定的程序大相径庭，领导层预计它们的实施会很缓慢，并计划在几年内分阶段进行。

也许是因为资金在整个改革计划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因为处理预算的行政机制已经到位，1985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许多具体的资金研究规定。1986年2月，国务院发布暂行规定，列入国家年度经济计划的科技项目以合同研究的形式完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同公开招标。银行将根据合同监督支出。开展基础研究的研究所的正常运营费用由国家担保，但所有其他收入将来自竞争性研究补助金. 政府将继续完全资助公共卫生和医学、计划生育、环境科学、技术信息、气象和农业领域的研究机构。1986年新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明确仿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从 12,000 份申请中选出的 3,432 个研究项目发放了第一笔竞争性奖项，总额为 9,500 万元。单个项目的奖金数额并不大，但建立并广泛宣传了竞争、无视行政边界、专家评审、个人或小组提案的先例。并且，早在 1987 年，NDSTIC宣布，今后武器采购和军事研发将通过合同和竞争性招标进行管理。

技术市场和合资企业

技术商业化需要市场，80年代后期的中国不得不发展市场机构来处理专利、技术销售和咨询合同。这是一项重大的努力，并承诺需要很多年。决定如何设定技术价格以及如何编写和执行技术咨询合同被证明是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市场的复杂性。此外，中国缺乏支持此类市场的法律和商业框架。尽管如此，机构和工厂还是大量参加“技术交易会”并建立了合

同关系，1986年技术贸易总额估计达到23亿元。研究机构和大学成立公司来销售技术服务和开发产品。甚至以前自成一体的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公司，出口特种磁铁和开发光学产品。

80年代后期，中国的技术市场和科技知识商业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混乱、发酵和动荡中迅速增长。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技术的商业化难以实施，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在 1987 年 2 月宣布，将大部分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并入大中型生产企业，与科研院所协调研究生产的需要。技术市场将采取的确切形式尚不清楚，但它的发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不太可能停止或逆转。

人员和工作流动

一方面，中国科技体系最重要的元素是人力资本——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 1980 年代，中国媒体普遍承认，科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待遇不高，工资低，生活条件艰苦，生产力下降。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的能力被浪费了，因为他们被分配到他们专长之外的工作，或者因为他们的研究所已经拥有其领域所需的所有专业人员，他们没有办法换工作。许多中国科学政策作家们熟悉西方专家的结论，即人员流动促进了科学进步和科学在实际问题中的有效应用。相应地，1985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改革人事制度，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

然而，在整个 1980 年代后期，工作流动和试图将科学家安置在他们的才能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是改革中取得的最少的方面。科学家从一个单位转移到另一个单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而且相对较少。据国家科委

统计， 1983年有2%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改变了工作单位，1985年只有4%。人员调动仍需得到所在单位负责人的许可，而这一许可往往被拒绝。许多研究所所长被指责有“封建心态”，即把人员当成单位财产的一部分。

即使在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政策后，科学人才的转移也存在困难，这表明中国独特的就业和经济组织工作单位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它给改革带来的障碍。允许人员自行决定搬出国家和党派给他们的工作单位，这是与中国自 1949 年以来制度化的做法的重大决裂。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由于这对当局的潜在挑战（党控制所有工作单位的人事事务、科学家的工作流动性），尽管它可以促进科学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但改革可能过于极端，不可行。

技术转让

政策

中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依赖于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任务是引进技术，改造和升级数千个生产力和能源效率水平远低于国际通行标准的工厂、矿山和发电站。

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声明强调需要改善现有设施，进口技术而不是成品，并通过选择性购买关键技术而不是购买整厂来改造工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因为中国以前的技术转让经验，无论是在 1950 年代大规模的苏联技术援助计划中，还是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期对化肥和石化工厂的适度采购中，都以大型项目为特色，引进的是完整的工

厂。在 1980 年代，进口的大部分技术是生产或加工技术，代表了生产中国已经制造的产品的更好方式，例如卡车传输或电话线。此类技术通常是外国公司的专有知识，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与此类公司合作的意愿。中国以促进技术引进为明确目标，大力吸引外国企业和外资，允许合资企业甚至外资子公司在华经营。

中国的经济计划者优先引进电子、电信、发电和输电、交通运输设备和节能设备的技术。1980 年代，中央控制技术进口的程度有所波动，反映了外贸政策和外汇收支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是将决策权下放给使用技术或设备的人。提供银行贷款和其他手段来鼓励最终用户选择合适的技术。

传输方式

从外国公司转让专有技术是一种商业交易，这种交易有多种形式。中国当局选择合资企业作为其首选的技术转让模式。在此类企业中，外国和中国合作伙伴都出资，各自提供其优势（通常是来自外国合作伙伴的技术和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以及来自中国合作伙伴的工厂劳动力），然后管理和利润分开。许多拥有中国想要的技术的大型外国公司一直不愿在此类企业中冒险投资。但是，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同意生产喷气式客机、计算机和机床等产品，中国当局可以声称其政策取得了成功。

将技术与经济联系起来

由于积累了与外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中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谈判合同，仍然允许在使用外国技术方面进行必要的培训和

咨询。到 1980 年代后期，外国技术的转让已成为正常的商业交易。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正在成为总体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在进口工厂的技术吸收和决定进口哪些外国技术方面面临问题。中国规划者和外国技术供应商逐渐清楚，这些问题反映了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整体缺陷，它们是普遍的经济和管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管理者视为经济和产业管理改革。因此，引进和吸收外国技术的努力有助于统一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并克服中国领导人自 1950 年代初以来一直试图解决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分离的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ience_and_technology_in_China

中国科学技术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中国政府已经将重点通过提供资金，改革，科学技术的社会地位作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的威望。中国在教育、基础设施、高科技制造、

学术出版、专利和商业应用等领域取得了快速进步，现在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现在越来越以自主创新为目标，旨在改革剩余的弱点。

历史

在19 世纪多次被日本和西方国家打败后，中国改革者开始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后，按照苏联的模式组织了科学技术研究. 它的特点是由非科学家领导的官僚组织，按照中央计划的目标进行研究，产学研分离，专门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实际应用，限制信息流动。研究人员应该作为社会的集体工作，而不是作为寻求认可的个人。许多人在苏联学习，也转让了技术。文化革命试图以去除认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态度，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其中包括科学界和正规教育受到攻击的其他措施，知识分子被派去从事体力劳动，大学和学术期刊关闭，大多数研究停止，近十年来中国没有培训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启发的系统随后被逐步改革。媒体开始宣传科技、科学思维和科学成果的价值。

国务院于1995年发布了描述计划科技发展，为未来几十年的“关于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它将科技描述为第一生产力，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和生活水平。科技应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不仅苏联式的研究所应该做

研究，大学和私营企业也应该做研究。国家机构应与中外风险投资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便科技发展能够进入行业。科技人员的职业流动性应该更大，薪酬应该与经济成果挂钩，年龄和资历对个人决策的重要性应该降低。应尊重知识产权。应加强信息交流，对项目进行竞争和公开招标。应该保护环境。重点推进中国本土科技。公职人员应提高对科技的了解，并将科技纳入决策。社会，包括共产党青年组织、工会和大众媒体，应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和人才。

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国专注于建设道路和港口等实体基础设施。过去十年的一项政策是要求技术转让，以便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现在越来越注重自主创新。在此期间，中国成功地发展了创新基础设施，其基础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 100 多个科技园区，并鼓励了国有部门以外的创业。Yip 和 McKern 认为，随着创新能力的成熟，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到 2017 年，其中许多企业已达到世界标准。他们现在在中国市场和越来越多的外国市场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正在建立本地业务。

技术民族主义

它已被用来描述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技术政策，尤其是在亚洲。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植根于 19 世纪中国在更先进国家手中的屈辱。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科技发展对于实现经济富裕、国家安全和国家声望至关重要。缺乏本土技术知识产权创新被视为关键的国家问题。因此，21 世纪出现了一系列中央政府举措，旨在更广泛地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发展。其中包括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2006-20）、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互联网+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计

划等。

通过这些举措，中国政府以多种方式干预经济，促进国家技术发展，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优先保护和引导重要的行业和公司。有系统地努力用本土技术取代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外国公司在技术转让和将研发转移到中国方面得到了许多奖励。同时，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这些政策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突，尽管中国在政策受到挑战时往往表现出灵活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失去影响力，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成就被视为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辩护和社会粘合剂。一些科技大型项目被视为出于宣传目的而进行的有问题的奖杯项目，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充斥着对中国成就的报道。2019年，有报道称中国政府已下令在未来三年内更换安装在政府办公室的所有外国PC硬件和操作系统。其他报道称，中国政府将增加对科技公司的补贴。

国内研发总支出

在《科学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2006-2020年）》中，中国确定了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2.5%的目标。发展 (GERD) 从占 GDP 的 1.13% 上升到 1.98%，表明该国有望实现其目标。

研究机构Battelle估计，到 2023 年，中国的 GERD 将超过美国。然而，几个趋同的因素对 Battelle 预测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2014 年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 2012 年以来的工业生产和主要股市在 2015 年中下滑。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GERD 在 2015 年稳定在 GDP 的 2.07%。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5 年中国将 5.1% 的研究支出用于基础研究。这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 4.8%，但低于 2004 年（6.0%）。长期对试验开发的政策重点导致企业贡献了中国研究支出的四分之三（2015 年研发支出占总支出的 77%）。企业专注于实验开发，到2015年占其研究总支出的97%。企业贡献了2000年GERD的60%和2008年的74%。2004年，74%的GERD进行了实验发展。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础研究占总研究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

机构

国务院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紧随其后的是涉及科学和技术各个方面的几个部委和部级组织。由主要科学机构领导组成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尝试组织国家政策。整体协调的效率受到质疑，被视为任务重叠和资源竞争的各个机构，有时会进行浪费性的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对科学和技术战略和政策负有主要责任。它还管理国家研究计划、科技开发区和国际合作。教育部负责教育以及在大学的科研院所。其他几个部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和农业部也参与科技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指导社会科学和哲学规划工作。

中国科学院（CAS）是最负盛名的专业科学机构。它指导许多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研究生培训项目，并提供有影响力的建议。中国工程院(CAE) 提供了重要建议，但与 CAS 不同的是，中国工程院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CASS）也有类似的作用。还有许多更狭窄的学院，如中国水产科学院。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 在经过同行评审后向个人研究人员提供资助。

在解放军总装备部指挥军事研发。

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性科学学术组织也是科技研究的重要力量。

中国科学新闻学会主持中国技术传播学会，中国第一个政府批准的技术传播协会。自2002年以来，该集团每年都举办年会。

研究由政府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私营企业进行。

地方政府在研发资金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可能占政府支出的一半。研究和高科技产业的激烈竞争有时会造成浪费性的补贴过剩产能，以及对

很快过时的技术的官僚补贴判断不力。

国家项目

截至 2010 年，中国的国家研发计划包括：

关键技术计划

国家高技术计划（863计划）

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星火计划-农村技术

火炬计划 - 通过创建特殊的高新区和孵化器进行新技术商业化

重点实验室计划

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科研院所专项技术开发项目

科技促贸行动计划

国家新产品计划

农业科技转移基金

2010 年，国家重大项目获得了政府研发支出的 15-20%资助。它们在经过

规定的竞争性提案程序后资助大学、研究所和企业的研究。重要项目可能会从多个资金项目中获得资助。这些计划可以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也涉及丑闻、腐败和欺诈。他们被指责主要是制作衍生作品而不是推动创新，并且据称他们在选择项目时忽视了优点而偏向任人唯亲。中国正试图通过更多的同行评审和评估等措施来提高效率。

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创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它们具有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加出口、改善区域经济的目的。他们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并且已经从最初的 14 个扩大到了 54 个。

教育和研发人员

中国学生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测试，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来自上海的15岁学生在所有三个类别中排名第一：数学、科学和阅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对中国成绩的一种解释可能是一种强调教育和竞争性考试的文化，以及由于较少参与体育等活动而花费更多时间学习的文化。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地位更高的职业。此外，进行了重要教育改革的工业化上海可能无法代表中国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考试有作弊或技术问题，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的上海可能允许特别优秀的学生在这座城市学习，学生可能被告知考试对中国的形象很重要. 经合组织测试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表示，结果预计会产生惊人的结果，在经合组织收到上海分数后，国际专家已经对其准确性进行了审查。他还表示，结果“反驳了普遍持有的假设，即中国只会产生死记硬

背”，“这些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证明了他们能够从他们所知道的进行推断，并在新情况下非常创造性地应用他们的知识”。他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根据施莱歇尔的说法，俄罗斯在死记硬背的评估中表现良好，但在 PISA 中表现不佳，而中国在死记硬背和更广泛的评估中表现良好。2018年，中国四大地区（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排名均位居榜首，中国的学童现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中国高中学生在很多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多次获得金牌，如国际生物奥林匹克，国际奥林匹克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国际奥数，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人员来源地之一。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59 万。相对于人口规模，与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这仍然很低，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自 1990 年代初以来，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加了十倍。在 1998-2007 年期间，大学的一般学生人数从 100 万增加到 540 万。仅在 2009 年，中国就产生了超过 10,000名博士。工程专业毕业生，以及多达 500,000 名理学学士工程、数学、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中国大学贡献了异常大的专利份额。大学从私营企业获得大约一半的研发资金。

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人员225万人次，2011年出国留学人员34万人，比上年增长20%。近年来，共有81.84万人次回国。2011年回国18.62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38%。中国为回国的受过外国教育的优秀中国人提供了多项好处。52% 的人认为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这与之前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74% 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最好的日子即将到来。68% 打算创业。回国后，外国受教育的学生往往为科学研究和产业提供重要的科学技术知识、管理技能和创新能力。高科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受过外国教育。

华侨

与其他侨民及其家园一样，海外华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们被视为通过商业活动和公共非营利合作将贸易、投资和现代技术带到中国的重要渠道。通过利用“人才培养”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华人回国工作，中国在其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取得了显着改善，尽管这种技术的可持续性存在一些局限性。

工业间谍

中国海外情报活动的目标之一是工业间谍活动以及获得军事技术。私营公司也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机构怀疑，数以千计的西方公司可能受到可追溯到中国的数据泄露事件的影响。

国际合作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05年的文章指出，中国有政府间合作的科技协定有96个国家，有152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科技计划，并参与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合作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增多。中国科协和技术及相关组织，以及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参加了很多的国际合作组织。

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组织专家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281人，担任常务理事以上职务293人。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和研发

1980 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开始通过许可协议和设备销售来转让技术。在 80 年代后期，许多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开始转让技术，以便在中国扩张。中国在 1990 年代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外国投资法规，通过这些法规，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是为了技术转让。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被要求停止这种做法，但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仍在继续。中国批评人士认为，这种技术转让可能有助于追赶，但不会创造新的尖端技术。

中国越来越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中国批评人士认为，外资研发主要有利于外国公司，并使许多有才华的中国研究人员从本土公司和机构中流失。中国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研发是本土公司的榜样和鼓励，并创造了劳动力和知识可以轻松流向本土公司的技术社区。2010年有1200个这样的研发中心，400个世界500强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发中心。企业认为，这是使产品适应中国市场当地要求的必要条件，也是利用众多可用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当跨国公司被问及未来的研发中心最有可能设在哪个国家时，中国现在排名第一。

创新

2005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帮助将科技工

作转化为成果的服务存在问题，支持科技的国家资金分配远未达到最佳状态。有时，如果研究人员过于接近市场，就会变得目光短浅。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往往先购买国外技术，而不是在国内投资开发技术和技术开发能力。许多专利申请来自中型企业（70%），因为小型企业在研究上投入很少。中国等级森严、自上而下的社会，权威受到极大的尊重和恐惧，被认为扼杀了创造性的辩论。

中国在 2006 年的一份报告中概述了促进创新的政策。其中包括纳米技术、高端通用微芯片、飞机、生物技术和新药等领域的20个大型项目。这与硅谷模式的自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该模式由小型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产学合作组成。

也有人认为，中国在对现有设计进行小的创新改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个例子是对电源设计的不断改进，使它们逐渐变得更小、更便宜、更节能。这可能不会创造全新的产品或创造头条新闻，但可能对创造就业更重要。

NBER 2016 年的一篇论文发现，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创新。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世界经济市场机会扩大”是创新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该研究还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要多得多，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于私营企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了 10.3%，达到创

纪录的 2.44 万亿元人民币（3780 亿美元）。

采购

作为高科技产品的大买家，中国中央政府在 2009 年提出了有争议的政策，要求向其出售产品的公司促进中国的创新，并且出售的产品没有外国知识产权。最具争议的部分后来被撤回，但中国地方政府继续通过采购来鼓励自主创新。

知识产权

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一直被视为薄弱环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会阻碍本土创新，并已努力加强该系统。

中国被指责不保护外国知识产权，默许此类技术被复制并声称是中国知识产权，甚至直接促进外国技术知识产权从外国公司转移到中国公司。外国公司被要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中国当局透露许多技术的内部运作；并指责中国安全部队非法与民用工业共享这项技术。

专利

2011年，中国成为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然而，这部分反映了政府鼓励公司提交专利申请，无论最终是否获得批准。中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比例从 2006 年的不到 52% 上升到 2010年的近 7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海外专利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目标是

将经济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设计”，从合同代工转变为拥有品牌从而提高利润率的公司。

尽管中国正在快速追赶，但在海外专利数量方面仍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18 年美国在国外提交了 230,085 件等效专利申请，其次是日本（206,739）、德国（106,753）、韩国（69,459）和中国（66,429）。

标准

为了鼓励创新和避免外国知识产权，中国一直在制定本土技术标准。一个例子是TD-SCDMA 3G标准。批评者认为它成本高昂且延迟了 3G 的引入，而支持者则认为它增加了技术能力和经验，从而增强了中国在4G 方面的竞争力

学术出版

英国皇家学会在 2011 年的一份学术出版报告中指出，在英文科学研究论文的份额中，排名先后的次序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预计 2015 年中国在所有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将与美国一样多。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将在生命和社会科学领域超过美国。2017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科学出版物数量最多的国家。

对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

文章中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1.85% 增加到 2011 年的 11.3%。根据同一份报告，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论文在过去十年中是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增长缓慢。2007 年中国仍仅贡献 1.39% 的研究，中国大陆仅在 2006 年超过香港。经济与商业的份额大于社会、政治与传播科学和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家在未列入索引的国家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且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职业动机较少，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而言，控制比自然科学更重要。在中国，自然科学由科技部管理而社会科学由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这可能会阻碍跨学科合作。

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发表的与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相关并被PubMed收录的文章平均每年增长31.2%和22%。随机临床试验约占临床研究文章的 1/3。然而，在 2009 年，这仍然仅占全球临床研究文章的 1.5% 和全球随机临床试验的 1.7%。医学生临床研究教育和医生参与临床研究的支持环境存在不足。

有 8,000 种期刊和 4,600 种科学领域的期刊。几乎所有的中国科学组织都出版自己的期刊。政府拥有或支持大多数期刊，只有少数是私人拥有的。"出版或灭亡"系统被认为会导致许多不常被引用的低质量期刊和文章，以及抄袭和欺诈。中国政府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对一些期刊进行了处罚或终止，旨在加强对期刊的质量控制和同行评审，并创建五到十家大型出版集团。作为改革的一部分，2012年中国科协监督 1,050 种期刊，在

一份声明中列出了各种形式的不当行为、剽窃和欺诈，以及对实施这些行为的处罚，例如书面警告、列入黑名单、联系研究人员的主管机构或资助机构，或公开披露。

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由各种参与者拥有，例如地方政府和政府机构。它们可能会受益于规模较小、更具创新性的公司所不具备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一直被视为存在问题。2010年，国有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多次中标，因为他们几十年不担心投资回报，忽视风险和成本。所有者可能试图通过法规保护其企业免受竞争或以其他方式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其影响力，这可能会扼杀更多创新的私人竞争对手。在 2002-2007 年期间，民营企业在研究支出、专利申请和研发实验室的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国有企业。

腐败

一些中国科学家，包括浙江大学刘明教授在其 2005 年出版的《学术评价制度批判》一书中，认为政府官员和大学的干预在中国影响不良，官僚机构使同行评审的效果远不如应有的效果。刘认为，以数字衡量一切的命令与经济心态与普遍的政治干预相结合，导致了中国科学界对金钱、人才和严重腐败的极大浪费。

研发的特定领域

2009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将在以下重点领域启动科技创新2030重点工程：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一个深海站；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脑科学和脑研究。该项目还包括创新种业、智能电网、天地信息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9个子项目。

农业

耕地和水都缺乏，这意味着只有新技术才能增加中国农业的产量。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因此呼吁进行“农业科技新革命”。在公众广泛关注后，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和法规已经出台或提出。中国一直在购买数百万只外国种畜以及大量外国精液和家畜胚胎，以迅速改善中国牲畜的遗传。更先进的农业方法，例如增加使用农药引发了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担忧。

水产养殖和渔业

2008年中国渔业占全球产量的34%。中国水产养殖产量是捕捞产量的两倍多，占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62.3%。水产养殖的快速增长部分归功于中国的研究，例如鲤鱼的人工养殖。

化学、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

201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在纳米技术领域的学术论文份额从 2000 年的不到 10% 增加到 2009 年的近四分之一，并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然而，中国在前三名期刊和引用方面的影响力较小，表明质量较差。在发表密度

方面，美国仍然领先，每百万居民中有 68.76 篇关于纳米技术的文章，而中国在 2014 年为每百万 25.44 篇。中国在发表数量方面排名第二。

根据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材料科学和化学领域学术论文的四分之一，物理学领域的论文数量占全球的 17%。 但仅占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 8.7%。尽管如此，这与 1999 年至 2003 年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出版物的世界份额仅占 1.4% 相比有了大幅上升。

半导体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尽管得到了政府的广泛支持，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创新设计。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即将过时的技术的指导不力和地理上分散的努力，缺乏工程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造成的。然而，各种趋势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例如重新强调市场机制而不是直接支持、集中力量、留学人的回归、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压力增加、中国本土技术标准以及需求增加。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同时以1500亿美元支持其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和开发商清华紫光集团，以确保中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在未来5年内打造世界一流的半导体产业.

环保技术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许多环境问题和日益严重的污染。中国的应对措施之一涉及先进技术，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和对车辆的高燃油效率要求。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其废水处理系统和电厂减排系统。由于中国的水危机以及未来的出口，中国正在建立其海水淡化技术能力，并计划建立一个本土产业。部分城市实施了广泛的节水措施和回收计划和技术。

军事技术

根据一些非官方估计，政府研发支出的 15-28% 可能会用于军事研究。中国的国防部门几乎仍然是完全国有的，但军事装备生产已重组为法人团体，允许有限竞争，国防专利制度已改革，以允许对创新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多奖励。与民用部门的合作有所增加，国家支持的民用研究有时具有双重用途。中国喷气发动机仍然是一个引起最高层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制造商的进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研究和生产线继续以苏联式的方式分裂成许多相互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的孤立单元，从而导致整体标准化、集成和质量控制出现问题。由此产生的更多问题可能是工作重复、工作分散以及对赞助的非生产性竞争，从而导致诸如不诚实报告问题等问题。高精度喷气发动机可能对累积的质量问题特别敏感。

采矿和稀土工业

咨询公司 The Beijing Axis 董事 Lilian Luca 在 2010 年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采矿技术的领导者。技术解决方案最初集中于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但越来越重视环境和安全问题，部分反映了中国对环境问题的更多关注。中国在稀土元素等某些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以环境问题为由对稀土元素实施出口配额，其中 95% 的稀土元素在中国开采，但

被指责想迫使使用稀土元素的高科技产业转移到中国。

寻找稀土元素只是第一步，有些人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步。精炼等制造业的其他步骤由中国和日本控制，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失去了所有生产商和大部分基本技术能力，该地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急剧下降。

空间科学

在中国的太空计划是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来源。1970年，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2003年，随着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2008年，中国与神舟七号任务一起进行了太空行走。2011 年天宫一号发射升空，这是中国在 2020 年左右空间站迈出的第一步。 正在进行的中国探月计划包括2013 年的月球车和在 2020 年代可能的载人登月。从月球计划中获得的经验将用于未来的火星和金星探索等计划。

中国计划在2012年为国外客户发射5颗商业卫星，并计划到2015年占领15%的商业发射市场和10%的卫星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共发射了19枚火箭，位居第二俄罗斯。

2016年建成的五百米口径球面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纺织品

2012 年，中国生产了发达国家服装进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近年来，随着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向东南亚和东欧等地区转移，这一份额一直在下降。

交通

交通基础设施继续快速发展。该国道主干线系统是在2011年预计将超过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长度。许多中国城市已经或正在计划建设地铁或其他形式的快速交通。

机动车辆

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然而，中国本土汽车公司在全球市场上遇到了困难，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中国在 2010 年提出了一项有争议的立法，要求外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组建少数合资企业并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共享技术以获得市场准入。一份由世界银行资助的 2011 年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电动汽车的世界领先者。

造船业

在 2009-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但韩国在 2011 年重新获得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技术更先进。中国正在发展其技术能力，预计竞争将加剧。

火车

BBC在2011年一篇关于中国高铁的文章中写道，2005年的中国没有高铁。2010 年，它的数量超过了欧洲，而 2012 年，预计中国的数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中国要求想要参与的外国公司必须分享他们的技术。大约 10,000 名中国工程师和学者在三年内生产出了速度更快的中国高铁，中国现在正出口到其他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ucation_in_China

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主要由国营公共教育系统管理，隶属于教育部。所有公民必须上学至少九年，称为九年义务教育，由政府资助。义务教育包括六年小学教育，通常从六岁开始，十二岁结束，然后是三年的初中教育（初中）。有些省份可能小学五年，初中四年。初中之后是三年的高中，到最后完成中等教育。中国规范教育制度的法律包括《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

2019年，教育部报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增加156.11万人。1985年，政府取消了税收资助的高等教育，要求大学申请者根据各自的学术能力竞争奖学金。1980年代初期，政府允许设立第一所私立高等学府。从1995年到2005年增加了本科生和博士学位的人数。

2003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支持高等学校（大专院校）1552所，教授72.5万人，学生1100万人。有超过100所国家重点大学的211工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认为是中国大学精英群体的一部分。自 1999 年以来，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2011 年超过 1000 亿美元。2006 年中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多达 150 万。到 2008 年，中国在公认的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184,080 篇论文——比 1996 年增加了七倍。2017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科学出版物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也一直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截至 2013 年，中国是亚洲最受欢迎的国际学生国家，在各国中排名第三。中国现在是讲英语的非洲学生的全球主要目的地和世界第二大国际学生人口的来源国。

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被诟病为它的严谨和注重考试。

历史

自文化大革命（1966-76 年）结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朝着经济现

代化的方向发展。1985年，政府通过中共中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基础教育的职责让渡给了地方政府。1985年5月教育改革方案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国家教委。官方对改善教育的承诺最明显的体现在“七五”期间（1986-90 年）教育经费的大幅增加。1986 年，国家预算的16.8%用于教育，而 1984 年为 10.4%。自 1949 年以来，教育一直是中国争议的根源。由于党内不断调整，官方政策在意识形态要求和促进国民教育的实际努力之间交替进行，尽管两者往往不相容。

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技教育成为教育政策的重点。到 1986 年，培训技术人员和扩大科学技术知识已成为最高优先事项。尽管人文学科被认为很重要，但职业和技术技能被认为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最重要因素。从 1976 年开始，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新重视导致采取了外向型政策，鼓励从国外学习。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鼓励知识分子从事支持四个现代化的研究，只要符合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就相对自由。

文学和艺术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也经历了巨大的复兴。传统形式再次繁荣，许多新的文学和文化表现形式从国外引进。

截至2015年，中国公立中小学在校学生2880万人。

发展

到1999年，90%的人口普及小学教育，9年义务教育有效覆盖85%的人口。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因地区而异，农村地区明显低于大城市。家庭必须用学费来补充政府提供给学校的钱，这意味着有些孩子的学费要少得多。然而，父母非常重视教育，并为送孩子上学和上大学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青年和中年人口的文盲率从 80% 以上下降到 5%。该系统培养了约6000万名中高级专业人才和近4亿名初、高中劳动力。今天，2.5 亿中国人接受了三级学校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

中国的教育视野正在扩大。在 1980 年代，MBA几乎无人知晓，但到 2004 年，有 47,000 名 MBA，在 62 所 MBA 学校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也申请国际职业资格，比如EMBA和MPA；近10,000名MPA学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7所高等院校。教育市场飞速发展，计算机和外语等专业资格的培训和测试蓬勃发展。继续教育是大势所趋，一生一次的学校教育已成为终身学习。

国际合作和教育交流逐年增加。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1979年以来，已有69.7万中国留学生在103个国家和地区留学，其中18.5万人毕业回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快速增长；2004年，来自178个国家的11万多名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

近年来，教育投资有所增加；1998年以来，教育总预算的比重逐年提高1个百分点。根据教育部的规划，政府将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体制，强化教育财政责任。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财政支出

增长快于经常性收入。该计划还阐明了政府的目标，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教育投资应占 GDP 的 4%。

对于非义务教育，中国实行费用分摊机制，按费用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同时，为保障低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政府采取多种扶持方式，例如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经济困难学生补贴、学费减免、国家津贴。

正如教育部的一项计划所证明的那样，政府已承诺显着提高整体教育水平；预计到2020年，每10万人中有1.35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3.1万人具有高中学历。据估计，文盲和半文盲率将降至 3% 以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 8 年增加到近 11 年。

教育政策

邓小平广泛的教育改革政策涉及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旨在缩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因此，教育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将教育管理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作为改善教育体系的手段。然而，中央集权并没有被放弃，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学术上，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和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增加学校和合格教师数量，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统一的课程标准、教科书、考试、教师资格（特别是中学阶段），允许自治区、省、直辖市之间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差异性。此外，高等教育招生和工作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减少了政府对高校的过度控制。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不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

教育系统

义务教育法

1986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因地制宜的普及教育的要求和期限，保障适龄儿童至少接受九年教育（六年小学教育和三年中学教育）。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在一定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步骤、方式和期限。该计划旨在使接受过四到六年义务教育的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保持一致。

省级政府制定计划，制定法令和规则，向县分配资金，并直接管理少数重点中学。县政府将资金分配给每个乡政府，以弥补任何不足。县政府负责教育教学监督管理，管理本县高中、师范学校、教师在职培训学校、农业职业学校和示范中小学。其余学校由县、乡政府分别管理。

义务教育法将中国划分为三类：沿海省份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腹地的少数发达地区；中等发展的乡镇；和经济落后地区。

到 1985 年 11 月，第一类——较大的城市和大约 20% 的县（主要在中国较发达的沿海和东南部地区）已实现普及 9 年教育。到1990年城市、沿海省级单位经济发达地区、少数发达内陆地区（约占中国人口的25%）和初中普及地区，目标是普及初中教育. 教育规划者曾设想，到 1990 年代中期，沿海地区、内陆城市、中等发达地区（总人口3亿至4亿人）接受9年义务教育或职业教育，5%的人口受过大学教育——为中国奠定坚实的智力基

础. 此外，规划者预计到 2000 年中学教育和大学入学人数会增加。

九年义务教育法的第二类目标是中等发展的乡镇（约占中国人口的50%），预计到 1995 年普及教育将达到初中水平。高等教育预计将以同样的速度发展。

第三类，经济落后（农村）地区（约占中国人口的25%），基础教育没有时间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普及，但国家会尽力支持教育发展。国家还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过去，农村缺乏标准化和普及的初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几代文盲；只有 60% 的小学毕业生达到了既定标准。

作为政府承诺九年义务教育的又一例证，1986 年 1 月，国务院起草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法案，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雇用完成九年学业之前的年轻人。该法案还授权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和补贴。

尽管有义务教育法律，免学费的小学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已实现的目标。由于许多家庭难以支付学费，一些孩子被迫在九年目标之前辍学。

重点学校

“重点学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闭，在 1970 年代末重新出现，并在 1980 年代初成为复兴已失效教育体系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教育资源稀缺，选定的（“重点”）机构——通常是那些有过往教育成就记录的机构——在教师、设备和资金的分配中被优先考虑。他们还被允许招募最优秀的学生进行特殊培训，以争夺更高级别的名校录取。重点学校仅占所有普通高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主要根据入学分数将最优秀的学生输送到最好的中学。

1987 年初，开始努力将重点学校从预科学校发展成为在当地学校传播改进的课程、材料和教学实践的工具。此外，一些官员质疑重点学校在九年基础教育计划中的作用是否合适，因为重点学校偏爱城市地区，以及更富裕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的孩子。长春、沉阳、深圳、厦门等城市和上海、天津的教育部门建立学生推荐制度，淘汰重点学校。1986年上海市教育局取消了重点初中制，以确保“整体教育水平”。尽管努力废除“重点学校”制度，但这种做法今天仍然以其他名义存在，教育不平等仍然受到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广泛批评。

培训学校

培训学校，也称为培训中心，是一种由公司提供的私立教育，在中国教授学生通常为 3-12 岁。这些学校的存在是为了提高学生在英语、数学和中文等学术科目上的表现。培训学校的范围可以从只有一名教师的单间运作到拥有数十万学生的大型公司。

初等教育

小学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小学教育机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 1949 年之前 20% 的入学率相比，1985 年大约 96% 的小学适龄儿童就读于大约 832,300 所小学。与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入学标准更加平等的记录数字相比，这一入学人数是有利的。1985 年，世界银行估计小学入学人数将从 1983 年的 1.36 亿减少到 1990 年代后期的 9500 万，入学人数的减少将减少所需的教师人数。然而，合格的教师将继续供不应求。

根据《九年义务教育法》，小学免收学费，地点合理，方便儿童就读；学生将在他们的社区或村庄上小学。父母每学期支付少量书费和其他费用，如交通、食物和取暖。在教育改革中，家庭贫困学生获得助学金。鼓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建立自己的学校。

到 1980 年，小学入学的学生比例很高，但学校的辍学率和地区入学率差距很大（大多数入学者集中在城市）。只有四分之一的县普及了初等教育。平均而言，每个年级之间有 10% 的学生辍学。1979-83年间，政府承认了“9-6-3”规则，即十个孩子中有九个上小学，六个完成了小学，三个以良好的成绩毕业。这意味着只有大约 60% 的小学生实际完成了他们的五年学习计划并毕业，只有大约 30% 的小学生被认为具有初级水平。1980 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女孩辍学的人数多于男孩。

在《九年义务教育法》和职业技术技能大势所趋的框架内，努力适应和纠正城乡教育差距。城市和重点学校几乎总是按照为期六天的全日制课程运

行，以帮助学生为继续教育和高层次工作做好准备。农村学校通常根据农业季节的需要按照灵活的时间表运作，并试图让学生为成年生活和从事低技能工作的体力劳动做好准备。他们还提供更有限的课程，通常只有语文、数学和道德。为了提高出勤率并使课程表和学年能够完成，农业季节被考虑在内。学校假期搬迁，上课时间缩短，并在农闲季节开设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班。有时，山村聘请巡回教师，上午服务一个村，下午服务另一个村。

农村父母普遍清楚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一些家长认为让孩子上小学也没什么用，尤其是在农业责任制建立之后。在该制度下，父母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长期和短期地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并让他们退学。

中等教育

中国的中等教育有着复杂的历史。1960年代初期，教育规划者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建立正规的学术学校和独立的职业培训技术学校。文革期间中等教育的迅速扩张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由于资源分散太少，教育质量下降。此外，这种扩展仅限于普通中学；技术学校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因为它们被视为试图为工农家庭的孩子提供劣质教育。

1970 年代后期，政府和党的代表批评他们所谓的 1960 年代"统一"方法，认为它忽略了对两种毕业生的需求：学术教育（大学预科）和专业技术教育（职业）。从 1976 年开始，重新强调技术培训，技术学校重新开放，招生人数增加。

在普及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中，普通中学入学率有所下降。到 1986 年，普及中等教育成为九年义务教育法的一部分，规定小学教育（六年）和初中教育（三年）是强制性的。然而，在教育改革中，巩固现有学校和提高重点中学质量的愿望比扩大招生更重要。

初中

初中教育包括最后三年的义务教育。住在农村地区的学生经常被寄宿到乡镇接受教育。

高中

高中教育通常是指从 10 年级到 12 年级。通常，完成六年小学教育的学生将在中学继续三年的学术学习。初中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学术高中继续三年的学术教育，最终会进入大学；或转入职业高中的职业课程。

一般来说，高中通常有两个学期，从九月和二月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操作可能会受到农业周期的影响。学校每周提供的课程数量是非常主观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资源。除了正常的课程外，还提供私人学习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学术课程包括中国，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学，音乐、美术、体育、技术、计算机等。一些学校也可能提供职业科目。一般来说，语文、数学和英语被认为是三个主要科目，因为它们肯定会在高考中考。在大多数省份，学生还需要学习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或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地

理，历史和意识形态与政治学。

在中国，高中毕业生将被视为受过教育的人，尽管大多数毕业生会进入大学或职业学院。由于优秀大学名额有限，竞争异常激烈，家长和学生大多以高考成绩来评价高中。

招生与中考

高中的招生，尤其是精英高中的招生，与国内的大学招生有点类似。学生将通过一个申请系统，在高中设定入学要求之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他们希望就读的高中。一旦完成，高中将根据这些信息公布他们的要求以及他们将在当年提供的名额。例如，如果学校当年提供800个名额，则第800名学生提供的成绩将是标准要求。这可确保学校在该学年申请该学校的所有学生中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

某些顶尖高中还有其他官方录取规则。如果某名牌高中每年要招收800名学生，招生办公室会根据学生的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名，然后从中筛选出前700名学生。其他100个职位提供给不符合要求但仍想在该学校学习的学生。这些潜在客户需要支付额外的学费。一个学生在中考的成绩不能差，如果他们的分数接近要求的标准，如果他们负担得起，他们仍然可以在那所名校学习。

职业技术学校

1996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学校、中等技能学校、职业高中、就业中心等成人技能和社会培训机构。为使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进行了改造，以就业为导向，着力抓好职业教育工程，以满足社会日益尖锐的高质量需求。

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都力求满足现代化的需要。文革后，一些技术和“技能工人”培训学校重新开学，并努力在普通中学开设职业课程（通过提供工业、服务业、商业和农业课程）。到 1985 年，有近 300 万职业技术学生。

教育改革者继续推动将大约 50% 的高中教育转为职业教育，而这在农村地区传统上是薄弱的。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中学，在部分高中开设职业培训班。将学生从学术教育转向技术教育旨在缓解技能短缺并减少大学入学竞争。

虽然各类技工学校的招生人数还没有增加到足以弥补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下降的程度，但职业技术学生占高中生总数的比例从1978年的约5%增加到1985 年近36%，虽然发展不平衡。此外，为了鼓励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进入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优先安排工作，其他求职者则必须参加技术考试。

1987年有四种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 技术学校，在商业、法律工作、美术和林业等领域提供四年制初中课程和二至三年高中后培训；

2. 工人培训学校，招收高中学历为二年木工、焊接等行业的学生；

3. 职业技术学校，招收初中或高中学生，学习烹饪、裁缝、摄影等服务的一到三年课程；和

4. 农业中学，开设基础学科和农业科学。

这些技术学校有数百个不同的课程。他们狭窄的专业领域的优势在于他们提供深入的培训，减少了对在职培训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学习时间和成本。此外，如果培训和未来工作之间存在联系，学生就会更有动力学习。大部分培训可以在现有企业进行，那里的员工和设备几乎不需要额外费用。

这个系统有一些缺点。“四化”时期更需要技术娴熟的通才，而不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员。此外，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和人员未得到充分利用，并且总体上缺乏进行培训的专业设施。此外，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人员方面产生了大量费用，一些政府技术机构的趋势是向更一般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发展。

此外，辍学率继续对劳动力储备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高中技术学生辍学以及初中毕业生在没有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职业僵化和人口的地域流动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限制了教育选择。

1985年，中专新招生66.8万人，但“七五”规划要求每年增加中级技术工人200万人，高级技术人员40万人，招生规模还远远不够。为改善这种情况，1986年7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召开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决定因地制宜短期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点组织技工学校和短期培训班。国务院决定加强对通过技术考试的工人（而非非技术工人）的培训，旨在加强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

长期以来，扩大和改善中等职业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者的目标，因为职业学校被视为最适合（通过提供训练有素的工人）满足国家经济增长，尤其是制造业和工业部门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学校。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学的资金有限，而且往往相当有限，因此其两个子行业之间必然存在分配竞争/冲突：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无论如何，后者的过度招生是 1980年代中期改革的总体结果。然而，必须从这个毕业生群体中寻找员工的公司对招聘的质量仍然不满意，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工作培训计划，为新雇用的员工提供再教育。公众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热情也不高，与普通教育不同，职业中等教育并没有带来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公众的看法是，这些学校对他们的孩子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死胡同。此外，职业院校的运营成本高于普通教育机构，而且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设施现代化，这是中国

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

到2004年底，中国有高等学校2236所，在校学生超过2000万人；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19%。研究生教育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与前一年相比，招收的学生增加了 24.1%，研究人员增加了25.9%。这一入学人数的增长表明中国高校已进入普及教育阶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6月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的中国的学校学生人数在很短的时间内翻了一倍，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

建立了许多工业综合性大学和专业学院，加强了一些不完备的学科，开设了新的专业，如自动化、核电、能源、海洋学、核物理、计算机科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放射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物理学。1993年启动了创建10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将708所高等学校合并为302所大学。高等学校合并对高等教育管理进行了深远的改革，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985工程和211工程的30多所大学获得了国家专项基金的帮助，以支持他们进入世界精英阶层。

高等教育研究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明显。高等学校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研究成果转化，涌现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重大创新成果。43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已开工或获批，其中一些已成为重要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背景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反映了中央政府实施的政治政策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教育重点主要是政治“再教育”。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动荡时期，意识形态重于专业或技术能力。文革初期（1966-1969），数万大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迫害许多大学教职工，并有效地关闭了中国的大学。1970年代初大学开学时，招生人数从文革前的水平开始减少，只招收经单位（单位）推荐、政治资历良好、体力劳动成绩突出的个人。在没有严格和合理客观的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在确保获得大学录取资格所需的推荐和政治档案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教育质量的下降是深刻的。大学毕业生在离开大学时“甚至无法在自己的领域阅读一本书”。大学教职工和管理人员因大学系统的政治方面而士气低落。

1975年提高教育质量的努力没有成功。到 1980 年前，以政治为导向的录取标准是否能达到提高工人和农民儿童入学率的目的，这似乎令人怀疑。上大学的往往是干部子弟，利用人脉“走后门”。来自官员家庭的学生会接受必要的至少两年的农村工作分配，通常是在郊区，让他们能够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村干部急于取悦家长/官员，在满足劳动力要求后，欣然推荐这些青年上大学。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通过建立秩序和稳定、呼吁结束大学校园的政治斗争和扩大大学招生，采取措施提高教育质量。这种保持质量和最小化支出的压力导致努力更有效地运行现有机构和开发其他学院和大学课程。结果，建立了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学院和为工人提供技术教育的工厂办大学。此外，对八十八所院校和重点大学给予专项资金、拔尖生和教职工

等支持，不分家庭背景和政治活动，招收学业最优秀的学生。

1980 年代的现代化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在现代化计划下，高等教育将成为培训和研究的基石。由于现代化依赖于极大地增强和改进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实现所需突破的能力，对高等教育和学术质量的重新关注——以及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强调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培训的必要性。这种担忧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高等教育被关闭，造成了科学方面的短缺和质量缺陷。为适应科学训练的需要，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的决议，强烈教育和科学的重要性。

改革者意识到高等教育系统远未达到现代化目标，需要进行额外的变革。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高等学校管理暂行条例》，对管理进行了重大变革，调整了办学机会、办学方向和办学内容。随着教育改革赋予了更多的独立性，大学和学院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接受或与其他社会主义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合作设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负责分发资本建设投资资金，并利用资金国际交流。

这些变化还允许大学接受工作单位的资助并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而无需向负责教育的部门要求更多的钱。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可以签订学生培训合同。

高等教育机构在管理跨地区和跨部门学校方面也被赋予了更大的作用。在国家批准的预算范围内，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来分配他们认为合适的资金，并将学费、技术和咨询服务的收入用于自己的发展，包括集体福利和奖金。

入学考试和录取标准

选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考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被认为是有声望的。尽管自文革以来，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它仍然是招收学业有成的学生的基础。

1970 年代初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开放时，入学考试的候选人必须是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一般年龄在 26 岁以下。取消了工作经验要求，但工人和员工参加考试需要获得企业许可。省级行政单位选派成绩优异的学生参加考试。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组织了招生预选考试（名额的三到五倍）。积极鼓励这些候选人参加考试，以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申请人。

1977 年 12 月，恢复统一全国考试时，有 570 万学生参加了考试，但只有 278,000 名分数最高的申请者可以进入大学。1984年7月，全国900多所高校的43万个名额，约有160万人（比1983年减少3万人）参加了入学考试。一年后，约有180万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高考，争夺56万个名额。文科考生接受政治、中文、数学、外语、历史和地理的测试。理工科考生接受了政治、语文、数学、化学和生物的测试。1985 年还对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入学考试，招收 55 万名新生。

除了笔试，大学申请者还必须通过体检和政治筛选。

国家教委制定统一试题、时间和考核标准，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管理考试，统一评分，确定最低录取分数线。各学校根据成绩录取学生。职工报考职务相关科目，报本单位审批。如果雇主支付大学课程的费用，工人就必须参加入学考试。1985 年，学院招收了来自各种企业和公司的 33,000 名员工，约占学院总招生人数的 6%。

1985 年，国家制定了大学名额配额，允许由机构资助的学生和自费学生。这一政策改变了以前所有学生都按照北京制定的指导方针入学的制度。除军校、警校学生、经济困难学生和毕业后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学生外，所有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和杂费均需自理。

注册和分配政策的变化

子女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更加贴近现代化的人才需求。到1986年，国家负责起草招生计划，该计划考虑了未来人才需求、边远地区招生的需要以及工作条件不利的行业和专业的需要。此外，将一定数量的解放军培养的毕业生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应雇主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时间被延长，作为对学生入学计划的补充。雇主须支付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学生须履行合同毕业后对雇主的义务。少数自费就读高等院校的学生，可在国家计划外招生。

伴随招生方式的变化，教师聘任制改革（1986年通过），结束了“铁饭碗”聘任制，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开设哪些院系、开设哪些专业、需要多少教师。高等院校的教师是按比例聘用的，通常一次聘用两到四年。可聘任的教学岗位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该制度在北京和上海的八所重点大学进行了试点，1985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学校长领导小组根据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负责聘任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工作。建立适合不同岗位层次的合理工资制度。建议拥有过剩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大学和学院授予他们适当的学术头衔，并鼓励他们在需要他们的高等教育学校工作，按目前的薪水工作。新系统将在两年内推广到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部门。

在1985年的改革中，所有毕业生都由国家分配工作；一个中央政府安置机构告诉学校将毕业生送到哪里。到 1985 年，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正在试验一种允许毕业生接受工作或寻找自己职位的系统。例如，1985年清华大学毕业生1900人中，有1200人继续攻读研究生，48人自己找工作，其余由学校与学生协商后分配工作。1986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主要分配到林业、教育、纺织、军工等部门工作。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金融领域仍然需要毕业生。

奖学金和贷款制度

新系统将在 1986-87 学年在选定的机构中进行测试，旨在帮助无法支付自己生活费用但努力学习、遵守法律并遵守纪律的学生。设立助学金三类：鼓励优等生全面发展；教育、农业、林业、体育、航海专业的学生；以及愿意在贫困、偏远和边境地区或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学生，例如采矿和工程。此外，军校实行免学杂费，要求毕业生在相关岗位上至少参军五年。对于那些毕业后在经批准的农村工作的人，学生贷款将由其雇主（如学

校）一次性偿还。这笔钱将由学生通过五年的时间偿还给雇主工资扣除。

留学

除了贷款之外，另一种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科学教育质量的方法是将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在与苏联的教育联系和其他合作项目在 1950 年代后期被切断之前，大量中国学生在苏联学习。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国继续向国外派遣少量学生，主要是到欧洲大学。1978年10月，中国留学生开始抵达美国；1979 年 1 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他们的人数增加了，这是符合现代化的政策需要。尽管数字各不相同，但1978 年至 1984 年间，有超过 36,000 名学生在 14 个国家学习，其中包括 7,000 名自费学生（自费学生、获得东道机构奖学金或接受亲戚和“外国朋友”帮助的学生）。其中，78%是技术人员出国深造。到 1986 年中期，美国大学共有 15,000 名中国学者和毕业生，而 1979 年至 1983 年间共派出了 19,000 名学者。

被派往美国的中国学生通常不是典型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而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学家，年龄通常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正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寻求高级培训。他们往往是能力出众的人，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要职。最早到达的人中只有不到 15% 是学位候选人。几乎所有的访问学者都在科学领域。

教育投资

过去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在1987年仍然存在。资金仍然是一个主

要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学习和出国研究和学习费用很高。由于教育正在与其他现代化项目竞争，资金非常短缺。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足够发达，可以有效利用计划培养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例如，一些观察家认为培养识字的人、低水平的技术人员而不是研究科学家的劳动力会更现实。而且，还担心通过考试招收最有能力的学生，可能会提升那些只擅长考试的人。教育改革批评死记硬背的传统做法，提倡创新的教学和学习方法，也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

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声望引起了对它的需求。但许多合格的青年无法上大学，因为中国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大学名额。为了满足需求并培养训练有素的专业劳动力，中国建立了高等教育的替代形式——如业余、非全日制和广播电视大学。

中国负担不起对少数学生的教育，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经济上的巨额投资。自 1978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修改了集中大学教育资源的政策，虽然旨在促进现代化，但与党的原则直接冲突。培养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政策也吸走了本可以用来更快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城乡教育机会均等的资源。重点学校的政策多年来一直在修改。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要有受过教育的精英。农村学校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吸走超过其份额的资金，为农村底层留下的资金太少。

家庭不得不通过对孩子的教育进行个人投资来弥补政府的漠不关心。中国经济可能无法有效吸收由此产生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些工作，他们可能需要适应低薪工作。

21世纪的改革

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扩大高校专业、专科毕业生招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合并、兼并和监管机构之间的转移进行重组，旨在解决规模小、效率低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也进行了重组，那里普遍倾向于强调精英院校。大众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不仅导致教学资源紧张，而且导致失业率上升。不受政府控制的私立大学的创建仍然缓慢且未来不确定。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高等教育的重组"在机构之间创造了一种明显不断升级的社会分层格局，按地域、资金来源、行政单位以及职能类别（如综合、法律、医学、等等。）。" 因此，尽管最近的改革可以说提高了整体教育质量，但它们创造了新的、不同的公平和效率问题，随着世纪的推进，需要加以解决。

2007年春，中国计划对其大学进行全国评估。该评估的结果用于支持下一个主要的计划政策举措。上一次对大学进行的实质性国家评估是在 1994 年进行的，其结果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对精英机构的重新重视。学界称赞世纪末改革将中国高等教育从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封闭的、静态的体系转变为更加多元化、分散、开放、活力的体系，激发了地方政府和其他非国家机构的参与。同时，他们注意到这种权力下放市场化导致教育机会进一步不平等。

中国的高考政策受到西方国家招生制度和科举传统文化的影响。自2007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高考前开始独立招生以来，中国一些顶尖高校开始效仿他们，除了统一考试制度外，还采取了新的招生方式。根据大学

规定，这些学院任命自己的工作人员并负责选拔学生。学生可以通过在高考前参加特定的考试或面试而被录取。这样，学生就有更多的机会被顶尖大学录取。2010年，教育领域发生了几项重大改革。1 月 31 日，广东省教育部开始在高考招生制度中实行平行志愿录取，这是降低广大学生升学风险的有效途径。11月20日，中国教育部取消了高考政策中的奥运加分政策。对中学生更公平，有效减轻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私立学校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许多私立幼儿园开始采用双语教学。此外，一些公办高校与投资者合作办学，利用公办办学、民营企业赞助的方式，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今，随着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进入大学在中国学生中已不再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相反，拥有普通中国大学的学位已经满足不了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国家长和学生开始高度重视海外教育，尤其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欧美顶尖学府，在众多中产阶级家长中"尊崇"。自1999年以来，中国申请海外名校的人数增加了十倍。对海外学校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佛女孩》等育儿指南的发行，这引发了"全国痴迷"的海外学校录取。2005年以后，中国留学生人数不仅呈现增长趋势，而且呈现出年龄下降的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上大学，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正在"选择退出"传统的公立学校系统，该系统主要面向准备中国大学入学考试。这些有能力负担外国大学学费并且可能更喜欢让孩子接受更"西式"教育的家庭，正在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公立学校的特殊课程或国外学校。美国高等教育的某些声望是中国教育体系薄弱的结果，它扼杀了创造力，有利于死记硬背。

由于中国的大学学位与就业机会之间的错配日益严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课外教育培训。其中包括大学俱乐部、志愿活动和实习。此外，中国国家通过开展创业培训、在校园设立"创业孵化器"、为学生创业提供特殊福利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创业。由于这种发展，中国的大学生活除了正式的课堂学习之外，还与"自我发展"的各个方面相关联。

海外学生

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的外国人数量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根据政府官方数据，2007年有来自188个国家和地区的195,503名海外学生来大陆学习，但据信这一数字约为300,000名左右，因为政府的数字不包括在私立语言学校学习的学生。这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留学目的地。截至2018年，中国是亚洲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国家，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教育强国。

据介绍，韩国、日本、美国、越南和泰国是5大来源国，来自欧洲来源国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政府向外国学生提供了10,000多个奖学金。

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中国经济的改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即预计到 2015 年经济将出现可观的增长，而不是 2050 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引起了西方的注意，2008 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加强了这种积极关注。另一个吸引学生来中国的因素是，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

国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最后，北京和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已经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成人教育

由于全国只有 4% 的中等教育毕业生被大学录取，中国发现有必要开发其他方式来满足教育需求。成人教育在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人或“非正规”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包括广播、电视和函授大学、业余和非全日制大学、工厂。为职工开办的大学和为农民开办的县办大学，许多大学主要在学生下班时间开办。这些替代教育形式是经济的。他们试图教育“迟到的一代”——那些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年）期间失去教育机会的人——并提高在职工人的文化、科学和通识教育水平。成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贫困或因其他原因失去教育机会的人提供第二次机会，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接受教育。

成人教育史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国需要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它解决了当时占人口 80% 以上的文盲的严重情况。1949年至1966年是新中国成人教育的开始和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成人教育无法正常开展。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新时期，成人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学校由政府部门、企业、工会、学术团体、民主党派等组织成立。1984年，大约 70% 的中国工厂和企业支持他们自己的兼职班，这通常被称为工

人大学。仅在北京，就有九十多所设有夜校的成人教育学校招收了数万名学生。这些学生中每年有超过 20,000 名毕业于夜校、工人学院、电视大学和函授学校——是普通学院和大学毕业人数的两倍多。1984 年约有 130 万名学生就读于电视、函授和夜校，比 1983 年增加了约 30%。

工农业余教育和成人扫盲班是基础教育的其他组成部分。业余教育包括非常广泛的各级教育活动。大多数业余学校由工厂赞助，为自己的工人开办；他们提供了相当基础的教育，以及提升技术技能的课程。大多数是在职培训和再培训课程，这是任何工业系统的正常组成部分。这些学校作为社会正义的象征不断在国内媒体上得到宣传，但不清楚他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

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成立，在28所省级大学设有分校。许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都是初中毕业生，他们的成绩略低于普通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全日制（四门课程）和兼职学生（两门课程）至少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毕业后返回工作岗位。业余学生（一门课程）下班后学习。工作单位批准在电视大学学习的学生获得正常工资；他们的大部分书籍和其他教育材料的费用由国家支付。在三年的时间里，一个典型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生每天要花六个小时观看中国一些最好的老师制作的录像带讲座。这些讲座通过当地教师的面对面辅导和每晚大约四个小时的家庭作业来加强。该系统的主要问题是电视机太少。1987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节目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作、播出、资助. 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课程并分发了印刷的辅助材料。课程包括基础的、通用的科学技术课程和更专业的课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通过56个工作中心在北京及郊区开设1000多个班级和14个2至3年制课程的专业。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获得证书，他们

有权获得与普通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同等水平的报酬。国家对留职学生在培训期间给予一定的补贴。

识字和语言改革

持续开展的扫盲运动也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统计显示，1985年总人口近11亿，其中文盲或半文盲约2.3亿。掌握书面汉语的难度使得提高识字率尤为困难。总的来说，语言改革的目的是使写作和标准语言更容易学习，这反过来又会促进识字和语言的统一，并为更简单的书面语言奠定基础。1951 年，该党发布了一项指令，启动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语言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对标准化通用语言的普遍理解，简化书面字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入基于拉丁字母的罗马化形式。1956年普通话（现代标准汉语）被引入学校和国家广播媒体作为教学语言，到 1977 年，它已在中国各地使用，特别是在政府和党内，以及教育中。尽管 1987 年政府继续支持普及普通话的目标，但仍有数百种地区和地方方言继续使用，使地区间的交流变得复杂。

第二次语言改革需要简化表意文字，因为笔画较少的表意文字更容易学习。1964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官方清单，列出了该语言最基本的 2,238 个简化字。简化使识字更容易，尽管一些只用简体字的人与用繁体字书写的中国文学财富隔绝了。政府和教育领导人很快就放弃了用罗马字母代替表意文字的任何想法。

第三个变化领域涉及更广泛地使用拼音罗马化系统的提议。鼓励拼音（195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批准）主要是为了促进普通话在使用其他

方言和语言的地区的传播。到80年代中期，拼音的使用不如普通话普及。

保持识字率和获得识字率一样困难，尤其是在农村人口中。识字率在 1966 年至 1976 年间有所下降。政治混乱可能是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但基本问题是，许多中国象形文字只能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并且经常因不用而被遗忘。

类型

随着教育体系的发展，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成人教育，设立了成人高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远程教育）三类成人教育。

每年只有一次高考。成人大学入学课程通常在工作日晚上或周末举行。

成人自学考试对所有成年人开放，不需要正规学校教育证书即可参加。唯一的要求是拥有有效的身份证。考生可以通过自学各种科目或报读大学或专科学校组织的课程来参加考试。

与传统的学历教育相比，开放教育是一种将传统面对面教学、教材自主学习、在线实时课程和在线课堂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网络教育是通过网络课程教授的。学习方式方便，适合工作繁忙且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成年人。招生时间相对宽松，分为春季招生和秋季招生。考试时间也很开放，每个月都有一次入学考试。

在线教育

教育部批准68所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到2003年底，这些学校在全国建立了2027个校外学习中心，开设了10个学科140个专业，在校生137.3万人。

私立教育

政府支持私立教育组织以及私立营利性教育机构。第一部《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要增加整体教育供给，改变公立学校的传统格局，以满足教育需求。2004年末，全国各类各级各类民办学校7万多所，在校学生1416万人，其中民办高等学校1279所，在校学生181万人。

民办学校开创了与外方合作办学的先河，许多外国大学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既提高了中国教育资源的质量，也为学生的升学开辟了新渠道。

2017年1月，国务院提出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在民办学校建立党组织，民办学校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牢牢控制民办学校。学校定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信息化教育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信息化对教育发展产生历史性影响，并呼吁高度重视信息化教育。为实现教育信息化科学有序发展，中国形成了整体性、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2011-2020 年教育信息通信技术十年发展规划于 2012 年正式确定。它指出，到 2020 年，所有成年人都将在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环境中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学习型社会的信息通信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形成，所有地区和各级学校都将接入宽带互联网。

为大幅提升互联网覆盖和传输能力，中国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包括中国教育研究网（CERNet）和中国教育宽带卫星（CEBSat）这两个主要教育网络。

为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影响力，中国高度重视开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尤其是中国启动了"一师一课、一班一优"倡议，为326万名教师打造了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开发MOOC，鼓励私营企业开发基础数字资源，以补充正规教育材料。

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国通过建立国家数据中心和实施全国教育决策服务体系，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中国还建立了一个国家数据中心，通过为每个学生、每个教师和每个学校提供唯一的在线身份号码来支持管理。

为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教师能力

培训。中国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小学教师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的能力提升项目，帮助他们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入教学。加强教育管理人员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提升信息通信技术领导能力。

教师

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地方政府正在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推动大量校长在职培训，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目前，在高等学校中，教授和助理教授分别占9.5%和30%。中青年教师占优势；45岁以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9%，35岁以下教师占46%。高等教育教师是科研、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队伍。在所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40.7%（280）在高等教育领域；为中国工程院相应的数字是 35.3% (234)。

教育改革者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合格教师的稀缺，这导致教育发展严重受阻。1986年，中国有大约800万中小学教师，但很多缺乏专业培训。据测算，为实现“七五”目标，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该体系需要新增小学教师100万人、初中教师75万人、高中教师30万人。学校。

为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国家教委于1985年规定，高中教师应为专业院校毕业两年以上，小学教师应为中学毕业生。为了提高教师质量，委员会设立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后者更受欢迎，因为成本较低）在职培训计划。小学和学前在职教师培训计划将 84% 的时间用于学科教学，6% 用于教育学和心理学，10% 用于教学方法。小学教师在职培训旨在将他们提高到大约两年的中学后学习水平，目标是到 1990 年使大多数小学教师合格。中学在职教师培训基于统一模式，因地制宜，业余提供。其课程的 95% 用于

学科教学，2% 至 3% 用于教育学和心理学，2% 至 3% 用于教学方法。技术和职业教师没有类似的大规模在职工作，他们大多在企业和地方当局工作。

到 1985 年，共有 1,000 多所教师培训学校——这是解决合格教师严重短缺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这些学校无法提供到 1990 年实现现代化目标所需的教师人数。 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从高等教育机构毕业成为合格的教师，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阻碍了招聘，并不是所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都成为了教师。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师，中国试图让教师成为更受欢迎和更受尊重的职业。为此，政府将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给予教师加薪，师范学院免学费。为进一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1986 年中央政府派教师到欠发达地区培训当地教师。

由于城市教师的收入继续高于农村教师，加上农村的学术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教师仍然难以招聘。农村地区的教师也对他们的土地负有生产责任，这需要他们的教学时间。农村小学教师需要通过务农来补充他们的工资，因为大多数是由相对贫困的当地社区而不是国家支付的。

问题

尽管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经常在国际评估中表现出色，但中国教育既有本土的，也有国际的；常见的批评领域包括它的严格性；它强调记忆和标准化测试；以及地区和性别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

强调记忆和严谨

《卫报》的乔纳森·凯曼 (Jonathan Kaiman)写道，中国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他们自己的制度腐败、不人道、压力大和不公平”；他接着讨论了该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称为高考），写道“许多父母认为九小时的艰苦考试是一种分拣机制，将决定他们孩子的生活轨迹。”

地区不平等

在《纽约时报》上，Helen Gao 称中国的教育体系是“残酷的”，并写道其在崇拜者中的良好声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神话之上：

虽然中国为人民提供了惊人的基础教育，在过去十年中将大学毕业生的产量翻了两番，但它也建立了一个歧视较不富裕和人脉较弱的公民的制度，以官僚主义和金融手段阻挠社会流动的每一步。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是罪魁祸首之一。农村学校约有6000万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在遥远的城市寻找工作，由祖父母照顾。虽然他们的许多城市同龄人就读于配备最先进设施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学校，农村学生经常挤在破旧的校舍里，在缺乏合格教师的情况下努力掌握英语和化学等高级科目。“农村学生在与城市学生的学业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

在《高等教育纪事》中，Lara Farrar 认为，残疾人在中国学校是“短板”，被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机会很小。

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95.2%的小学、87.6%的初中和71.5%的高中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6亿。1995-2000年“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39亿元，地方政府筹集1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各项专项资金100亿元，比2003年的58亿元增长72.4%。

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拥有近3000所分校和46000教学和行政人员。利用广播、电视、卫星、网络、音像等资源，累计培训农业适用技术1亿多人次，农村就业培训800万人次以上。经过20年的发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教育远程学习机构。

政府将实施措施，实现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和中青年文盲基本扫除和东部地区普及高水平、高质量九年义务教育目标。同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性别不平等

尽管过去 30 年中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已大大减少，但中国在此期间经历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全国各地区的不平衡增长。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语言障碍，以及管理入学率的地区法律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教育中不同程度的性别平等。

学术审查

中国的学术出版物和演讲受到中国当局的审查。

英语教育

中国与英语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中英商人之间，1630 年代在澳门建立了第一所教授英语的传教士学校。197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美中建立外交关系后，国家重视英语教育。据估计，中国懂一些英语的人数超过 2 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目前有 5000 万中学生在学习英语。

在中国，大多数小学生在 10 岁开始第一堂英语课。尽管英语学习早，但对语言的教与学却存在广泛的批评。中国的学校根据考试成绩进行评估和资助。这导致教学面向测试的技能。学生将死记硬背（书面和口头重复）作为主要的学习策略。这些非常适合中国学习方式的方法，被西方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批评为存在根本缺陷。此外，新学到的单词很少使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每个人都通过普通话或中国地方方言进行交流，而人们认为英语在该国几乎没有用处。通过全国四级考试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其中 80% 的考试是写作部分，20% 专门用于听力，完全排除口语。根据一项全国调查，只有一半的教师认为应该通过对话或交流来学习词汇。支持角色扮演或词汇游戏等活动的比例要小得多。

根据《每日电讯报》在 2017 年完成的研究，只有不到 1% 的中国人会说英语。

留守儿童的教育

随着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这些农民工的子女要么作为留守儿童留在农村，要么随父母迁往城市。公立学校通过设置高门槛，例如学费和考试或要求城市登记（户口），使得农村户口的儿童在城市难于上学。自 1990 年代以来建立的半官方私立学校以较低的费用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这种制度导致了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的隔离与不平等。此外，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往往很差，只提供价值有限的学校证书，有时甚至不遵守安全规定。从2000年代初开始，一些地方政府因此开始了关闭这些私立学校的运动，但尽管如此，在许多城市，这些学校仍然存在。尽管中国学者对流动儿童及其学校进行了案例研究，但缺乏全国范围的研究。

对中国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与整体儿童相比，他们的自尊心较低，心理健康问题更多。留守儿童的教师往往缺乏资源、理解或机会向家人或监护人传达他们需要提供支持和关注的信息。对2019年教育监测报告的分析发现，母亲缺席的孩子的数学、汉语和英语的成绩较低。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有更多的抑郁症状。甘肃省农村分析（2000 年和 2015 年）发现，没有父亲的孩子受教育年限减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kou

户口

户口是一个系统，在中国大陆使用。户籍记录正式确定一个人作为一个地区的常住居民，包括身份信息，如姓名，父母，配偶和出生日期。居民证制度在苏联也有类似的目的。

由于它与政府提供的社会计划的联系，政府根据农业和非农业居民身份（通常称为农村和城市）分配福利，因此户口制度有时被比作一种种姓制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它一直是造成许多不平等的根源，城镇居民享受从退休金到教育到医疗的各种福利，而农村居民往往只能自谋生路。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应对抗议和不断变化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体制改革，而一些西方专家质疑这些变化是否具有实质性。

该系统的正式名称是“户籍”。一个“户口”是在这个系统中的特定个人的注册居留身份。

中国大陆户籍

户口制度起源于中国，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目前的制度是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而产生的。直到最近，每个公民都被归入农业或非农业户口（通常称为农村或城市），并进一步按原籍地分类。这种双重组织结构与社会政策有关，拥有非农业（即城市）户口的居民获得了农村居民无法获得的福利。国内移民也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在某种程度上有限地放宽了这些限制。户口也促进和加剧了社会分层，并大大导致了中国许多农村工人的贫困。

基本原理和功能

在最初的立法中，户口制度被证明是为了

“……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央政府断言，由于农村地区吸收和利用过剩劳动力的能力更强，因此大多数人口应该集中在这些地区。此外，人们的自由流动被认为是危险的。

实际上，户籍制度还有其他目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稳定和快速现代化的理念制定政策，户籍制度也不例外。城市地区历来是专制政权最脆弱的地方：为了打击这一点，中央政府对城市居民给予优惠待遇，希望防止反政府起义，特别是在特别容易发生叛乱的早期。户籍制度的结构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其城市公民的权力：通过让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依赖政府，中央政府可以迫使有问题的个人服从。

他们对进入城市地区的移民进行严格控制。

历史

中国户籍制度的遗产可以追溯到前朝时期。在其早期形式中，户籍制度主要用于税收和征兵，以及规范移民。户口制度的两种早期模式是相随和保甲制度。公元前4世纪商鞅所宣扬的保甲制度，其作用是建立一个公民群体内部的问责制度：如果群体中的一个人违反了现行的严格规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这种结构后来在秦朝（公元前 221-207 年）期间被利用和扩展，用于税收、人口控制和征兵。

公元前7世纪齐国宰相管仲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和征兵政策。此外，管仲还禁止未经许可的移民、移民和家庭分离。在《尚书》中，商鞅也描述了他限制移民的政策。

户口制度的前身在清朝被用来监视个人和筹集战争资金。

户籍制度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出现在清朝末年（1644-1912 年）。该法还扩展了保甲制度，旨在建立稳定感。

1949-1978：毛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是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大约 89% 的公民居住在农村地区——大约 4.84 亿人居住在农村，而城市大约有 5800 万人。然而，随着工业化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1957年至1960年间，城市劳动力增加了90.9%。

尽管目前形式的户籍制度直到 1958 年才正式成立，但在其建立之前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努力地控制其民众。1950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表声明，详细阐述了他对新时期户籍制度实施的设想。到1954年，农村和城市公民已经在国家登记，并且已经实施了严格的户籍转换规定。这要求申请人有文件证明工作、被大学录取或直系亲属在城市，才有资格从农村进入城市。同年3月，内政部和劳动部发布了《控制农民盲目进城的联合指令》，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企业的就业将被当地劳动局完全控制。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签署成为法律。这将民众分为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和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并按地区对所有公民进行分组。然而，主要区别在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由于中央政府优先考虑工业化，与户口挂钩的国家福利计划非常有利于城市居民；农业户口持有人无法获得这些福利，并背负着低劣的福利政策。此外，户口迁移受到严格限制，官方配额为每年 0.15-0.2%，实际转换率约为 1.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扩大了对人员流动的监督。1964 年，对向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移民施加了更大的限制，并在 1977 年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规定。在整个时代，户籍制度被用作指令经济的工具，帮助中央政府实施其国家工业化计划。

1978 年至今：后毛泽东时代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 年毛主席逝世，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国内移民的控制，到 1978 年，国内流动完全由政府控制。因为生活在“体制外”几

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人口流动都是由国家批准。

然而，随着邓小平1978 年上台，改革的启动稳步开始缓解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持有人之间的一些差距。尽管向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迁移仍受到严格监管，但对从农村地区向小城市迁移的限制已经放宽。在决定转换户口身份的配额和资格标准方面，地方政府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立法允许农民工获得临时居留许可，但这些许可不允许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然而，许多农民工没有获得临时居留许可——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资源或具体的就业机会——并且生活在被迫返回农村的危险之中。

对农村人口的影响

虽然政府对城市教育投入巨资，但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发生。

在1958年中央政府实施的户籍制度下，非农业户籍持有者获得食品和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卡，农村居民被迫自己生产一切。虽然国家在城市提供住房，但农民必须建造自己的房屋。国家为城市居民投资教育、安排就业、提供退休福利，而没有为农村居民提供这些服务。这些差距使农村人口处于高度不利地位，大跃进等饥荒等悲剧主要蹂躏中国农村居民。

在饥荒中幸存

在1958 年至 1962 年的中国大饥荒期间，拥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可能意

味着生与死的区别。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大约 6 亿农村户口居民都被集体化为村集体农场人，他们的农业产出（扣除国家税收）将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来源。由于地方共产党领导人制度化地夸大产出数字和实际产量大幅下降，那些年的国家税收几乎没收了许多农村公社的所有食物，导致大规模饥饿和超过 4000万至6500 万中国人死亡。

然而，1 亿城市户口居民靠中央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来养活，这种口粮有时会下降到平均每天 1500 卡路里的热量，但在饥荒期间仍然可以维持几乎所有人的生存。大跃进饥荒期间，估计 95% 或更高的死亡发生在农村户口持有者中。在内部压制消息的情况下，许多城市居民根本不知道农村正在发生大规模死亡事件。这对于防止有组织地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至关重要。

1978 年后

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期间（1978-2001 年），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在城市郊区新建的出口加工区工作，工作条件低于标准。农民工的流动受到限制，迫使他们在公司宿舍或棚户区过着岌岌可危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受到虐待。

1980 年代，在数亿人被逐出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之后，户口制度对农民工的影响变得沉重。自 1980 年代以来，估计有 2 亿中国人生活在其正式注册地区之外，他们获得教育和政府服务的资格要低得多，因此这种局面成为一种极其严重和广泛的不平等歧视制度。数百万离开土地的农民仍然被困在城市社会的边缘。他们经常被指责为犯罪率和失业率上升的罪魁祸首，

在市民的压力下，市政府实施了歧视性规定。例如，农民工的子女不得在城市学校就读，他们很多人不得不回到家乡与他们的祖父母或其他亲戚住，在家乡农村上学。他们通常被称为留守儿童。据中国研究人员报告，大约有 1.3 亿这样的家庭儿童，没有与父母生活。

由于农村工人在城市地区提供劳动力，他们也从实际上贡献了城市地区的公共税收，而他们的家人使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例如子女学校、老人医疗），该制度导致财富在公共部门层面转移，从较贫困地区转移到较富裕的城市地区。劳动适龄成员给农村亲属的家庭内部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一点。

城市农民工

随着 1980 年代移民限制的放松，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机会。然而，这些农民工在追求经济安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许多挑战。在就业机会方面，城镇居民优先于农民工，农民工找到的工作往往是发展潜力不大的岗位。由于城市官员的绩效是根据当地居民的繁荣和当地经济状况来评估的，他们几乎没有动力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2008 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保障平等就业机会，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并要求雇主向全职员工提供包括就业福利在内的合同。然而，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村工人的收入比城市工人低40%，只有16%的人获得就业福利。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也经常受到侵犯——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时间过长，并面临身心骚扰。

外来工受到工资拖欠的严重影响。拖欠工资是指，雇主未能按时或全额支付员工工资。尽管此类事件在技术上是非法的，可处以七年监禁，但拖欠工资的情况仍然存在，劳动合同和养老金可能会被无视。在 1990 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研究中，46% 的农民工被拖欠了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工资，有些工人已经十年没有拿到工资。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拖欠工资的流行率有所下降，在 2006 年至 2009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8% 的农民工经历了拖欠工资。

农民工子女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经济改革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激增。农村居民急于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以户口身份为基础的政府社会项目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离开家人。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不断被农民工填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0-14岁的儿童中，有2290万人没有他们的父母之一或双方，成为留守儿童；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100万，相当于农村儿童的37.7%和中国儿童总数的21.88%。这些孩子通常由他们剩下的父母和/或他们的祖父母照顾。尽管留守儿童的入学率为 96%，但他们容易受到许多发展挑战的影响。留守儿童更有可能抗拒权威，并在与同龄人互动时遇到问题；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健康的行为，例如不吃早餐和吸烟，并且更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孤独和抑郁。尽管由于父母的经济能力扩大，留守儿童可能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他们通常也承受着更大的学业压力，因此更容易受到与学校有关的压力的影响。

与父母一起移民的儿童面临着当地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困难

与父母一起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也面临挑战。由于没有当地的非农业户口，流动儿童获得公共社会基础设施的机会有限。例如，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远远优于流动学生。中央政府于 1986 年和 1993 年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来监管其教育体制。有限的空间和保护地方利益的愿望反过来又促使地方政府避免让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此外，由于中央政府根据当地户口儿童的入学率补贴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如果想上学就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因此，许多移民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到专门为移民服务的私立学校。然而，为了降低入学和出勤费，这些机构必须削减其他领域的支出，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学校设施往往状况不佳，许多教师不合格。

随后几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多项改革，但影响有限。2001年，它声称公立学校应该是国家儿童的主要教育形式，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在财政上支持学校招收更多的流动儿童，结果几乎没有变化。同样，2003年，政府呼吁降低流动儿童的学费，但再次没有详细说明它将如何帮助学校支付这笔费用。2006年，政府制定了《新义务教育法》，主张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并将农民工子女招收割让为省级政府的责任。然而，这也未能改善流动儿童的命运。非本地户口的学生必须在家庭平均年收入 10,000 元中支付 3,000 至 5,000 元的高额入学费用，并需要在户口所在地参加全国高考（高考），因而通常更难上大学。2012年以来，部分地区开始放宽要求，允许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区参加高考。到2016年广东的政策最为宽松。农民工子女在广东省高中3年以上，父母有合法工作，在省内缴纳3年社会保险的，可以参加广东省入学考试。

流动儿童面临的困难导致许多人辍学，这在中学阶段尤为普遍：2010 年，只有 30% 的流动儿童接受了中等教育。流动儿童也有不成比例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当地户口的同龄人中，分别为 36% 和 22%；——70% 的人经历过学业焦虑。他们经常因着装和说话方式的差异而面临污名和歧视，并且难以与其他学生互动。

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

农村居民大量外出打工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子女，也影响了留守老人。随着 1970 年代一胎化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平均年龄发生了上升：2000 年 82% 的农民工年龄在 15-44 岁之间。虽然城市退休工人有政府退休计划的支持，但农村工人必须依靠自己和家人。流动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似乎是不明确的：虽然流动儿童的父母通常经济状况较好，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但与没有流动儿童的老人相比，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往往较低。与农民工的孩子一样，父母也会经历抑郁和孤独等心理问题，那些照顾孙子的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责任而感到负担。

改革

自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的过去几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实施各种改革政策采取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骤。1979-1991 年可以确定为第一个改革时期。具体而言，1984年10月，国家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城定居问题的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实行农民工登记。1985年，国家还实施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农民工即使没有改变户籍，也可以留在流动的城市。同年，国家还出台了《居民身份证条例》，允许农民工即使没有城镇居民身份证也可以到城市工作。然而，随之而来的不仅是3000万农村人

口向城市迁移，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假城市身份证被出售给农民工以获取城市利益的现象。因此刺激国家于1989年实施另一项政策，即《关于严格控制城镇化过快增长的通知》，以规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这项政策下，农民工再次受到监控。

1992-2013年可以确定为第二次户籍改革时期。国家实施了各种改革。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一种是向在特定城市具有专业技能和/或有能力进行某种投资（至少 1 亿元人民币）的人提供"蓝印"户口，（通常是上海等大城市），让他们住在城市，享受城市福利。这种"蓝印户口"随后在1999年被许多其他大城市（包括南京、天津、广州和深圳）进行。第二种不是适用于大城市，而是适用于某些选定的城镇和小城市。1997年，国家对在新落户城镇和小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实行城镇户口。同时，根据1997年的两份政府文件，《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改进农村户口制度管理的指示》，农民工可以平等地登记为永久居民。这些政策随后于2012年在国家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的通知》中正式生效。此外，1999年，国家还允许更多的人群获得城市户口，包括父母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和孩子已经获得城市户口的老人。第三类适用于专门为经济增长而设立的经济特区和地区（如深圳）。具体来说，1992年，国家允许所有居住在经济特区和经济特区的人都可以携带两个户口：他们的原户口和另一个与他们在特区和经济特区工作有关的户口。因此，这项政策使农民工更容易在特区获得不同的城市机会。然而，2003年，国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将农民工送回农村原居住地。在这项政策下，农民工的生活机会再次取决于他们的户口身份。

第三个改革时期始于2014年，国家于3月印发实施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以解决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2012年居住在城市但不携带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与拥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之间17.3%的差距缩小2%。同时，该计划还计划到 2020 年为至少 90%（约 1 亿）的农民工提供包括教育、福利住房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农村户口人口（从农村流动人口到携带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比如，国家给予很多留守儿童上城里学校的权利，让他们与农民工的父母团聚；它还为许多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培训。此外，同年7月，政府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城镇和小城市户籍限制，逐步取消中等城市户籍限制，大城市放宽限制——但保持特大城市的限制。因此，根据公安部的公告，到2016年，国家已经为约2890万农民工发放了城镇户口。此外，2016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将在北京取消城市户口与非城市户口的官方区分。话虽如此，2017年11月，北京政府实施了一场“大扫除”运动，旨在将数百万农民工送回原来的农村地区。

上面提到的改革是否适用于大多数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受到质疑。具体而言，许多改革政策，尤其是第一、二时期的改革政策，似乎都要求农民工拥有某种资本，要么是人力资本（如专业技能和职称），要么是与财产相关的资本（如成为城市房主）或两者兼而有之。一些学者因此也将一些改革政策称为“卖”户口的方式。与此同时，许多移民声称他们缺乏社交网络（所谓“关系”的一部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财富积累的——也让他们更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更不用说一份利润丰厚的工作了。因此，如果财富是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先决条件，那么许多农民工确实无法获得这种机会，因为许多人是“不熟练的”（因为许多人的技能，如农业，不被归类为专业技能）。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即使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得城市户口。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许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身上。尽管他们受过教育，但许多人除非成为房主，否则不会获得城市户口。

然而，由于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的房地产价格很高，许多人也无法做到买房。由于缺乏城市户口，许多人不仅面临着买房的困难——而且还面临着租房的劣势。由于许多大城市缺乏租房管理制度，即使租一个房间——或者租公寓——也可能面临被随时要求离开的可能性。许多受过教育的农民工青年因此也被称为"蚁族"，字面意思是"一群蚂蚁"，因为许多人没有自己的房间，不得不与许多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因此，户籍制度是否已经充分改进为更加以人为本的制度是值得提出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大城市在给予农民工城市户口和使用户口制度来决定是否应该给予福利待遇方面仍然很严格。即使在第三次改革时期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在打造更加以人为本的体制，他们仍然声称大城市应该有不同于小城镇的户口登记制度；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将继续更加严格。然而，大城市（如北京）通常是最能吸引农民工的城市，因为它们有广泛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积极推行多项改革政策，但户口城乡划分仍然在发挥作用，代表着一种生活机会的划分体系。因此，有学者认为，户籍改革确实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户籍制度，只是将户籍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它仍然活跃并继续导致愈演愈烈的城乡差距。同时，也有人认为，户籍改革以城市为中心，未能针对贫困地区，那里的居民往往无法享受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简而言之，大多数农民工由于缺乏城市户口而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和歧视，而城市户口通常被视为获得生活福祉的起点。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ral_society_in_China

中国农村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社会占中国人口的不到一半（约 45%），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中国农村的生活不同于中国城市的生活。在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农村地区正在发展，并且在某些地区，统计上已接近城市经济。在西北和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仍然被认为是低标准和原始的。自来水和无障碍交通等基本需求是这些地区的问题。

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至 1949 年崛起期间公开宣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1936 年以前，中

国共产党在其影响或控制的地区改变农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主要领域是土地改革，从传统的土地所有者和富农手中夺取控制权，并归入国家，即集体化。

大跃进

在1958 年至 1961 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中国领导人试图加快集体化进程，并在全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大幅加快工业生产的步伐。这主要涉及小规模生产，例如“土法炼钢”。人们认为，通过集体化和大规模劳动，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飞跃”开始后的短短15年内超过英国。

1958年初在河南建立了一个实验公社，很快公社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动员起来生产一种象征工业化的商品：钢铁。大约建立了 25,000 个公社，每个公社约有 5,000 户。希望通过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工业化，避免进口重型机械。每个公社都建有小型炼钢炉，农民在那里生产用废金属制成的小块铸铁。同时，农民社区集体化。

大跃进现在在中国国内外被广泛视为一场重大的经济灾难。农民经常放弃农业，生产钢铁或从事其他工业生产。1959年至1962年这三年被称为“大饥荒”，因为中国人遭受了粮食的极度缺乏。这一时期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毛泽东时代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中国经济的新政策从集体农业转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配额，在许多方面扭转了数十年的集体化努力。在中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中国南方和沿海地区，邓小平改革后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乡镇企业将工业生产带到农村地区——主要是南部沿海地区，帮助这些农村社区开放，实现更大的经济繁荣。然而，北部、内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有多种复杂因素导致了这种状况。例如，在西部和内陆地区，距离要远得多，而且地理位置通常更具挑战性。人口更加分散；社会结构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往往与中国沿海地区有很大不同。

邓小平的改革包括实行有计划的、由精通技术的官僚对宏观经济进行集中管理，摒弃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建设。邓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他强调农业产出至上，并鼓励农村经济团队和个体农户的决策权显着下放。在地方层面，将使用物质激励而非政治诉求来激励劳动力，包括允许农民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有土地的产品来赚取额外收入。

在邓小平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方法下，出售农民自产产品和公社剩余产品的农村市场恢复了活力。农村市场不仅增加了农业产量，还刺激了工业发展。由于农民能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国内消费也刺激了工业化，也为更困难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政治支持。

发展仍然不平衡，许多高度繁荣的地区远远超过深度贫困地区，在那些贫困地区，尽管教育费用已经很低，但父母很难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确保他们

的孩子可以上学。事实上，教育和社会不平衡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

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新趋势是“流动人口”或“黑（例如黑市场）的人”，农民工进入市区寻找工作。直到最近的发展，数千万至数亿农村居民在未经批准、没有合法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地区。许多人在建筑和其他部门找到了工作，工资和福利相对较低，工作场所危险很大。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即城市里的农村人受到歧视，农民工的心理孤立，其中一些问题导致了犯罪。

就业机会的缺乏使许多农村地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因此显然很想在城市地区重新定居。当然，就业机会仍然有限，因此许多人确实搬到了城市，却发现前景比他们预期的要少得多。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地区居民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比例非常高。

经济特区的发展也刺激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发展。

2013年，中国公布了一项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和减少农业发展障碍来减少贫困和发展贫困农村地区的新计划。该计划包括促进家庭农场和有组织的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企业，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

集体化和阶级地位

改变村庄社会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 19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党派工作队到每个村庄执行其土地改革政策。这本身就是行政和政治权力的前所未有的展示。土地改革有几个相关的目标。工作小组将把一些（尽管不是全部）来自富裕家庭或拥有土地的信托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从而实现基本生产资料的更公平分配；打倒可能会反对党及其计划的村里精英；从那些对党的目标表现出最大承诺的人中招募新的村长。

为了最后一个目标，党的工作组召开了广泛的系列会议，把村里的所有家庭都分为地主、富农、中农或贫农。这些标签基于大约 1945 年至 1950 年间的家庭土地所有权和整体经济地位，成为每个家庭身份的永久和世袭部分，直到 1980 年仍然影响，例如加入军队的机会等、高校、地方行政岗位甚至婚姻前景。

1958年人民公社的农业集体化基本上完成。它们旨在成为多功能组织，结合经济和地方行政职能。在公社制度下，家庭仍然是基本的消费单位，生活水平的一些差异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不像土改前那样明显。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向上流动需要成为团队或公社干部或获得稀缺的技术职位，例如成为卡车司机。

去集体化

集体化和其他政治进程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亡。在 1970 年代后期，低产区面积大、生活水平低的省级单位的管理人员开始尝试新的保有权和生产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采取的形式是解散集体

生产队，家庭承包集体土地的分配部分工作，并扩大可以生产的农作物或牲畜的种类。这些实验被认为是成功和受欢迎的，并且很快传播到所有地区。1982-1983年冬，人民公社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行政乡镇和一些专门的团队或企业，这些团队或企业经常租赁拖拉机等集体资产并提供服务。

1980 年代初期的农业改革导致了大量令人困惑的新生产安排和合同。行政和合同形式的可变性背后是几个基本原则和趋势。首先，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是集体财产。它被出租、分配或承包给个别家庭，但这些农户不拥有土地，不能将其转让给其他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成为基本经济单位，对自己的生产和损失负责。大多数经济活动是通过合同安排的，合同通常保证向乡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或一笔钱，以换取土地、车间或拖拉机的使用。

承包制的目标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挖掘农民的积极性。在所有村庄，生产粮食的硬性要求被专业化和交换的优势以及更大的市场作用所取代。一些"专业户"全身心投入经济作物生产或服务业，收获颇丰。总体情况是农村经济日益专业化、分化和交流。农村收入增长迅速，部分原因是国家大幅提高了主要农作物的价格，部分原因是市场扩张和重新发现的比较优势刺激了经济增长。

家庭角色

去集体化增加了个体家庭的选择，并使户主对其家庭的经济成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例如，在1987年，离开村庄搬到附近的城镇在一个小工厂里工作，开一个面馆，或者开个机器修理店是合法的。然而，农民仍然不能

合法地进入大中型城市。中国媒体报道，在乡下的增加升值的教育和农业为导向的报纸和期刊的需求在增长；这些文字出版物包括关于有利可图的行业的清晰指南，如养兔和养蜂手册。专业化和分工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步伐很快。

农村改革的后果

国家在 1980 年代保留了其在农村经济中的权力和作用。去集体化，就像 1950 年代的集体化一样，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有时，显然，它被强加于满足于其集体方法的社区。但是，为了让家庭和社区有更大的余地来决定生产什么，并允许农村市场和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国家退出了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严密监管和强制性配额。

去集体化消除了基层干部的监督职能，他们不再需要监督集体领域的工作。有的干部成为乡镇公所专职管理人员，有的干部利用改革优势，成立专业化生产大户，或以优惠的价格出租集体财产。前干部凭借他们的人脉网络和对行政程序的熟悉，比普通农民更能利用市场和商业活动增长所提供的机会。即便是那些不全心全意为自己增加家庭收入的干部也发现，要像预期的那样为村民服务，就必须做企业家。1980 年代中期，村级干部较少担任监督员，而更多地担任推广代理和营销顾问。

到 1987 年，农村社会比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更加开放和多样化，那个时期反映国家对安全的压倒性关注的僵化集体单位已被较小单位的网络和集群所取代。新的、更松散的结构显示了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优先地位。

基本安全，即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对残疾人、孤儿或老年人的支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到一半的中国人记得 1950 年前社会的不安全感和风险，但集体制度的成本和低效率在他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加强专业化和分工趋势不可能逆转。在农村，虽然人还住在村里，但单位的意义似乎已经减弱了，基层干部的行为仍然直接影响到普通农民或小商贩。

国家及其官员仍然主导着经济，控制必需品的供应，对企业和市场征税和监管，并授予合同。毛主义时期的分层制度建立在职能上非专业化的干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干部指挥着相当统一的农民群众的劳动。它在 1980 年代被经济专业家庭和企业家组成的新精英所取代，他们设法与控制获得经济成功所需的许多资源的行政干部达成协议。地方干部仍然有权征收费用、税收和提出各种苛求。新体制的规范不明确，经济社会体制随着农村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和改革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

法规和优惠

商业活动的增加产生了高度的规范模糊性，特别是在广东中部和江苏省等农村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地方官员的适当角色以及新企业家或商人的权利和义务都不清楚。正常使用个人接触和款待与非同寻常和犯罪的偏袒和腐败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迹象表明建立了一种赞助人-客户关系系统，其中行政干部给予普通农民恩惠，以换取支持、尊重和礼物。中国媒体报道的腐败案件数量增加，使人们普遍认为，去集体化和农村经济改革导致腐败日益严重，这可能反映了各种交易和恩惠的机会增加以及许多交易和关系的含糊不清的性质。党一再呼吁改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央试图建立民法体系并促进对民法的尊重，可以理解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家庭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家庭提供了每个人的支持、生计和长期的保障。今天，国家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这种保障，家庭和单位对个人承担长期责任。家庭的作用已经改变，但它们仍然很重要，尤其是在农村。家庭成员在法律和习俗上有义务支持他们的老年或残疾成员。只有在家庭不能提供支持和福利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工作单位采取行动。家庭通常汇集收入；任何个人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家庭工薪阶层的人数和受抚养人的人数。在城市和乡村，收入最高的家庭通常有几个工薪族，例如未婚的成年儿子或女儿。

在传统社会晚期，家庭规模和结构复杂性直接随阶级而变化。农村地主和官吏的家庭最大，贫农的家庭最小。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即无地劳动者，负担不起结婚和组建家庭的费用。提供晚年的需要以及存活到成年的儿子数量与长期家庭成功之间的普遍联系促使个人创造各种非标准的家庭形式。没有儿子或根本没有孩子的夫妇直接领养或购买婴儿。有女儿无儿子的家庭试图寻找愿意入赘的女婿，其放弃原来的家庭，有时甚至放弃原来的姓氏。有女儿但没有财产来吸引女婿的家庭有时被迫将女儿卖为小妾或妓女。家庭规模和复杂性的变化是阶级地位变化以及家庭作为家居和经济企业的双重角色的结果。

在当代社会，农村家庭不再拥有土地或将其传给下一代。然而，他们可能拥有和传承房屋。农村家庭为孩子支付医疗费和学费。在1958 年至 1982 年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家庭的收入直接取决于它在集体田间贡献

的劳动力数量。这一点，再加上对集体单位对老人或残疾人的支持程度的关注，鼓励农民多生儿子。在 1970 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改革中，家庭承担了越来越多、更负责任的经济角色。家庭成员的劳动仍然是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农村经济增长和商业化越来越多地奖励管理和技术技能，并使非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只要这种经济趋势在 1980 年代后期在农村继续下去，农民家庭就可能会选择数量较少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孩子。

自 1950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变化以及家庭和经济企业的更大分离的结果是家庭形式更加标准化。1987 年，大多数家庭接近过去的中农（拥有一些土地的农民）规范。这样的家庭由五六个人组成，建立在成年儿子和搬入丈夫家庭的成年妇女之间的婚姻基础上。变异的家庭形式——无论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还是基于次要的、非标准的婚姻形式——都不太常见。国家禁止纳妾、童婚和买卖婴儿或女性，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实行的，尽管并不常见。预期寿命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婴儿能活到成年，更多的成年人活到六七十岁。80 年代，更多的农村家庭能够实现三代家庭的传统目标。孤儿和中青年寡妇或鳏夫较少。被迫保持终身单身状态的男性要少得多。离婚虽然可能，但很少见，家庭是稳定的、持续的单位。

许多关于家庭的传统态度没有受到质疑而得以幸存。人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结婚，而婚姻仍然是正常成年人身份定义的一部分。预计婚姻将是永久性的。这种婚姻要求女人搬进丈夫的家庭，成为媳妇和妻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接受。父系血统的规范以及儿子对年迈的父母承担主要责任的假设仍然存在。党和政府在控制生育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试图限制每对夫妇的孩子数量。但当局并没有试图通过建议某些人根本不应该结婚来控

制人口增长。

过去，亲属关系原则延伸到家庭群体之外，并被用来形成大规模群体，例如血统。血统与家庭截然不同。他们本质上是企业经济政治团体。他们控制土地；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控制了整个村和庄，并拥有大部分农田的所有权。像大多数其他晚期传统协会一样，世系由富有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主导。普通农民将他们的庄稼支付给他们的宗族群体，就像他们支付给地主一样。共产党人谴责这些组织是封建制度，声称地主借以剥削他人。这些宗族在 1950 年代初期被压制，他们的土地在土地改革中被没收和重新分配。随着宗族产业的解散，对远宗祖先的集体崇拜失去了大部分的正当性，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容易被压制。家庭祖先崇拜至少一直持续到 1966 年和 1967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红卫兵毁坏祭坛和牌位。1987年，该党仍在谴责祖先崇拜是迷信，但几乎没有努力去结束它。

婚姻

1950 年的《婚姻法》保证每个人都有选择婚姻伴侣的自由。然而，特别是在农村，很少有机会见到潜在的伴侣。中国农村很少为求爱提供隐私，在农村，公众对未婚男女之间调情甚至长时间交谈的容忍度很低。介绍人和中间人继续在婚姻安排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对媒人的任何提议都有有效的否决权。

过去，婚姻被视为家庭和媒人双方的关注点。婚姻结合的家庭被期望具有同等地位，或者新郎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婚姻模式的这一方面仍在继续，而地位的定义却发生了变化。由于继承财富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被排

除，评估已转移到对收入能力和未来繁荣的估计。最理想的丈夫是行政干部、党员和大型国有企业的雇员。相反，来自贫困村庄的男人很难找到妻子。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世袭阶级标签非常重要，任何有“反革命”背景的人，即任何以前出身于地主甚至富农阶级家庭背景的人，婚姻前景都不好。这些贱民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具有“坏”阶级背景的家庭的后代结婚。在社会尺度的另一端，高级干部子女之间的通婚处于很高层次。

社区结构

大多数农村中国人生活在大约 90 万个村庄中，这些村庄的平均人口为 1,000 至 2,000 人。村庄从来都不是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单位，中国农民的社会世界已经延伸到他们的家乡之外。几乎所有的新婚妻子都从其他定居点进入一个村庄，而女儿则出嫁。所有村民都与其他村子的家庭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婚介人在村子之间穿梭。

1950 年之前，村庄群以小集镇为中心，将它们与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起来。大多数农民距离集镇只有几个小时的步行路程，集镇不仅提供买卖机会，还提供娱乐、信息、社交生活和一系列专业服务的机会。市场周围的村庄形成了一个社会单位；这个社会单位虽然不像村庄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

从 50 年代初开始，中国革命政府努力将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村庄直接联系起来，扫除传统上为村民解释中央政策和民族价值观的中间人和经纪人。（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从来都是“皇权不下县”；这种

局面自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后彻底发生了改变）。国家和党总体上是成功的，建立了空前程度的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整合，以及村级对国家政策和政治目标的认识。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意外后果是增加了中国村庄的封闭性和企业质量，并缩小了村民的社会视野。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子单位村庄的改组意味着村庄成为集体土地持有单位，并在其土地与相邻村庄的土地之间有明确的界限。集体田地劳动的集中指挥使以前的村间劳务交换成为不可能。户籍和配给制度将村民限制在他们的家乡，使他们无法在别处谋生。与村民的合作以及与村领导的良好关系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伴随着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自给自足的推动，农村市场受到压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大多数农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定期进城，与其他村庄居民交流合作的机会减少。村庄变成了工作单位。

1980 年代初期的去集体化导致了农村营销的复兴，对向外迁移的管制的有限放松打开了村庄并减弱了周围的社会界限。农民的社会世界扩大了，随着村庄本身的减少，更大的营销社区变得更加重要。村民身份曾经是决定个人情况的唯一最重要因素，现在只是众多重要因素之一，其中还包括职业、人际关系和管理才能。

医疗保健

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的第一梯队是在乡村医疗中心工作的“赤脚医生”。他们提供预防和初级保健服务，平均每 1,000 人有两名医生。赤脚医生出现于1968年，当时中国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工作者，1985年，中

国停止使用赤脚医生一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转为私人执业的乡村医生，以收取使用费的药品销售为生。上一级是乡镇卫生院，其主要功能是作为门诊诊所，每个照管约 10,000 至 30,000 人。这些中心每个大约有十到三十张床位，最合格的工作人员是助理医生。上述两个较低级别的机构组成了“农村集体卫生系统”，提供了全国大部分的医疗服务。只有病情最严重的病人被转诊到第三级也是最后一级，即县医院，每间医院服务 200,000 至 600,000 人，并配备拥有 5 年制医学院学位的高级医生。

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医疗保健的可得性和质量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农村地区的粗死亡率比城市地区高很多，预期寿命低4年左右。城市地区每千人的高级医师人数是农村地区的10倍左右；国家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在城市地区超过26元，在农村地区不到3元。城市地区的病床数量也大约是农村地区的两倍。然而，这些是总体数字，某些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和营养水平比其他农村地区要好得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rban_society_in_China

中国城市社会

城市人口规模的确定问题反映了行政类别的不一致和变化；——城乡户籍和住区类别的区别；将郊区或农村地区置于市政府管理之下的做法；以及赋予小城镇的地位差异。

在社会学术语中，城市是指具有较高职业角色专业化程度、许多特殊目的机构以及在非个人环境中对人的统一待遇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集镇比村庄更城市化；随着规模和经济复杂性的增长，集镇定居点变得更加城市化。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的分工程度最高，机构也最专业。

显着特征

在中国，作为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是非常宝贵的。由于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实践，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具有鲜明的特征，中国城市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可比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同。

最重要的政策是户籍制度、移民的法律障碍、全方位工作单位的培育，以及包括住房市场在内的商业和市场的限制。在许多方面，城市更能感受到官方控制和监督的权势；城市的管理者关注控制人口层次结构，并通过双重行政管理来实现。这些控制结构所基于的两个原则是职位和职业。户籍

由警察维护，警察在城市的存在比在农村强得多。城市被细分为区、街道、小区，最后被细分为大约 15 到 30 户的小单元，例如一个公寓楼或一条小巷。对于那些在大型组织中工作的人，工作单位要么与居住单位相连，要么优先于居住单位；对于在小型集体企业或邻里商店就业的人，居委会是他们的登记单位，提供一系列服务和监督。

单位和地方政府对住房的管控和住房市场的缺位导致了住宅的高度稳定性。大多数城市居民在同一所房子或公寓里度过了几十年。出于这个原因，城市社区是严密的。

自 1950 年代初以来，党的领导层始终将快速工业化作为首要目标，为此，普遍倾向于重工业投资而不是消费。对于城市来说，这些政策意味着工厂和工业就业的扩张，同时在住房或城市交通系统等“非生产性”领域的支出水平非常低。强调生产和重工业，不鼓励消费和交换，以及国家对商业和服务业的接管，导致城市有许多工厂，但没有小贩、小吃摊或娱乐区。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期，为使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力做出了重大努力。这有助于通过平等参与生产劳动来增加生产和实现性别平等，这是解决性别不平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补救措施。到 1987 年，几乎所有城市中的中青年妇女都外出工作。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城市在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比例很高，而在服务业的工人比例很低。工人享有高水平的工作保障，但工资很低。1963 年至 1977 年间，大部分工资都被冻结，晋升和加薪非常罕见。即使在 1970 年代后期恢复了物质激励，在 1980 年代两次普遍加薪，并

增加了奖金和晋升机会，但工资仍然很低，主要是随着资历的增加而增加。有这么多中国城市女性参加工作的原因之一是，一份工人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

80年代，电视机、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住房仍然稀缺，只能由单位或市住建局分配。尽管住房简陋且拥挤，但与1950 年之前存在的贫民窟状况相比，中国的社区有了很大改善。市政府提供最低水平的服务和公用设施（水和卫生设施）；犯罪率很低。

住房

中国城市居民作为一个类别，在食品、住房和交通服务方面获得补贴。在 1980 年代，此类补贴在国家预算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即使有补贴，食品购买仍占家庭预算的最大份额. 相比之下，租金非常低，即使包括水电费，也很少占家庭收入的 5% 以上。1950 年至 1980 年间建造的新住房很少，尽管 1980 年至 1985 年间建造的城市住房比过去 30 年多，但住房仍然供不应求。整个家庭通常住在一个房间里，并与其他家庭共用炊具和卫生间设施。婚姻有时会推迟，直到市政办公室或工作单位提供住房。年轻人至少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 这与传统的家庭模式一致，但也因住房短缺而加剧。长期居住稳定的模式和可用住房存量稀缺的巨大压力意味着城市社区的职业或收入分层相对较少。不仅收入从一开始就更加平等，而且更多的钱无法购买更大或设备更好的公寓。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生活条件与体力劳动者大致相同，通常住在同一栋楼或小区里。虽然许多城市家庭在 1980 年代享有更高的实际收入，但他们通常无法像农民那样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更好的住房。

直到二十世纪后期，住房还是由个人工作单位以一居室或两居室公寓的形式提供。在20世纪90年代，私人住房市场开始发展，导致大量的“小区”在城市拔地而起。这些地区有新装修的公寓和联排别墅。大户型住房，通俗称为“豪宅”（别墅）；在中国的语言中，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通常只提供给商务精英。

充分的成人就业与最低限度的服务部门相结合，给城市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到 1980 年代，公众和政府都认识到城市家庭的负担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精力消耗。1985年以后投入更多的资金预算，为住房和市政等服务，包括管道煤气。但国家对私营或集体服务部门的鼓励效果更大。失业的城市青年被允许，有时甚至被建议设立小餐馆或服务机构。农民被允许进入城市出售农产品或当地产品。市政当局似乎忽视了大量农村人口作为小贩、木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或偶尔作为家庭佣工进入城市服务部门的情况。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国媒体报道了来自该国的少女涌入城市，寻求短期的管家或保姆工作。与其他农民工一样，他们通常通过与居住在城市的亲戚或村民的关系来寻找职位。

家庭与婚姻

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主要由工薪阶层组成，向工作单位寻求住房、养老保障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而在农村这些事情仍然是家庭的责任。除了在最近复兴的城市服务部门（餐馆、裁缝店或修理店）中受雇的有时经营家族企业的人外，城市家庭并没有像农民家庭那样将家庭和企业结合起来。城市家庭里面通常有多个工薪阶层，但孩子并没

有就像在农村一样容易带来额外的收入或工资。城市家庭普遍比农村家庭小，而且与传统模式相反，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和干部拥有最小的家庭。晚婚和一两个孩子是城市管理者和职业群体的特征。和过去一样，精英家庭形式被推广为每个人的榜样。

三代家庭在城市并不少见，一个健康的祖父母可能是大多数家庭育儿和家务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由祖父母照顾的幼儿与在工作单位托儿所或幼儿园入学的儿童一样多，这些机构远非普及。新婚夫妇住在哪里的决定通常取决于住房的供应情况。夫妻最常建立自己的家庭，经常与丈夫的父母同住，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可能与妻子的父母同住。国家和社会都希望孩子能照顾年迈的父母。此外，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将有退休金，通常也有相对理想的公寓。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是家庭的资产。那些雇用未登记的农村女佣的城市家庭，最有可能是没有健康的祖父母。

家庭在城市婚姻选择中的作用不如农村，至少部分是因为家庭本身并不是向其成员承诺长期安全和利益的单位。到 1970 年代后期，可能有一半的城市婚姻是同事、亲戚或父母介绍的结果。城市的结婚年龄比农村晚，这反映了更符合国家规则和准则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共有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城市人以及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或专业工作的职员往往比农民晚结婚。在中国，人们认为婚姻只适合那些有工作、从而能够成为社会正式成员的人。对集体田地和家庭房屋的份额自动拥有权利的农民青年符合结婚资格，但“等待分配”终身工作的大学生或城市青年则没有。不管怎样，结婚都需要单位的同意。

城市婚礼通常比农村婚礼更小、更低调，这反映了家庭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减弱。家庭通常会预订餐厅和婚礼剧团，其中包括婚礼主持人和艺人。更多的客人是新娘和新郎的同事或朋友，而不是父母的远亲或同事。婚礼的重点是新娘和新郎作为一对夫妇，而不是他们作为家庭成员的地位。同样，短暂的蜜月旅行而不是整个村庄或社区都参与的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越来越普遍。长期订婚在城市很常见，有时是因为这对夫妇正在等待住房可用。

为下一代提供条件

尽管中国家庭继续以尊重父母和孝顺为主要特征，但父母对子女也负有沉重的义务。子女有义务在年老时赡养父母，父母有义务在子女生命的早期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个世界上有利的位置。在过去，这意味着给他们留下财产并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教育或培训。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农村父母来说，为孩子选择职业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大多数农民的孩子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农民，最高的现实抱负是担任低级干部或基层干部、老师或者技术员。农村儿童的地位和福祉的主要决定因素仍然是他或她的家庭，这是对儿子和女儿的婚姻选择的强烈关注以及父母更多地参与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城市父母不太关心孩子嫁娶谁，而是更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最终的职业。城市父母可以期望给孩子留下很少的财产，但他们会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为在国家和商业部门从事安全和理想的工作做好准备。困难在于此类工作有限，竞争激烈，而且自 1950 年代初以来，进入的标准已经数次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社会的许多动态都围绕着工作分配问题以及社会富裕阶层的父母试图将他们的青睐地位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稀缺和理想商品的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是工作职业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自 1950 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一个所有地方性的城市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教育政策的变化、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农村安置城市青年的尝试、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以及 1980 年后鼓励城市小型私营和集体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一切变化都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每一次尝试都有其自身的成本和缺点。

机会与竞争

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职业分工和分工程度高的地方。它们是为居民提供一系列职业选择的地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职业是被认为比其他职业更好，竞争力更高的职业。城市还提供专业职业培训，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中。

在中国，有一种强调个人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文化模式。这些最好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并且与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期望和义务息息相关。也有社会结构其中一个单一的官僚框架定义了理想的职位，即国家或私营部门的管理或专业工作、或工厂的安全工作。

受限制的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移民，终生就业、平等的工资结构以及工作单位的孤立性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限制个人竞争。尽管如此，一些工作仍然被认为比其他工作更可取，城市居民及其子女最有机会竞争稀缺的工作。大多数家庭的问题是如何使子女成员被分配到这些职位。大多数工作的终身任期和党对工作分配的严格控制，使这些成为受惠群体中的父母以及地方当局和党组织的核心问题。

从 195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中期，有关人员招聘及其分配到理想工作岗位的政策发生了数次变化。随着每种方法的成本和缺点变得明显，改变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在 1950 年代初期和中期，问题并不严重。国家办公室正在迅速扩大，职位比有资格填补的人多。农民迁入城市，在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找到工作。大多数为新官僚部门工作的人都很年轻，直到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才开始退休。

从1962年至1976年时期城市和农村里乌托邦的政策，使得农民及其子女后代被约束在村庄内。城市工资冻结、以及城市中必需品和稀缺消费品的配给，试图减少分层，从而减少竞争。这在毛泽东时代尤为突出；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苦难回忆和平等主义的社区伦理上；这些措施部分地转移了人们对现在的挫败感的注意力。

教育系统中的紧张局势最为严重，与大多数社会一样，教育系统负责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分类，并选择那些将继续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人。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才如此消极地关注教育系统；其假设是，由于学校竞争的加剧以及学校教育可能带来的工作，越来越明显的是，在学校表现最好的是“资产阶级”和城市专业群体的孩子，而不是工农的孩子。

文革时期的政策与公众观念是，弃用教育和专业知识，包括一年以上的大专和大学的所有学校关闭了近十年；劳工教育及专业技术中，提高政治动机，和优待工人和农民青年。

大多数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被说服或被迫定居在农村，通常是在偏远的边远地区。由于在城市没有工作可提供，党希望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教育，成为小学教师、生产队会计或赤脚医生。许多人从事体力劳动。这项政策非常不受欢迎，不仅在城市父母和青年中，而且在农民中也很不受欢迎，并且在 1976 年末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就被取消了。

在 19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许多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设法回到城市，在那里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粮食配给与衣物配给（没有配给，就无法在商店中买粮食或衣物等商品）。到 1980 年代中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新扩大的服务部门找到了工作。

在创造就业和安抚城镇父母方面，1980年代的城镇就业政策相当成功。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作不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或他们的父母会选择的那种，但比终生分配到偏远的边疆地区要好得多。

毛主义的教育和工作分配政策成功地阻止了许多城市“资产阶级”父母将他们偏爱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孩子。然而，这项改革给经济和党本身的威信和权威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考试、工作的世袭传承和人脉

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强调专业知识和教育，而不是政治动

机和意识形态，因此再次强调考试。学校竞争激烈，考试频繁。理想工作竞争的一大步是从高中升入大学，这成功取决于在全国高考中的表现。工厂也采用考试来选拔应聘者，甚至工厂经理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保住职位。这些考试的内容未公开，但它们的实施代表了对不正当竞争、偏袒和腐败问题的合乎逻辑的回应。

1980年代偏袒选择的一种极端形式是简单的世袭传递，这一原则在农村工作单位事实上运作，似乎在中国的工业部门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1960年代至80年代，工厂和矿山在许多情况下允许子女继承父母工作，这简化了招聘，是鼓励老年工人退休的有效方式. 政府在80年代末禁止这种做法，但在某些情况下，国营厂矿，特别是位于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国营厂矿，利用其资源设立子公司或副业，为工人的子女提供就业机会。显然，这些单位的领导对给单位成员的子女提供就业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复杂的“关系”社会概念，工作也通过其他亲戚或他们的朋友传递。

党及其在人事事务（包括工作分配）中的作用可能成为一致应用招聘标准的障碍。在基层，工作任务和推动党支部的控制是其权力的基础之一，而在8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显然认为扩大利用考试和教育的资格，威胁到了党基层干部权力。该党通过地方就业委员会行事，控制着所有的工作分配。党员占据了最有权势和最理想的位置；党员的评估和选拔方式仍然模糊不清。地方党干部经常被认为利用他们的关系为其亲属或客户谋得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structure_of_China

中国社会结构

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结构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并进入帝制，然后进入当代。从周朝开始有中国贵族。但是，宋朝以后，权贵的官职就不是世袭的了。相反，他们是通过科举制度、基于儒家思想的笔试选出的，从而削弱了世袭贵族的权力。

中华帝国将国家分为四个职业或阶级，由皇帝统治。在这段时间里，有人试图根除这个系统。社会流动性很难，有时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社会阶层主要由个人身份定义。要上升需要通过非常困难的笔试。绝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但对于那些通过的人来说，他们整个家庭的地位都会上升。

在宋代，社会结构分工明确，这是由法律强制执行。然而，平民可以通过获得财富而在社会上晋升。通过科举考试或捐赠资源，人们可以进入士绅。

到了元朝，对平民的法律保护有所减少。然而，绅士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元朝的奴隶制也有所增加，因为奴隶地位成为世袭。此时的平民新政，使得平民身份内的各个阶层都世袭。

在明朝与元朝实行的政策相比，平民的类别数量有所减少。剩下的三个类别是世袭的，几乎不可能在它们之间移动。绅士也分为两种。到了清朝，乡绅被视为最受尊敬的阶级。商人的地位要低得多，除非他们购买了绅士地位。

在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期间，随着工人阶级开始显着增加，该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更加依赖就业和教育，这让公民拥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自由。

儒家

对于使用儒家（而不是法家）的朝代，人与人关系中的第一个显着的人总是优越的，并且必须充当他人的向导和领导者/榜样；而后者权益则不受强调。例如：父子关系，或君臣关系。

在儒家的经济观中，农业劳动在道德上是优越的。重点是工作是社会契约的体现。皇帝和他的官员努力确保被设想为农民家庭的人民（“民”）的福利。男民在田里劳作，为自己的食物和税收生产粮食；他们的妻子为每个人制作衣服。因此，农业是根本。手工艺和贸易是次要的，通常会转移生产性劳动力和促进奢侈浪费。

帝国早期

从秦朝到晚清（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人分为四类：地主、农民、工匠和商人。地主和农民构成了两大阶级，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则被归入两个小阶级。理论上，除了皇帝之位，没有什么是世袭的。

在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361年的内战中，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和大量半农奴的豪门，封建制度部分地复辟。他们控制着政府的重要文职和军事职位，使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氏族成员可以使用这些职位。唐朝扩大科举制度，企图根除这种封建制度。

宋朝

在宋代，社会阶层分工明确，依法执行。金字塔底部的平民分为两类：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口。在城乡居民中，一等平民是最富有的。平民的等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为获得更多财富的人可能会被提升到更高的等级。

另一方面，绅士和政府官员不是平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属于绅士。绅士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即可成为“官户”一员。此外，官员的亲属有更多机会也成为官户。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平民可以通过向朝廷捐赠大量金钱、粮食或工业材料来成为官户。1006年，官户占总人口的1.3%。到1190年，官户的比例增加到2.8%。官户人口不断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官户亲属相

对容易进入官户阶层。

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宋朝的王室。皇室由皇帝、皇后、妃嫔、王子和公主组成。皇室享有最高品质的生活，其他社会阶层提供的一切。有了御田（皇帝拥有的田地），王室的基本粮食供应得到满足。宫廷中的奢侈品也有其来源。例如，茶是由皇家茶园提供的。每年，中国各地区的土特产品都被作为贡品献给王室。

宋代，奴隶买卖被法律禁止和惩处。然而，宋朝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奴隶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非法绑架平民并将其作为奴隶出售的奴隶贩子。罪犯有时会被政府转变为奴隶。然而，传统的奴隶制在宋代并不普遍。富裕绅士的仆人通常与所服务的领主保持着契约式的关系。

实际上，宋社会的结构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和变化。在靖康之变后，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明显。通过土地兼并，富裕的平民和政府官员将公共土地或穷人拥有的土地私有化。宋末社会两极分化。富裕的地主吞噬了大部分可耕地，使其他人陷入极度贫困。就连朝廷的利益也被遏制了。富有的地主非法避税，宫廷最终发现自己征收的税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得多。当时有句名言是“弱肉强食”。

女真帝国

靖康事件后，女真的金朝与宋朝并存。女真帝国统治着中国北部。在女真统治法典下，皇帝和他的朝臣是平等的。金熙宗改革女真帝国的法律制度

后，取消了原住民女真人的习俗，代之以宋辽时期的习俗。金朝时期，定居华北的女真将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中国平民的农耕生活方式。

元朝

元朝的开国元勋忽必烈特别给予江南地区的绅士许多财政特权。元朝灭宋后，与宋当地精英的结交变得很重要。结果，宋朝社会阶层中最富有的人在元朝仍然富有。

与士绅的情况相反，元朝的平民发现自己受到法律的保护较少。蒙古统治者似乎并不把平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大批普通农民转为为士绅工作的种植园工人。富人占有平民的财产，同时使他们基本上成为奴隶农民。

元朝的记录和文献提供了极其有限的关于蒙古人社会阶层的信息。尽管缺乏历史记录，但可以肯定地说，蒙古人享有其他团体所没有的特权。在他们统治期间，蒙古人将大量稻田改造成牧场，因为农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政府和蒙古贵族都通过从普通农民手中夺走稻田来在中国开辟牧场。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元朝中的其他社会种姓包括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汉人指华北、朝鲜、四川等地的居民。南人是指宋朝的公民（四川人除外，尽管该地区是宋的一部分）。

元朝推出人口统计的政策。该政策根据职业划分平民。农民、士兵、工

匠、猎人、医生、使者和儒家学者是该政策下的一些类别。农民是元代平民中人口最多的。这些类别是世袭的。一名士兵将生下一个儿子，他将也成为一名士兵。与其他平民相比，工匠受到更公平的对待，因为蒙古人认为制造武器的技能是他们征服世界的必要条件。蒙古人经常屠杀中国平民，但工匠除外。

元朝时期，奴隶制很普遍。奴隶的主要来源包括俘虏、罪犯、被绑架的平民、奴隶贩卖。奴隶身份也是世袭的。

明朝

明朝政府对每个臣民都有一个全国性的登记册——“籍”。这种登记人口的做法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访问杭州期间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政策。明政府用黄册正式登记，黄册记录了特定家庭的每个成员。此外，还有一本白色的小册子，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税收。

元代种姓统计政策被明代继承和改革。众多的平民类别，被缩减为只有三个类别：士兵、平民和工匠。这些种姓是世袭的和固定的。从一个类别转移到另一个类别几乎是不可能的。三个主要类别的子类别更加具体和专业。根据台湾历史学家蔡士山的说法，也有独立于其他三类的盐提炼者。

明代的士绅属于平民种姓。有两种类型的绅士。通过考试殿试的人被称为

生员。所有生员都从朝廷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平均额度在18两到12两之间。其余的士绅主要靠在私立学校当老师来谋生。

明代的农民有两个群体。自给自足的农民占所有农民的 10%，而富裕地主的佃农则高达 90%。他们比自给自足的农民负担更多，收获更少。

工匠受到政府的严重剥削。他们不得不应朝廷的要求提供免费服务，没有任何回报。两类工匠是：直接为朝廷工作的官方工匠和为他人提供有偿服务的普通工匠。

在明代，皇室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明王室包括明太祖和他的侄子朱守谦的任何后裔。太祖有26子，其中19子都有后代。而朱守谦的后代由20个不同的军校分支组成。王室成员不得通过劳动过上平凡的生活。王室的一切开支，都是从平民每年的税收中拿出来的钱来支付。额外的特权，如法定特惠权利和奢侈品，是朝廷赠送的。17世纪中叶，王室人口众多，生活开支占全年税收的225.79%，政府几乎破产。

清朝

在清朝，人口可分为五类。上层阶级是皇帝和他的直系亲属。之后是士绅（所有政府官员）。接下来是农家、地主、农户和农民。然后是工匠和商人。排在最后的是下层流浪汉和罪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根据儒家哲学的理论原理发展了其社会分层体系。

到 18 世纪后期，该制度基本上是固定的，将国家、省和地方各级的政治权力以及地位授予少数人，他们经过多年精心、昂贵的学习，能够通过极其困难的书面儒家哲学的考试。最高层被称为“绅士”或文人。他们的人数从 1850 年的 110 万增加到 1900 年的 150 万。考试是汉人获得高级政府职位的途径，否则主要由少数满族统治。正如臭名昭著的“八股文”所表明的那样，考试变得更难，更随意了。绝大多数候试人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浪费了他们昂贵的岁月。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这项投资，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并没有得到回报。越来越多的最富有的家庭通过购买而获得他们的高地位证书。从现实角度看，平民无法进入精英阶层；考试失败者往往变得非常沮丧，甚至领导叛乱。例如，洪秀全（1813-1864）一再失败、落榜，尽管他的天赋使他能够认真地研究基督教（但由于没有圣经，他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基本上是错误的），并继续形成并领导了 19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叛乱。他手下领导的一些高官，如冯云山、洪仁安等，也是考不及格的文人。袁世凯出身文学精英，但考试不及格；他的家人为他购买了一个军事指挥职位，他上升到军队的最高层，并于1912年成为中国总统。1898年的百日维新，公务员考试几乎结束，但保守反动派获胜。科举制度最终于 1905 年废除。

士绅

士绅是政府官员。大多数士绅拥有土地，这是他们大部分收入的来源。其他士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们的政府服务。1864年湖南军队战胜太平天国后，士绅阶层大量增加，许多人被授予准官衔。许多人担任正式的地方行政职务。其他人用他们的军事奖励购买土地并加入士绅阶层。

社会官僚是清朝的官场。他们负责组织公共工程项目，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官僚们穿着独特的服装，包括带有蓝色边框和众多等级徽章的黑色长袍。平民用尊称称呼他们，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优惠。

农业

90% 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从贫穷的佃农到富裕的地主，他们的地位远低于官僚/文人。许多人是非常贫穷的佃户或临时工，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在南部省份，拥有自己的土地，境况更好，更安全。儒家称赞农民是为国家提供食物的诚实人。饥荒和洪水是严重的风险。为了防止地方叛乱，清政府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以防止饥荒和其他灾害，如流行病。它是围绕储存谷物的粮仓系统建造的。当灾荒发生时，它通过分发免费或低成本的粮食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饥荒。然而，该系统在1850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基本上被摧毁，使中国庞大人口面临洪水、干旱、瘟疫和其他饥荒的风险。红薯的引入大大减少了过度饥饿并降低了反抗的倾向。

到 1860 年代中期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后，清朝政府致力于解除困境、稳定社会和改善农业。它减少了税收并需要徭役劳动力、开垦土地并促进灌溉。1900年后，政府成立农村协会，为农民出版报纸和教科书，开办农业学校，举办地方培训班，以及农业展览。继续实施水资源保护和森林站项目的计划。农业改革是清政府在最后一刻大力改革教育、军队和地方管理的一个方面。

工匠、商人和工人

尽管工人的地位较低，但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农民高。工匠和工人经常直接为国家或士绅工作。商人的排名较低，因为他们被儒家视为非生产性的水蛭、寄生虫。商人可以包括从街头小贩到具有高影响力和财富的企业家阶层的任何人。他们被认为因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而蓬勃发展。他们会贿赂政府官员或利用利润分享来获得资金。商人家庭可以用这笔财富来支付儿子的公务员考试培训费用，从而跃升至高位。

下层阶级

下层普通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良民”，一类是“鄙陋”的小人（下人）。奴隶、仆人、妓女、艺人、低级政府雇员仆人和军队下层士兵都是“小人”阶级的一部分。士兵被视为“恶”的小人（尽管这种“恶”被视为是必要的），而平民则被安排指挥军队，以防止军队统治社会。那些在娱乐业工作的人尤其被看作是下贱的；别人往往可以严厉地惩罚他们，而不会承担法律后果。小人阶层受到严重的歧视，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小人阶层和良民阶层不能结婚。

在清朝初期，世袭奴隶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这种制度很快就衰落了。女奴（婢女），主要是通过合同协议买卖的，她们将服务一定年限。

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1911 至 1949

1911年后，中国进入军阀时代。在此期间，工业化过程缓慢甚至不存在；从 1920 年到 1949 年，工业部门仅增加了不到 300 万成员，主要是在棉

纺厂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是军队。

此时，许多工人被雇用从事各种建设项目。一小部分工人阶级是学徒。他们接受了师傅的培训，可以在行业中工作，但受到的待遇与女奴相似。学徒期结束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师父，自己找工作。

1924 年，苏联帮助孙中山重建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最著名的是通过广州附近珠江上的一个岛屿军事学院（黄埔军校）。随后几十年的许多军事领导人都是黄埔毕业生，包括林彪，以及国民党的众多抗日将军。

1949 至 1978

1949年，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避开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现在成为他们试图推翻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干部成为新的上层阶级。属于这个社会阶级的人约占城市工人阶级的 20%。他们不仅获得了福利，还为他们的职业受到了特殊培训。共产主义的物资配给制度，使这些共产主义干部阶级得到很多利益。他们滥用这些配给，并用这些配给制度掌控社会。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成为了新的特权阶级。往往只有他们的后代才能进入国家高层领导阶层。过去，他们的职位主要是通过被最好的学校录取而获得的，而现在干部地位使他们能够获得特别的资源和选择；这些并未在所有人之间公平分配。住房在中国一直很抢手，尤其是在大城市，干部们也可以免受居住空间的激烈竞争。

在农村，地主阶级在土改期间被消灭了。1959年，国家干部有一千万，国家工人有三千五百万，农民有两亿。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因为农民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

随着土地改革的实施，毛泽东启动了集体化进程。毛建立了一个公社制度，农民应该平等地耕种土地。他的想法是利用农民的数量，有效地生产有助于工业化的剩余收成。这被称为大跃进，失败并导致数千万农民死亡。

正如农民被安置到公社一样，国家工人也被安置在称为"单位"的大型工作单位中。由于城市教育改革的发展速度比农村快得多，越来越多的工人是高中毕业生。国有工业的放缓和合格的中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导致获得国家工人职位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时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城乡居民两大类。这样做是为了使通过单位和公社的国家服务分配更容易，并更好地组织人口。户籍制度使得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是在不同地区之间迁移成为非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的组成再次改变。学校停课，大多数青年被推到乡下向农民学习。对农民的关心体现在被称为赤脚医生和赤脚教师的农村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农民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前的不到40岁增加到1970年代的60多岁。与此同时，农民仍然是最文盲、最无能为力、最贫穷的社会阶层。

在 1949 年共产党胜利后不久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声称中国社会有四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旗上有四颗小星星的原因经常被引用。被四颗小星星包围的第五颗大星星代表共产党。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中，他把中国人定义为包括四个社会阶层，其中有，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声称这些阶级已经被革命统一了。但 1949 年后的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阶级分层，尤其是在将普通公民的权利与共产党精英所享有的极端特权进行比较时。

在 1978 年经济改革之前，从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7 年，随着中国开始去除过时的标签，成千上万人获得工人阶级地位，中国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变。苏联理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很快被引入，由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在此期间，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媒体也开始传播关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宣传，将他们描绘为优秀的阶级，称他们为“领导阶级”。不久之后，随着对无产阶级的尊重增加，社会上的人们开始反映这种情绪。就农民阶层而言，尽管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但农民人数却在逐年增加。知识分子阶层由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组成，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模糊，很难确切知道这个阶层有多少人。然而，据估计大约有 500 万人。

1978 年至 2000 年

在1970 年代后期实施中国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政策后，毛泽东建立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面前瓦解。在农村，公社在 1984 年就消失了。被称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开始裁员，因为成本高、效率低，所以“砸了铁饭

碗”。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进一步分裂，先前的“两个阶级一层”理论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然而，农民阶级的规模缩小了，而工人阶级的人数却显着增长。

进入 21 世纪之前的几年，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随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种增长并没有转化为社会发展的速度。到1993年，大约22.4%的工人阶级人口生产了中国51.8%的GDP。

1992 年，随着财富继续在该国少数人口中积累，社会不平等成为一个大辩论话题。这是官僚资本主义腐败的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中产阶级只能获得很少的资源。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被边缘化，此时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变得明显。

此时的工人阶级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这包括失业者、退休者以及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生活条件也很差，但也有一些人能够开办小企业。由于不同农民工经济和职业环境的差异，农民工跨越了多个阶层。

21世纪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依赖于阶层，阶层是由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共有十个阶层，广义上包括政府官员、私营和小企业业主、产业工人、农民工、农业工人和失业者。到2016年，农业劳动力仅占中国工人阶级的40%左右。服务业工人占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超过产业工人。

此时的工人中产阶级被视为领先阶级，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能力。随着工人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他们被视为中国生产力的代表，以及将改善国家整体经济的人。中国对中产阶级的看法也很积极，因为他们被认为赚了相当多的钱，而且很胜任他们的职位。

21 世纪农民占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也有所下降，因为经济改革为他们的职业生活提供了更多自由。许多生活在农村社区的年轻人也开始发现在城市上大学或找工作更有吸引力。从那些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的年龄来看，年轻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寻找 40 岁以下仍在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现在比以前困难得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anxi

关系

“关系”定义了个性化的根本动力、社交网络的力量，并且是中国文化信仰中的关键系统。在西方媒体中，这个中文单词的拼音正变得越来越广泛。

“关系”在儒家学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儒家学说将个人视为社区和家庭、等级和友好关系的一部分。尤其注重默契的相互承诺、互惠和信任，这是关系和关系网络的基础。

与此密切相关的概念包括的“感情”，反映了人际关系内的深度、人情、道德义务；和“面子”，指社会地位、礼节、威望或三者的组合。其他相关概念包括“仁义”，它支持长期的理念，发展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支持互惠和同理心。

描述和用法

在个人情况下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关系”描述了两个人之间的个人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一个人能够说服另一个人以提供帮助或服务，或者被说服，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立场联系。两个人不必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关系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脉网络；一个人可以在需要做某事时调用它，并通过它来代表另一个人施加影响。

“关系”也指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好处，通常来自大家庭、学校朋友、同事

和共同俱乐部或组织的成员。中国人习惯于培养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可能会向大量方向扩展，包括终生的关系。与网络成员保持联系并不是约束相互义务的必要条件。互惠互利是维系关系网的关键因素，而不互惠则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罪行（即越多要求某人，就越欠他）。关系可以使人情看似无止境。

该术语通常不用于描述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尽管有时可以用亲戚家庭来描述关系义务。从本质上讲，家庭关系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各种非家庭人际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一个人可能会以类似于他们对家庭亲族成员的看法和互动的方式来看待和与其他人互动；通过关系，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每个朋友比作准兄妹关系；每个朋友都根据这种关系采取相应的行动（将自己视为"弟妹"的朋友会对被视为"哥姐"的朋友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关系"理念也是基于像忠诚，敬业，互惠和信任等原则，大力发展非家族人际关系。

归根结底，"关系"形成的联结是个人的，不可转让。

在商业环境中

在中国，一个商业关系高度社会化的国家，"关系"在日常商业交易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允许商业间关系、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组织相互合作。具体来说，在商业环境中，"关系"首先通过个人互动发生，然后应用于公司层面（例如，一个企业的一个成员可能会为另一个企业的成员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有人际关系，这有助于促进"关系"参与两家企业之间的交互）。"关系"还充当重要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在中

国，地方政府的结构和政府政策制度等可能会降低促进业务互动的效率，“关系”可以作为企业规避此类制度的一种方式。

因此，“关系”在两个领域很重要：与供应商、买家、竞争对手和其他商业中介的经理的社会联系；以及与各个国家政府监管机构的政府官员的社会联系。

鉴于其在塑造企业运营方面的广泛影响力，许多人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和企业成功的战略工具。通过“关系”，公司获得秘密信息，增加他们对政府法规的精确了解，并获得对股票和资源的特殊专有惠利。

“关系”的性质也可以构成客户−客户关系的基础。在履行这些义务时，企业也可能被迫以不利于其未来的方式行事，并开始过度依赖彼此。关系网也可能违反官僚规范，导致企业腐败。

上述“关系”造成的组织缺陷可以通过建立更有效的制度（如在促进竞争和创新的同时受正式组织程序监管的开放市场系统）来减少，以帮助更有效地促进业务互动。

在东亚社会，商业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很模糊，因为人们往往严重依赖于他们更亲密的关系和朋友。这可能导致通过“关系”在劳动力中产生裙带关系，因为权威人士通常会从家庭和亲密关系中汲取雇员或就业机

会，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评估人才和适合性。这种做法通常会阻止最合适的合格人员被聘用担任该职位。关系与裙带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易（考虑到强调建立关系的实际行为），而不纯粹基于金融交易，而后者则明确基于金融交易，导致法律后果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很明显；关系文化、或裙带关系文化，会导致谄媚文化盛行，并在企业内部组织中建立起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力架构。

在政治背景下

对于基于关系的网络，声誉在塑造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尽管中国最近努力尽量减少政府对于商业的参与，但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重要的政府官员有权选择政治伙伴和盟友、批准项目、分配资源和分配资金。因此，国际公司与政府官员建立和谐的个人关系尤为重要。除了拥有主要立法权外，中国政府还拥有土地、银行和主要媒体网络等重要资源，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施加重大影响。因此，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企业维持关系非常重要。然而，关系作为一种政府腐败形式的问题近年来受到了质疑。当商人将关系的互惠义务解释为不道德的送礼以换取政府的批准时，通常就是这种情况。道德和不道德的互惠义务之间的界限尚不清楚。

伦理问题

近年来，关系的伦理后果受到质疑。虽然关系可以直接给关系网络内的人带来好处，但如果被误用或滥用，它也有可能给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例如，相互的义务是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具体的日期、时间和方法往往是未指定的。因此，当一方利用他人的个人恩惠而不寻求回报

时，关系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不道德的互惠义务的一个常见例子涉及滥用企业-政府关系。2013 年，一个中国共产党（CCP）官员批评政府官员使用超过10,000元的公款用于宴会。每年的宴会总价值约为 480 亿美元。关系还可以使得人际义务优先于公民义务。

“关系”是一个中性词，但关系的使用或实践可以从“良性、中性到可疑和腐败”不等。中国大陆，像“关系”的实践方面常会被用来指贿赂和腐败。“关系”的做法通常被寻求恩惠的人用来从当权者那里谋取腐败利益。关系提供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帮助关系成员识别潜在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它还为非法交易提供安全保密的平台。关系规范帮助腐败利益的买卖双方为其行为辩护和合理化。

当西方公司和审计师在儒家文化中运作时，这个问题在跨文化商业伙伴关系中尤为重要。西方管理者在确定他们的中国同事和商业伙伴是否真的在实践关系时必须谨慎行事。应采取谨慎和额外指导，以确保不会因误解文化协议而发生冲突。

其他研究认为，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被错误地指责为在不了解关系和中国文化的人眼中是不道德的行为。正如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西方伦理态度的形象，可以说东方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此外，虽然西方人可能将关系误解为腐败的一种形式，但中国人认为关系是人情的一个子集，还将维护人际关系比作道德义务。因此，为维持此类关系而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被视为在道德约束范围内起作用。

“关系学”也被用来具体指通过自私和有时非法行为带来的操纵和腐败。尽管许多中国人因为关系的不道德使用而感叹关系在他们的文化中的重要性，但他们仍然认为关系是不应否认的中国元素。

社会学家将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概念联系起来，并且在西方对中国经济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详尽地描述了它。

西方与东方社会商业关系

成功的商业网络的四个维度包括：信任、联系、相互关系和同理心。然而，在东方和西方，理解这些维度并将其整合到业务任务中的观点大相径庭。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信任被视为共享的坚定不移的品质、恒常性和对应性。相反，从东方的角度来看，信任也是义务的同义词，关系需要通过持久的长期从属关系和联系来维持。

同理心是一种极为植入东方商业纽带的衡量标准，经销商和客户看到彼此需求的意义极为重要。儒家对仁的理解也等同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卖家和客户了解彼此需求的重要性。

其用法的跨文化差异也将西方关系营销与中国关系区分开来。在西方关系营销网络中，网络在塑造更大的商业关系中扮演着更浅层的非个人化角

色；而在东方关系网络中，“关系”在塑造社会商业关系中扮演着更为核心和个人化的角色。中国文化借鉴了儒家思想的许多实践，儒家强调集体主义和长期的个人关系。同样，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作用，直接反映了中国商业关系中表达的价值观和行为。例如，互惠义务在维持和谐的商业关系中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希望双方不仅保持友好，而且还回报对方给予的恩惠。另一方面，西方关系营销网络的结构要正式得多，其中没有社会义务和进一步的恩惠交换义务。因此，与西方关系营销相比，中国关系实践更强调长期的个人化关系。

———

思想桎梏、经济桎梏、社会桎梏、人生桎梏

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当政以来，亿万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思想桎梏、经济桎梏、社会桎梏、人生桎梏的境地之中，直到今日，已经长达七十多年之久。这种桎梏的状态，在1966-1976年之间的文革时期，更为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建政理想，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声称要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平等而奋斗，然而，讽刺的是，中国共产党给人民所带来的，却是生灵涂炭、痛苦、奴役、压制、患难。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人，失去了思想与灵魂的意义，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庞大运转机器中的零件，变成

了一个又一个空洞的数字和符号，变成了行尸走肉一般的被欺压者，而失去了人格与尊严的高贵意义。这固然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的愚昧统治政策，例如荒谬的文革、大跃进政策等等；更是出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共产主义理念本身的欺谎、荒谬、愚昧与罪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中，没有敬神畏天的信仰，没有敬虔、谦卑、虔诚的情感，而是充满了人的自义、自高。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看到人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目的、归宿之所在，而把人的生命错误地当成了集体主义的垫脚石，当成了以物质世界为归依的工具和劳动机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平等理念，必然给人类带来最大的、最荒谬的、系统化的、普及性的不平等【例如，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其所引致的出身论、成分论、阶级论、国家机器论、等等；蔑视对于全体人民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蔑视经济活动中的思想与创造力价值、知识革新价值、投资资本价值、创新、历险与试错价值，等等】；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信念，必然给人类带来对于人生命、思想、灵魂、尊严的践踏、奴役、桎梏。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念中，人的思想、人格、灵魂、人性、尊严、高贵、自由，成为了垫脚石、牺牲品，成为了任人践踏、欺凌、不值一文价值的草芥。

请注意，我们并非是说，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建政历史中，就没有值得肯定的建设成就，就没有各个方面的许多社会进步；我们也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故意行恶。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诚实、公道、谦卑地指出，事实上，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确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取得了许许多多、各个方面的值得称道的社会进步；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是出于相对而言正直勤奋的工作态度，想要在建设国家、服务公众的方面，做出有益的、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那些建设成就、社会进步、工作价值，等等，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桎梏、经济桎梏、社会桎梏、人身桎梏的政策措施吗？【例如，言论审查；全面掌控整个国家的一切新闻、报纸、书籍、出版、广播、影视、等等任何与思想、精神和言论有关的领域；通过愚昧残酷的户口等等管治措施，在中国人为地制造出巨大的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行业不平等的政治局面；在教育、经济发展等等方面，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系统性的歧视措施；等等等等】。我们必须清晰而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成就和工作价值，恰恰不是由于那些思想桎梏、经济桎梏、社会桎梏、人身桎梏的愚昧残酷罪恶措施；而是由于，近代三百年来，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结果。

这一点，我们只要环顾世界，看一看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美洲、日本、东亚、亚洲四小龙、东盟、甚至非洲的很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就能够清楚地明白。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台湾，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大陆文革的1960、1970年代时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超过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数十倍；以至于，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台湾与香港一道成为了对中国大陆外贸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为中国大陆从198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不可忘记的贡献。而且，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直至今天二十一世纪2020年代以来的、四十年经济腾飞过程，正是由于与西方经济密切融合，大力吸收、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

技术的结果。

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中国人口从4亿人增加了数倍，直到14亿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自从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广泛地普及了近代三百年以来的西医护理、消毒、分娩、育婴技术，从而使得婴幼儿夭折率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首次史无前例地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使得婴儿分娩出生时的成功率大幅度上升。在清末以前的古代时期，中国母亲与婴儿在生产的过程中曾经有着很高的死亡率，母亲生产分娩曾经是一件非常具有生命危险性的事情。正是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所首先建立起来的西医医院，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从那以后，中国所有的医院建筑都有红十字的标志（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如此）。

中国人口的增长，与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这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恩德，也不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而是由于西方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以及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作用。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的建设成就与社会进步【无论是在农业进步、工业进步，还是医疗健康系统、人口增长、以及随人口增长而

导致的自然经济体量增长、等等许多方面】，如果我们的内心是诚实、谦卑、公道的，那么，我们会看见，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阻碍、而是利用了现代科技进步与政治文化文明的结果；而反之，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深刻、愚昧、残酷、罪恶的错误【例如，反右、大跃进、文革、八九六四、等等许许多多罄竹难书的罪恶之事】，则恰恰是由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理念、残暴专制主义的结果。

固然，一个健康、蓬勃、全面发展的经济体系，需要有稳定、团结、成熟的社会体系做保障；但是，这样的稳定团结的社会体系、政治局面，不应当是出于残暴的压制、镇压、铁拳统治，不应当是出于扼杀自由与个体生命的尊贵价值和意义；而应当是建基于敬虔真挚的信仰，建基于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思想与灵魂之宝贵意义的尊重。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关于团结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

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

+++

+++

+++

+++

+++++++++

【【【引述 《基督教的证据》相关内容】】】

基督教信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什么

本章的题目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社会道德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福音对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另外，关于福音对于人生命更深层次问题的深刻作用，我们则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专门论述。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福音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社会整体的生机勃勃、自由而团结的状态。这个题目虽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广泛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在很漫长的历史中都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只想进行一些言简意赅的、初浅的论述。我的这些论述其实相比于前人的相关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如果说与前人的著作有什么稍微不同，那么我想，本章的文字大概更专门地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缺乏以及所经历的很多具体事情。

我想要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之团结状态的概念，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群，与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后者而言，这些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

的人群所能够在一起组成的最好的团结状态，就是一个无中心的、散漫邋遢的“共和国”。在前者而言，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群在一起则会构建起一个“有坚固根基的城”、一个有良好核心、众志成城的“上帝的国度”。

在我们考察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注意看一下基督教信仰中一些重要的抽象原则，然后再看其在基督徒们的教导中、以及生命中的应用与体现。

当我们讨论基督福音中的抽象原则、及其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而言，我们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福音的最根本层面的真理中，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之所需，如何得到了满足？

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需要，取决于构成社会的所有组成分子的需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能够单独地站立，面对自我，面对上帝。然而这些个体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通过一个心灵的网络纽带，彼此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一些外在的言语行为来彼此影响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在内心的许多观念上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改变。他们互相影响的程度和

力量，取决于社会的团结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一个社会的良好而健康的状态，取决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程度与群体的团结程度之间的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于达到的。即使在理论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完美平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如果个人自由太多，则社会的状态会变得道德堕落、生活散漫邋遢。如果群体团结程度太多，则每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压抑、束手束脚，人的幸福与创造力也会大大下降。当社会无法达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两方面之间的平衡的时候，社会就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荡。个人自由散漫现象如果普遍地在社会中发生，社会就会逐渐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堕落状态，并最终导致暴君专制主义的盛行，然后暴君专制又被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这样，社会就会如此周而复始地陷入动乱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政府的统治机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手术刀。但是，这个手术刀总是在病人的伤口上刻下更深的伤痕，使病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福祉而言，必须同时需要有两个原则得到满足：自由的原则，与团结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建立，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官方治理，部分地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愿。

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需要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一定的范围内采取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团、群体能够自由地行动和

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的团结状态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性是社会长久存在、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团结状态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则。社会稳定性的原则独立于、或先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原则。

如果没有自由原则，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人都成了奴隶，自由思想也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稳定原则、或团结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完美的、或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这方面的意思。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处事“文明”，享有自由、但要为集体做贡献，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团结而愿意牺牲自己。

现在我们来思考，基督福音与上述两个根本性社会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福音向我们启示的社会生活之真正原则是什么？

无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敬拜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永生真神。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那里"。上帝的圣洁道德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人类的最好状态、最高理想、最大幸福，就应当是像上帝那样圣洁、公义、恩慈。显然，基督教信仰为上述社会两原则中的稳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真理层面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需要一个先于其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基础。

有人会就此争辩说："即使社会中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随从自己的良知，就足以维护社会的基础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律法"的现实性。不论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总之，社会需要这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而这些律法、或规章制度总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意志。这种社会统治的权柄与社会个人自由意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不论两者之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对于无神论主义者或泛神论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律法的来源是宇宙自然世界，或者基于人性自身的光景。事实上一般而言，无神论主义与泛神论主义【译者注：泛神论主义是指，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有着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的、自有永有的上帝、造物主。因而，在泛神主义者眼中，人在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终极层面的高贵性；人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并没有什么本质层面的高贵源泉和永存价值】的理论家们，都往往是王权、专制政权的坚决推崇者、坚定拥护者、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推崇社会的稳定要胜过社会的自由。在他们眼中，个人自由并没有那么珍贵，思想自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甚至，这些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这些都可以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而被裁减、践踏。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终极高贵性、尊贵性；在人与自然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译者注：人的尊严，按着圣经中所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尊严与荣耀，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们的所谓和平与稳定，是压制自由的结果。他们所推崇的统治常常导致社会中属灵状态的荒凉。他们的和平往往是一种扭曲的、徒有其表的外在和平。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疑，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敬拜全能、全知、公义之上帝的信仰体系，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坚固、最安全的稳定性环境因素。对于个人自由与意志的所划定的界限："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向前逾越"这样的律法，必须是在终极层面意义上来自那位有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全能者上帝自己的话语。个人思想与生命就像是大海中

匍匐向前的海浪潮水。对这潮水的限制力量，必须是来自天上的力量，来自那位创造和管理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天、独一的真神。

然而一神主义本身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社会在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达成平衡。【译者注：一神主义是指，信仰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和掌管的。在人类历史中，一神主义的宗教信仰有三个主要宗教形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后两者的起源都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经典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否定旧约圣经的主要部分，认为犹太人的祖先篡改了上帝的启示，于是穆罕默德就另起炉灶，另外创建出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是因为，一神主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苛刻的管理，以至于达到完全排他主义的程度。比如，伊斯兰教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王权和专制政府的特点。在犹太教的社会中，这种专制倾向不那么严重，因为根据旧约圣经，"耶和华所膏的"人有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负责国家政事，先知把上帝的启示向世人传讲，祭司则负责全国百姓与政府人员们的敬拜信仰和仪式。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时代，这三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合，结果导致百姓担负很重的轭。在地上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当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事高度重合的时候，社会的统治权力就会很大，而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很大挤压与压制。

而在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一神主义中，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完全沦为绝对命运下的被动受体，因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无条件地完全服从于穆罕默德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权力。在伊斯兰教的一神主义下，"一神主

义”的概念就成为完全的“真主凌驾世人”。在这样的统治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微小的、盲目的、软弱的、罪恶的。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律法颁布者，是全能的法官。在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要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在这种一神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服从与顺服，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当有，也不需要有任何自由。在这样的一神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生活无法在社会的纽带关系中立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政府绝对统治权力之下往往失去了权利与自由的空间，不再有活力和创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状态，直到下一次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政府权力与国王被推翻。然后社会进入下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周期循环。

有时，上述弊病也成为一些现代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国家社会也会像伊斯兰教社会那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社会大众就会失去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与简单的、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中，上帝的启示表明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不是“上帝凌驾世人”，而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以马内利”。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使人有思想、有自由、有意志。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人的自由才有了真正高贵的、终极的、本质性的根基。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人应

当谦卑地承认和悔改己罪，虽然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人的生命本质当中，应当本有自由的属性。正是在这样的、与生命自由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上帝才真正是世人的天父，人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作工，不是把人当作无意识的机器，也不是把人当作被压制的奴隶，而是，圣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由内而外地、由衷地、忠心地、自由地来到公义圣洁之上帝的面前。福音的奥秘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之祭。在福音中，包含着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与真理。保罗把这福音看作是上帝的奇妙大能，看作是基督教信仰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刻的内容。人与上帝是朋友、是同工、是亲人、是至爱。这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哲理，而是真实的、热忱的、生命的信仰。

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与最迷人、最甜蜜的精髓，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而不是使人处于被奴役之境地的律法之约。恩典之约使人真正地、衷心地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洁的律法典章，因而真正成就了、完全了上帝的律法。这恩典之约使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债被偿清，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因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真心地承认自己本都是该死的罪人。这样的人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人是真诚而热忱的，是自由的，因为不再有灵魂之中、罪恶权柄之下的奴役和羁

绊。

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拥有之自由的价值。这自由是尊贵的，是高尚的，而不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在欧洲古代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被逐渐废除了，中世纪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了，以及在我们当代，美洲境内的奴役制度也这样被最终取消了。

请注意，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放人类奴隶制的“解放神学”，而是指出世人普遍的罪的光景，指出世人对于上帝的背离，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救恩与大能。人灵魂所处的被奴役光景，真正根源不是外在的奴隶制，而是内在的、人生命处于罪的奴役之中的光景。每一个世人在其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倾向于罪的性质。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所在。他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其核心不是在于外面的、肉体上的自由，而是在于里面的、灵魂之中的、脱离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脱离了死亡恐惧、有永远生命、天国盼望的自由，是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之生活的、热忱地爱上帝、完全地归向上帝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福音之中所包含着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人生命之真正自由的思想，的确对于社会学中的个人自由具有重大影响和价

值意义。这以生命自由为中心实质的教义，这以自由为基础的信仰、思想、行为、规范，是对任何专制政权、暴君统治、强迫压制、寡头政治、强奸民意等等社会暴虐法权机制的本质性的反对。

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特点，正是导致世上的那些想要奴役人民的政权讨厌、排斥、压制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比如，TRAJAN以及MARCUS AURELIUS等等专制政权，都极力想要反对和排挤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历世历代中，在各个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曾经有许多基督徒殉道者。这些殉道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或是那里正在经受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死的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谦卑而和平的信仰，为了心中所敬畏的上帝，为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为了对于上帝的爱，而宁肯丧失性命，也不愿放弃这宝贵的信仰。他们愿意在一切世事上温和地、和平地、恩慈地、勤劳、谨守地生活，愿意在一切世事上遵从在上掌权者，尊重政府权力和法律，遵守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典章制度。但是在信仰之事上、属灵之事上，他们却绝不愿意在任何属世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绝不愿意听从人而不听从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终极的律法赐予者，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立法者；上帝的典章，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的规章制度与法律。

这种既谦卑温和、又坚毅稳定的信仰，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无数基督徒殉道者们的信仰，也更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平凡

而真诚之基督徒的信仰。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都应是如此。这种信仰中包含着一种与世俗中的好勇斗狠的英勇主义完全不同的、谦卑温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中，有着对于人灵魂自由的高尚本质的追求和尊重。在人的心灵土壤上，在人的信仰之中，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亲自来掌权。上帝以道成肉身的、舍命牺牲的、救赎性的爱，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以任何属世的人为我们灵魂之主。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革命；但至少在名义上，这些革命更多地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要真诚地、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完全为了属世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重视，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提出这个论述的结论和论点，即，基督教信仰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健康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团结稳定原则，也满足了这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原则。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因为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可以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勤奋谨守、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却不会滑入道德堕落、无政府主义、刁酸尖滑、彼此猜疑、毫无信任、好勇斗狠的混乱与败坏的深渊。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渐渐失去基督教信仰、沉迷于饮酒宴乐、骄奢淫逸、彼此争斗不休的时候，就是他们逐渐走

向败坏与崩塌的时候。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两者之间试图进行某种调和，或是给出某种明确的界限和公式。圣经福音书中，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是否要纳税的时候，耶稣给出了一个在历世历代以来非常著名、人所熟知的回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在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天的事情上，划出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一般的界限，而就是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当然，耶稣对那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意思是说，应当纳税。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说，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的本质性问题上，耶稣基督的有限度的沉默，以及有限度的澄清，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无疑，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见，基督教的教会、团体、会众要起来，以和平的精神，为社会公义而发声；在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上，常常需要挺身而出、为弱者呼吁、秉公行义、抵挡罪恶，无论这罪恶是来自高举稳定大旗的政府权力、还是来自高举自由主义的社会个人、甚至暴民。然而，无论基督教信仰、福音针对社会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具体立场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价值原则，而仅仅是此时此地的、福音之永恒价值与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只有福音原则本身才是永恒的。在福音中，既包括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强调，也包括了对于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的强调。这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却都是重要的、高尚的，因为都是来自上帝的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

力、尽意地爱主你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更进一步说，究其本质，基督徒们的真正终极的归宿和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繁荣与富强、或是公义与和平，而是在于天上的永远国度，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那没有死亡和眼泪、没有痛苦与别离的属天国度，那个与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真实的家园。所以，无论是贫是富、是显赫还是卑微，基督徒们都能在这个世上和平地、谦卑地、忍耐地度日。基督教信仰不是遁世的信仰，而是积极入世的信仰；基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作光和盐，发光发热，竭尽全力、毕其一生爱上帝、爱世人。然而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归宿、倚靠、终极价值的思想体系。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基督教信仰都会把真正的福祉带给那个社会，并渐渐地也把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带到那里。无论是在稳定不动的东方，还是在活泼变化的西方；无论是在早期的、以家庭为单位与核心的、简单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纽带所连接的、庞杂社会环境中；基督教都能够把人心灵所饥渴的、渴慕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带给人。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的广传与普及，社会道德风貌得到大大提高，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人民同时享有更多丰富美好的自由。

如果，在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基督教只强调稳定原则或是自由原则中的一方，而不强调另外一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社会形态中，稳定与自由这两个原则因素之间不平衡，一方太大太多、而另一方太小太少。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随着个人主义的解放而导致道德失序、社会混乱。但是，当那些国家的社会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中经过重整、进入法律秩序状态中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政权上台，公民自由被一扫而光。当今，在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或是许多明确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专制极权主义常常被当成针对社会淫乱放荡、混乱、失序、道德败坏的解药。他们的国家社会形态如同钟摆一样，在极权与放荡之间摆来摆去，总是不能停歇、不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的社会中，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稳定，二者总是不能兼得。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从久远的历史层面来说，从漫长的时间见证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真正的、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基督教信仰，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这样的社会：——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自由、充满温馨博爱、同情弱者、鼓励强者、彼此平等、满怀热忱情感的社会；又是稳定繁荣、长治久安、和平安宁、不断奋进地进取的社会。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此独具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为了千古以来无数哲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一直找不到答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极其惊奇诧异的事情。关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彼此和谐相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对此思索不已。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方面有汗牛充栋的著述。世上也有许多流派和学院，不断在探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或是流于一些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对真实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或是导致一些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做出来却尽是假冒为善的虚伪之辈所组成的社会。而基督教从诞生到发展，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增长，看似平淡无奇、和平温柔，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世人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与文化，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没有什么，比这些历史更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我们永生与天国的盼望，等等这些教义，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文盲，最简朴的公众也都能够理解。我们如果否认这些教义，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奇妙作为，不能理解教会的永存性，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

+++
+++
+++
+++
+

====================================

集体的团结与个人的自由：良知、信仰与道德法则；宽容、饶恕与坚持正义

在一个社会中，必须兼有集体的团结与个人的自由，这样的社会才会健康向上、生机勃勃、稳定有序、长效发展。这样的社会，必须建基于良知、信仰与道德法则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宽容、饶恕、包容、与坚持正义的平衡之上。这正是现代民主制度成功的秘诀所在。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左派往往是代表社会恩慈、扶助弱势群体、主张社会福利等等政治力量，右派往往是代表社会公义、推崇平等竞争、鼓励和奖励竞争、赏善罚恶、严厉打击罪恶势力等等政治力量。在这样的健康民主社会中，左右两派必须都认识到，在自己的一方，既包含着一部分真理，又并非是包含着全部的真理；而在自己政治对立面一方，也包含着一部分真理，并也并非是全部的真理。只有通过左右双方的不断角力、合力、磋商、坚持、妥协，整个社会才能够不断地保持既发展、又和平，既公义、又恩慈，既有生机活力、又充满温情的社会局面。在这其中，最最关键的是，左右双方都应当有敬虔的信仰，都应当坚定而谦卑地深深倚靠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以那伟大的信仰为自己心灵的归依，而不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心灵的归依，要死要活、好勇斗狠、甚至耍赖、造反、干革命、等等。只有这样，民主社会才会是长久而稳定健康的。

=======================================

什么是真正的团结稳定

一个社会中，真正的团结稳定，不是通过高压政策来实现，而是通过有效的政策，行公义、好怜悯，既坚持公平正义、又坚持恩慈宽容，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真正团结稳定的社会，一定是基于人们心灵之间的纽带，是众志成城、心心相印、彼此包容宽恕、共同敬虔地寻求公义的社会。

==

什么是个人自由与社会中的团体自由

所谓自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群体、社团，不受到不合理的、不必要的、不公义的压迫、约束、限制、欺压。

社会的平等公义、幸福安康，必须建基于这样的自由之上。

人生命中真正的自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受罪恶所辖制的自由。

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只有在对于上帝的信仰中，在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倚靠中，才能够真正得到。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

自由与真理是紧密相连的。那真正的、绝对的真理，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找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约翰福音14章1-14节：

1“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　神，也应当信我。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4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5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8腓力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9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10你不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11你们应当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不然，也要因我所作的而相信。12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14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甚么，我必定成全。

==

怎样面对潜在性的冲突与矛盾

在一个社会中，怎样面对、怎样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潜在性冲突与矛盾？

专制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能够通过斗争、压制、暴力、强力等手段来解决；甚至，像纳粹主义那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肉体消灭才能解决；或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

然而，这种专制主义思维方式，就像是一个战场上的随军庸医，看到战士们身上中了箭伤，于是就拿出剪刀，简单粗暴地剪断战士们身上所中之箭的箭杆。换言之，专制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愚蠢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是虚谎、诡诈、不诚实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为特殊的存在体，因为在每一个世人的里面，都有

着一颗心灵和灵魂。所以，究其根本而言，人的心灵不可能被压服，而只能被劝服、感化、以心换心。

专制主义者们的愚蠢之处，正是在于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或是颐指气使地、专横跋扈地、故意无视这一点。

世人虽然会暂时屈服于专制主义的铁拳之下，但是，他们的心灵中却是怨声载道、心怀不满；一旦有机会，百姓就会起来造反、革命、推翻旧政权。最后，究其根本而言，专制主义者们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们不仅会受到世人的反抗和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受到那无限全能、圣洁公义之上帝的终极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他们必将和世上一切顽梗刚硬之罪人一样，在地狱中承受永远的、终极的痛苦刑罚，在那里哀哭切齿。那里是彻底黑暗的火湖；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

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而言，必须通过像民主社会中那样的复杂而微妙的、小心而谨慎的、恩慈而公义的，民主政策决策过程来解决。在这样的民主过程

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有发声的渠道；所有的声音都会得到关注、考虑和聆听。最终，在不断地坚持与不断地妥协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达成一种最大程度共识基础之上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需要整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在心灵中都有良知和公义，都有敬虔、热忱、恩慈、圣洁的、对于上天的信仰。

=======================================

====================

压制与自由

专制主义政府仅凭着高压政策本身，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因此，专制主义统治的最常见手段，就是高压、邪恶与欺骗相结合。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专制主义政府会通过腐败、不义、邪恶的方式，来拉拢统治集团内部的各层官员与国家机器组成人员。为了取得被统治者的表面拥护，专制主义政府会通过虚伪、欺骗、政治宣传等等来蒙蔽人的心灵。这一类手段，我们在纳粹政权、苏联政权、北朝鲜政权、古巴政权等政府中屡见不鲜。这些高压、邪恶、欺骗等等手段，常常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作社会中的螺丝钉”、“为社会

建设而添砖加瓦”、国家主义、“民族骄傲自豪感”、“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等等冠冕堂皇的政治性口号相结合。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些专制主义的愚蠢荒谬的丑态与手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尽人皆知。

在一个社会中，真正的公平、正义、平等、公义，一定是与自由紧密结合的。只有在世人的心中有自由，在社会言论和舆论环境中有自由，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知道世事真相。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着普遍而敬虔的信仰，有着普遍的良知与公义；人们不会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冠冕堂皇的口号所欺骗、羁绊，而堕入专制主义的陷阱和谎言之中。

这并不是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情感本身是错误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把所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至理，甚至凌驾于良知与公义之上；即，我们不看世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而仅仅是愚昧、一味、盲目、固执地认为，凡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正义的；当我们国家与别的国家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别人的错，我们一定是正义的。

如果我们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看作是凌驾于良知、公义之上的所谓至

理，而离弃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对与错、善与恶；那么，这就正显明了，我们自己心中的本质上的罪性。

所谓罪正是指，世人常常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以自己为自己的神，而离弃、悖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离弃、悖逆上帝所放置在我们世人良知之中的公义圣洁之道德法则。正是因此，世人常常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同心圆中；正是因此，世人盲目而愚昧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比别人的国家好，自己的文化就比别人的文化好，自己的家人就比别人的家人好，自己的同乡、同学、同胞，就比别人更正义。

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并深思上述问题，就会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战争、冲突、仇恨、杀戮、荼毒、血泪、甚至生灵涂炭，都与这种所谓人内心中的本质之罪深刻相关。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并不是说，爱国主义本身、集体主义本身是错误的。关键在于，我们所爱的国家、社会、集体本身，是否是公义、良善的。我们的国家、集体、乃至同胞、同乡、同学、亲人、家人，在面对各样复杂世事的时候，是否秉公行义，是否行公义、好怜悯，是否以公平、正义、公义、恩慈的方式待人。如果不是，那么，所谓“大义灭亲”的意思是指，在国家、集体、同胞、同乡、同学、亲人、家人之上，有着更加重

大、更加根本、更加终极的真理和正义的基准。

那真正的终极真理和正义的基准，正是在于我们所敬虔信仰的对象，就是那无限全能、无限伟大、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

只有在这样的对于上天的信仰中，只有在这样的终极道德基准下，只有在这样的良知约束范围之内，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亲人之爱，才是美好的，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与正义，而不是——专制、暴戾、欺压、甚至邪恶与欺骗。

真正的自由，绝非仅仅是政治上的、外在的自由，而更是心灵中的、灵魂中的自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脱离罪的权势辖制的自由【这种罪的辖制，不仅是指那种外在的欺压，而更是指在人自己内心深处的；是出于人自己生命、心灵本质中的罪性本身】。

真正的自由，必是与真理、正义、上帝的救赎恩典，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
+++
+++
+++
++++++++++++++++++++

圣经加拉太书4、5章：

1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期，却和奴仆没有分别。2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候。3我们也是这样，作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4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5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嗣子的名分。6你们既然是儿子， 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7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 神承受产业了。

8从前你们不认识 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 神的作奴仆；9现在你们既然认识 神，更可以说是 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到那些软弱贫乏的言论，情愿再作它们的奴仆呢？10你们严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11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我在你们身上的劳苦是白费了。

12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并没有亏负过我。13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14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个试炼，你们却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而接纳我，好象　神的天使，也好象基督耶稣。15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我可以为你们作证，那时如果可能，你们甚至愿意把你们的眼睛剜出来给我哩！16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反而成了你们的仇敌吗？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你们和我疏远，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18常常在善事上热心，总是好的；只是不要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是这样。19我的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再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20我恨不得现今就在你们那里，改变我的语气，因为我为你们十分困扰。

21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哪！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过律法吗？22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出于婢女，一个出于自由的妇人。23但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妇人的，是凭着应许生的。24这都是寓意的说法：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作奴仆，这是夏甲。25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她和她的儿女都是作奴仆的。26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27因为经上记着说：

“不能生育、没有生养的啊，你要欢欣！

没有受过生产痛苦的啊，你要呼喊，大声呼叫！

因为弃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儿子。”

28可是，弟兄们，你们是按着应许作儿女的，好象以撒一样。29不过，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30然而经上怎样说呢？“把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婢女的儿子，绝对不可以和自由

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31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婢女的儿女，而是自由的妇人的儿女了。

1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轭控制。

2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受割礼，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了。3我再对所有受割礼的人郑重声明：他有责任遵行全部的律法。4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6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

7你们向来跑得好，谁拦阻了你们，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8这种劝诱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9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面发起来。10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存别的意念；但那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定要受刑罚。11弟兄们，如果我仍旧传割礼，我为甚么还受迫害呢？若是这样，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了。12我恨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阉割了！

13弟兄们，你们蒙召得了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事。14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15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都要毁灭了。

16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17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作自己愿意作的。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

下了。19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20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竞、忌恨、忿怒、自私、分党、结派、21嫉妒、醉酒、荒宴，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　神的国。

22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24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25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26我们不可贪图虚荣，彼此触怒，互相嫉妒。

+++

+++

+++

+++

++++++++++++++++++++

=======================================

公义与恩慈

所谓公义就是指，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容让人的罪，严厉地指责人的罪，寻求真理、饥渴慕义，寻求良善、离弃罪恶。

所谓恩慈就是指，以宽容、友爱、温柔、饶恕、忍耐的心，对待他人。真正的恩慈，就是对待罪人的爱。

公义与真理和正义紧密相连；恩慈与恩典和饶恕紧密相连。真正的公义与恩慈，只有是来自上帝、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生命之主。

约翰福音1章

1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2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3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5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

6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　神所差来的。7他来是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使众人借着他可以相信。8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作见证。9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

界却不认识他。11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12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 神的儿女。13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 神生的。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

15约翰为他作见证，大声说："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16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18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

爱的真谛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门徒作盐作光（可9:50；路14:34~35）

13“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14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15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16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论律法

17“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19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不可恨人（路12:58~59）

21“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2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24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25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26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不可动淫念

27“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28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29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30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

到地狱里去。

不可休妻（太19:9；可10:11~12；路16:18）

31“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3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不可发誓

33“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34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35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36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可报复（路6:29~30）

38“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40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41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当爱仇敌（路6:27~28、32~36）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

++

++

++

++

++

++

++

++

++

++

++

+++

____

中苏关系危机与中美关系解冻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o-Soviet_split

中苏分裂

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破裂。从他们不同的解释和实际应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出现了分歧。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苏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争论变成了关于苏联国家去斯大林化和国际化政策的具体争论。苏联要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而毛泽东则谴责其为修正主义。在这一思想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向西方的好战姿态，并公开拒绝了苏联的关于东方和西方阵营的和平共处政策。此外，中国对苏联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感到不满；莫斯科担心毛泽东对核战争的恐怖漠不关心。

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中谴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开始了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他们对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应用上逐渐出现分歧时，毛和中国领导人感到震惊。到 1961 年，他们难以解决的意识形态分歧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谴责苏联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叛徒”。对东方集团国家来说，中苏分裂是一个谁来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谁（中国或苏联）是先锋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通过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先锋党争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权。

在西方世界，中苏分裂将两极冷战变成了三极冷战，这一地缘政治事件与柏林墙的竖立（1961）、古巴导弹危机的化解（1962）、以及越南战争（1975 年）的结束一样重要。因为这场竞争促使毛泽东在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实现了中美和解。此外，中苏分裂的发生也使整体共产主义的概念失效；在此之前，西方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地缘政治中是一个统一的参与者，尤其是在1947 年至 1950 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当美国介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 时。从历史上看，中苏分裂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实政治，毛泽东用它建立了冷战后期（1956-1991）的三极地缘政治（中国-美国-苏联）以及四极地地缘政治（中国-英国-美

国-苏联），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

起源

不情愿的共同交战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区，1936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被他自己的一名军官绑架，被迫与中共的共产党毛泽东结盟，作为不情愿的共同交战者，将日本帝国驱逐出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国民党搁置内战，试图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为此，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下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合作抗日。继日本投降，双方恢复了他们的内战，共产党人1949年赢得了内战。

1945年二战结束时，斯大林建议毛当时不要夺取政权，而是根据 1945 年的苏联-国民党友好同盟条约与蒋合作。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团结中追随斯大林。然而，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即 1945 年 11 月，当蒋反对将塔努乌里安凯（蒙古）并入苏联时，斯大林违反了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红军撤出满洲的条约，并下令Rodion Malinovsky将军将日本剩余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给予毛地区控制权）。

在二战后的五年期间，美国部分资助了蒋介石、他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国民革命军。然而，华盛顿向蒋施压，要求其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美国特使乔治·马歇尔 (George Marshall)在中国度过了 13 个月，试图促成和平，但没有成功。在中国内战结束的三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击败并驱逐了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因此，国民党于 1949 年 12 月撤退到台湾。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毛主席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的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1967)

作为寻求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毛泽东发展并改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意识形态，以实际应用于前工业化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农业条件。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把政治实用主义确立为实现国家和人民加快现代化的第一要务。

1947年中国内战期间，毛派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往西方，携带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政治文件，并要求她“向美国和欧洲的党领导人展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但“没有必要把他们带到莫斯科”。

毛信任斯特朗，因为她在“毛泽东思想”一文中对他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的正面报道，以及在 1948 年出版的《曙光乍现》一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正面报道：《中国解放区的亲密记述》报告说，毛泽东的思想成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转变为亚洲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无法想象的方式”。

中苏友好条约

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了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共同维护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该条约改善了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层面的地缘政治关系。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慷慨捐助包括一笔 3 亿美元的贷款；军事援助，如果日本攻击中国；将满洲里、旅顺港和大连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控制。作为回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尽管有优惠条件，社会主义友好条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苏联的地缘政治霸权，但与东欧的苏联卫星国政府不同，苏联并没有控制毛泽东的政府。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首先发展重工业，其次发展消费品。后来，毛泽东不顾技术顾问的指导，发动了大跃进，试图把农业中国迅速变成工业化国家，给人民和土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农业生产目标由于规划和实现不力而未能实现，这加剧了农村饥饿，导致了中国大饥荒。

社会主义关系得到修复

1954 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试图修复与中国关系，通过与中国贸易协定、正式承认斯大林对中国的经济不公平、援助十五个工业发展项目、以及派遣技术人员（约 10,000）和政治顾问（约. 1,500）；而中国劳工则被派去填补西伯利亚体力劳动者的短缺。尽管如此，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个人和意识形态上都不喜欢对方。然而，到了 1955 年，由于赫鲁晓夫修复了与毛泽东和中国人的关系，根据1953 年开始的中国五年计划，中国60% 的出口都流向了苏联。

去斯大林化的不满

中苏分裂源于赫鲁晓夫总理的去斯大林化、苏联同西方和平共处政策、毛泽东的好战和斯大林主义政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1956年初，由于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去斯大林化，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他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批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武装部队和苏联共产党（CPSU）的普通党员的大清洗。在去斯大林化的背景下，苏共意识形态方向的转变——从斯大林与西方的对抗到赫鲁晓夫与之共存——给效仿斯大林的领导风格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应用的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可信度和政治权威问题与挑战。

1956年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匈牙利革命对毛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它需要苏联军事干预进行镇压，而且它的发生否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针对东方集团欧洲成员的这种不满，中国共产党谴责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是修正主义，并重申毛政府的斯大林主义思想、政策和做法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结果，中苏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和解释上的这种分歧开始破坏“整体共产主义”。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将在地缘政治上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匈牙利革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势力范围内有可能发生叛乱。为了制止这种不满情绪，毛泽东于 1956 年发起了政治自由化的百花运动——公开批评政府、官僚和中共的言论自由。然而，当有人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时，这场运动被证明过于成功。由于去斯大林化的苏联相对自由，毛决定与苏联分道扬镳，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政府和社会的斯大林主义模式。

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台湾海峡

1958 年 7 月，在北京，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谈判在中国建立中苏联合海军基地，苏联核潜艇将在那里阻止美国对东亚的干预。当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试图建立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岸的控制时，协议失败了。8月底，毛

泽东通过进攻马祖群岛和金门岛，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导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在发动那场地区战争时，毛没有通知赫鲁晓夫。对这种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的正式意识形态反应迫使赫鲁晓夫修改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将地区战争包括在内，例如最近的台湾危机。毛对赫鲁晓夫隐瞒信息恶化了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特别是因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和苏联发动核战争；因此，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持续枪战促使赫鲁晓夫因中国长期内战而与美国发生争执。

在三极冷战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怀疑毛泽东的精神是否健全，因为他不切实际的地缘政治对抗政策可能会引发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核战争。为了挫败毛泽东的好战，赫鲁晓夫取消了对外援助协议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苏联原子弹的计划。

整个1950年代，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对中国的外援工程项目，保持积极的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国原子弹项目596计划的核技术。然而，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存在，因为苏联同西方和平共处政策的经济利益使交战的中国在中国霸权国家中的地缘政治信誉失效，尤其是在中美和解失败之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中美外交的失败和美国在台湾的核武器证明了毛泽东对台湾的对抗性外交政策是合理的。

1958 年底，中国共产党复兴了毛泽东游击时期的个人崇拜，将毛主席描绘

成一位有魅力、有远见的领导人，完全有资格控制实现中国工业化大跃进所需的政策、行政和民众动员。此外，对于东方集团，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战争和大跃进的加速现代化描述为适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范例。这些情况允许中苏意识形态竞争，毛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争端的开始

对毛泽东来说，1958 年至 1959 年期间的事件表明，赫鲁晓夫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不可信的。1959年，赫鲁晓夫总理会见了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缓和美苏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此，苏联：(i) 违背了开发596 项目的技术援助协议，(ii) 在中印战争中站在印度一边。每次美苏合作都冒犯了毛，他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对西方过于宽容的机会主义者。中共说，苏共过分强调“苏美合作统治世界”，地缘政治行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

赫鲁晓夫、毛泽东和巴尔干

斯大林主义的团结：中国的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联合起来，将斯大林主义作为他们国家的政府形式。

1950年代，中苏分裂的迫在眉睫，表现在双方对分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谴责和批评。中国谴责南斯拉夫的混合经济不够社会主义。毛泽东个人批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 是意识形态的背离主义者，因为他奉行政治上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批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落后的国家，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没有超越斯大林主义并与中国结盟，这引发了苏阿分裂. 此外，为了进一步挫败中国，苏联公开在语言上支持1959 年西藏起义。

毛泽东、赫鲁晓夫和美国

1960 年，毛期望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积极对峙，让艾森豪威尔为U-2 间谍飞机事件负责（该间谍飞机被苏联击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利用U-2拍摄军事基地）；美国则称已停止空中间谍活动。在巴黎，在四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为中央情报局继续对苏联进行空中间谍活动道歉，但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的道歉。在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解释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主权的不尊重，并举行政治集会，要求赫鲁晓夫与美国侵略者进行军事对抗；如果没有这样果断的行动，赫鲁晓夫就在中国面前丢了脸。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60 年 11月）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抨击苏联和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是苏联和中国走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毛说，赫鲁晓夫强调消费品和物质丰富，会使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变得软弱和不革命，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我们除了革命以外不能向人民承诺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会挠头说：不是吃炖牛肉更好吗？”

人身攻击

在 1960 年代，公开展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激烈争吵是强硬的斯大林主义中国人和后斯大林主义苏联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特征。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共的彭真与赫鲁晓夫发生争吵，因为赫鲁晓夫侮辱毛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地缘政治冒险家和思想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反过来，彭将赫鲁晓夫侮辱为修正主义者，其制度表明他是一个"重男轻女、专断和专制"的统治者。结果，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用80页的批评来谴责中共。1960 年 6 月，在去斯大林化的顶峰时期，苏联谴责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落后的国家，因为它保留了斯大林主义作为政府和社会主义的典范。中共给中国干部的信息是："当赫鲁晓夫停止俄罗斯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时，霍查对他的人民说：'即使我们必须吃草根生存，我们也不会从俄罗斯拿走任何东西。中国没有沙文主义，而是立即向兄弟国家送去食物。'"

作为对侮辱的回应，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了 1,400 名苏联技术人员，从而取消了大约 200 个联合科学项目。作为回应，毛泽东证明了他的声称，即赫鲁晓夫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经济失败，饥荒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尽管如此，中国和苏联仍然是务实的盟友，这使毛泽东能够缓解中国的饥荒并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对毛泽东来说，赫鲁晓夫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可信度，因为他的美苏缓和导致了美方对苏联的军事（空中）间谍活动的成功。赫鲁晓夫对人和环境的错误估计使美苏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上的外交无效。

整体共产主义分裂

1962年底，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美国和苏联分别同意，美方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除中程PGM-19木星核导弹，苏方从古巴撤除中程R-12 Dvina和R-14 Chusovaya核导弹。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毛说苏联的军事停摆是赫鲁晓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地缘政治的背叛。

1961年底，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中苏重新审视了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和适用的学说争论。1961年12月，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苏争端从政党层面上升到国家政府层面。

1962年底，由于赫鲁晓夫没有因古巴导弹危机与美国开战，中国与苏联断绝关系。对于苏联的丢脸，毛说，“赫鲁晓夫已经从冒险主义转向投降主义”，中苏双边军事谈判停摆。赫鲁晓夫回答说，毛泽东的好战外交政策将导致东西方核战争。对西方国家而言，古巴导弹危机所威胁的核战争得以避免，核裁军成为他们的政治优先事项。为此，美国、英国和苏联1963 年同意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它正式禁止在地球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爆炸试验，但允许在地下进行原子弹试验和爆炸。当时，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即596计划刚刚起步，毛将禁试条约视为核大国试图阻止中国成为核超级大国的企图。

作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美国开战、以及美国对

古巴实施持续经济制裁感到非常愤怒。对于东方集团，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及其领导苏联的“九封信”中谈到了中苏问题。此外，与苏联的决裂使毛泽东能够通过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正式关系（外交、经济、政治）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方向。

正式声明

在 1960 年代，中苏分裂只允许中苏之间进行书面交流，其中每个国家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通向世界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的正式声明来支持他们的地缘政治行动；各自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党。196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联用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予以答复；每一种意识形态立场都使中苏分裂永久化。1964年，毛泽东说，鉴于中苏在解释和实际应用上的分歧，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反革命，在苏联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因此，在苏联效仿毛对苏的好战态度之后，华沙条约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了关系。

1964 年底，在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罢免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了苏联新领导人、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证明了不可能恢复经济关系的外交僵局。周向毛报告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政府仍然继续保持同西方和平共处政策；因而毛泽东指责其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尽管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但中苏分裂仍然存在。当柯西金和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Glassboro 峰会上会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指责苏联背叛了东方集团国家的人民。北京广播电台的官

方解释称，美国和苏联政客讨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阴谋……罪恶地出卖了越南人民、阿拉伯人民以及他们的革命。苏联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权利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者”。

冲突

文化大革命

为了重新获得中国的政治霸权，毛泽东于 1966 年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对抗在教育、农业和工业管理领域建立起来的苏联式官僚机构。遵照毛泽东关于普遍意识形态正统的宣言，当学生组织成为政治激进的红卫兵时，中国各地的学校和大学都关闭了。由于缺乏领导者、政治目的和社会功能，红卫兵在意识形态上的离散状态很快就沦为政治派别的局面；每个派别都声称自己比其他派系更具有正统毛主义特征。

在建立小红书（毛泽东主席语录）中的意识形态正统性时，红卫兵的政治暴力在中国部分地区引发了内战，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一起镇压了暴躁的红卫兵。此外，当红卫兵派系主义发生在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基础——解放军内部时——他解散了红卫兵，然后用在文革初期造反和清洗运动中忍受并幸存下来的新一代毛派（以及老革命们）重建了革命委员会政府。

作为社会工程，文化大革命重申了毛主义的政治首要地位，但也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和西方的关系。从地缘政治而言，尽管中苏纠纷，但双方在越南战争期间共同资助北越；毛将北越对于南越的侵略定义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团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联的物资安全通行到北越，以对美国支持的南越共和国发动战争。

边界冲突

中苏分裂使轻微的边界争端升级为阿尔贡河和阿穆尔河（1969 年 3 月 2 日至 9 月 11 日）地区的交火（珍宝岛战役）。

196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解释和应用问题不断发生争吵，升级为中苏边境的小规模战争。

1966年，为了外交解决，中国重新审视了19世纪划定的中苏边界的国家问题，在那里最初是通过清朝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领土强行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尽管没有要求归还领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苏联正式和公开承认，1858 年的《中俄爱珲条约》和 1860 年的《北京公约》在19 世纪中俄边界问题上是不平等、错误的。苏联政府对此置若罔闻。

1968 年，苏联军队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4,380 公里边界集结，特别是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边境；苏联很容易在那里诱使突厥人发动分裂叛乱。

1961年，苏联在该边界驻扎了12个师的士兵和200架飞机。到1968年，苏联在外蒙古驻扎了6个师，在中苏边境部署了16个师、1200架飞机和120枚中程导弹，与中国军队的47个轻型师对峙。到1969年3月，边界冲突不断升级，包括在乌苏里江，珍宝岛战斗，以及铁列克提。

中国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核弹，铀235内爆裂变装置，爆炸当量为22千吨TNT；并公开承认苏联为实现596 计划提供的技术援助.

1969年，苏联计划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原子弹袭击，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理查德尼克松政府警告苏联说，对中国的这种攻击将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声称，若苏联向中国投掷核弹，美国将向苏联宣战；美国担心苏联核轰炸中国以后将使世界跪倒在苏联面前）。美国将苏联视为更大的威胁，希望中国制衡苏联。意识到苏联的核威胁，中国建造了大型地下防空洞，如北京地下城、地下131工程、湖北指挥中心和816核军工厂的重庆市涪陵区军事防空洞。

地缘政治实用主义

1972年，毛主席为对抗苏联，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建立了中美关系。

1969年10月，经过七个月的中苏边界冲突，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秘密交谈，共同确定了中苏边界的部分程度的划分。尽管边界划分仍未完全确定，总理会议恢复了中苏外交交流，到 1970 年，毛明白了中国不能同时与美国和苏联作战，同时在中国各地压制内部动乱。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赴北京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基辛格中美和解过程得罪苏联，勃列日涅夫随后与尼克松举行首脑会晤，将美苏冷战的两极地缘政治重新塑造成中美苏冷战的三极地缘政治战争。

关于中苏关于 4,380 公里领土边界划分的争端，苏联的宣传机器鼓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平等的 1858 年《爱晖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的抱怨。为此，在 1972 年至 1973 年期间，苏联从俄罗斯远东地图中删除了相关地方的中文和满语地名，并将它们分别替换为俄语地名：Dalnerechensk、Dalnegorsk和Partizansk。为了促进社会接受这种文化修正主义，苏联媒体歪曲了中国人的历史存在——在沙皇俄罗斯获得的土地上——这激起了俄罗斯对当地华人的暴力行为；此外，在距离中苏边境约 30 公里、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哈巴罗夫斯克，苏联博物馆中移除了政治上不方便的展品，并用水泥覆盖了关于金国的女真文字碑。

第三世界的竞争

1970年代，中苏意识形态的较量扩展到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试图资助当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民兵的先锋队活动。他们的政治建议、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促进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现，例如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欧加登战争；欧洲白人殖民者和反殖民的黑人土

著之间的罗得西亚丛林战争；丛林战争的后果是，津巴布韦古库拉洪迪大屠杀；相互竞争的民族解放游击队之间的安哥拉内战，这被证明是一个美苏代理战争；莫桑比克内战；以及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战的游击队。在泰国，亲华阵线组织仅仅以当地的华人少数民族为基础，因而作为毛派革命先锋队在政治上证明是无效的。在苏阿战争中，中国暗中支持对立的阿富汗游击队。

毛泽东之后

向实用主义过渡

1971 年林彪元帅的灭亡，减轻了毛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破坏，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三极冷战的现实政治过渡。

1971 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激进阶段以571 计划（推翻毛的政变）的失败和与四人帮勾结的“阴谋家”林彪元帅（毛的执行官）的死亡而告终。随后，四人——江青（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反动”的政治激进分子，四人帮主张以牺牲内部经济发展为代价实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但很快就在毛逝世后立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秘密情报部门压制。

中国国内恢复安宁、结束了与苏联的武装火拼，但并没有改善外交关系，

因为1973年中苏边境的苏军驻军规模是1969年的两倍。苏联指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敌人，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在 1980 年代将缓慢逐渐改善。

毛去世一年后，在 1977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恢复了政治面貌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内部现代化计划的负责人。邓避免全面否定和攻击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温和主义，通过系统地逆转毛泽东的低效政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开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现。1980年代，中国奉行“实事求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现实政治政策，使中国从意识形态和高层抽象论战中抽身而出；这削弱了中苏分裂的政治重要性。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终于正常化。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_Asi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

东亚与美国的关系

东亚-美国关系涵盖了美国与整个地区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和较小地方的关系的摘要。它包括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重点是历史发展。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非常敌对（1949-1970），转变为贸易增长友好（1970-2015）和再次敌对（2016-至今），形成循环。两国之间存在大量贸易（2000-2020），尽管偶尔会在关税、货币汇率和台湾的政治地位方面出现分歧。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

（至2020年，中美贸易长期失衡。中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补贴出口，无法兑现大量世贸协议承诺）。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等出售设备，将中国指定为“货币操纵国”，等等；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1911-1979

在整个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直到 1979 年；根据一个中国政策，将承认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后，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并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继续保持非正式关系，台湾被认为是美国强大的亚洲盟友和支持者。

日美关系

这种关系始于 1850 年代，因为美国是迫使日本恢复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主要因素。在 19 世纪后期，日本派遣许多代表团前往欧洲，其中一些代表团前往美国，以发现和复制最新技术，从而使日本迅速现代化并建立自己的帝国。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钦佩日本击败欧洲大国俄罗斯的实力。他促成了 1905-1906 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战争的结束。1907-24 年间，反日情绪（尤其是西海岸）使两国关系恶化。在 1930 年代，美国强烈抗议日本侵占满洲（1931 年）、对中国的战争（1937-45 年）以及对印度支那（越南）的侵占（1940-41 年）。美国同情中国，日本拒绝了美国日益愤怒的要求日本撤出中国的要求。两国在 1941-45 年间打了一场全面战争；美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重磅炸弹（包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最大的 50 个工业城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下的美国军队1945-51

年占领和统治日本，其成功目标是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的国家。

1951年美日签订《旧金山条约》和《美日安保条约》，1960年修订为《美日安全合作条约》，从此关系一直很好。美国将日本视为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既是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又是北约的接触国。美国在日本的几个军事基地，包括横须贺，驻扎有美国第7舰队。美军经常为日本自卫队提供辅助安全性帮助和进行军事演习。

韩美关系

韩美关系自 1945 年以来的发展最为广泛，当时美国帮助在韩国建立资本主义并领导了联合国发起的针对北韩侵略南韩、针对朝鲜和中国的朝鲜战争（1950-53 年）。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主化和现代化大大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大量美军留在韩国。2018 年 9 月 24 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签署了美韩贸易协定。

历史

东南亚

美国早期进入当时被称为东印度群岛的地区是低调的。1795 年，商船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启航，航行了 18 个月，带着散装胡椒返回，这是第一批如此进口到该国的胡椒，销售利润为 700%。1831年，塞勒姆友谊号商船返

回报告说该船被当地海盗掠夺，副驾驶和两名船员在苏门答腊被谋杀。1824 年的英荷条约规定荷兰有义务确保亚齐及其周边地区的航运和陆路贸易的安全，因此荷兰人派遣了1831 年荷兰皇家东印度军队的惩罚性远征部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还下令在 1832 年进行美国第一次苏门答腊的惩罚性远征，随后在 1838年进行了第二次惩罚性远征。友谊号商船被海盗劫掠事件为荷兰人提供了接管亚齐的理由；同时，杰克逊总统，派遣外交官埃德蒙·罗伯茨前往该地区，并在1833年与暹罗（泰国）签署了罗伯茨条约。1856 年，在对该条约的修改谈判中，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美国在东方没有任何地业，也不想要任何地业。政府正式禁止持有殖民地。因此，美国不应成为任何东方大国嫉恨的对象。总统希望与暹罗建立和平的商业关系，给予和获得利益，这也是我使命的目标。”

中国的鸦片贸易

鸦片在印度种植——当时在英国控制之下——并由英国商人出售给中国的中国批发商。中国政府抗议，导致两场战争，英国为谋求贸易港口开放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商人在中国做的鸦片生意只有英国的 1/10。英国垄断了印度的供应，但美国商人更多地依赖土耳其，而中国政府则专注于广州的英国人。实际上，英国海军保护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商人受到了中国被迫与英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美国商人彼得·斯诺在广州营商，但他的生意利润并不高。另一方面，他在 1830 年代末和 1840 年代初担任美国领事。事实证明，在 1839-40 年鸦片危机期间，他有效地保护了美国的商业利益。

新兴的美国政策为所有国家提供平等机会，到 1900 年成为“门户开放”政策。

根据 1844 年美国部长卡莱布·库欣(Caleb Cushing)谈判达成的《旺吉亚条约》，美国商人被限制在指定港口城市的指定国际区。他们不受中国法院的管辖，而是受美国官员的法律管辖。这些治外法权一直持续到 1943 年。该条约代表了美国对英国统治地位的挑战。中国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以阻止英国接管中国市场。美国传教士被允许到任何地方。（治外法权的主要存在原因是由于在当时中国法律体系内普遍存在酷刑和体罚）。

更好的旅行机会

在 19 世纪下半叶，从旧金山快速轮船旅行的机会大大增加。1867 年，第一条定期轮船航线将旅客、货物和邮件运送到横滨。1869 年横滨铁路开通，服务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南太平洋。美国邮局资助它运送邮件。1885 年只有一条轮船连接美国和日本，但到 1898 年已经有 6 条了。横滨之行在1886年用了22天，1898年只用了12天，客货运费持续下降。

中国传教士

英国新教教会率先在中国建立传教角色，特别是中国内地会。美国的项目规模较小，但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对美国影响更大。

当地政府官员都沉浸在儒家思想中，对基督教抱有敌意，因此皈依者很少，而且来自社会边缘。更重要的是对医学和教育的影响。在广州的彼得・帕克（1804-1888）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医生。约翰・克尔（1824-1901）于1859年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博济医院，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医院之一。他创办了医学院，并编写了教科书和期刊文章，深入介绍了西医。到1937年，英美传教士经营着300家教会医院，21000张床位，以及600个小诊所。美国传教士社区可以自豪地拥有数百所中小学，此外还有 13 所新教大学和 3 所天主教大学。顶峰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美国传教士在美国国内很有听众，他们仔细聆听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在 1900 年左右，平均约有 300 名美国在华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每年向教会团体陈述报告约 30,000 次，覆盖数百万去教堂的人。他们对中国迟早会皈依基督教充满乐观。然而，到 1920 年代，主流新教教会意识到，尽管有很多学校和医院，但皈依并没有大规模迅即发生。但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

小说家赛珍珠（1892-1973）在中国的双语环境中由她的传教士父母抚养长大。她的许多畅销小说和故事都以中国为背景，探索了她所爱的人的艰辛和人性的深度。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她于 1914 年至 1932 年作为长老会传教士返回中国。她在大学教授英语。《大地》（1931）是她最畅销的小说，也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除了众多其他书籍和文章，她还以对中国高度同情的观点吸引了大量美国中产阶级观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称赞她“杰出的作品为跨越广泛分离的种族界限的人类同情铺平了道路，以及对人类理想的研究，这是一门伟大而鲜活的肖像艺术。”

没有人比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1898-1967 年）对美国外交政策政治思想的影响更大，他是从 1920 年代到其去世时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商。他的父母是来华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出生长大并接受教育直到15岁。他的中国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出版物总是对中国给予广泛的关注。在蒋与毛泽东的斗争中，他给予了蒋介石一些非常有力的支持。

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归国传教士是 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1898-1994），他在福建服务了 10 年，1925-1931 年和 1934-1938 年在福建做医疗传教士。回到明尼苏达州后，他成为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口齿伶俐的发言人，从日本缺乏原材料和市场、人口压力以及中国的混乱和内战等方面进行解释。据传记作者高艳丽说：

“贾德既是威尔逊主义的道德主义者，也是杰克逊主义的保护主义者，他的努力受到基督教对人类的普遍理解以及传教士情结的推动。当他同时呼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普遍的基督教道德良知时，贾德的经历表明，传教士果断、勇敢的倡导实际上有助于塑造需要从孤立主义沉睡中唤醒的美国外交政策。”

1943年至1962年，贾德作为共和党人曾任职美国国会二十年；他是在美国亚洲政策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尤其是关于中国。

1905年中国抵制

针对关于华人移民美国的严格限制，居住在美国的华侨组织了一场抵制，

鼓动中国国内的人们拒绝购买美国产品。与反对变革的义和团不同，这些改革者是现代化者。满族政府支持义和团，但这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革派反对政府。抵制是由华南和华中的商人和学生实施的。它只对经济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因为除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外，中国购买的美国产品很少。华盛顿对此感到愤怒，将抵制视为义和团式的暴力袭击，并要求北京政府停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为一次海军远征提供特别资金。华盛顿拒绝考虑软化限制华人移民的排除法案，因为它回应了一些欧洲移民的反华偏见，尤其是在美国西海岸（那里主要以意大利移民政治势力为主）。它现在开始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次事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无论是在海内外，都是深远的。简拉森认为抵制"标志着中国大众政治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开始。以前从未有过共同的民族主义愿望在政治行动中动员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将中国移民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

在美国的亚裔学生

日本和中国派遣了数千名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清政府派遣 120 名学生到新英格兰生活和学习十年，即 1872 年至 1882 年。然而，更多的学生参加了传教士学校，这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与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大致相当；然而去日本更近、更便宜，而且语言与汉语重叠。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群体，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孙中山积极招募他们，但中国驻日外交官试图支持较为保守的学生并压制革命冲动。

美元外交

美元外交是塔夫脱政府的政策，它希望尽量减少使用或威胁军事力量，而是利用美国的银行实力在中国增加贸易的机会和投资，并帮助维护所有国家贸易机会的大门。在 1912 年 12 月 3 日的国会年度致辞中，塔夫脱总结了基本思想：

“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试图回应现代商业往来观念。这项政策的特点是用美元代替子弹。它对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情绪、健全的政策和战略的要求以及合法的商业目标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西奥多·罗斯福想与日本和解并帮助它抵御俄罗斯，塔夫脱和他的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无视罗斯福的政策和他的建议。美元外交基于错误的假设，即美国的金融利益可以调动其潜在力量，并希望在东亚这样做。然而，美国金融体系并不适合处理国际金融，例如贷款和大笔投资，而不得不主要依赖伦敦。英国人也想在中国敞开贸易大门，但不准备支持美国的金融活动。最后，其他大国拥有领土利益，包括他们在中国境内控制的海军基地和指定的地理区域，而美国拒绝任何此类活动。银行家们并不情愿，但塔夫脱和诺克斯一直在推动他们投资。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直到最后美国强行进入湖广国际铁路贷款。这笔贷款终于在 1911 年由一个国际财团提供，并间接引发了中国国内广泛的“铁路保护运动”。债券引起了无尽的失望和麻烦。直到1983年，超过300名美国投资者试图迫使中国政府赎回毫无价值的湖广债券，但没有成功。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后，立即取消了对美元外交的所有支持。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塔夫脱的美元外交在各处都是失败的，在远东疏远了日本和俄罗斯，并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对于美国动机的怀疑。

移民

亚裔移民美国分三个阶段。从 1850 年到 1880 年，大约有 165,000 名中

国劳工来到这里修建铁路；大多数人回到了中国，由于很少有中国女性到达，华裔美国人的人数减少了。美国的一些欧洲移民（例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他们在劳动力方面与华人劳工存在竞争关系；爱尔兰裔劳工的罢工抗争，常由于华人劳工不愿意参加罢工而受损）对于这些华人劳工的敌意强烈，多次发生暴力袭击。结果，大多数华裔美国人搬到大城市中称为唐人街的贫民窟。1882 年的《排华法案》大幅减少了非技术劳工的移民，但允许学生和商人来美。

在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之前，大量日本农民在 1890 年代前往夏威夷。1900-1910 年，日本农场工人抵达加利福尼亚和西海岸。西方舆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当敌视，并通过了许多试图阻止或减缓流入的法律。1965 年移民法案中的种族配额结束后，大量亚洲人开始抵达。

限制

主要的法律限制是《排华法案》，该法案在 1882 年至 1943 年期间在很大程度上禁止非技术华人移民。

1905 年打败俄国之后，日本作为一个过于强大和骄傲的国家，无法容忍法律限制。然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 年签订了绅士协议，不允许日本非技术移民到美国。在1924年的法律中，几乎完全停止了来自亚洲的移民。

战后移民

二战时期的立法和司法裁决逐渐增加了亚裔美国人移民并成为归化公民的

能力。到 1960 年，有 20 万菲律宾裔美国人；到 2000 年，他们的数量达到了 200 万。共产党在东亚的接管导致来自东南亚发生的冲突（例如越南战争）的难民潮。韩裔美国人作为难民、战争新娘（即嫁给美国士兵的韩国女子）和孤儿（在战争或患难中失去父母的儿童被美国人领养）以及许多其他角色来到这里，到 1990 年总共约有 800,000 人。亚裔美国移民中有很大比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已经获得了专业地位，在二十世纪移民群体中的专业和收入水平居于首位。

最重要的因素是1965 年的移民和国籍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结束了对亚洲人的主要限制和配额。从1960年代开始，亚裔移民迅速增长。亚裔美国人是在2000年到2010年间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自1965年以来，亚洲人已占所有移民的四分之一。

亚洲人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60 年，亚洲人占美国的在外国出生人口的 5%；到 2014 年，他们的份额增长到美国 4240 万移民的 30%。” 截至2016年，“亚洲人是美国移民的第二大出生地区（仅次于拉丁美洲）。”2013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移民最多的单一来源国。亚洲移民“比其他的美国在外国出生人口更可能成为归化公民”；2014 年，59% 的亚洲移民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而在所有移民中这一比例为 47%。战后前往美国的亚裔移民情况多种多样：2014 年，31% 的亚裔移民来自东亚（主要是中国和韩国）；27.7% 来自南亚（主要是印度）；32.6% 来自东南亚（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8.3% 来自西亚。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Chin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_to_1948

1948年之前的中美关系史

新独立的美国早在 1784 年就向广州派遣了领事，然而从未作为国家代表被中国官员正式接待过。两国在1844年之前就承认彼此的存在，但当年的谈判和条约标志着国际法上的首次承认。正式的外交关系于 1844 年 6 月 16 日开始，因为各国参与了导致《望厦条约》的谈判。

旧中国贸易

银币和金币，人参，和毛皮，以及茶叶，棉花，丝绸，漆器，瓷器，和异国情调的家具被交易。1784 年，第一艘从美国前往中国的船只是中国皇后号。

中国工匠开始注意到美国人对异国情调的商品的兴趣，并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做法，制造专门用于出口的商品。这些出口商品通常带有美国或欧洲的图案，以充分迎合消费者群体。

传教士

1832年后，它为英文读者提供了对中国的深入报道。

在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年至1861年）1832年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宝库》，成为美国的关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主要信息来源。

在约翰·庞弗雷特看来，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一起，提供了打破传统正统观念束缚的工具。他们教授中国西方科学、批判性思维、体育、工业和法律。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批大学和医院。这些机构虽然现已更名，但仍然是中国同类机构中最好的。

女传教士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们组织了反对杀女婴和缠足传统习俗的道

德运动，帮助实现了庞弗雷特所说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权进步”。传教士利用体育教育和运动来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展示穷人如何脱颖而出，并通过使用女性运动扩大性别角色来推翻阶级惯例。

在1899 年至 1901 年的义和团叛乱期间，基督教传教团被烧毁，数千名皈依者被处决，美国传教士几乎没有逃过一劫。

Paul Varg 认为美国传教士非常努力地改变中国：

“传教士人数从1890年的513人增加到1914年的2000多人，到1920年，中国新教传教士已达8325人。1927 年，美国在华有 16 所大学和学院、10 所大学级别的专业学校、4 所神学院和 6 所医学院。这些机构的投资额为 1900 万美元。到 1920 年，已有 265 所基督教中学，入学人数为 15,213。有数千所小学；仅长老会就有 383 所小学，约有 15,000 名学生。”

在美国各地举行广泛的筹款和宣传活动。美国的天主教徒也支持在中国的大型宣教活动。

迦勒库欣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中国港口对英开放，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构成了威胁。总统约翰泰勒1843 年任命马萨诸塞州外交官迦勒库欣为专员和部长。为了给中国皇室留下深刻印

象，库欣代表团突然带着四艘海军军舰出现，满载着包括左轮手枪、望远镜和百科全书在内的科学奇迹的礼物。他于 1844 年 2 月抵达澳门，在当地引起轰动，但中国政府不愿再向一个国家开放贸易。库欣巧妙地将胡萝卜和大棒混合在一起。他警告——在他的战舰的背景下——不接待特使是一种民族侮辱。他威胁要直接去找皇帝——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程序。清朝皇帝试图拖延，但他最终派使者与库欣谈判，导致1844 年 7 月 3 日在望厦村签署了望厦条约。 除了贸易国待遇外，库欣还确保美国人获得治外法权，这意味着在中国境内涉及美国人的法律案件将由西方法官审理，而不是由中国法官审理（以避免中国法律体系中常用的酷刑和体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这要归功于高速快船，运载了相对少量的高价值货物，如人参和丝绸。美国新教传教士也开始抵达。中国民众的反应大多是敌对的，但有一个因素为美国传教士和商人提供了支持的基础。到 1850-64 年，中国卷入了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叛乱，对外贸易停滞不前。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和清军于 1856 年 11 月在屏障堡战役中发生了短暂的冲突，这是两国之间的第一次军事交战。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后，咸丰帝逃离北京。1860 年 10 月 18 日，他的弟弟恭亲王在北京条约中批准了天津条约。该条约除其他条款外规定，美国将与英、法、俄一起，有权在北京设置使馆办公室。

台湾

有的美国商人建议从中国吞并台湾，但这个想法在华盛顿没有得到支持。台湾当地原住民有时会屠杀遇难的西方水手。1867年，在罗妺号事件中，台湾原住民袭击了遇难的美国水手，造成全体船员死亡。随后，他们击败

了美国军队的报复性远征，并在小规模冲突中杀死了另一名美国人。

伯林格姆条约和排华法案

1868年，清政府任命美国人安森·伯林格姆为使节代表中国赴美。伯林格姆走遍全国，为中国和中国移民的公平待遇提供支持。1868 年的伯林格姆条约体现了这些原则。1871年，中国教育使团将两组120名中国男孩中的第一批带到美国学习。他们由容闳带领，他是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

在加州淘金热和横贯美国大陆铁路建设期间，大量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激起了美国公民的敌意（由于中国劳工与爱尔兰裔、德国裔移民劳工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等等原因）。被强制赶出矿山后，大多数华人定居旧金山等城市的唐人街，从事餐饮、清洁等低端工资劳动。随着内战后经济衰退和1870 年代开始的长期萧条，劳工领袖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及其政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约翰·比格勒 (John Bigler) 将反华仇恨政治化。他们怪罪中国人工资水平低下的苦力。在美国历史上对自由移民的第一次重大限制中，国会在 1880 年对伯林格姆条约进行修订后，于 1882 年 5 月 6 日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些修订允许美国暂停劳工移民以及非技术移民，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在十年内将中国熟练和非熟练劳工排除在外，处以监禁和驱逐出境的处罚。该禁令被多次更新，持续了 60 多年。

寻找中国市场

在美国的中国发展公司，例如由工业公司合并、成立于1895年的JP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公司，力求为美国的资本和管理资源开拓市场的努力，将产生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它开始修建粤汉铁路，链接中央和中国南方。它只设法完成了 30 英里的线路。美国人很快就失望了，而铁路投资项目被卖给了一个比利时竞争对手、辛迪加。总体而言，通过在中国投资或向数亿中国人出售而致富的美国梦几乎总是失败。标准石油公司成功销售煤油灯具进入中国市场，但很少有人从中获利。

义和团叛乱

1899 年，一场自称为“义和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运动在中国北方发起了一场暴力叛乱，西方人称之为义和团叛乱；这些暴民反对外国在中国的贸易、政治、宗教和技术方面的影响。这些战役发生在 1899 年 11 月至 1901 年 9 月 7 日，在清朝满族统治中国的最后几年。

起义开始作为一个排外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以农民为基础，在中国北方移动。叛乱分子袭击了修建铁路和违反风水的外国人，以及他们所认为对外国统治中国负有责任的基督徒。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对驻外使馆周边地区进行了洗劫。6月21日，慈禧太后向所有西方国家宣战。外交官、外国平民、士兵和中国基督徒在国际公使馆避难期间被围困了 55 天。由奥匈帝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组成的称为八国联盟的联盟组织了西摩远征队，共有 2000 名士兵，其中包括 116 名美国人。在廊坊之战中被义和团击退。一支规模更大的盟军组成了加塞利远征军，由于中国军队之间的内部竞争，它取得了成功。

美国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次要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驻扎在菲律宾的军舰的可用性。1900-1901 年，美军被纳入盟军对北京的占领部队。美国指挥官阿德娜·查菲上校与中国官员合作，开始了公共卫生、救援和警察行动。查菲得出结论，亚洲人只尊重权力。重新分配到菲律宾后，他应用了在北京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将仁慈和公共卫生措施与武力和与当地官员合作相结合。

中国人向每一个大国支付了赔偿金。美国用这些1100万美元的份额促进文化和教育交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并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例如北京的清华学院。

由于全美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义和团事件上，美国新教徒把对中国的传教作为重中之重。在向中国传教事工中，他们在 1890 年支持了 500 名传教士，1914 年支持了 2000 多名，1920 年支持了 8300 名。到 1927 年，他们在中国开设了 16 所美国大学、6 所医学院和 4 所神学院，以及 265 所中学和大量小学。相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而言，皈依者人数不多，但教育影响却是巨大的。

门户开放政策

1890 年代，世界主要大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开始提议在当时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美国要求放弃这些提议，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

伊致函这些国家，要求它们保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不干涉其理论势力范围内自由使用通商口岸。大国回避承诺，表示在其他大国首先同意之前，他们不能同意任何事情。海伊认为这是接受他的提议，后来被称为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但俄罗斯和日本在入侵满洲时却忽视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对俄罗斯的行为提出抗议。（俄罗斯在1900年义和团叛乱运动中入侵满洲以保护俄罗斯人安全利益，但在之后驻守满洲而不像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撤离中国。随后日本和俄罗斯于1904年在满洲爆发日俄战争；双方在美国介导之下于1905年签署停战协议）。日本在 1915 年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也对该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了进一步挑战。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谴责了这一行动，导致美国支持中国在 1937 年后与日本的战争。

中华民国与美国

1911–1937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华盛顿承认了新中国的共和国的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实践中，中国国内一些强大的地区军阀控制中国内部政治事务，而中央政府仅处理外交政策。“二十一条”是1915年日本向中华民国提出的一系列秘密要求，这些要求将大大扩大日本的控制范围。日本将在满洲和南蒙古更强大。它将在铁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极端的要求（在第 5 部分）将使日本在中国的金融、警务和政府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事实上，第五部分将使中国实际上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从而减少西方

的影响。当时日本处于强势地位，因为西方各国与德国处于僵持状态。英国和日本从 1902 年就结成了军事同盟；1914 年，伦敦要求东京参战，共同针对德国。后来，北京公布了这些秘密要求，并向华盛顿和伦敦发出呼吁。他们同情北京，并向东京施压。在最终和解中，日本放弃了其第五组要求。它在中国获得了一点点利益，但在美国和英国眼中失去了很多威信和信任。美国国务院在 1915 年 1 月称：

“我们目前在日本的商业利益大于中国，但展望未来，我们的利益是看到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被日本奴役的中国。中国对我们的同情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我们无视这些要求，我们就有失去在远东影响力和增加局势危险的危险。”

1922年，华盛顿、北京、东京和伦敦等国签署的九国条约明确规定了对中国地位的保护。

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 担任国务卿 (1925-1929)，他听从了远东事务司新任局长纳尔逊·约翰逊 (Nelson Johnson) 的建议。他们偏袒中国并保护它免受日本的威胁。中国外交政策主权的关键是控制关税税率，西方国家将关税税率定为 5%，并结束英国和其他国家控制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额外领土。凯洛格和约翰逊与中国成功谈判关税改革，从而提高了国民党的地位，帮助摆脱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由国民党领导的单一政府统一(KMT) 于 1928 年。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在 1928-1931 年实现了一些外交目标。

从 1870 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发展教育机构。他们发现对西

方教育的需求比对基督教的需求更强烈，也更精英化。他们设立项目，资助去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赛珍珠是美国人，在美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她的畅销书和讲座引起了美国对中国农民的广泛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中国开始抗日战争以后，中华民国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了大幅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当时，美国有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向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提供援助。然而，由于中日战争中双方从未正式宣战（中国直到夏威夷珍珠港事件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因此，罗斯福否认中国存在战争状态，并开始向蒋提供援助。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同情被传教士、赛珍珠等小说家和时代杂志关于日本在中国的暴行的报道所激起，包括围绕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舆论压倒性地支持中国并谴责日本。

美国从1937年开始大力支持中国，并警告日本退出中国。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开始流动。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指挥美国第一志愿队（绰号“飞虎队”）；美国飞行员驾驶涂有中国国旗的美国战机攻击日本。他领导了志愿小组和在 1942 年取而代之的美国陆军空军部队。美国于 1941 年切断了日本的主要石油供应，迫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妥协，但日本却袭击了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西太平洋的属地。

计划轰炸日本

1940 年，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华盛顿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对日本基地发动偷袭。美国将派出穿着中国制服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他们要轰炸日本。美国陆军反对这一计划，并指出能否到达日本取决于中国国民革命军能否在距离日本足够近的地方建造和保护机场和基地，他们怀疑蒋介石能否做到。美国将军们对这个计划几乎没有信心。无视陆军的建议，美国文职领导人被中国空袭日本的想法迷住了。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热情地批准了该计划。然而，提议的袭击从未发生：正如陆军所警告的那样，中国没有建造和确保任何足够接近日本的跑道或基地。美国轰炸机和机组人员被延误，最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不久抵达。它们被用于缅甸战争，因为它们缺乏从中国安全基地到达日本的射程。

美国宣战

美国于 1941 年 12 月正式向日本宣战。罗斯福政府向蒋的四面楚歌的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该政府现在总部设在重庆。蒋夫人宋美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受过美国教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演讲和周游美国全国，为中国争取支持。然而，关于蒋政府无法有效抵抗日本人或他更愿意更多地专注于击败共产党人的看法，在美国越来越多。美国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声称，与中国共产党沟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为日本的陆基反攻入侵做准备。1943年，美国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触。其他美国人，如克莱尔·李·陈纳德，则主张依靠空中力量，并支持蒋的立场。1944年，陈纳德成功要求华盛顿召回史迪威。魏德迈将军取代史迪威，帕特里克·J·赫尔利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中国大陆内战

1945年二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敌意爆发为公开的中国内战。杜鲁门总统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斡旋，但马歇尔任务没有成功。1948年2月，现任国务卿马歇尔在秘密会议上向国会作证说，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因此必须通过某种谈判解决，否则美国将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警告说：

“美国任何大规模协助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的努力，极有可能沦为美国的直接承诺和责任，涉及无限期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美国资源的这种浪费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俄罗斯人的手中，或者会引发一种反应，甚至可能导致另一场西班牙式的革命或普遍的敌对态度......全力以赴的代价以使共产党军队在中国遭到抵抗和摧毁……显然与取得的结果不相称。”

（马歇尔的意思是，虽然美国全力以赴地帮助中国国民党或许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但是却会在中国遭致中国人民的普遍敌意和愤恨，甚至会导致以后的西班牙式的内乱和革命。）

1949 年，当国民党将失去对中国的有效控制变得明朗时，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出版《中国白皮书》，以解释美国的政策并抵御批评者（例如美国中国政策协会，他们问“谁”失去了中国？）的批评。艾奇逊宣布美国将“等待尘埃落定”，然后才承认新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军队到台湾岛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从而开始对台湾的军事占领，并于1948年至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和其他岛屿仍然在中华民国的控制之下。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ng-pong_diplomacy

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是指美国和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之间开始于70年代初的交流；197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由美国选手格伦考恩和中国

选手庄则栋对决。这一事件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为尼克松总统 1972 年访问北京铺平了道路。这一事件被视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此后政策方法已在其他地方实施。

历史

背景

1950 年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美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侵略国，并实施经济遏制政策，包括对中国实行禁运。经过大约 20 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两国终于看到相互开放的优势：中国将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视为对抗其与苏联日益紧张的关系的有利反击，后者与中国爆发了一系列血腥边境事件，而美国则寻求更紧密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其与北越和平谈判的杠杆。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 30 届世乒赛为中国和美国提供了机会。

过程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时，于4月6日接到访华邀请。中共建国初期，体育在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常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在孤立主义年代，中国运动员是少数能获准出国旅行的中国公民之一。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团队和随行记者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踏足中国首都的美国代表团。会议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促成。（以前，曾经有 11 名美国人被允许进入中国一周，因为他们都声称隶属于遵循毛主义政治路线的黑豹党）。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行动是不寻

常的；此前，包括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等知名人士在内的美国公民在 1968 年总统大选后都曾经表示有兴趣访问中国，然而他们都无法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根据随美国乒乓球队一起前往中国的蒂姆·博根所著的《美国乒乓球史》，三起事件可能触发了他们来自中国的邀请。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威尔士曼·H·罗伊·埃文斯声称，他在第31届世乒赛之前访问了中国，并向非中国体育当局和周恩来总理建议，中国应采取措施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在文革后通过国际体育赛事走向世界。此外，美国选手Leah “Miss Ping” Neuberger 于1956年获得世界乒乓球混双冠军和第九届美国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当时正跟随加拿大乒乓球队应中国邀请访华。中国在外交上将批准 Leah Neuberger 的签证申请扩大到整个美国团队。第三个事件，也许是最有可能的触发因素，是美国球员格伦考恩和中国球员庄则栋之间意外但戏剧性的相遇；庄则栋是三届世界冠军和许多其他乒乓球赛事的冠军。庄则栋在 2007 年在南加州大学美中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描述了这一事件。

当格伦考恩在第 31 届世乒赛期间在名古屋练习后错过了他的球队巴士时，导致相遇的事件开始了。考恩已经和中国球员梁戈亮一起练习了15分钟，这时一名日本官员来了，想要关闭训练区。考恩登上了载有中国队的穿梭巴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他持怀疑态度。然而，中国选手庄则栋与考恩握手，通过翻译与他交谈，并向他赠送了一幅黄山的丝绸画，这是一件杭州名品。考恩想回馈一些东西，但他从包里只能找到一把梳子。美国人犹豫地回答：“我不能给你梳子。我希望我能给你一些东西，但我不能。”本届世乒赛标志着时隔六年的中国重返赛场。当中国队和考恩走下大

巴时，跟随中国队的记者纷纷拍照留念。在1960年代的政治气候中，一个共产主义中国运动员和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景象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天，作为一个自称嬉皮士的考恩向庄则栋赠送了一件印有红白蓝和平标志的T恤，上面写着“ Let It Be ”，这是披头士乐队的一首著名歌曲名称。

当一位记者问考恩，“考恩先生，你想访问中国吗？”，他回答说，“好吧，我想看看我以前没见过的任何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 . 任何我以前没见过的国家。”“但特别是中国呢？你想去那里吗？”“当然，”格伦考恩说。

在2002年接受著名电视人陈鲁豫采访时，庄则栋告诉更多的故事：“巴士上的行程花了15分钟，我犹豫了10分钟，我长大时熟悉的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而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绳子空前拉紧，我在问自己，‘能和你的头号敌人发生什么关系吗？’”庄则栋回忆起毛泽东主席会见埃德加·斯诺的情景。1970 年天安门的国庆讲台上，毛对斯诺说，中国现在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身上。庄先生在包里看了看，先是看到了一些别针、毛像徽章、丝绸手帕和扇子。但他觉得这些还不够体面，不足以成为一份好礼物。他终于挑到了黄山的绢画。第二天，许多日本报纸刊登了庄则栋和格伦考恩的照片。

当中国外交部接到美国乒乓球队希望受邀访华的报道时，外交部照例予以拒绝。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初都同意这一决定，但当毛泽东在只有高级政府官员才能阅读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中看到考恩的消息时，他决定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据报道，毛泽东说：“这位庄则栋不仅乒乓球打得好，而且外交好，有政治头脑。”1971年4月10日，九名美国球员、四名官员和两名配偶从香港跨过一座桥前往中国大陆，然后在 4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间进行了有趣的比赛、游览长城和颐和园以及观看芭蕾舞。

2011 年 7 月 8 日这一周，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乒乓外交活动。1971年中美乒乓球队的原成员再次参加比赛。

1988年，乒乓球成为奥运会项目。

1994 年的电影《阿甘正传》中提到了乒乓外交。在战斗中受伤后，福雷斯特培养了这项运动的天赋并加入了美国陆军队——最终在一次友好之旅中与中国队竞争。

反应

回到美国后，其中一名美国球员告诉记者，中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说：

“人们就像我们一样。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是真切的，他们有感觉。我交了朋友，我交了真正的朋友，你看。该国与美国相似，但仍有很大不同。很美丽。他们有长城，那里有平原。他们有一座古老的宫殿、公园、溪流；有各种各样的，你知道的，动物。国家由南向北变化。他们有一个团结的人民。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毛主义。”

尼克松访问的后果

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1972年4月12日至30日，庄则栋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访问了美国。值得一提的是，1972 年 4 月 17 日，中国代表团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科尔Field House与该大学校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尼克松总统的女儿Tricia Nixon Cox在看台上观看了比赛。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行程中还有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鲁。

通过"乒乓外交"的国家接触并不总是成功，例如1971年10月，全印尼乒乓球协会（PTMSI）拒绝了中国的邀请，声称接受中国的提议将提高中国的声誉。由于美国运动员和记者出现后，苏联运动员和记者都没有出现在中国，有人猜测这一举动表明了两国对苏联的同等蔑视。

结果

乒乓外交取得成功，开启了美中关系，导致美国于1971年6月10日解除对中国的禁运。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访问上海期间，上海公报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布的。公报指出，两国将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

1991年统一韩国队

乒乓外交的另一个例子是1991 年在日本千叶举行的世乒赛，朝鲜队和韩国队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联合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队伍参加比赛。这项外交努力是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荻村伊智朗促成的。

在该次世乒赛之前，荻村伊智朗曾经20次访问韩国，并15次前往朝鲜，以恳求朝鲜半岛派出一个统一的团队参赛。荻村还与日本当地政府官员合作，在长野、长冈和千叶市建立联合训练营，并获得国际乒联同意朝鲜和韩国以统一名称进行比赛。

统一韩国队的队旗是白底蓝图的朝鲜半岛图案，队歌是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而不是北韩或南韩的国歌。比赛中，统一韩国队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

此后一直重复此参赛方式。2018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两个韩国队分队参加比赛，但在女子项目1/4决赛中对阵时，他们商定联合组队参加半决赛。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

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复杂，从正面到高度负面不等。1980年后，经济联系迅速增长。双方都对对方作为潜在对手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同时又保持着极其强大的经济伙伴关系。它被世界领导人和学者描述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截至 2021 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更大。从历史上看，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有过一些公开的冲突时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目前，美国

和中国有着一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如核武器扩散，但也有与角色悬而未决的担忧，例如中国民主和人权. 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外国债权国，仅次于日本。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仍存在争议。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时很缓慢，直到 1845 年的望厦条约。美国在太平洋抗日战争（1941-1945）期间与中华民国结盟，但在中国内战期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后，在朝鲜战争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重大武装冲突，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才关系解冻，在分隔25年后重新建立关系。尼克松访华以来，除吉米卡特外，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在任职期间访问过中国。尽管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关系紧张，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在 2016 年奥巴马的最后一年仍为 51%，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 年的一项调查，22%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73% 的人表示不赞成，这是对中国最负面的看法之一。民意调查还发现，24%（不同寻常的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此外，一项针对中国舆论的调查也发现，对美国的好感度也相应下降，61%的人表示对美国不赞成。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开始，他的政府将中国标记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了“打击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倡议”。随后它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和其他与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出售设备，并指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尤其是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政治观察家开始警告新冷战正在出现。迈克尔·D·斯温2019 年警告说，“几十年来维持双边关系的积极和乐观的力量、利益和信念正在让位于几乎所有参与领域的过度悲观、敌意和零和思维。”

=====

作为绝对独裁者，毛泽东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共产党、政府和媒体。华盛顿忽视了它在 1950 年 6 月宣布保卫韩国、并在 9 月登陆朝鲜半岛的决定会惊动中国的可能性。但它确实发生了，1950 年 11 月，中国以大规模入侵朝鲜作为回应，将联合国军推到了北纬 38 度线以南。到 1951 年，情况已经稳定在最初的北纬38度分界线附近。1953 年华盛顿新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明确表示必须停止战斗，并暗示如果需要，它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为了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双方于 1953 年达成停战协议，中国从朝鲜撤军。各方从未签署过和平条约。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无法容忍俄罗斯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的反斯大林主义计划。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意识形态紧张局势几乎升级到战争的边缘。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旧的亲莫斯科分子和更激进的亲北京毛主义者。尽管毛对美国仍然不友好，但是毛意识到，只要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邻国苏联，那么，美国在冷战中的反苏姿态就对他有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美国一直没有正式承认它。相反，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完成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美国大使馆跟随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前往台北，而美国领事官员则留在中国大陆。1950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收了美国的所有资产和财产，总额为 1.968 亿美元。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北韩入侵南韩，朝鲜战争开始。北韩由共产主义势力控制，与莫斯科和北京有密切联系。（本书作者注：北韩入侵南韩的具体原因是，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美苏协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军控制南韩，苏军控制北韩；并且双方商定，当地社会秩序稳定以后，举行全民选举成立朝鲜半岛政府，美苏撤军。然而，苏联以各种理由推迟北韩选举以及撤军。之后，南韩完成了选举，成立李承晚政府。因而，北韩金日成在此情况下出兵南下，并几乎彻底消灭南韩民选政府。）

作为回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82 号决议，一致对北韩宣战。拥有否决权的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侵略者推回了北纬38度线以北，并开始逼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联合国已批准朝鲜统一，中国不能容忍在鸭绿江与朝鲜接壤的敌对势力。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战争的警告被杜鲁门总统驳回。1950年10月下旬，中国的干预开始。在清川江战役中，人民志愿军越过或包抄联合国军，导致美军第8集团军战败。1950年12月11日，清川江战役后不久，联合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停战提议，但是毛政府拒绝了此项提议，因为他们希望

中国军队能够把联合国军完全从朝鲜半岛赶逐出境，并以此表明中国取得全面胜利。随后，中国军队在第三次汉城战役、以及横城战役中又取得胜利，但联合国军成功地反击了中国军队，并把战线维持在北纬38度线。结果双方陷入僵局。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僵局结束。从那时起，分裂的朝鲜半岛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军驻扎在韩国。

越南战争

（本书作者注：越南战争的起源原因与上述朝鲜战争的起源原因类似；北越政府共产主义军队侵略南越资本主义政府，并几乎消灭后者；在此情况下，美军参战试图保卫南越政府，但北越受到了中国与苏联的暗中帮助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北越提供了资源和训练；1962 年夏天，毛泽东同意向北越河内政府免费提供 90,000 支步枪和枪支。1965 年美国"滚雷行动"启动后，中国向北越派出了高射炮部队和工程营，以修复美国轰炸造成的破坏，重建公路和铁路，并进行其他工程工作，从而使得北越军队能够把数十万更多的士兵投入到与南越的战争中去。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阵亡了 58,159 名士兵。

中国军队在北越的存在为美国官员所熟知；这可以解释围绕美国在越南冲突中的战略的许多因素。特别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早期就排除了对北越进行地面入侵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害怕重演朝鲜战争的局面，尤其是现在中国有了热核武器。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对美国入侵北越可能性的确切反应——据报道，

毛泽东1965年告诉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无意为拯救河内政权而战，除非美军进入中国领土，否则不会与美军交战。在其他场合，毛表示有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再次与美国抗衡，就像在朝鲜那样。无论中国的计划是什么，约翰逊政府都不愿试探运气，因此美国地面部队从未进入北越。

冻结关系

1949 年至 1971 年，美中关系始终敌对。在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1963）的领导下，关系恶化。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华盛顿的决策者不确定中国是否会根据意识形态、国家野心和准备在许多国家指导共产主义活动的作用与苏联决裂。1962 年 11 月中印边境战争，以及北京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使得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了新的认识。肯尼迪政府官员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比苏联更激进、更危险，因此希望与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苏美两国都试图遏制中国的野心。美国外交承认中国仍然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关键否决权。美国继续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并鼓励其盟友不要与中国打交道。美国禁止民间与中国进行贸易，并鼓励盟国遵守该禁令。

在中国于1964年发展核武器时，后来美国解密文件透露，约翰逊总统曾考虑针对中国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停止其核计划。但他最终认为该措施风险太大，因此被放弃。相反，约翰逊寻找改善关系的方法。美国公众似乎更愿意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例如放松贸易禁运。但随着中国援助北越，越南战争激烈进行。毛的大跃进是耻辱的失败，他的文化大革命是敌视美国的；约翰逊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僵局。

尽管官方不承认，但从 1954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70 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 136 次大使级会议，首先是在日内瓦，然后是1958-1970年在华沙。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中国国内声势浩大地口诛笔伐美帝和苏修。

从 1967 年开始，外国理赔委员会建立了中国理赔计划，在该计划中，美国公民可以在 1950 年共产党没收外国财产后计算其损失的资产和财产的总和。后来，邓小平在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对外保证稳定营商环境的时候，美国公司仍然不情愿在中国进行大笔初期投资。

和解

1960 年代末带来了转型期。对中国而言，1968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结束越战，给中国的印象是美国没有兴趣再在亚洲扩张，而相比之下，苏联因为干预捷克斯洛伐克以颠覆其共产主义政府而成为对中国更严重的威胁，因为苏联也很可能会干涉中国。

在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态，领导层开始相信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将有效地制衡苏联的威胁。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坚定

支持下，走在了这一努力的最前沿。1969年，美国采取措施放宽贸易限制和其他双边接触的障碍，中方对此作出回应。然而，这种和解进程因中国支持北越的越南战争而停滞。此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是通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和波兰作为中间人进行的。

在美国，John K. Fairbank和A. Doak Barnett等学者指出需要现实地与北京政府打交道，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则发起辩论以提高公众意识。许多人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看到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幽灵，但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这将意味着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以对抗苏联。中国大陆近十亿消费者的市场吸引了美国企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就此事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中美两国正在经历一个对抗时代后进入谈判时代。尽管尼克松在 1960 年总统竞选期间大力支持蒋介石，但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他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没有理由让中国愤怒和孤立”。尼克松认为与中国建立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协助了他。此时美国国内政治也是尼克松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如果他能够成功与中国结交，将会有助于他在1972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

1971年，美国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考恩和庄则栋在日本意外的友好相遇，为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国之行开辟了道路。1971年4月，这些运动员成

为共产党接管中国以来第一批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人。这一访问的顺利进行，造就了"乒乓外交"一词，给了双方信心。乒乓外交也让随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美国记者进入了这个国家，打开了双方的交流，打破了此前存在的障碍。这使稍后将要发生的贸易伙伴关系的开始变得顺利。1971 年 7 月，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在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假装生病，一天没有公开露面。他实际上是去北京执行绝密任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谈判。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在北京没有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住的旅馆里摆满了痛斥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然而，与周恩来的会晤富有成效，中国总理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周恩来说，是美国故意孤立中国，而不是相反，所以任何恢复外交关系的举措都必须来自美方。周谈到已故肯尼迪总统与中国恢复关系的计划，并告诉基辛格"我们愿意等待，只要我们需要。如果这些谈判失败，早晚会有另一个肯尼迪或另一个尼克松出现。"

1971 年 7 月 15 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世界透露了这一使命，并表示他已接受访问中国的邀请。

这个公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在美国，一些强硬的反共分子（最著名的是自由主义者、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谴责了这一决定，但大多数公众舆论支持这一举动，尼克松看到了他一直希望的民意调查满意度的增长。由于尼克松拥有出色的反共资历，因此他几乎不会被称为"对共产主义软弱"。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希望确保新闻报道提供戏剧性的图像。尼克松特别渴望强有力的新闻报道。

其中一些图像是，尼克松总统和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与美国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国东道主一起走在中国的长城上；尼克松访华期间，尼克松总统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也有左翼分子的反对。据称，这一反对努力是由军队首脑林彪领导的，他在试图叛逃到苏联时在蒙古上空神秘的飞机失事中丧生。据称，他的死平息了对这次访问的大多数内部异议。

在国际上，反应不一。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人非常担心中美两大敌人似乎已经解决了他们的分歧；而新的世界联盟对缓和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称赞美国的倡议是"为世界和平而采取的举措"。古巴、阿尔巴尼亚和北越等几个共产主义政权指责中国"向帝国主义投降"。朝鲜宣称情况正好相反，美国被迫向中国投降，未能孤立中国。

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对这一倡议感到高兴，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反应要复杂得多。日本感到恼火的是，直到宣布这一消息前 15 分钟才被告知，并担心美国人会放弃他们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之后，日本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承诺与中国大陆进行大量贸易。韩国和南越双方都担心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和平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再支持他们对抗共产主义敌人。在整个和解期间，韩国与南越两国必须定期得到保证，他们不会被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则批评："今天任何国际安抚邪恶势力谋求政权平衡的运动，都无助于

世界和平，反而拉长了70亿人民的苦难，扩大了世界的灾难。”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访问结束后，美中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外交政策观点。在公报中，两国承诺致力于实现外交关系的全面正常化。这并没有导致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双方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联络处”。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该声明使美中两国暂时搁置台湾问题，开放贸易和交流。此外，美国和中国都同意对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的“任何国家”采取行动。在朝鲜、越南、以色列等国持续不断的冲突等问题上，美中未能达成共识。

尼克松访华后，大部分主要的反美宣传在中国消失了；尽管偶尔还会有人批评美帝国主义，但苏联在 1970 年代已明确成为中国的死敌。

与美国的和解使中国受益匪浅，并大大增加了冷战剩余时间的安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美国看到的好处比它所希望的要少，因为中国继续支持美国在河内与平壤的敌人。然而后来，中国对越南的怀疑导致中越合作中断，并在 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引发了中越战争。中国和美国都支持非洲的战斗人员对抗苏联和古巴所支持的力量。中美双方正常化的经济效益是缓慢的。尽管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被许多人视为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亮点，但威廉邦迪等其他人则认为这对美国几乎没有好处。

联络处（1973–1978）

1973年5月，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国分别在北京设立了美国联络处（USLO），在华盛顿设立了中国对口办事处。1973年到1978年，大卫·柯布鲁斯，乔治·HW布什，托马斯·S·盖茨，和伍德科克，相继担任USLO的负责人。中国明确表示将苏联视为主要对手，并敦促美国保持外交强势，从而分散莫斯科的注意力。

联络官乔治·布什总结道："中国一直希望我们强大，希望我们保卫欧洲，希望我们增加国防预算等等。"布什总结说，美国的参与对于支持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市场、盟友和稳定至关重要。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 1975 年访问了中国，并重申了美国对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兴趣。1977年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再次重申了上海公报的目标。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期望卡特寻求与中国的全面外交和贸易关系。尽管布热津斯基寻求迅速与北京建立安全关系以对抗苏联，但卡特站在国务卿万斯一边，认为这样的协议会威胁到现有的美苏关系，包括SALT II谈判。因此，政府决定谨慎地追求政治正常化而不是军事关系。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于 1978 年初前往北京，与当时的联络处负责人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 合作，为政治正常化做奠定基础。美中两国于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两国政府将于1979年1月1日建交。

外交关系正常化

在1979 年 1 月 1 日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北移交给北京。美国重申《上海公报》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北京承认美国人民将继续与台湾人民进行商业、文化和其他非官方接触。

台湾虽然对这一步并不意外，但对美国没有先征求意见表示失望。共产主义世界的反应与1972年类似，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大多不置可否，罗马尼亚对此表示欢迎，古巴和阿尔巴尼亚强烈反对。朝鲜发表声明祝贺“我们的兄弟邻居结束与美国的长期敌对关系”。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1979年1月访问华盛顿启动了一系列重要高层交往；这些高层交往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春天；这导致许多双边协定，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文化等交流的领域，以及贸易关系。自 1979 年初以来，美国和中国根据最大的双边项目《科技合作协议》启动了数百个联合研究项目和合作项目。

1979年3月1日，两国正式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1979 年，悬而未决的私人索赔得到解决，双边贸易协定得以完成。沃尔特·蒙代尔副总统以 1979 年 8 月的中国之行回应了邓副总理的访问。这次访问促成了 1980 年 9 月关于海事、民航联系和纺织事务的协议，以及双边领事公约。

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威胁是使华盛顿和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的主要因素。美中军事合作始于1979年；美国开始向中国出售武器，1981 年有消息称，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设立了一个美中联合监听站。

中国对美国先进技术的需求并不总是得到满足，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要么出于原则不信任向共产主义国家转让技术，要么担心无法保证此类技术不会最终落入不友好的第三方手中。1983年，美国国务院将中国的分类改为“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增加了可以出售的技术和武器数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在 1980 年代继续向伊朗和其他公开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出售武器。

由于 1980 年开始的高层和工作级别接触，美国与中国的对话扩大到涵盖广泛的问题，包括全球和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包括军备控制、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事务和国际麻醉品事务。纽约市和北京成为友好城市。

高层交往仍然是 80 年代美中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1984年，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总理赵紫阳互访。里根访问北京的进程顺利，但他在访问中的批评苏联、并赞美资本主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讲话没有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美国。1985年10月布什副总统访华并在成都开设美国总领事馆，这是美国在中国的第四个领事馆。1985 年至 1989 年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内阁级官员交流，直到布什总统于 1989 年 2 月访问北京。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不久，他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欢迎与台湾重建关系。这些言论引起了北京的最初关注，但里根的顾问很快就他的讲话道歉，总统选择很快收回了那些话。里根执政的头两年里，由于总统大声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两国无法就朝鲜冲突、以巴冲突达成共识，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在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邓小平重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批评美苏帝国主义。1983年，因中国网球选手胡娜叛逃美国，以及纽约奥运游行花车展示台湾国旗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而中美双方发生争吵。

在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前的时期，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中美两国人民广泛接触彼此的文化、艺术和教育成就。每个月都有许多中国大陆专业和官方代表团访问美国。许多这样的交流在天安门抗议活动被镇压后仍在继续。

台湾问题

自1979年初美中关系恢复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争论的主要焦点。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意向后，中华民国（台湾）立即谴责美国，引发台湾对美国的强烈抗议。1979年4月，美国国会签署了《台湾关系法》，一方面允许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宣示美国有权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1981 年，由于中国反对美国在台湾向中华民国出售武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不断扩大的双边关系受到威胁。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于 1981 年 6 月访问中国，以解决中国对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

的担忧。布什副总统于 1982 年 5 月访问中国。经过八个月的谈判，产生了 1982 年 8 月 17 日的美中联合公报。在第三次公报中，美国表示打算逐步减少对中华民国的军售水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把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描述为一项基本政策。当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台湾问题之争愈演愈烈；特朗普总统决定接听蔡英文总统的电话，成为自 1979 年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以来第一位与台湾进行正式政治或外交接触的在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了美国事实上的驻台北美国非官方大使馆的职责——增加了更多的安全人员，并允许了蔡英文政府和美国国会议员与官员对彼此国家/地区的非外交访问增加。此外，据报道，美国军舰越过台湾海峡并加强与台湾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直接威胁。台湾政府也发出警告要求所罗门群岛不要承认中国，以保护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减少的邦交国数量。

乔治 HW 布什政府 (1989–1993)

一直看好中国的民主特征将要出现、以应对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国人，对 1989 年亲民主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所受到的残酷镇压感到震惊和失望。美国等政府针对中国侵犯人权采取了多项措施。美国暂停与中国的高层交往和美国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美国还实施了多项经济制裁。1990年夏天，在七国集团 休斯敦峰会上，西方呼吁在中国大陆重新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在人权政治领域。

天安门事件扰乱了美中贸易关系，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大陆的兴趣急剧下降。旅游客流量急剧下降。布什政府于 1989 年 6 月 5 日至 20 日谴责

镇压并暂停了某些贸易和投资计划，但国会负责实施更多行动；而白宫本身对北京的态度远没有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那么负面；白宫反复表示希望两国保持关系正常化。八九六四以后，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制裁措施是来自于国会立法机构，而另一些制裁措施则是行政行为。例子包括：

美国贸易发展署（TDA）：从1989年6月至2001年1月，在中国大陆的活动被停止；2001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解除这种禁令。

海外私人保险公司（OPIC）：新业务自 1989 年 6 月起停止。

世界开发银行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信贷：美国不支持世界开发银行对中国贷款，也不会支持 IMF 向中国提供信贷，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项目除外。

军用品清单出口：除某些例外情况外，不得为美国军用品清单上的任何国防物品的出口向中国颁发许可证。根据总统的国家利益决定，可以免除此限制。

武器进口——在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后，禁止从中国进口国防用品。它涵盖了所有BATFE的武器进口名单。在这关键时期，美国职业外交官J. Stapleton Roy出任驻北京大使。

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跌至 1960 年代以来的最差水平；北京指责美国“颠覆中国社会主义长达数十年的阴谋”。从 1989 年到 1992 年的两年半期间，随着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中国更加固执于强硬的毛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政治。尽管如此，中国继续寻求外国商业和投资。

美中军事关系和军售在 1989 年突然终止，到 2020 年从未恢复。1989 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格言论审查之下的）中国舆论对美国的敌意更加强烈，以 1996 年宣言“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愤怒的作者呼吁北京对美国和日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建立更强大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先是赞同宣言，后来又斥之为不负责任。

克林顿政府（1993–2001）

比尔・克林顿在 1992 年竞选总统时严厉批评了他的前任乔治・H・W・布什，说布什将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置于中国人权问题之上。然而，在 1993 年至 2001 年担任总统期间，克林顿放弃了他的竞选立场。他确实清晰地阐明了，希望中国达到怎样的一些理想目标。它们包括自由移民、禁止出口监狱劳工制造的商品、释放和平抗议者、按照国际标准对待囚犯、承认西藏独特的地域文化，允许国际电视和广播报道，以及遵守联合国决议规定的人权公约。中国拒绝遵守；到 1994 年夏天，克林顿承认失败，并呼吁恢复正常化的贸易关系。同时，尽管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国会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共和党的压力，迫使克林顿批准对台军售。

1993年，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拦截了一艘前往科威特的中国集装箱船银河号，将其扣留数周，声称其为伊朗运送化学武器物资，并最终强行在沙特阿拉伯对该船进行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化学武器物资。这一事件在中国被视为美国欺凌。

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显然是为了在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前恫吓中华民国选民；这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向该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随后，台海紧张局势缓和，美中关系有所改善，高层交往增加，在包括人权、核扩散和贸易在内的众多双边问题上取得进展。中国领导人江泽民1997年秋季访问美国，这是自1979年以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通过这次访问，双方就落实1985年和平核合作协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访问中国。他在中国大陆广泛游历，与中国人民进行了直接互动，包括现场演讲和广播节目，让总统能够传达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然而，克林顿总统因未能充分关注中国大陆的侵犯人权行为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1999年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本书作者注：当时，美国正在打击南斯拉夫独裁者政府，其首都贝尔格莱德处于战火之中；很多其他国家大使馆都已经撤离该地，但中国暗中对于独裁者政府强力支持，而且不撤离其本国大使馆人员），白宫解释说是由于情报和军方之间的信息错误，尽管有些中国人相信是故意的。无论如何，北京连续几天被大规模的反美示威震动。到1999年底，两国关系开始逐步改善。1999年10月，两国就对遇难者家属的赔偿、以及分别在贝尔格莱德和中国的外交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达成协议。1999 年的美中关系也因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指控而受到损害；他被指控将美国的核机密交给北京。

2001 年 4 月，在中国近海的国际空域，一架中国空军的 J-8 战斗机与一架美国空军 EP-3侦察机在海南岛事件中相撞。EP-3在中国海南岛紧急降

落，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中国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丧生。在销毁与飞机操作有关的所有机密文件后，机组人员被解放军拘留。经过广泛的谈判产生了“very sorry的信”（本书作者注：sorry一词在英文中既可以表示抱歉的含义，也可以表示当对方遭遇不幸的时候、表达为对方事故感到难过的含义；在该英文信中，根据英文的情景上下文，其含义是为对方的事故而“难过”；但根据中文翻译文件，该信的含义被故意翻译成“抱歉”），随后，EP-3 的船员被释放，并在 11 天后获准离开中国。三个月后，美国飞机被拆解、分批归还，此后美中关系逐渐好转。

乔治·W·布什政府 (2001–2009)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后，美中关系有所改善。两名中国公民在世贸中心遇袭中丧生。中国企业和个人向美国同行表示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在新疆受到穆斯林分裂分子的困扰，2001 年中国在 APEC 会议上公开大力支持反恐战争。中国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 号决议，公开支持在阿富汗的联军运动，并在塔利班战败后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 1.5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和中国也开始了反恐对话。第三轮对话于 2003 年 2 月在北京举行。

在美国，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威胁极大地改变了话语的性质。正如“蓝队”早些时候断言的那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已不再合理，而关注中东和反恐战争的需要避免了潜在的把东亚当作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中国领导人最初担心反恐战争会导致美国的反中国努力，特别是当美国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建立基地并重新打击伊拉克时。但在美国伊拉克战后，中国的这些担忧已基本消退。美国在伊拉克的权力运用以及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持续努力大大减少了 1990 年代中期流行的中国反美情绪。

中国和美国还在地区问题上密切合作，包括与朝鲜及其核武器计划有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语言上强调反对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对朝鲜核能力表示口头关切，以及表达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口头愿望。它还投票决定将朝鲜不遵守其国际原子能机构义务的行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台湾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但仍处于控制之中。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强调"四不一没有"（本书作者注：这是陈水扁在其总统就职时所宣布的政策，即，陈水扁说"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议题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有时，美国指责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的挑衅性支持独立言论。然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声明称，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诉诸"非和平手段"。许多批评中国的人认为中国正试图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时机（因而无暇顾及东亚事务），来主张其对中华民国领土的主张。2008年，台湾选民选举马英九为总统。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的竞选纲领包括与中国大陆和解。他的选举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皮尤在 2008 年春季对中国全体人口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消极——69% 的人对日本持负面看法，相当多的中国人(38%) 认为日本是敌人。对美国的看法也往往是负面的，34%的人将美国描述为敌人，而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伙伴。对印度的看法充其量是混合的——25% 的人认为印度是合作伙伴，而类似的数字 (24%) 将其描述为敌人。

奥巴马政府（2009-2017）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战争和经济衰退的问题是辩论的中心；但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还谈到了关于广泛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双方都赞成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但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分歧。奥巴马对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价值以便利中国出口商表示担忧。麦凯恩认为，自由贸易至关重要，并且正在中国产生变革性影响。尽管如此，麦凯恩指出，虽然中国可能与美国有共同的利益，但它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大多数当地人和国内媒体的积极正面反应。他的总统任期培养了两国之间加强合作和提高友谊水平的希望。2008年11月8日，胡锦涛和巴拉克奥巴马进行电话交谈，中国主席祝贺奥巴马在选举胜利。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发展美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访问中国，讨论

经济担忧、核武器扩散担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201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警告中国停止在南海快速造岛。

特朗普政府（2017-2021）

（本书作者注：中美贸易额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的二十年中大幅增长，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履行其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各种政策承诺，例如，开放市场、削减进口关税以及取消各种贸易壁垒；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对美国长期享有巨额贸易顺差，长达二十多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值达到美国出口中国价值的数倍之多；这种长期贸易失衡局面，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日，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这是1979年以来台湾领导人首次与美国当选总统通话或首次接触；它激起北京提起外交抗议、“严正交涉”。特朗普通过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的访谈来澄清他的举动，“我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除非我们与中国在其他事情上达成协议，包括贸易。”

特朗普就职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官员在官网上写道，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集结，以及用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武装韩国，是挑衅性的“热点”，“越来越接近点火”，并且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加真实”。

在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主权要求时，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这些岛屿其实都是在国际水域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将确保我们保护国际领土不被一个国家接管。”

1 月 4 日，在访问日本时，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重申华盛顿根据《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承诺保卫日本，包括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

2 月 9 日，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广泛的问题；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现状的承诺。

2018 年 3 月 13 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 表示：“要明确我们与中国未来关系的性质，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未来五十年我们将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并确保我们所有人民的繁荣时期；两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之间没有冲突。”

中国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对 128 类美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的国家安全税。中国政府的反应是经过衡量的，影响了每年 30 亿美元的中美贸易，约占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 2%。到 2018 年 9 月下旬，特朗普政府已对价值 2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增税 25%），试图抵消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2018 年 12 月 1 日，应美国当局的要求，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捕，这进一步加剧了美中关系的压力。美国参议员本•萨斯指责中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经常“利用私营部门实体”绕过美国对向伊朗出售电信设备的制裁。

2018 年 8 月，美国政府签署了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立法更新，将政府审查范围扩大到审查中国政府资助的对美国科技初创公司的投资。

美国两党议员均表示支持2019 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中美双方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与其他贸易协定不同，该协定不依赖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政府间组织进行仲裁，而是通过双边机制进行仲裁。

快速恶化

Michael D. Swaine在 2019 年认为：

“美中关系正面临建交40年来最艰巨的挑战。当前的趋势预示着长期内关系会恶化，对所有相关行为者造成越来越不利的后果。具体而言，北京和华盛顿正在从有时有争议但互利的关系转变为越来越对立、相互破坏的一系列互动。几十年来维持双边关系的积极和乐观的力量、利益和信念正在让位于几乎所有参与领域的过度悲观、敌意和零和思维。”

两位美中关系专家牛津大学罗斯玛丽·福特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艾米·金表示，专家们的共识是：

“两国关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恶化。原因……涵盖了大量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些因素与美国和中国官方人员的变动有关，另一些因素与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相对权力的变化有关，还有一些因素与中国改变全球治理的更大决心有关。”

富特和金强调中国在开发具有重大军事和商业意义的尖端技术方面的积极努力；而美国则认为有必要积极防御技术盗窃。

根据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 ）的说法，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技术冷战中，特朗普对中国的技术战争一直是其政府最大的外交政策胜利，他说，“在技术脱钩问题上，美国与大多数盟友都立场相同。”

根据南加州大学的学者格雷格·奥特里的说法，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他指出财政部增加了收入，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从中国离开，并称赞特朗普政府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没有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真实利益的人，并且，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和苏珊·赖斯（Susan Rice）批评中国在贸易、孟晚舟事件（孟晚舟被指控涉及在关于华为资助伊朗之事上欺诈香港银行）和香港民主抗议运动方面的行动，同时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反击力度不够。

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建议，鉴于习近平的一党领导，每个人都应该停止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中国总统” ，而应使用中共总书记这个词。

2020 年 1 月 29 日，内政部的 800 多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包括大疆制造的无人机，以安全为由停飞。

2020 年 2 月 18 日，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营业的五家中国官方媒体公司将被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它们在美国政府合法注册为外国政府实体。第二天，中国对驻京的华尔街日报的三名美国记者采取了行动，撤销了他们的记者证。路透社 2020 年 3 月的一篇文章称，由于北京“长期对驻华外国记者进行恐吓和骚扰”，华盛顿将使中国主要媒体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 160 人削减至 100 人。作为回应，中国驱逐了《纽约时报》、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十几名美国记者，这引起了国务院的批评。5月8日，美国将在非美国新闻媒体工作的中国公民从开放式工作签证改为可延期的90天工作签证，并于6月指定了另外四家在美营业的中国媒体机构作为外国政府实体。

2020 年 8 月，乔·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托尼·布林肯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

在COVID-19 大流行期间，美国人，尤其是年长的共和党选民，对中国和中

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看法越来越消极，表达了对经济、人权和环境的担忧。

到 2020 年 5 月，两国关系恶化，华盛顿发动了一场调查、起诉和出口限制运动。与此同时，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加强军事活动，对美国国务卿迈克彭佩奥进行谴责，并公开诽谤美国军方故意在中国释放病毒。在越来越多的诽谤中，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阻止向华为运送半导体，而中国方面则威胁要将苹果、波音和其他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并指责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利用国家权力，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压制和遏制其他国家的特定企业。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 Orville Schell）将情况总结如下："美中关系破裂的后果对世界和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合作能力是整个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拱门的基石。随着这一点的消失，将会有大量的干扰。"

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2020 年 6 月 17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授权美国对负责关押超过 100 万维吾尔 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拘留营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制裁。2020年7月9日，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强大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和签证限制。

2020 年 7 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他说，"联邦调查局现在每 10 小时就会开立一个新的与中国有关

的反间谍案件。在目前全国正在进行的近 5000 起活跃的反间谍案件中，几乎有一半与中国有关。”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2020 年 7 月的一篇文章断言中国和平崛起的终结，称虽然两代美国学者都希望中国在 2020 年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这些希望已经破灭。

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2020 年 7 月 20 日，美国制裁了 11 家中国公司，限制了它们与美国的任何贸易行为，因为美国政府称它们参与了中国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指责它们使用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强迫劳动。

2020 年 7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宣布结束他所谓的与中国政府的“盲目接触”。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为“已经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真正的信徒。”

2020年8月，华盛顿宣布制裁11名香港政府官员和中国大陆官员，因为他们破坏香港自由与法治环境；作为报复，中国制裁了 6 名共和党议员和 5 名非营利组织和人权组织的个人。

2020 年 9 月，美国根据 5 月 29 日的总统公告撤销了 1,000 多个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美国政府称这些学生和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有联系；以防止他们窃取或以其他方式盗用敏感研究技术。

2020 年 9 月 26 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实施限制，随后要求它的美国供应商获得出口许可证才能向它出口芯片与技术。美国认为，中芯国际的设备可能用于军事目的。

2020 年 10 月 1 日，美国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立法，将中国共产党（CCP）列入国际犯罪组织最高目标（TICOT）名单，并向美国执法机构提供战略建议，以针对中共的恶性活动。

2020年10月6日，德国驻联合国大使代表德国、英国和美国等39国集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和限制香港自由的做法。

2020 年 10 月 9 日，美国司法部禁止使用其资金购买中国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美国司法部将其归类为“涵盖的外国实体”。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建议特朗普总统将中国蚂蚁集团列入其贸易黑名单，因为担心未来用户的银行数据会被访问。

2020年10月21日，美国批准对台军售18亿美元。它涉及三个部分，其中包括高科技武器，例如 SLAM-ER 导弹、HIMARS M142 发射器和 Recce Pods。2020年10月26日，中国宣布有意对包括波音、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在内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台湾对军售表示欢迎，也表示将继续从美国购买武器。

2020 年 10 月 27 日，美国和印度签署了《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加强了信息共享和进一步的防务合作，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

2020 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情报官员评估说，中国实行了一项悬赏计划，该计划支付阿富汗武装分子杀死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

2020 年 12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结束了与中国的五项文化交流项目，分别是——“决策者中国之旅项目”、“美中友好项目”、“美中领导人交流项目”、“美中跨太平洋交流项目”、以及“香港教育文化计划”。他们将这些项目描述为中国政府的软实力政治宣传工具。

2020 年 12 月，Axios发布了一项报道，详细说明了中国公民 Christine Fang 的可疑活动；美国官员怀疑，从2011 年至 2015 年，她在美国期间为中国国家安全部(MSS)进行了政治间谍活动。虽然方在 Axios 调查之前的可疑活动已经受到联邦执法机构的审查，但随后对其发布的反应引起了政界人士和媒体的进一步审查。

2021 年 1 月 19 日，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正式宣布中国正在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蓬佩奥呼吁“所有适当的多边和相关司法机构与美国一起努力追究对这些暴行负责之人的责任。”

拜登政府（2021-）

2021 年中国与拜登新政府的关系包括贸易、技术和人权方面的紧张局势加剧，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待遇问题。此外，关于南海控制权的国际紧张局势仍然很严重。然而，拜登和习政府同意在有关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的长期项目上进行合作。

2021年1月20日，中国对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前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前副国务卿基思・J・克拉奇、即将卸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等24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称制裁“徒劳且不负责任”。新任国务卿布林肯支持蓬佩奥关于中国正在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报告，重申了拜登的竞选立场。

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计划延续特朗普严格、强硬的政策，但通过争取美国盟友的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多边方式，在安全和经济增长相关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对北京施加影响。这被视为背离了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好战言论和单方面做法。2021 年 1 月下旬，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重申中国寻求与美国和平共处的长期立场，并呼吁华盛顿的美国新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美国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呼吁中国良善对待维吾尔族人。拜登总统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将中国称为美国“最严重的竞争对手”。

经济关系

1991年，中国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多年来，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需要每年最惠国待遇豁免以维持自由贸易地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豁免自 1980 年起生效。从 1989 年到 1999 年，国会每年都会试图通过立法反对总统的豁免。该立法试图将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与中国人权条件联系起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授予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是在 2000 年完成的；允许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美国的中国最惠国待遇(MFN) 地位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永久化。

自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 WTO 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速度加快（由于中国冲击）。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导致了，从2001年至2011年，包括制造业等行业在内，美国损失了270万个就业

机会。

中美于1972年和1973年恢复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涵盖广泛的制造业、大型酒店项目、餐饮连锁店和石油化工等。美国公司已在中国大陆设立了20,000多家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超过100家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有项目，其中一些有多项投资。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累计投资价值为 480 亿美元。2006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超过3500亿美元，是美国的全球贸易中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影响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的一些因素包括：

——低端组装行业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日益成为增值生产长链中的最后一环。

——美国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需求超过国内产出：中国在中国大陆实行限制性贸易做法，其中包括对外国商品和服务设置广泛的壁垒，通常旨在保护国有企业。这些做法包括高关税、缺乏透明度、要求企业获得进口商品的特别许可、不一致的法律法规适用、以及利用外国企业的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旨在帮助解决这些障碍（本书作者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前的谈判中，承诺逐渐取消上述贸易壁垒；但是，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中国没有实现其大部分承诺）。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被人为控制和低估。

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 2019 年，由于持续的贸易战，中国跌至第三位。

货币争议

中国在 21 世纪一直是货币操纵国。经济学家C. Fred Bergsten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稿称，在 2003 年至 2014 年期间，“中国每年购买超过 3000 亿美元，以通过人为地保持美元汇率来抵制其货币升值。中国的竞争地位因此在干预高峰期增强了 30% 至 40%。货币操纵解释了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原因，在 2007 年达到了其整个 GDP 的惊人 10%。”在此期间，中国的货币操纵是与美国的冲突点。美国国内领导人施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迫使其升值，并向美国国会提出立法，要求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直到中国适当地重视其货币操纵问题。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而，作为就正在进行的贸易战达成贸易协议的努力的一部分，它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取消了这一指定。

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中国是美国公共债务的主要债权人和第二大外国持有者，并且一直批评美国的赤字和财政政策，建议维持美元购买价值的政策，尽管除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外，它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中国谴责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应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并建议美国不要继续积累债务，最后声明称美国不能继续借钱来解决金融问题。

重要问题

美国对中国军事预算的担忧可能源于美国担心中国正试图威胁其邻国或挑战美国。有人担心中国正在南海附近发展大型海军基地，并将资源从解放军地面部队转移到解放军海军以及空军和导弹开发。

2009 年 10 月 27 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称赞中国为提高国防开支透明度所采取的措施。然而，2010 年 6 月，他表示，中国军方正在抵制改善与美国两军关系的努力。盖茨还表示，美国将"主张航行自由"，以回应中国对美国海军在中国附近国际水域部署的抱怨。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军事联系，但将继续在西太平洋开展行动。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该地区的六个美国空军基地中有五个可能容易受到中国导弹的攻击，并呼吁加强防御。

与此同时，《原子科学家公报》在 2010 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继续投资于核力量的现代化，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威慑力量容易受到美国能力的影响，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将推动中国的进一步支出。

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

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11年报告中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将在15 - 20年内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平等。

《华尔街日报》2012 年的一篇文章称，中国正在发展攻击卫星和网络战的能力。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R·霍姆斯教授表示，中国对未来潜在冲突的投资与美国的投资更接近，因为中国低估了他们的支出和内部价格结构。两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只需要专注于在离自己海岸很近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美国及其盟国削减开支，这种平衡可能会很快转向中国的优势。

人权

2003年，美国宣布，尽管当年有一些积极的势头，并且有更多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接触，但仍然存在严重的倒退。中国原则上承认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并声称已采取措施使自己的人权实践符合国际规范。这些步骤包括1997 年 10 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于 2001 年 3 月获得全国人大批准；以及1998 年 10 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全国人大尚未批准。2002 年，中国释放了大量政治犯和宗教犯，并同意与联合国专家就酷刑、任意拘留和宗教问题进行互动。然而，国际人权组织声称，这些承诺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自那时以来，有更多人因类似罪行被捕。这些团体坚持认为，中国在进行根本性的系统性变革以保护中国大陆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其中包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评估。

在一项遭到人权组织批评的决定中，美国国务院没有在其 2007 年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人权实践报告中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之一。然而，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 助理国务卿乔纳森·D·法拉尔（Jonathan D. Farrar）表示，中国在2007年的总体人权记录仍然很差。

2014 年 2 月 27 日，美国发布了其2013 年中国人权实践报告，根据其执行摘要，该报告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威权国家，是一个镇压和胁迫司空见惯的地方。

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特别是在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上，在 2018 年底和 2019 年明显扩大。2019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迈克庞培间接将中国与德国纳粹相提并论。他表示，国际社会"自 1930 年代以来"从未见过像穆斯林少数群体被围捕到营地这样的类似于大规模集中营的做法。2019年5月，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将维吾尔人置于"集中营"。美国政府也考虑制裁参与集中营的中国官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共产党书记陈全国。2019年7月，副总统 迈克·彭斯指责中国政府迫害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

2019 年 10 月 4 日，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发布了一条推文，支持2019-2020 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莫雷的推文导致中国篮协暂停与休斯敦火箭队的关系，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发出不满声明。10 月 6 日，莫雷和NBA分别发表了针对原始推文的解释声明（并看似包含道歉的意味）。莫雷表示，他的推文从未打算引起任何冒犯，NBA 称

这条推文“令人遗憾”。这些道歉声明受到美国政界人士和第三方观察员的批评，认为中国在行使经济治国之道，以及 NBA 对莫雷推文的辩护不足。批评者还将NBA对莫雷推文的反应与NBA的政治激进主义历史进行了对比；并将这一事件与 10 月 2 日漫画剧集“南方公园”的一集“中国乐队”相提并论，后者模仿和讽刺美国娱乐业的自我审查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要求。由于莫雷没有进行充分道歉，这些声明还因其被认为的不足而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

2020年6月，白宫在天安门镇压31周年之际，要求北京尊重人权，履行对香港的应有承诺，斥责其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2020年7月9日，美国宣布制裁那些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政治家。

许多美国公司，包括达美航空、纽约客车、万豪国际、卡尔文克莱恩和蒂芙尼公司，在“冒犯”了中国和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后，曾经向中国道歉。

2020 年 9 月 15 日，美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阻止中国新疆地区的部分出口，原因是该国涉嫌侵犯人权，主要针对该地区的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

2021 年 1 月 19 日，即将卸任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蓬佩奥在一封书面信中写道：“我相信这场种族灭绝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目睹中国有系统地企图消灭维吾尔人及其文化。”蓬佩奥呼吁“所有适当的多边和相关司法机

构，与美国一道，共同努力推动向对这些暴行负责的人追究责任。”中国强烈否认新疆正在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乔·拜登 (Joe Biden) 的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他同意蓬佩奥 (Pompeo) 的评估。

拜登总统20日就职前后，中国宣布对蓬佩奥和其他27名前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中国指责他们“策划、推动和执行”干涉中国内政。制裁禁止他们进入中国、香港或澳门。它还限制与他们有关联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亚洲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通过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回应中国对海域的主张。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表示，尽管面临预算压力，但美国将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国的军事集结。

2013年6月7日，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在《外交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必须停止争取信任，而是强调验证：——“信任导致和平的前提是，中美之间的猜疑是毫无根据的，随着更多更深入的对话，这些猜疑会烟消云散。不幸的是，至少其中一些猜疑是完全有道理并符合事实的。国际法是否应该管辖亚洲的地区事务，是否应该允许中国提出广泛的主权主张，以及韩国和日本未来的战略作用是什么？”

罗伊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问题，因此无法实现战略信任。“两国应努力通过达成双方都看到利益、且合规性可衡量的协议，来管理其不可避免的双边战略紧张局势......对于这些固有的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来说，重点在于‘验证’，而不是‘信任’。”

网络战和选举干预

在2014年，中国黑客破解了美国的计算机人事管理系统，导致约2200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人事档案被盗。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表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和反间谍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于曾为、试图为、或正在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每个人的信息宝库。”

2018年10月，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就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正在将技术嵌入发送到美国的微芯片中，这些芯片收集美国消费者的数据。然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金·尼尔森均拒绝证实这一说法。尼尔森表示，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并在回答参议员提问时证实，中国正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2019 年，两名中国公民因Anthem 医疗数据泄露而被起诉。大约 8000 万条公司记录遭到黑客攻击，引发了人们对被盗数据可能被用于身份盗用的担忧。2020 年 2 月，美国政府起诉中国解放军成员入侵美国的全国个人

信用记录公司Equifax并掠夺敏感数据，成为大规模信息抢劫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窃取商业机密。超过 1.45 亿美国人的私人记录在2017 年 Equifax 数据泄露事件中遭到窃取。

COVID-19

2020 年 9 月 22 日，唐纳德·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呼吁联合国“让中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特朗普总统将COVID-19的全球传播归咎于中国政府，当时COVID-19已在全球感染了 3100 万人，并导致超过 965,000 人死亡。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foreign_policy_toward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走向，起源于冷战期间。当时，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政策。泄露的五角大楼文件表明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取军事行动遏制中国的努力。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中国和解政策标志着焦点转变。美中正式外交关系于1979年建立，2000年以来贸易关系正常化，美中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在 2010 年代和 2020 年代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内说，“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和繁荣。如果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它符合美国的良好利益。” 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承认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 拜登政府表示，以前用乐观的方法来看待中国的方式,是有缺陷的，而且中国的姿态“是对美国最显著的挑战”。

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改善与印度和越南关系的努力、以及奥巴马政府2012 年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参与的“转向亚洲”战略，都有关旨在对

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指定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试图推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取代美国，并呼吁整个美国政府联合行动,回归原则性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政策。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与韩国、日本、菲律宾军事联盟，以及在阿富汗部署的部队（预计2021年9月撤回）。

背景

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美国试图阻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国家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的多米诺效应。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于 1971年在五角大楼文件中指出了有关美国干预越南以及将秘密作战行动扩大到附近柬埔寨和老挝背后的动机。

总统林登•B•约翰逊说，越南战争的目的是确保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指责红色中国怀有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那样的帝国主义抱负。据他说，中国密谋“组织整个亚洲”对抗美国。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美国的中国遏制政策是一个与盟国长期战略性合作的政策，旨在围绕北京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以及：（一）日本-韩国线，（二）印度–巴基斯坦线，以及(三)东南亚线。

冷战后

在随后的时代，随着尼克松的和解和上海公报的签署，美中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1979年正式建交，2000年经贸关系正常化，中美经济联系更加紧

密。

美国 2006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拥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最大潜力，并拥有在没有美国反制战略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破坏性军事技术”。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它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将面临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要求走东亚许多现代民主国家的道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增加政治自由。该文件继续指出，中国不能继续走这条和平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坚持加剧地区和国际安全担忧的“旧思维和行为方式”。美国在关于中国不透明的军事扩张、重商主义（中国追求贸易顺差、贸易保护、进口壁垒）、以及中国支持有不可接受行为记录的资源丰富的外国政权（例如伊朗与朝鲜）方面，提到了中国“旧方式” 。

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在 2011 年开始转变政策立场，从奥巴马政府“重心”转向亚洲开始。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资”，这被视为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举措。增加美国在东亚的参与度的支持者将美国视为对中国过度扩张的一种制衡。与该论点相关的事实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例如在南海和尖阁诸岛，曾抱怨中国在争议地区的骚扰。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在此类争端中利用其经济实力，例如在黄岩岛紧张局势期间突然限制中国进口菲律宾香蕉。

发展

2019 年 4 月，具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团，即“当前危险委员会（CPDC）”，在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成立。该组织是由前特朗普

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和前里根政府官员弗兰克·加夫尼等人成立，旨在“教育、并告知美国公民和决策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所带来的重大威胁”。CPDC认为，“只要共产党执政，就没有与中国共存的希望”。

保罗·马斯格雷夫，一位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助理教授，评论说，特朗普政府透露了与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的战略细节。2019 年 4 月 29 日在未来安全论坛上的演讲中，斯金纳认为中美不太可能有妥协或合作，因为这是“......一场与真正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2019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称，斯金纳被迫辞去国务院的工作，特朗普政府官员私下驳回了她的评论。五位关注中国的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发表了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并得到了一些商界领袖的支持，他们在信中谴责美国的做法是“适得其反”，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继续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

由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冷战后世界的持续目标存有疑问，北约国家没有重新定位中国并将其标记为彻头彻尾的“敌人”，但北约主席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该组织需要认识到中国在 2019 年北约活动中提出的“挑战”，称“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它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国防预算，大量投资于新能力。”他还说北约不想“制造新的对手”。

2020年5月20日，根据《约翰·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该报告陈述了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采取的全政府政策；该报告称，现在是美国“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失败政策的时候了——这些政策基于

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与竞争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能够将把它们变成良性的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

报告称，它"反映了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中国领导人行为的根本性重新评估，并补充说"美国认识到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

2021 年 2 月，美国总统 乔·拜登表示，中国是"最严重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挑战。美国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此前美国对中国的乐观态度存在缺陷，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世界上任何民族国家中最重大的挑战"。布林肯还同意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是正确的"。

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提出了重大立法。该法案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反映了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强硬态度，旨在对抗中国政府的外交和战略举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D-NJ) 说："2021 年的战略竞争法案承认，这一刻需要统一的战略回应，以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投资于我们超越中国的能力，并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重新建立外交"，并补充说，"美国政府必须对北京的意图和行动保持清醒和冷静，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战略。"

军事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大体上是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削弱其影响力。这包括加强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以及试图让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帮助他们的努力。此外，随着美国撤出与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条约（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参加该条约）。据报道，美国希望能在亚太地区找到一个部署中程导弹的基地，并将其对准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了许多军事基地，配备军舰、核导弹和具有核能力的战略轰炸机，作为威慑，并在类似于冷战的战略中实现全方位优势。

制裁

采用经济制裁一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这已成为利用的中心，在21世纪更加频繁地使用；从针对个人，到有时甚至是针对整个国家；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能够起到有效的限制贸易以及限制资金流动的作用。

新疆

在人权和国际法领域，美国提请世界注意中国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决策者尤其关注中国新疆自治区、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香港抗议活动中的中国政府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了许多“再教育营”的营地，新疆维吾尔族人在这里被强行拘押。一些非政府组织，如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和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估计有超过一百万新疆维吾尔人被政府收押。“再教育营”被描述为像监狱一样、旨在根除维吾尔文化和宗教、强迫使之汉化；并被比作纳粹德国的集中营。2019 年 12 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作为对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责任法案的响

应。

中国官员对批评和审查作出回应，拒绝外国专家的关于“再教育营收押了超过一百万人”的估计，称新疆的“职业教育中心”是为了通过教授普通话和工作技能来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并称，西方“恶意歪曲和诽谤”中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事务局发言人告诉记者，“如果你不说这是最好的方式，也许这是必要的方式处理伊斯兰或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西方在处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方面没有做到这一点”，并驳斥了新疆的监视营造戒严环境的观点，称“至于监视摄像头，中国正在向英国学习……你们人均监视摄像头的数量高于中国新疆自治区。”

香港

当一个有争议的“引渡嫌犯到中国大陆”的法案在试图被引入到香港特区的时候，激起2019-2020的香港民主抗议运动。

经济战略

随着中国于2001年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进入新市场，中国贸易增加、经济大幅增长；中美双边贸易也大幅增长。然而，美国的一些人对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感到遗憾，因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自由化从未实现。美国希望中国经济自由化将最终导致中国政治自由化的想法从未实现；正如，当初美国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的乐观看法所遭到的恶劣结局一样。

贸易战

在中美贸易战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2018 年开始对中国设置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目的是迫使中国改变美国所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美国表示，中国的这些不公平贸易行为及其影响是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被盗、以及美国技术被迫向中国转让的原因。

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如约翰•博尔顿、彼得•纳瓦罗和罗伯特•莱特泽，要求中美任何全面的贸易协议都以“结构性变化”为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贴上“债务陷阱外交”的标签。

战略联盟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2007年5月，四国签署战略军事伙伴关系协定，即四边安全对话。

美国-日本-印度；这三个国家于 2011 年 12 月举行了首次三边会议。

美国-台湾（中华民国）；

尽管美国于 1979 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保持事实上的与台湾外交关系，并受美国国会《台湾关系法》的约束，其中含糊其辞地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此类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数量足以使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在美国1970年代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以前，尽管中国国民党在1940年代中国内战期间失去了领土，但美国仍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1954年，当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作战以后，美国与中华民国（台湾）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根本上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岛。冷战期间，该条约延长并协助中华民国维持作为整个中国大陆唯一政府的合法性直至 1970 年代初，并帮助美国决策者与韩国和日本共同制定在东亚的遏制共产主义革命扩张政策。与韩国一样，日本也反对共产主义的蔓延。1980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台防务条约被废除。

近十年来，随着商业关系的扩大，美国对台军售的频率增高。2015 年 12 月 16 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向台湾武装部队出售价值 18.3 亿美元的武器，这是在美国国会通过《2014 年台湾关系法确认和海军舰艇转让法》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向台湾出售奥利弗・哈扎德・佩里级护卫舰。该交易将包括出售两艘退役的美国海军护卫舰、反坦克导弹、突击两栖车辆和 FIM-92 毒刺地对空导弹。

2018 年 6 月，美国驻台协会耗资 2.5 亿美元的新建筑在“低调”美国代表

团的陪同下揭幕。中国当局谴责这一行为违反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声明，并要求美国停止与台湾的一切关系。2019年，美国批准以2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108辆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和250枚毒刺导弹，并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66架F-16V战斗机。通过此次出售，中国发誓要制裁任何参与交易的公司。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批准了18枚MK-48 Mod 6 Advanced Technology重型鱼雷，军售估计价值为 1.8 亿美元。

美国-菲律宾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历来牢固，被描述为特殊关系。2011 年 11 月的马尼拉宣言重申了 1951 年的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韩国

美国继续在韩国设立军事基地。中国人认为，美国针对朝鲜半岛所部署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不是用于防止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而是为了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美国的潜在战争攻击。韩国部署该系统的决定导致中韩关系显着恶化。

挑战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由于中国的市场需求，澳大利亚采矿业正在蓬勃发展。因而，澳大利亚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更多经济力量的威胁和压力。

印度

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该运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没有正式结盟或反对任何大国集团，其五个支柱包括“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和平共处”。不结盟运动的基础是 1954 年中印关系协定中的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出口而言，中国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而印度仅排在第 24 位。

日本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菲律宾

在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的领导下，菲律宾与中国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试图将南海领土问题与更广泛的关系区分开来。

韩国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韩国出口的25.1%和进口的20.5%。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Cold_War

第二次冷战

（摘选）

所谓第二冷战，也或被称为新冷战，是通过各种评论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后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高度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它也被用来描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一个国家，在 1991 年解散之前，它是原始冷战的主要参与方之一。一些政治评论员使用这个词与最初的冷战进行比较。

中美紧张局势

唐纳德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国总统，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这一立场加剧了对"与中国的新冷战"可能性的猜测。2017年3月，自称社会主义的杂志《月刊》表示，"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崛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已被搁置"，并表示特朗普政府已计划从俄罗斯转向中国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

2020 年 1 月，专栏作家兼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中国是这场冷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实力在于"经济而非军事"，而俄罗斯的作用"相当小"。弗格森还写道：

"与1950年代相比，角色已经颠倒了。中国现在是巨人，俄罗斯是小伙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仍然非常忠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已经恢复了沙皇制度。"

弗格森进一步写道，这次冷战与从前的冷战不同，因为美国"与中国如此纠缠不清"，在这一点上，"脱钩"就像其他人所说的"妄想"，而且"美国的传

统盟友并不那么渴望与中国脱钩，与华盛顿结盟，反对北京。” 他进一步写道，当美国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新冷战“从贸易转向技术”。

在 2020 年 2 月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弗格森表示，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应当“与其亚洲和欧洲盟友明智地合作”，就像美国在从前的冷战中所做的那样。

2020 年 5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表示，在COVID-19 大流行的紧张局势加剧后，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 。2020年6月，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家罗伯特・S・罗斯写道，美国和中国“注定要竞争，但不注定要爆发暴力冲突或冷战”。在接下来的 7 月，罗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没有贸易，没有文化交流，没有政治交流，没有任何类似共同利益的合作。”

2020 年 8 月，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教授尼克・比斯利 (Nick Bisley) 写道，美中对抗“不会是冷战”，而是会“更加复杂、难以管理且持续时间更长”。他进一步写道，将旧的冷战与正在进行的竞争进行比较“是一项冒险的努力”。

2020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警告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正在导致“大断裂”，这将使世界付出代价。